民國叢書

第五編

·16·

社會科學總論類

社會科學新論

王亞南著

社會科學常識講話

鄧初民著

現代社會科學趨勢

孫本文編

社會科學新論

王亞南著

社會科學新論

著者　王亞南

發行者　經濟科學出版社（福州倉前山）

印刷者　風行印刷社（福州光祿坊）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增訂新版

本書據經濟科學出版社1946年版影印

序

說當前是一個科學的時代，只要稍微對時代有所認識的人，便十分贊同；但如說當前其所以被稱爲科學的時代，不只是由於自然科學發達，還更是由於社會科學發達，那就是一般自命爲站在時代前面的人物，甚至是一個自命爲社會科學研究者的人物，也還不能十分釋然。

如其說，我們近數十年的科學教育是失敗了，我敢說，在社會科學方面失敗的程度，比之在自然科學方面失敗的程度，也許還要厲害得多。

科學教育失敗的基本原因，當然應求之科學教育展開所需的社會條件，所需的促進誘因，沒有形成。但如就科學研究的本身來說，或單就社會科學研究本身來說，其失敗的癥結，却不能不歸之於學與用的脫節。大家只知道注意某門社會科學的入門知識或基礎知識，而不肯注意學得那些知識的人，對於現實有關的問題，究作如何的理解。這也許是研究社會科學

的人，連自已也不知道社會科學的重要性的許多原因之一。

近年以來，以注入的刻板的方式，叫讀者去死死閱讀什麽ＡＢＣ的傾向是有所改變了。於是通俗的，實用的社會科學讀本又風靡一時，但這種補救的方式，也許不免會矯枉過正的發生科學流俗化、常識化的毛病。

爲了使理論不避開實踐，同時還爲不使社會科學的研究，一直逗留在入門的階段，我以「社會科學論綱」這本書向我們科學界貢獻出來。

第一部包括三篇，都是關於社會科學本身的認識問題，故總稱爲社會科學認識論。因爲在認識論上，我已明確理解到一切社會科學，均是在應用過程中產生，更當在應用的過程中去理解，所以特就當前最顯著的，且爲一般論壇上談論得最熱鬧的文化，戰爭及建設三種社會事象，分別應用社會科學的基本理論加以研究。第二部包括四篇，題稱爲社會科學的文化論。第三部包括四篇，題稱爲社會科學的戰爭論。第四部亦包括四篇，亦題稱爲社會科學的建設論。這一切社會事象社會問題，當然是依據社會科學來討論的；加上「社會科學的」形容詞，似乎是「畫蛇添足」。但我的用意，卻正是因爲一般人討論這些問題，不是憑着成見、玄學，就是憑着直觀的或經驗的常識。所以，這樣的標題，乃寓有「批判的」意圖。

四部所包括的十五篇，只有「政治經濟學對於現代戰爭的說明」一篇，是從拙著「經濟科學論叢」中移來，但刪去了最後一長節；其餘只有評梁漱溟先生及評顧翊羣先生兩文，是

在到福建以前寫的，即是說，這部書主要是在福建寫成，它的出版，希望能多少有助於一般社會人士特別是一般青年研究者，對於時代，對於科學的明確認識。同時也希望大家對於書中不健全的地方，予以指正。

王亞南　一九四五年四月於永安野馬軒

新版序

這個增訂版，原來的打算，是對於原書第一版第一部「社會科學認識論」，暫不更動；第二部「社會科學的文化論」後面，增加一篇「四論東西文化與東西經濟——評余精一先生的東西文化觀」；第三部「社會科學的戰爭論」後面，添一篇「四論戰爭與社會進步——第一次大戰後的世界社會經濟變動與第二次大戰後的世界社會經濟變動」。但當我找到執筆的機會的時候，經濟科學出版社的負責人告訴我，該書再版已排印到第四部「社會科學的建設論」方面了，結局，就只有這最後一部分來得及增訂。

在第四部的原有諸論文中「關於一個有建設性的穩定戰時經濟方案」那一篇，是被抽去了，因爲它比較有時間性。此外，增加進去了以次三篇，即「混合經濟制度論批判」，「技術在生產建設上的地位」及「中國工業建設論」。經過這次增訂，建設方面的諸基本論點是大體觸到了。時人談經濟建設，常常有意無意的犯着這樣的毛病，即

（一）以爲建設需要科學，但他們理解的科學，是止於自然科學。

（二）以爲建設需要技術，遂認定技術條件就是生產建設的唯一條件。

（三）以爲建設是關於經濟的事，覺得任何形態的政治或政權，都不妨從事建設。

（四）以爲私人經營的發展是建設，國家經營的擴張亦是建設，不妨任意混同的作去。

（五）以爲建設是關於積極方面的建樹，至關消極方面的破壞或改造，是不值得怎樣注意了。

關於這些方面的不正確見解，這裏算是有一個補充糾正的說明。

至原來準備在前述第一部第二部後面增加進去的論文，只好留到第三版再說，好在余精一先生的「創作」，還只完成那部導論性的東西，「好戲」也許在後面；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經濟變動，更還有一個相當長的期間使人們覃思和揣測。

一部有關社會基本原則之應用的活的社會科學書籍，它是應當隨時增訂新版的。

一九四六年九月於湖南醴陵野馬軒

目錄

第二部　社會科學的文化論

第二部 社會科學的戰爭論

第四部　社會科學的建設論

第一部　社會科學認識論

一　研究社會科學應有的幾個基本認識

一　中國科學的貧困

在今天提出這樣一個太富有啓蒙性的課題來，一定有人覺得太過時了一點。但任何一個稍有社會科學修養的人，只要他隨時隨地留意一下我們國內論壇上，有關社會科學範疇內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等無論那一方面表述的意見，他就會發現有最大一部分完全沒有依照社會科學所要求的軌則，而都彷彿是在乘駕無軌電車，「縱意所如」，沾沾自喜的高談闊論。他們開始是談論起來，不依據科學，或根本不知道何謂科學，然後再回過頭來，說社會科學根本就不成其爲科學，彷彿這樣才好完成他們「信口開河」的不科學的「科學」根據。不幸，這樣一種非科學的或反科學的作風，並不限於一般幼稚的青年作者，那些社會諸

學科方面的專家們，也都不知不覺的充滿了這種情態。這樣，就不但造成了國內社會科學界的全面的精神貧困，在自然科學在其發展過程中，必須有社會科學幫同作滑道的啓蒙的工作的限內，自然科學界的不振，亦自是意中事。因此，抗戰過程中的國內出版界的定期刊物乃至各種中小型的叢書，儘管是非常之多，但所有這些出版刊物上的意見，如被分類歸納起來，却是非常之少，大家「入乎耳，出乎口」的在相互傳揚着少得可憐，同時却一點也經不起科學考驗的常識。不管這種精神貧困的險象是如何造成，但這種險象的存在，却是鐵一般的事實。我們時常聽見國人訴說物質貧困，却似乎沒有人注意到我們更嚴重的精神貧困。事實上，精神的貧困，是定然會齎來或加重物質貧困的。物質的貧困雖再大，雖再劇烈，我們能由科學的研究，好好去理解它，並能好好去緩和它，克服它，否則我們不能理喻的物質困難，一定會比之我們能够好好理喻它，要給予我們更大的威脅和困惑。暴風雨所給予自然科學者的可怕程度，是遠不如一般常人的。我們今日的經濟危機，事實上，被我們對它沒有明確認識的經濟學者乃至政論家們的歪曲解釋，和胡亂救治弄嚴重了許多。不重視科學或不知道如何重視科學，是隨時隨地會受到沒有科學訓練的惡果的。

因此，有關社會科學本身的認識，在今日還是有其必要的，我願就下面幾個論點來加以說明。

二　科學的三種屬性

首先，我得指出，社會科學一般的具有科學的性能。

所謂科學，原來是指着自然科學。自從社會科學於近代逐漸完成其科學體系以後，在科學的領域內，原來的所謂科學或科學一般，乃在對照的意義上，被稱爲自然科學。

科學在其發展的全歷程上，大體是由自然科學發其端緒，先把自然作爲研究的對象，後來始把社會本身作爲研究的對象。因爲我們人類在最初，或在較原始的狀態下，根本就無法從較廣闊的視野，體認到他們社會本身的變動軌則。他們當時的社會，被文化、交通、特別是生產條件等等，拘限在極狹的範圍內。可是，那極狹的視野，却並不會阻止他們直觀的體察到自然界的秩序。最有規則的天體運動，最初被他們發現出軌則了；天體運動既有軌則可循，接着物體運動的軌則就被發現了；往後，由無生物間原質與力點顯示出的因果關聯，逐漸啟發出生物界的運動秩序。最後，更進一步觀察體驗到人類社會本身的運動法則了。由天文學，到物理學，最後到社會諸學科的這種科學建立的順序，大體由法儒孔德（Comte）將它指證出來了。不過，在這個科學建立的大體順序中，我們不應忽略以次這種例外性的事實的存在，即任何一種科學，都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最後完成或建立的社會科學，它的開始被研究，或者它的研究對象開始被考察到，是在近代以前許久，或者在遠古時候的事；同時，許多自然科學的眞理的發現，或者，那些眞理的被允許發現，還有不少是得力於未完全成熟的社會科學的研究與宣揚的結果。可是，這種事實即使存在，却並不妨礙我們前面指述的科學建立的大體的一般的順序。

不管先進的自然科學，抑是後起的社會科學，在它被稱爲科學的限內，一定要具有科學的一般性能。然則所謂科學的性能，究何所指呢？那須得就科學的涵義予以說明。科學原可

稱爲法則之學，或諸種法則之綜合。我們試一揭開科學典籍，其中例皆舉列着種種定律、公理、通則一類的語辭及其解釋。換言之，即科學的書，大體可稱爲法則之書。科學的性能，是依着法則或通過法則表達出來的。我在其他場合曾經解述過（見拙著「經濟科學論叢」第三七——八頁）：

法則這個語辭，普通是用來表示諸事象在特定情形下所顯現出的相互因果關聯。一種事象，對其他諸事象，或者，其他諸事象，對某一事象，在一定條件下，發生某一作用，在它們之間，表現出了一定的變動，表現出了有關數量的質量的一事態，則在同一條件，同一作用下，那同一變動或同一事態，一定會重複的被表現出來，這即是說，法則本身存在着一種規律性。

又，某一組或某一些事象，相互間在特定情形或特定條件下，表現出一定的因果規律；在不同的情形，不同的條件下，却會表現出不同的或非前一規律所能範圍的變動現象。在紛然雜陳的諸事象，和紛然錯綜的諸作用，諸因果關聯之間，或者，在連續繼起的諸事象作用之間，有一個總的法則，把它們綜合聯貫起來，使各別的法則，從矛盾上顯出統一，從絕對上顯出相對，從一般顯出特殊，使它們各別的法則，各別的因果關聯，在總的大法則之下，表現出一種條理秩序。相成的，相續的，固不必說，即使是相反的現象，若從其最高的境界，最高級的發展形態看去，它們亦是相統率的，或者，諸規律關係之間，還存在着一種系統性。

再者，上述的這種規律性和系統性，不只說明了法則這個概念的內涵，同時還意味着它的本質。法則儘管是抽象的表現，它所表現出的對象，儘管不一定能完全，不一定能無遺漏

，但它本身，却與客觀現實分離不得。它是現實在主觀上最集中的，最有概括作用的，最真實的體現。這卻是法則的實在性。

科學的性能，可通過法則的這三種屬性而得到理解。被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着的任何法則，都須具備這三種屬性：規律性、系統性，實在性。不同種類，不同性質的科學，其法則所體現的這諸般屬性，儘管在程度上不盡能一致，但缺乏了這任何一種屬性，它就根本不能取得科學的資格。許多形而上學的觀念論者，無疑曾在，而且還時常在他們腦海中，僞製出一個僞是「自圓其說」的思想體系，而他們那種思想體系也許更能表現出一個規律系統的外觀，但因爲缺乏實在性，它就根本不能成其爲科學，只不過是觀念構成的玄學罷了。

要之，社會科學之被稱爲科學，並不是對於它所包括諸學科，如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律學等等，從外面曲加上的裝飾，而且所有這些學科的研究成果，在本質上顯出它們分別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上述的科學性能。從法則上體現的規律性、系統性、與實在性，是一切科學的基本要求：就在這種限度內，我們發現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共同一致的地方。

三　一切社會科學皆是歷史科學

由上，我得指出，社會科學不僅是科學，不僅具有上述的科學性能，同時還是歷史科學；[illegible]在其內，我們又發現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相一致的地方，或者社會科學對自然科學有特別的地方。

我可套一句中國史學家的「六經皆史也」的成語，說一切社會科學皆歷史科學。

社會科學的歷史性，與其說是由它研究的成果立論，毋寧更本質的說是由它研究的對象立論。社會科學中任一門科學的研究對象，都帶有變動不居的歷史的特徵。在這種論點上，我們也許會要碰到以次的反駁，即自然科學所研究的對象，亦並不是永劫不變的。一花一草，任何一個有生命的生物，一方面固然在成長或凋亡過程中，而它們之成爲此花，此草，此生物，正不知經歷了如何曲折與積累的演變。我們任意從沙灘道左俯拾一片碎土，一個石丸，它們之成此形，成此質，其歷史的悠久性，是頗費地質學家探索的。設我們放寬眼界，把天文學研究對象的天體運動，拿來加以歷史的考察，儘管它一向被認爲是最有定着性的，但自一七五五年康德（Kant）的「一般自然史與天體論」問世以後，它的日月經天，萬古不變的舊認識，亦受到了莫大的修正。較近相對論出，我們對於宇宙本體的觀念，已經在不絕改變。所以，自然界，或者自然科學界所研究的對象之歷史性格，應當是不容我們忽視的。

但從另一方面講來，自然界的變動，比起社會現象來，畢竟是過於緩慢，以人類歷史年代來尺度它，它的變化的緩慢程度，幾乎近似於永恆不變，近似於千篇一律的定型化，正類於所謂「蟪蛄不識春秋，朝菌不知晦朔」一樣，我們人類在古代，在歷史初期，直觀體察的許多有關自然現象的定律，迄乎今日，還因那些自然現象的本身依舊維持着原來的狀態，而有其科學的實在性。

可是，問題的焦點，並不在自然科學所研究的自然現象，和社會科學所研究的社會現象，是否變動不變動，或者變動是快是慢，而在它們各別的變動，是否通過人類的意識和行爲，是否由人類社會關係所導來。大體上，自然界的變動或演化，都是起因於自然的原質或力

素，離人類意識而獨立的、自目的、交互作用着、演變着。至若人類社會現象的變動，或其歷史的性質，則是通過一定社會關係，由此社會關係必然導來的有關個人及其階層之利害意識，不絕施作用或反作用於其間的諸社會事象之連續表現的發生、成長、衰落以至其完結的全演變歷程。這種經由人類利害意識，或離人類利害意識而獨立的歷史變遷，正是自然發展史與社會發展史的分水嶺，是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的大異其趣的基本事實，同時，亦是社會科學對自然科學的根本差別所在。

從這裏，我們已不難知道，要把握住所研究對象的法則，把握住那種法則的規律性、系統性、特別是實在性，那是研究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共有的困難。而除此以外，還得進一步把握那種法則之社會的歷史，那却是研究社會科學獨有的困難。許多人——其中並不僅是研究自然科學的人，更還有研究社會科學的人——以爲研究社會科學，比較研究自然科學容易，那種錯覺，可能是起於以次兩種場合之一：或者是根本不曾跨進社會科學之門，或者是完全不曾跨進科學之門。生育的痛苦，是只有產婦才能深刻體驗到的。

四　社會科學的歷史性並不妨礙它的一般的科學性能

又其次，我得指明，社會科學的特殊歷史性，是不妨礙它的一般的科學性能的。

我前面所講的，研究社會科學較之研究自然科學更爲困難，正意味着：把握社會法則之規律性、系統性、乃至實在性，常常不免受到它的特殊歷史性的二重影響：一方面，社會現象比較太富於變動，它不易定型化，把它作爲對象來研究，就似乎只能理解到它通過變動之

流的某一瞬間的靜態。誠如西哲所謂「濯足長流，插足再入，已非前水」了；在另一方面，我們對於那些現象的認識，不能像我們對於自然現象之認識那樣，完全不牽涉及我們關於它的利害念頭，即不容易在認識中，完全排擯去主觀的要素。這無疑是非常明白而眞實的事情。也許就因此故，一般人以爲這正是社會科學雖具有一般科學性能的理論上和事實上的根據。

在這裏，我們且跟蹤他們這種形式邏輯，來考察他們必然由此引出的似是而非的謬論：

第一，他們像抓住了社會科學之痛處一樣的，以爲以變動不居的社會現象作爲對象來研究的社會科學，如其要把握它的實在性，即它所研究發現出的法則，如其要它不離開現實，則它那種法則在時間上的持久性，在空間上的延展性，就要受到極大的限制了；設由此更向前引論，社會現象所由形成的自然因素與歷史因素，以及這些因素的社會的配列和結合，隨時隨地皆會因其內容的不同與變化，而妨礙着一般性的法則的建立。惟其如此，

第二，他們就像很有理由相信，有關社會現象的解釋，就不必有，且也像不能有一種定說，「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詭辯哲學，遂很自然的被用來矇蔽社會科學的科學性格。而在現實上，同一社會事象或社會因果關係，確曾有極其不同的，甚至互相牴觸矛盾的解說。比如，人類社會自來就像歷劫常存着的，且存在得異常普遍的貧困現象，誰都會依他的高興和肯用數字計量的習慣，列記出各種各樣的說法，這事實，自然會成爲非難社會科學者的有力佐證。不僅此也，

第三，他們依着上述第一點第二點的論據，即使自退一步，說社會科學的法則可以存在

，那種法則的持久性和一致性，固然頗成問題，卽其針對着現實的準確性實在性，亦定然會因衆說紛紜，以致使其中任何一種說法，只見其偏，不及其全，而由是對現實狹減其確實程度。

以上這種似是而非的不健全的意見，是每個研究社會科學的人所應當懷疑到的，但他不宜停止在這種懷疑上面，他必須進一步去做點釋疑解惑的工夫。

對於社會科學上的法則，在時空方面都不免受到限制的說法，如其這種說法，不含有根本否定的意圖，我們毋甯是表示贊同的。科學的歷史方法論，根本就排斥學術或理論上的絕對主義與永恆主義。一種學說，或者一種社會法則的建立，卽使是健全的，合於我們前述三種科學性能的，如其它的建立者乃至它的擁護者，把它的適用性，延伸到它的時空限界以外，如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那就根本忽視了社會科學的歷史特徵，忽視了社會現象的歷史演變極則。

可是，我們在這裏從正面指出的社會諸法則在時空上所受到的限制，並不像前面懷疑論者們對它曲加的狹隘短促到法則根本無法建立的，從而，由是否定法則的那種程度。社會現象在不同的自然條件與歷史條件交互作用的情形下，無疑是極其多樣和多變的。但科學的研究，並不是一種照着現象的原樣加以分類記錄的現象學，它必須透過或者不十分妥當的說，撥開有烟幕性的現象，去研討它的本質，去究明隱在那些現象後面的社會基礎　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只能容許某種或某一些社會事象或社會制度存在，而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亦只能容許其他某種或某一些社會事象或社會制度存在。儘管人們有根據說在不同的

社會經濟基礎之上，曾存在着同一名目的社會事象或社會制度，如家族，宗教，商業以及其他等等，但我們的研究，正好是要在它們這些同名的事象或制度當中，去區辨解析其在各別相異社會經濟基礎上的不同本質。商業或勞動或家族，差不多是在一切歷史時代都有過的，但它們在各別歷史時代，畢竟會分別呈現出不同的內容和姿態，扮演着極其不同的社會角色。如其說，一種社會經濟基礎，移轉蛻變到另一種社會經濟基礎，並不是一蹴可幾的事，或者依據歷史科學所詔示，是曾分別經歷過幾千年幾百年的事，那麼，在某一社會經濟基礎上作用着的諸般社會事象及其所表現的法則，其時間上的限制，就不會像幼稚的直觀的懷疑論者所想像的那麼短促；同時，一種社會制度，在當作一種社會規模的制度，而存在着，而作用着；而這樣存在着，作用着的制度，又一定會當作一種社會的強制力，來擴大，來展拓其存在與作用的限度內，支配着其存在與作用的諸般法則，在空間上的限制，也不會像人們想像的那樣狹隘。

至關於社會科學上的諸般思想體系或學說，顯得過於分歧，過於沒有一定的疑難，也無疑是非常值得我們考慮的。但這是關係認識之客觀障礙與主觀錮蔽的問題，我們不能懷疑到科學本身的建立。而且，這種事實，並不僅只發生於社會科學方面，也同樣發生於自然科學方面。科學的研究，並不是突進的，而寧是累積的。其前一認識階段的障礙不曾清除，就直接會影響到其次一認識階段的發展。關於天體運動，在哥白尼(Copernikus)以前，固有許多說法，即在他以後，對他的發現，亦不斷有所增益和修改。在伽利略（Galileo），牛頓（Newton)前後的有關物理學上的法則，亦是如此，特別是生物學上關係生物演變，關係人類

由猿類進化過來的基本法則，就有分歧到令人難於置信的那樣多的意見，其中最著名的權威說法就有拉馬克（Lamarck）的用進廢退說，有新拉馬克派的平行誘致說，有達爾文(Darwin）的天擇說，有竇富力（De Vries）的突變說，有瓦格納（M. Wagner）之地域隔絕說，有內格里（Carl von Nägeli）之演進定則等等，但雖然如此，今日並沒有誰還會懷疑到生物學上的進化論的科學價值。準此推論，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上，無論是關於財產制度，婚姻制度，或者關於其他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就其起源說也好，就其發展過程說也好，都不難找到許多相異的乃至相互抵觸的解說，然而這並不能為社會科學的致命傷，反之，在社會現象具有社會的歷史性格，它因此必然會顯出相對的多樣性與多變性的限內，我們倒毋甯希望或者要求，對於它那種現象的本質，能從多方面，多個視野去考察它，揭發它，理解它，能把問題任何一方面所應考察到的地方，都分別提出各種解說，然後庶幾可以比較，究竟何種解說，能更包括，更有系統，更對現實具有妥當性。把這一點弄清楚了，我們始可進一步去解釋前面的第三個被懷疑的論點，那是說，因社會科學上的思想系統龐雜，學無定說，所以每種說法對現實的確實妥當性，是太有限了。

本來，這樣一種疑難，是由前述第二個被懷疑的論點引導來出來的。我們已經就第二點結論出：社會科學也同自然科學一樣，對於它的每種研究對象，或全體對象的許多紛歧的解釋，儘管有的解釋或說明，部分的或在某一場合，有其妥當性，有勉强可以講得通的地方，但我們已經講過，科學是不止要求對某特別場合或特定諸事象間的因果關聯，能作牽强附會的說明，就算成功的，它同時還要求所有關於一切特定場合的說明，能在統一的總原則之下

，分別找到它適合於全系統的關聯的地位。此外，它更還要求這通過主觀，或在人類意識中再生産的總原則及其全列系統，能確實反射着現實，而不是單從頭腦中構成的架空的觀念。沒有科學修養的人，往往不是止步於對某特定場合的現象或問題，強作常識的解釋，就是對那些現象或問題，單作無關現實的架空的說明，像這樣一類性質的解釋或說明，並不曾，也不能分有科學的實在性妥當性，那至多不過由它們這些糊說亂道的見解的雜然存在，更顯得定於一宗的科學研究系統的重要，以及那種研究系統，必須具有上述一種科學的性能罷了。

在這裏，我也許需要理論到社會科學研究上的主觀性的問題，即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都直接間接關涉到我們個人乃至個人所屬階層的利害關係，在那種對象須得我們通過主觀去認識理解的限內，我們在認識理解的歷程中，便難免不夾入利害攸關的情感，而由是影響到科學研究所要求的純客觀的精神。不僅如此，在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對象，無論是那一種社會行爲，或那一種社會制度，其本身就滲透着人類意志，人類利害關係的限內，對於它的研究，也似乎無法像離開人類意識而獨立的自然現象那樣，能保持其純客觀的研究對象性。這兩點，其一即研究者主觀上不易維持客觀態度，其二即被研究的客觀難免不滲入主觀因素，都是我們在解述前面三個被懷疑的論點時，應當加以分釋的。

試翻閱一部科學史，我們將會發現：對於被研究對象的認識，不免滲入個人利害成見，那在自然科學上和社會科學上，只不過有程度的差別。大遠的過去不說，文藝復興以後直至第十八世紀終末，當時許多自然科學家受迫害的情形，我們今日似難想像到。哥白尼，伽利略，乃至牛頓，儘管他們所研究的對象，並不直接關係人們的物質利害，但他們研究的結果

，却顯然要影響到人們對上帝創造萬物的信心，影響到僧侶的社會權勢，由此影響到他們對什一稅及大量贖罪金的收入。許多自然科學家之被燒死，被判極刑，在當時固然罪有應得，甚至在二十世紀的三四十年代，我們還從最有自由精神的太平洋彼岸的美國最高學府（哈佛大學）中，傳送來達爾文進化論被擯斥為異端邪說的微詞，誰說自然科學研究對象不涉及人們的物質利害關係？不過，在大體上，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是更為直接關聯到人們的利害的感情，通過一己的權與利的黑暗箱，在認識上所反映出的研究對象，是定然會失去它的真相。但是在考慮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利害關聯時，我們不應忽略其中有一種饒有歷史意味的事實在，那事實，將可能補救我們在研究上不免碰到的這個缺陷。且更具體的就社會科學上更有基本性的經濟學來說罷。一位大經濟學者曾這樣提示我們：「自由的科學的研究，在經濟學範圍內所遇到的敵，不僅和它在其他範圍內所遇到的敵相同；它的研究材料，含有一種特殊的性質，它會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感情喚起，把代表私人利害的仇神召到戰場上來，成為自由研究之敵」。就因此故，當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資本主義經濟，已經發展到從它內部造成了威脅其生存的勞動者社會階級，並且這階級已明目張膽的對它本身，對它所保育滋養的階級，即資本家階級，採取了各種威嚇姿態的時候，與它的利害密切關聯的經濟研究者，或在這時的經濟學，其研究上成為問題的，已經「不是真理與非真理的問題，祇是於資本有益抑有害，便利抑不便利，違背警章抑不違背警章的問題，超利害的研究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領津貼的論難攻擊，真正的科學考察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辯護論者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惡的意圖」。果真如此，經濟學上的研究，不是變成了完全不能照應着現實

的矯揉造作的東西麼？我們很可以如此這般的理解十九世紀後期以至二十世紀的資本者的經濟學說。然則現代經濟學又何以能科學的建立起來呢？歷史在這裏爲我們提供了最有辯護性的保證，即現代資產者的經濟學者，在資本主義經濟已經取得支配地位，即資產者已經成功爲壓迫的社會階級的場合，他們雖懼怕眞理，但當資本主義經濟還受到封建勢力桎梏，資產者階級還遭受到貴族僧侶拑制的場合，乃至資本及資本家已取得了歷史的支配地位，而尙不會明顯的嚴重的遭受其內在對立物勞動階級勢力之威脅的場合，他們是必須而且可能要求闡明經濟法則，並由是建樹起科學的經濟學的，亞丹斯密（Adam Smith）是處在前一個場合，里嘉圖(D. Ricardo)及當時其他經濟學者，是處在後一場合。在這種認識下，我們還有理由相信，當代替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代替資本家社會支配地位的社會經濟組織及其主導者尙還處在資本及資本家處在近代初期那種被拑制的地位的場合，立在反資本制立場的人們，却顯然需要逼近眞理，很科學的客觀的去暴露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法則。一切批判的經濟學者，是處在這樣一個場合。——把上面這幾層曲折有致的關係分釋清楚，我想社會科學研究者主觀性的毛病，是可能而且已經成爲事實的在受着客觀要求的矯正。

至關於社會科學上被研究對象滲透有人類意志或主觀因素，以致妨礙着客觀的科學研究的問題，我不想在這裏多加解釋，我只須指明，一切通過了人類意識而形成的社會行爲，社會習慣，社會制度，乃至社會風氣，當它們一經形成爲社會的規模，被當作一種社會的存在物，而成爲種種社會科學攷察的對象時，各別個人的意識，不論它「在主觀方面怎樣超出周圍的種種事情，他在社會方面總歸是周圍種種事情的產物」。社會科學無須要把人類的各種

意識形態，甚至就他們的動機，他們的感情，他們的意志力加以分析，但所有這些，都是人類的，社會的，客觀存在的，張三李四獨特的胡思亂想，根本就不成其爲社會科學考察的對象。然則人類的行爲，風習，制度，一取得了社會的規模，不已離開個人意志而獨立，從而，他不將失却其對這種方面的主宰，而變成被動的，宿命的麼？許多人曾是而且還在這樣就心着。但還是過慮了，人類如其能依據科學的研究，把每種成爲社會存在的活動或制度，放在科學的考驗上，由是認知其社會的因果關聯，社會的存在基礎，更由是判斷其必然的發展演變動向，採行妨礙或加速促進的步驟，那正是科學研究所要求達到的成果。

不同科學接近的人，往往就會發生許多杞人憂天的幻想。我們社會科學研究的論壇上，正還普遍存在着這種幼稚的，但却不天真的常識大家。這是需要自我診斷，自我批判的。

五　中國人研究社會科學的難易問題

更其次，我得指明，我們處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人來研究社會科學，一方面，有許多特別困難的地方，另一方面，也還有其特別容易的地方，把這種種關鍵指明出來，也許對於有志於社會科學研究的人，有不少的便利。

且先講到特別困難的地方。

最先，我們應當明瞭，說二十世紀是一個科學昌明的時代，任誰當然無法否認，這是我們這時代的一個光明面；同時，它確實還有一個黑暗面在。我們被這時代的各種物質文明炫惑了眼，就很不容易體察出它常作暗流存在着的反科學的，濃密到使人感到窒息的黑暗陰影

。這事實，請教歷史是會得到理論根據的。

前面已經約略的提過，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在其成育發展的前期階段，它是需要自然科學，需要社會科學，來幫助它完成其成育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增進，就是意味着物理學、化學、礦物學、土壤學等等科學研究成果的擴大應用；而在社會生產力增進過程中，社會經濟基礎在不絕改變，在已往社會經濟基礎上生根的各種社會意識，一定會成爲那種改變過程中的精神上的物質上的障礙。所以，就在各種自然科學被獎勵的當時，由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開其端緒的社會各學科的研究，也經啓蒙運動的促進，相繼在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敎育方面，……樹立起了現代的科學基礎。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是藉着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幫助而建樹起來的。但當這種制度一經對其他過去的社會制度，取得了全面的支配地位，它本身就因其內部發展出的矛盾，而導出了不能像其在前期那樣的獎進發揚科學的「苦衷」。事實是這樣的：資本制的商品生產，不絕强制的要求大量化，大規模化，機械化，但它由獎進科學發明，更機械化，所製造出更多量的商品，却不曾，也不可能找到與其相適應的社會購買力或市場。商品生產過剩，一方面製造更强烈的競爭，更促進科學研究事業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却又會因此造出桎梏社會生產力，限制科學應用，相互暗中收買祕藏發明的場面。在一部題名爲「資本主義的浪費」的書中，著者切色（Miso Chase）曾這樣告訴我們：「假使一切科學上的發明，能立即將其應用起來，則我們人類社會的進步，也許比現在要快好幾百年。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把科學可能的進步限制了」。我們知道，在我們所處的二十世紀，因爲需要獎勵科學，需

要阻遏科學乃至破壞科學的各種社會經濟形態在雖然並存着，從全般看去，自然科學雖尙在發展進步的途中，但就其速率言，就其可能發展的進度言，它顯然已受到了資本制在末期的反動影響，它在跛行的坎坷狀態中。

可是，與自然科學比較起來，社會科學就更加顯然的臨到了備受摧殘的厄運。同樣由資本制本身造出的反對物即勞動階級勢力，隨着資本制發展，而日益增大，資本主義在它還是保持着社會支配地位的局面下，它這種社會制度無論那方面的矛盾和破綻，都不允許各種社會科學來暴露它。就因此故，不僅社會科學，就是與社會科學接近的自然科學，也大觸霉頭了。政治地理學被轉化爲爭取「生存空間」（Lebensraum），擴大侵略的說教；人種學變成了統治異族的種族優劣論的說教；也許有人說，這是法西主義國家的情形，但今日在英美等國家，不脛而走，風靡一時的奧大利學派的經濟學，德國西南學派的文化社會學等等，不更顯示着社會科學在怎樣的被歪曲，被排制麼？

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兩方面被虐待的情形，通盤加以攷慮，說我們目前大體上是處在一個科學的反動時代，總不應說是過份的事。處在這個時代的中國科學研究者，無疑會受到這時代暗流的激盪，一開始就對科學失却信心，科學造出了戰爭哪，造出了物質上的罪惡哪，還是皈依我們東方精神文化哪，一切玄學鬼，觀念論者從這一類表現上撫拾的常識和痳醉語，就够令無科學修養的研究者，「發憤」站在反科學的陣線上。而研究科學的困難，和任意反科學的容易，更會加強這種趨勢。——然而這還祇是中國人開始研究科學會逢到的第一個難關。

其次，現代的社會科學，本質上，都是以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社會現象爲研究對象；經濟學固不必說，即政治學、教育學、法律學、藝術等等，殆莫不如是。研究各種自然科學，其法則，其定律，其構成形態，其運動軌跡，是否對，在何種程度對，有關自然科學研究的各種設備，如天文台，如實驗室，如栽培場等等，可以提出實在的證明；至若社會科學，它對於各種社會現象研究的成果，就無法經由這一類的人爲設備加以應驗，它必須就社會本身的各種現象的演變情形，分別用來證示其研究成果之是否健全，是否具有極大的妥當性。就因此故，如其我們的社會，已經發展到了資本主義階段，那末，我們所研究的各種社會科學，就可以「現身說法」似的，從我們在社會的實際情形，得到印證，反之，如其我們社會還是處在前資本階段，則社會科學上的經濟學中，所討論的商品貨幣形態，利潤形態，利息形態，合股公司，托辣斯，辛迪克乃至較抽象的價值形態等等，均不能從我們所在社會得到照觀的認識。即令那種經濟學上所研究的最具體的問題，在我們都會變得極其抽象。在經濟學上是如此，在政治學上是如此，在政治學上的所謂民主制度，在法律學上的所謂民法，刑法，以及在教育學上的所謂民主主義、實驗主義等等，都將對我們發生「隔靴搔癢」的感覺；其本體是什麼既較費解釋，較不易把握，而欲進一步分辨其是非曲直，並何者合於科學，何者反乎科學，就更加困難了。從這點上，又必然會在我們研究社會科學或者研究科學的過程中，導來第三種困難。

那即是說，我們不易由我們社會本身證驗出何者爲貨眞價實，何者接近或合乎眞理。我們根本不易理解何者爲有利於我們社會的學說，何者爲不利於我們社會的思想系統，這種科

學介紹上的渾噩昏迷狀態，對於前進諸國向着我們的文化侵略，無異開了一個方便之門。

本來，在二十世紀的帝國主義時代，我們已把它反科學，歪曲科學，限制科學的事實指明過了。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社會科學論壇，已經在爲一些烏烟瘴氣的思想和見解所籠罩。它們在大量輸出其商品與資本的過程中，連帶不打折扣，不加渲染的把這類似是而非的假科學，眞玄學，向着落後國家不絕的傾注，那應當是很自然的事。但事實並不只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許多落後民族的覺醒，由於蘇聯經濟體系的出現，還由於各帝國主義國家間及各該國國內矛盾的加强，它們對於落後民族，已不僅只天眞無邪的把它們現成的「文化製品」照原樣輸出，還須在這當中，加一番選煉泡製的工夫，通過教會及其所設立的學校，通過各種關門，通過講學的學者，傳播有利於它們而不利於落後民族思想解放的學說。此外，它們還異想天開的就諸落後民族以往的傳統教義，以「備加贊揚」的方式，叫它們更沉溺的陷在自家所設的迷宮中。英國贊成印度大修廟宇，講究佛教；日本一貫的代中國昌明孔學，提倡讀經，諸如這一類反科學的反時代的作爲，只有從這裏才能得到「科學」的解釋。我們在差不多經歷了一百年的現代化過程中，其所以到了今日，還不能在科學的研究上，確立自己的立場，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雖要負一部分責任，而我們自己太不知道時代，太沒有看淸那種文化侵略的性質，也要負一大部分責任。歸結一句，我們在國內國外這樣的氛圍下研究社會科學，其困難自然是不難想見的。

然而，我們不用氣餒，我們中國人在今日研究社會科學，實在有抵消這種種困難的特殊容易的地方在。

那首先可以指示到的，就是從中國開始現代化過程的十九世紀中葉起，或者就在這個時期以後不久，由最基本的經濟學到其他各種社會科學，都大體進於完成。與尚在形成過程中，或尚未成熟的社會科學比較，這種進於完成或成熟之境的科學，在落後民族方面研究起來，能得到不少的便利。落後諸國民的社會經濟條件，雖不允許他們對基本的各種社會科學，從本身社會找到「物證」，但作爲這些成熟了的科學研究發展之基地的各國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及其歷史的記述，却很可幫助我們證示那種種研究成果，或其所定立的發現的法則，有了事實的根據。不僅此也，社會科學大體進於完成以後，它最先或最有力的給予我們的教訓，就是指示人類的社會行爲或社會制度，有一個歷史的方向。這種歷史的方向，在現代社會科學未建立以前，本來就客觀的存在着的，不過，這種客觀的存在，是直到了這種科學建立起來，才爲主觀所認識；換言之，是直到了社會科學建立起來，人類的社會行爲，才可能成爲自覺的社會行爲，才可能理解體現那種行爲的社會制度，是否向着它應當發展的方向發展、這一點的成就，或者這個開章明義的認識，大可提起研究者對於其所學社會科學部門之信心與興趣。

其次，到了二十世紀，社會科學的研究，已發展到社會史學的研究。以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爲研究對象的狹義經濟學，狹義政治學，狹義社會學等等，分別拓展到以那種包括有資本制社會在內的一切歷史時期爲研究對象的廣義經濟學，廣義政治學，廣義社會學等等。由一個歷史時期的社會內部運動法則的發現，到各歷史時期相連續的運動法則的發現，這種研究成果，本來不容易由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的發展情形得到確證，但在我們所處的二十世紀五

十年代，不僅全世界的交通的發達與文化的交流，很便利的約縮爲一個大社會，而這個大社會還由一切歷史時期的社會形態的相並存在，及其相續的必然趨勢的存在，給那些廣義的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等的現實妥當性，提供了洞若觀火的佐證。這對於處在過渡時期的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者，格外能誘導他去認識科學的實踐性，能這樣，他就比較容易從前述的玄學或觀念的氛霧中覺醒。

此外，我們還有一種特別便於研究社會科學的地方。真理往往是留在被壓迫者一邊的。我們前面已從反面說明了處在壓迫他人的地位者，是如何害怕接近真理。我們民族是處在被壓迫者的地位，不論在經濟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我們一直在受着其他民族的拑制，爲了擺脫這些方面的束縛，我們需要，我們有極多理由，應當努力對一切阻礙我們思想解放，從而，阻礙我們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解放的玄學，墮落哲學，金利生活者的經濟學，侵略主義的政治地理學、人種學、民族學、文化社會學等等，作無情的抨擊。我們所處的地位，是必須而且應當這樣作去的。

不管在現實上，我們對於社會科學的研究，是如何的仍在爲前述幾種困難情形所苦惱，但我們所指出的容易方面的事實，卻不僅明顯的存在着，並將在今後當作極有力的誘因啓迪我們。

六　我們的責任

最後，我還得簡略的指明，社會科學的研究，並不只是在機械的死記一些社會科學上的

定則同原理，實在是要利用或運用那些定則原理或其他研究的成果，來進一步研究理解我們所在的社會。在這種認識下，使我們知道，研究社會科學，並不僅是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事，更重要的乃在發揮並充實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國是一個大社會，一個歷史相當悠久的國家，它的社會制度，它的文化特質，都在一般中顯示了極大的特殊，不論是關於中國現代的，抑是過去的社會，都不允許我們套現成的一般公式，來理解它，解釋它。活用一般的基本原則，把握它帶有極大特殊性的基本社會經濟基礎，而由是究明其在政治上，家族制度上，文化體系上的特質與特徵，那才是必由的途徑。能這樣，一方面就使我們明瞭中國社會不會或不容易同世界其他先進國家以同一步調成就現代化歷程的歷史基因；同時又使我們明瞭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或今後社會經濟運動的趨向，也並不能脫却一般世界史的軌跡。

如其我們不妨加重的說，中國社會之科學的研究，是現代社會科學的科學性能的一大試金石，則不假手於對我們社會歷史各方面都不免感到隔膜的外國學者，而勇敢的担負「自我研究」的艱鉅工作，就是我們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者不應逃避的責任。

二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

一　時代的光明面與黑暗面

二十世紀是一個一面昌明科學，一面又殘害科學的時代。科學在這同一個時代的不同遭遇，在某種限度內，也許可由科學自己各別部門對於社會利害關係的深淺程度，及其發展的差參情形來說明。但最基本的，還當由同一時代同時存在着的各種不拘性質不同形式的社會體制來說明。一般把科學大別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個部門。它們的分野，大體是由它們所研究的對象立論，而非由它們研究所用的方法立論。晚近德國一部分經濟學者如桑巴特（Sombart）等，及一部分文化社會學者如文德爾班（Windelband）等，雖然從研究的方法上來强調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區別，以為自然科學是屬於法則性的，它自身自有規律，把那些規律記述出來，就成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是屬於理解性的，它自身原無規律，它們的規律，須待我們依據一定「文化價值」，去加以編造，去加以系統的理解，這系統理解的結果，就是社會科學。我沒有在這裏指摘這種錯誤見解的餘裕，我只須說明，即使自然科學的

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不盡相同，那主要也是由於它們各別的研究對象不同。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是社會，而自然科學所研究的對象則是自然。這樣一種分類，我們有時雖然會遇到某種非難，如像數學一類工具性的科學，它所研究的對象，似既不歸屬社會，亦不歸屬自然；又如像生理學、心理學、人種學、地理學……等科學，它們所研究的對象，似既屬社會範疇，又屬自然範疇。但諸如此類非難，科學分類學會給我們以明白的解答。我在這裏，不是要廣泛的論到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在本質上，在其各別科學性能上的相同相異關係，我所要說明的，只是這一點，即它們由研究對象的不同，由其研究成果對於社會直接間接的利害關係的不同，雖然會大有影響於其參差發展情形，但在它們發展全過程中，却顯然會明示我們以下面幾點基本事實：

第一、在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一同當作科學來綜合考察的限內，它們同是要在社會上生根的。一部科學發達史，殆與一部社會進化史，保有平行的密切的關聯。社會的進化，不是一直線的經歷着康莊坦途，科學的發達，亦正有它坎坷曲折的途徑。設我們由這兩者表現上的類似，去探索其內在的聯繫，殆可說，科學研究的向上，正顯示一個社會在進步坦途中，反之，則表示它正在經歷着黑暗的遭遇。

第二、在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當作兩個不同範疇來分別考察的限內，凡在自然科學上有所成就或有所發現，將會給予社會科學以有利的發展的影響，而在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成果，亦直接間接大有造於自然科學。同時，自然科學方面遭遇的社會的不幸，就應理解為社會科學的不幸甚或加大社會科學的不幸。反之亦然。不拘是幸遇抑是不幸，它們殆可以說是

同其命運的。

本文將就這兩種基本事實分別加以簡括的說明，而由是導出一個極有實踐意義的結論。

二 惟進步的社會斯能尊重科學

先就上述第一點說。

中國經常有人哼着：「國家之興亡，繫乎學術之盛衰」這句老話，似乎把學術的重要性看得太大了一點。但如其說，由科學的盛衰，可以徵之一個社會是前進抑是後退，是在「文化」抑是「野化」，是在發達過程中抑是在衰落過程中，那却是十分確實的。自然，當我們如此立論時，仍彷彿會引起種種疑難：其一，學術並不僅發達於昌盛的國家，也還發達於沒落的國家，甚至於在中國歷史上，有些王朝在興盛時於學術無所建樹，在衰落時反而把學術繁昌起來，周代的經驗，似乎就能爲我們提供這樣的例證，春秋戰國是周代式微的時期，而百家爭鳴所造成的學術鼎盛局面，却正好是在這一個時期出現的；其二，在同一國家，同一個時期，往往竟能發現一面獎勵學術，一面又破壞學術的矛盾事象，如像漢武帝多方面講求崇尙儒術，同時却又罷黜周末「學術鼎盛」之成果的「百家」；罷黜百家，竟被視爲是崇尙儒術的一個手段。此等事實上的疑難，我們需要從兩方面予以分釋：在一方面，我們應明瞭國家與社會雖是相涵的，但並不是同一的，在另一方面，學術與科學雖是相涵的，但亦並不是同一的。一個國家走到了沒落的路上，可以理解爲它這種沒落國家形態或政治形態所依存的社會經濟條件，已在開始一種新的前進的轉變，而爲這種轉變所允許所促起的學術研究精神，

表面上儘管是呈現在沒落的國家，骨子裏却正是象徵着在更新改造中的社會局面。作爲一個國家政治形態來看，是極度式微的，極度破碎支離的周朝春秋戰國時代，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觀點來看，它那種式微破碎支離的場面之下，却正在孕育着中國社會史上最有生氣的一幕轉變，即由領主經濟過渡到地主經濟的轉變，由離心封建體制過渡到向心封建體制的轉變。這就是說，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學術繁興，不是朝代沒落的體現物，而是社會解放的體現物。至於漢武之同時崇尙儒術，罷黜百家，那亦並不難解釋。儒術並不意味着科學，正如同在焚書的秦始皇手上得免於難的醫卜之學之不意味着科學；在文化一般衰落的晉魏六朝勃興起來的另是一格的詩文之不意味着科學；甚且也很難得是意味着學術一樣。反之漢武所罷黜的「百家」，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比儒術更多科學性的，更多學術性的。漢武以後的大大小小的漢武，以及儒家之言，更合自己的脾味而加以利用，而表示推崇，而將其定型化成自己所需要的意識形態，那就不但離開昌明學術很遠，就是距離提倡儒術亦很遠，當然更談不到獎勵科學。

爲了避免需要多加解釋的用語上的含混，這裏且就近代科學產源地的歐西社會科學發展情形，來說明我們上面的論點。

近代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無疑繼承了古希臘不少的研究成果。一想到哥白尼在天文學上的發現，我們立即就會記起達雷士（Thales），亞諾芝曼德（Anaximander）諸人在這一學科上的特殊研究及其對於宇宙之自然的說明；一想到現代物理學上的物質不滅，原子結合離散以及有關物體下落的諸種基本原則，我們立即就記起德謨克利特斯（Demokritus）在

這些方面的努力成果：達爾文在生物學上的自然淘汰，適者生存的見解，也許大有負於主張「惟合目的者斷能：亦發展其自身」的恩比多克斯（Empedokles）的定則。即在科學法則發見程序上比較後期的有關社會科學方面的諸種現代學說，要窮源追溯起來，殆都不難從古希臘哲學者找到一些雖然是素朴而直觀的意見。不過，我們在這裏所當注意的，是希臘那種自然而客觀的科學研究傳統，爲何中斷千數百年乃至兩千年，至近代始以「文藝復興」以後的種種精神上的努力的事實再現出來。適應着整個中世紀及其他前後相當時期的奴隸的，特別是農奴的社會經濟形態，基督教義逐漸變成了那種社會經濟形態最必需的精神支配的東西。非人的統治，一定要使被統治者把現實的痛苦，歸因於上帝的懲罰，上帝是一切，上帝安排一切的宇宙觀和人生觀，決不容許人們對社會自然，作客觀的探索，即是，決不容許科學研究精神的發揮。但現實社會經濟事象的演變，並不會一直按照着基督教會，僧侶貴族統治者所御定的途程。由多次十字軍運動，帶來分解封建體制的諸多事變，已經不能制止新大陸的發現，和攪擾封建社會秩序的貨幣關係的流入；哥崙布（Columbus）在一四九二年打破了人們對於地球上的胡說，哥白尼在一五〇〇年就有胆量提出天文上的新意見。到一五二一年，宗教改革的要求，居然從教會裏面發生出來了。神聖不可侵犯的教義，隨着這教義生根的社會制度，根本發生動搖了。從這方面講，科學研究的可能，已漸形成了，但就在這科學研究漸有可能的當中，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即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又因商品貨幣經濟關係漸露端倪，而對科學研究提出了新的必要。在十六世紀，教會尚可能在舊社會未完全崩潰的情形下，對科學研究加以某種程度的妨害與壓迫，但到十八世紀，由手工業、製造業、移向

大工業的機運，已經在若干國家成熟，於是作爲大工業之商品生產前提條件的各種基本科學及其技術的應用，遂變成了迫切萬分的要求，大約由十八世紀五十年代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這一百年間，自然科學的研究和發明，達到了極其普遍，極其尋常的程度。而在這同一時期，各種基本的社會科學，如以商品經濟爲研究對象的經濟學，以市民階級參政爲目的而以民主主義相號召的政治學，以新社會個人主義精神爲旨歸，並在形式上根據平等自由結成各種社會制約關係，而以此等關係爲研究對象的社會學等等，都分別參差的，在各國較爲有利的條件下，順應着整個資本對社會經濟的要求，而被建立起堅實的基礎了。

上面所說明的，是從正面指出一個新興社會，在它向上發展的階段，它不但要求對自然作科學的研究，同時，也要求對社會作科學的研究，即爲了它自身的存在和成長，那些爲過去社會所要求的有關自然的認識和社會意識形態，是必須予以清算和批判，而代以它自己所要求的研究的。但從反面講，當這一社會臨到向下的階段，臨到它不能盡量利用科學研究的成果，不能讓自身的破綻缺點盡量暴露出來的時候，它對自然科學就必然會採取一種限制或歪曲破壞的步驟，而對於社會科學的研究，是更會施行一些極端保守極不光明的妨害手術的。自然，各資本國家發展的步調，並非一致，因而它們各別對於科學研究的態度，並不一律。但就十九世紀末葉以後的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傾向說來，在自然科學方面，不僅由各國工廠的局部停閉，或工廠農場經營規模之自然的縮小，可以反映出科學技術研究之正常發展在無形受着妨礙，並且各自由競爭儕分別收買，隱匿，破壞科學研究發明成果，亦已成爲大家公認的事實。諸如此類事實，如其由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各方面毫無隱諱的研究出其必然

的原因，那將成爲資本制本身一個影響惡劣的精神重壓。

因此，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統一來考察的限內，對於它們的研究，是受獎勵，抑是遭受阻制，大體可以微知道一個社會是在發展，抑是在退化。

三、兩種科學是相依爲命的

次就上述第二點說。

這一點，是就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依爲命，相互影響立論的。從某一方面講，這是對於前一論點的補充，但它的注意重點，却是指出以次的癥結，即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彼此不易各別獨自發展，彼此也不會各別獨受殘害，並且一方的幸遇或不幸，都將相應的使對方受到利或不利的影響，近代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歷史遭遇，正可爲我們說明這一切。

我曾在其他場合提論到，科學法則的發現，大體是先起於自然科學，然後始及於社會科學的。但這樣一個命題，並無礙於我們前面的論點的確立。比如作爲近代社會之開始界碑的文藝復興運動，它對於古代自然哲學的世界觀的復活，對於中世經院哲學的批判，已不僅是近代自然科學研究的開步要求，同時也是近代社會科學研究的最先要做的工作。次於這一運動而發生的宗教改革，它對於一向把宇宙和人類社會認識之鎖鑰，操在自己手中的加特力教會和僧侶階級的攻擊，對於以贖罪保證金爲重心的政教合一制度的非難，已不啻揭開了加特力僧侶們，以私利與罪惡矇蔽着人們對於宇宙，對於自然與社會之認識的黑幕。從此以後，自然科學的研究，儘管依其性質及已有的研究成果，比較先於社會科學而爲人所努力，但直

到十七世紀的啓蒙運動展開以前，一方面由於僧侶階級的多方妨害，一方面由於現實經濟對它的要求尙不十分迫切，以致這一個期間（由宗教改革運動到啓蒙運動）的自然科學研究，還沒有長足的進展。啓蒙運動的展開，其在哲學上的自然主義與經驗主義無疑給予了自然科學莫大的助力，但在那種運動中，反專制主義在政治上的成就，和反重商主義在經濟上的成就，即以民主政治爲鵠的的政治思想，及以自由主義爲旨歸的經濟思想的宣揚，不但直接賦予了自然科學以自由研究的好機遇，同時還在間接方面，由政治經濟客觀條件的變革，新社會生產力培育環境的形成，大大加强了自然科學的需要。但反過來，自然科學每有一門新的發現，立即就在社會科學研究上，發生莫大的促進的影響。比如，達爾文在一八五八年發表的物種原始論，它對於自然及人類原來就是如此的一成不變說，給予了破滅的打擊，而發展的社會觀、宇宙觀，給予了社會科學研究以最有效力的科學根據和啓示。

然而，就根據萬物、人、社會，都是在發展過程中，都有它的生起、成長、衰落、滅亡的必然遭遇，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互提攜以抵於完成的順境，也伴隨着它們所生根的社會的歷史轉變，而竟從這原來在它的迫害下解放培植它們的同一社會，經驗着新的迫害。這迫害，是從十九世紀下半期逐漸開始的，那時，在有些國家，由商品生產過剩招來的接二連三的經濟恐慌，由伴隨商品生產規模擴大集中所招來的勞動階級勢力的抬頭，已經使這種社會的支配者資產階級，感到他們原來對科學所取的開明態度，需要修正。畢竟因爲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正好是他們需要掩飾，需要不揭穿內幕，公諸大衆的那些政治、經濟、法律等等因素，於是受到迫害的，首先就是以這等因素或事象爲研究對象的諸科學。除了在最必要

的若干場合之外，用過去僧侶階級對付科學家的野蠻屠殺方法，當然不是現代資產者階級所認爲最有效的方法，他們已經在社會科學的領域內，多方設法打擊批判原來的研究成果，並還用各種研究組織，豢養一批御用學者另起爐灶，烹製出合他們口味的學說，而這些學說的主要目的，就是使一般人把正視社會現象的目光轉移到玄之又玄的迷宮裏。充溢泛濫於十九世紀末葉以至目前的形而上的經濟學、法律學、社會學、倫理學等等，殆莫不是這一大手法的結果。然而，就在社會科學開始遭逢這種歷史的厄運後不久，被人們視爲最基本科學的自然科學，被人們視爲與現實社會利害關係比較無大關聯的自然科學，也開始經驗到了新的迫害。在十九世紀末葉，就因爲在社會科學方面的烏煙瘴氣觀念論氣息籠罩之下，許多大科學家如赫胥黎（Huxeley）蘇渙諾夫（Seohenov）馬赫（Mach）等，儘管他們分別在生物學上，生理學上，物理學上有了光輝的研究成果，但他們却是不約而同的認定他們所研究的對象，不是「物自體」，因爲「物自體」是不能認識的。這一來，他們的「不可知論」，就不啻把他們的研究成果，從根本予以否定。特別是同世紀最後幾年電子論問世以後，一向把原子作爲分析基本原素的科學，就被懷疑反對者視爲失却了立脚的根據：他們認爲一向科學研究的對象裏面，原本就滲入了假想臆斷的精神元素，於是純客觀的科學論成爲不可能了（馬哈主義者雷伊（Abel Rey）作了這樣爽快的結論）。自然科學這樣被主觀論者誣陷之後，雖然等到愛因斯坦（Einstein）的相對論出，又相當得到了支持，但自然科學在這時期中所受的委曲，無疑進一步增加了社會科學研究上的不利影響。

可是，「否極泰來」的素朴辯證論，在這裏似乎又可應用到科學的研究上了。封建制末

期所孕育的新社會既需要科學，資本制末期孕育的新社會亦需要科學。也許就因此故，依據社會科學從事社會改造的蘇聯，就因爲它改造，它對於生產力的解放，能遵循着合理的途徑，它就更需要利用自然科學研究的成果了。

四 「理性與自由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

由前面的研究，我們有理由得出以次這幾個有教訓意義的結論：

第一，無論那種科學，屬於社會範疇的也好，屬於自然範疇的也好，它的遭遇，正好象徵或直接體現着一個社會的遭遇。科學不受到尊重的社會，研究科學的自由，也橫遭限制與剝奪的社會，乃表示它在衰落式微中，在向後發展中。

第二，一個社會如其眞的提倡社會科學，它就沒有理由妨礙自然科學，反之，如其它認眞提倡自然科學，也同樣沒有理由限制社會科學。在科學是一體，科學有共休戚相關，相互影響的關聯的限內，即使我們乖謬而道之的，大聲疾呼的讚着自然科學的重要，並用各種方式或有效方法來獎助自然科學，但同時對社會科學，對社會認識，却盡量用非科學的，玄誕的，神權的，教條主義的作風和態度，來加以蒙飾和妨害，結局，在學校中，在一般社會中，隨在只有窒息和令人不朝大處深處想的淺薄主義與功利主義的氛圍氣，單在這種空氣下，自然科學的研究，已經不能令人提起神來，而間接由那種作風與態度造成的社會經濟政治各方面的後果，定然不會給予自然科學研究以何等有益的刺激與要求。這一來，對於自然科學研究的鼓勵，也就會變成空洞的形式主義的東西了。自然，一個社會如其片面的獎勵社會科

學，它也一樣會得出如此的惡果。

還是非常值得我們痛切深省的教訓。在這個科學的時代，我們不僅要理解科學是關係國運的東西，絲毫大意不得；我們同時還要理解科學中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原是一體的東西，絲毫歧視不得。德國一位大哲學家告訴我們：「理性與自由，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我服膺斯言，我並願在科學的研究上以斯言勗勉國人！

三 論社會科學的應用

一 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新興社會科學在應用上的比較觀察

無論那一門科學的研究，大部上似乎都可分別出理解的或「知」的研究階段，和應用的或「用」的研究階段來。就研究的程序上講，對一門科學本身是什麼，其範圍，其性質，其中包含有那些基本法則，自然有最先理解之必要；但就研究的目的上講，則更須理解，更爲重要的，乃是我們如何把那門科學的諸基本法則，應用來幫助我們更深一層或更廣一些的認識，或者是應用來達成我們某種實踐上的任務。

然而，這樣說明的便利，往往會因此引起「知」與「用」間機械的割裂，引起理論與實踐的無條件的分離。在實際上，研究在任何一個階段，或者在開始的入門階段，如通過應用的方式，卽隨時不忘記把所學科目，與現實相證驗，那定然大有助於研究者對於所學科目的確實理解。中國科學界的幼稚狀態的繼續存在，在許多原因之中，我們不應當忽略了研究方法的重要關鍵。與應用脫了節的研究，只能造就出兩種人；一種人是把科學引到玄學的迷宮

裏，他們的口號，是「爲學問而學問」；另一種人是把科學常識化，他們的作風，是「膚受淺嘗」，「淺嘗輒止」。這兩種形態的人，所在皆是。

我近年在經濟科學的研究上，特別强調經濟學的應用，並進而主張「中國經濟學」。我的用意，當然不是看輕理論，而是認定，非在應用上體驗其眞實性的理論，或者不能拿到現實上去應用的理論，根本就是與我們生活無關的，甚且是妨害我們精神生活的東西。我並還有一個感想，覺得在科學研究的領域內，我們對於社會科學的研究，彷彿比之對於自然科學的研究，還要顯得不能應用；而對於新興社會科學的研究，比之對於一般社會科學的研究，又還要顯得不能應用，我想順便在這裏講出其中的癥結來。

自然科學不拘是那一個門類，是天文學、物理學、生物學、地質學、或其他等等，一開始，或者說，特別是在入門的研究階段，其所研究的對象，便是多少與我們實際生活有關聯的一些事物。而這些事物的研究，又多少藉助於各種方式的實驗。那顯然能在某種程度，防止「知」與「用」脫節的危險，我們前面所論及的，我們自然科學研究上的超脫現實或超脫應用的現象，也許主要是由於以次諸原因：

第一、我們還沒有造出允許或敦促自然科學者作踏實研究的社會環境。自然科學是把產業的有利發展，作爲其被重視，被急迫要求的前提條件。如非起於實踐上的緊迫需要，自然科學上的格物致知，就和文藝上的抒情感興，沒有怎樣本質的區別。自然科學研究者，也無非是一個文人，而在實際，他們大多數也無非是在做一般文人，一般教學者的工作。而況

第二、我們又實在沒有培養自然科學者的教育環境。一個產業不發達的國家，國民經濟照例是貧弱的，各種供研究的科學設備，照例是缺乏的。除了在各級學校，多少備置了一點主要備觀覽的實驗點綴而外，社會上幾乎沒有什麽可資以啓發科學研究，或協助科學研究的工具。假使一個人在這種環境下想對科學有所深造，那就只好亂逞思辨，使科學化爲玄學了。

然而，這一切足以惹起自然科學之學理與應用脫節的原因，似乎不致影響到社會科學的研究。社會科學在它研究過程中，原本就不依靠什麽科學實驗的設備；而且，一個貧弱而動亂的社會，彷彿還更能刺激我們去從事社會科學眞理的探求。可是，我們從這裏看出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在應用上顯出的差別關係，一把它們放在同一科學範疇內統一來觀察，就知道那種差別不但是相對的，而且是互有出入的。在自然科學不被尊重的社會，學術界就不免還是由神學觀念和玄學觀念所支配，那對於社會科學研究的不利影響，也許較之對於自然科學研究，還要厲害得多。社會科學在研究上，誠然無須藉助於解剖室、化驗室、以及其他費用浩繁的科學設備，但社會科學者顯然不能憑空直觀的去考察，圖書資料的設置，調查工作的進行，以及其他種種便利研究的學術事業的舉辦，亦是無法期之於一個貧乏而又一般缺乏求知要求的社會的。

而且，我們如其把考察的視野，移到國外，移到外國學術思想向中國社會注入的過程上，我們立刻就會發現社會科學其所以在中國比自然科學還要不易拿來應用，拿來與實踐密切聯繫的道理。現代學術思想向中國的輸入，和現代商品的輸入，是平行的。即使我們把國際資本的文化侵略意圖拋開不論，我們向國外輸入的社會意識形態，也顯然只能是流行於各資

本主義國家思想界學術界那一些的屬於末期的，一味掩飾現實或歪曲現實的東西。舉其著者，如奧大利學派經濟學，所謂西南學派的社會學，形式主義的法律學，實驗主義的教育學等，它們本來就是在「引人入迷」的意圖上產生的。把社會的問題自然化，把本質的問題現象化，把基本的大問題零碎支離化，還是一切晚近資產者社會科學的共同趨勢。我們把如此這般的學問，作爲研究對象，顯然無從收到應用的效果的。但我在其他場合一再指明過，晚近科學的危機，決不僅是就社會科學立論，自然科學的觀念化，玄學化，已經是有目共覩的。不過，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比較起來，前者畢竟只能發現自然界的眞理，而後者則能曝露社會的實相；這是在近代初期，在玄學基督教義支配的時期，自然科學能率先被研究到的基本原因之一。而且，自然科學的歪曲，自然科學的「摻假」，也畢竟沒有社會科學那樣容易；惟其有這些事實，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思想之向落後國輸入，對於自然科學，就顯然沒有對於社會科學那樣需要檢點，需要警戒；結局，我們的自然科學界雖顯得貧乏，我們的社會科學界，却就顯得極其混亂和浮誇了。

所以，說到寓研究於「應用」中，它們就顯出了相當大的差別。

但是，在「混亂」和「浮誇」的我們社會科學界，不還包含有所謂新興社會科學的研究麽？這正是我們打算討論到的。我在前面已經揭明出來：「我們對於新興社會科學的研究，彷彿比之對於一般資產者的社會科學的研究，還要顯得不能應用」。在這個命題下，我們可以毫不客氣的把一般人非難新興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幾種意見指出來，引起大家的反省：

其一是說，研究新興社會科學的人，只知道背誦或抄錄公式，離開了公式，就不能講話。

其二是說，研究新興社會科學的人，對於我們日常的社會問題，都不能作科學的說明。

其三是說，研究新興社會科學的人，是一味在浮誇的講些不負責任的話。

這三種非難，儘管「不盡是事實」，但却也並不「全非事實」。我們需要簡括解說其原因所在。

第一，新興社會科學，比之一般傳統的社會科學，是需要更高一層的理解的。它的發生，是由批判一般變爲陳舊，流爲庸俗的社會科學而來。在這種意義上，即使我們把它是表識較高級社會的較高級社會意識形態的事實置諸不論，它一開始，就要求我們對於一般的傳統的社會科學理論，有某種程度的修養；或者對於被批判的社會科學理論所表識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本身，有某種程度的認識。這兩點，在一個社會經濟未發達起來的社會，從而，在一般科學研究異常貧乏的社會，顯然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作業。新興社會科學研究之流於公式主義，從此可以得到一點說明。因爲任何科學的研究，不難於背誦公式，而難於把公式拿來活用，拿來系統的說明現實。說「財產是賊物」的普魯東的斷案，和說「地球是繞日而動」的哥白尼的斷案，是一樣簡單，一樣容易背誦，但如請作系統的科學的說明，則後者固難，前者尤爲不易。不把各種社會形態的財產，從其整個經濟制度中理解其實質，那末，「財產是賊物」的這個斷案或公式，就顯然不易說明日常的社會財產問題，而我們強調這個公式，就顯然變成了「不負責任」的「浮誇」。

第二，直至目前爲止，許多新興社會科學，還是在形成的階段，即如最基本的社會史學，依舊還只有一些粗枝大葉的輪廓的提示。這在我們研究起來，就難免要發生許多的不便和

困難。

第三，在一切社會，新興的學說的研究，總難免不受到傳統的或已經定型化的原有學說的妨阻。在兩種不同性質的學說，必然會分別同實踐相聯繫的限內，新興學說除了遭受反對者的妨阻以外，這種學說的研究者自己，往往又不免把自己封鎖在「自以爲是」的樊籠中，不曾對他所反對的理論或科學，作踏實的客觀的研究。而在我們所理解的新興社會科學，必然是批判的社會科學的限內，這種研究作風，就最不利於自己研究了——在近年，新興社會科學研究的論壇上，這作風似已顯然有所改變。

最後第四，新興社會科學研究除了由上述幾方面妨阻其科學的應用外，並還直接由一般流俗社會科學逐漸化爲社會常識，轉化爲實用術學知識，而相對的顯得不能應用了。晚近流行於資本主義各國，從而，流行於中國社會科學論壇上的各門社會科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學、社會學、教育學等等，爲了避開現實，或者爲了隱罩現實社會的陰暗面，一方面日益形而上學化，另一方面則日益常識化。常識的特點，是零碎枝節的講個別社會現象。說價值是由需供關係決定，是由效用決定，這同一般人經濟常識可以調和；說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不同，因而前者偏於客觀，後者偏於主觀，這同一般人的科學常識也可以調和；說社會科學的研究，須通過以血統、性別、智能等等關係構成的社會形式，這與一般的社會常識也可以調和。在這種意識上，流俗的或至晚近始逐漸流俗化的社會科學，彷彿就能即學即用，而從反面證示新興社會科學更不能應用了。

但在這裏，我需要指明：（一）流俗社會科學與常識結合的這種應用，與我將在後而具

體說明的應用，大有分別；（二）新興社會科學研究者不能好好運用科學理論，那與這種科學本身宜不宜於應用，完全是兩件事，我們甚且可以說，新興社會科學之所以勝過流俗社會科學的地方，就在它更能本質的解明一切現實。

二　從基本的經濟學的應用講起

在一切社會科學中，經濟學算是最基本的一門科學了。它是最基本的社會科學的唯一原因，乃是由於它所研究的對象，是一切社會事象中最基本事象。就因此故，我們講社會科學的應用，只好從經濟學的應用講起，並還得就經濟學的應用，多講幾句，然後由此類推到其他各門社會科學。

在拙著「經濟科學論叢」中（見六九頁以下），我曾在「政治經濟學及其應用」這個題目下，詳細對此有所闡述，現在打算用更簡潔明確的表現方式，節論其大要如次。

在實踐的應用的觀點上考察經濟學，經濟學大體是帶着兩重或兩個歷史使命而顯現出來。那兩個使命，就是作爲民族生存鬥爭的理論武器，和作爲社會生存鬥爭之理論武器。社會的生存鬥爭，有時必須或矯揉的轉化爲民族的生存鬥爭，如當前各法西斯國家，爲了解決國內的社會經濟矛盾，而向外發動戰爭是；同樣的，民族的生存鬥爭，也可能或必然轉化爲社會的生存鬥爭，如上次世界大戰中的要角之一的俄國，竟在戰爭過程中，把整個社會變質了。這種眩惑人的變化，當其演化重心在經濟領域內，對於經濟學理的研究和應用，就成爲民族生存社會生存攸關的問題了。現在且分別說明經濟學在這兩方面的應用上，究竟表現了那

些值得注意的徵候。

先就經濟理論表現為社會生存鬥爭武器方面說。

這裏所說的社會，是指着現代社會中相互對立的各種利害休戚相關的社會集團。一國經濟發展，在特定的社會關係下，當然會促使各社會階層間的利害，互不相同，於是從各別社會階層利害關係所反映出的經濟思想，不能不相應表現出不同的分野。

在近代初期，各國的重商主義理論，從社會的立場去看，那是所謂第二階級（君主）對第一階級（封建貴族僧侶）行使經濟鬥爭的思想表現，國王或君主聯合第三階級（商工市民）在財富上及其他有關經濟方面的措施，均在限制或剝削僧侶貴族的特權。作為重商主義在德國之變種的所謂官房學（Kammer-wissenschaft）的學者們，直截了當的將其經濟論著題名為「德意志王侯國」（Seckendorf著）或「君主義務論」（J. D. Assmuth著）。這些論著，當然可以包括在羅雪爾（Roscher）所諷刺的「威廉王經濟學」的意識形態中。昂肯(Oncken）把重商主義稱呼為「王侯致富政策體系」，斯班（Spann）則稱之為「有利於資產階級及活動資本但不利於貴族領主的政治專制主義體系」，姑無論其妥當性如何，但無疑顯示了當時經濟理論之社會階級利害關係的「內情」。

當亞丹斯密用他的理論，道出英國資產階級的要求，得到滿意的成果以後，英國經濟就「一帆風順」的成就了極大的發展。產業革命成功了，與產業革命配合的農業革命（即是使農業生產者由其生產手段分離，而由是造出產業預備軍的「圈地運動」）也成功了。僧侶、貴族，乃至王侯的權益，都相繼遭受剝削與限制，第三階級或資產階級變成天之驕子了。經

濟學在它是直接體現着資產者經濟意識的限內，資產者既取得了社會支配的權勢，它不是到此止步了麼？但就在這當中，經濟學者要為他們的實踐要求煩心了。隨着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以前原不足為資本階級利益發展阻害的勞動階級，地主階級，現在都抬起頭來。特別是新興的地主階級，它憑藉傳統的(與貴族領主有深厚淵源，或即貴族領主之化身)政治勢力，憑藉阻遏國外穀物輸入的所謂穀物保護條例，作了商工資產階級的死對頭。它們以穀物保護條例為中心而展開的白熱論戰，倒使勞動階級從意識上實利上得到了不少的便益。「在一方面，論證穀物條例對現實生產者沒有何等保護效用，那是資產階級煽動者的利益；在另一方面，土地貴族對工廠狀態所加的非難，以及他們對工廠立法所表示的「外交的熱忱」，都為工業方面的資產階級所深惡痛絕。英諺有云：兩賊相爭，善良者從中獲利。在實際，支配階層的這兩派，都在極無恥的搾取勞動者。他們彼此由於搾取問題的喧嘩爭論，雙方都成為真理的產婆』(見郭王合譯資本論第一卷九七一頁)。當時論爭的兩方主帥，是馬爾薩斯(Maltus)和里嘉圖。代表地主利益的馬爾薩斯，雖然用激越的辭句，說明地租的增漲，顯示為國富增進的表徵，但里嘉圖用科學的證明：「除了地主，一切階級皆不利於穀物騰貴……地主與社會各階級的關係，是一方面全然損失，一方面全然利得」(見郭王合譯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第二章)。他由種種深密的研究，達出地租是「掠自消費者而給予地主的東西」。馬爾薩斯被駁倒了，與貴族有密切淵源的地主階級的利益，到了一八四六年的穀物條例的撤廢，就失掉保障了。但里嘉圖的學說，雖然被人非難「只是貨幣資產階級憎惡地主階級的簡單的記憶」；可是馬爾薩斯在擁護地租利益的場合，儘管和里嘉圖相對立，當他反對勞動階級的

場合，却又是里嘉圖一夥的戰友。他的大著人口論，不是當作反對擁護勞動階級利益的高德文（Godwin）和康多塞（Condocet）而發表出來的麼？

但在里嘉圖和馬爾薩斯的當時，勞動階級的力量，還不能夠威脅資產階級的生存，故他們對於這些問題的討論，還能保持科學的冷靜，他們的研究成果，還能說是經濟學上的古典。里嘉圖公然認定「階級利害的對立關係，是社會的自然法則，並還意識的以這種對立爲研究的出發點」。但資產經濟學者到此已達到了難於再向前進的限界。「從此以往，無論從實際方面說，抑從理論方面說，階級鬥爭都要採取公開的威脅的形態，……從此以往，成爲問題的，不是眞理與非眞理的問題，祇是於資本有益抑有害，便利抑不便利，違背警章抑不違背警章的問題。超利害的研究沒有了，……眞正的科學考察沒有了，……」（見郭王合譯前書原著者第二版跋）。

在以資本主義經濟爲研究對象的限內，從相反的立場，來繼續英國古典學派經濟學或說明的經濟學體系的，是所謂批判的經濟學體系的研究，是從古典學派終止了的地方開始的。但他們的研究，他們的經濟理論，同樣或更顯然以特定社會階級的生存鬥爭武器而表現出來，他們毫不諱飾的表示：「這種批判如果可以代表一個階級，那末，它只能代表無產者階級」（同前書）。

然而以上是現代經濟學，由社會的觀點去考察的一面，但它還有由民族的觀點去考察的一面。

次就經濟理論表現爲民族生存鬥爭武器方面講。

這裏所謂民族，差不多具有國家同一涵義。現代經濟雖然以個人的利己觀出發，而演成世界的規模，但却始終在把國家作爲其活動的政治的限界，而這「國家」，爲要團結內部，加强對外鬥爭力量，又被混同的代以「民族」這個名稱。

經濟理論在民族生存鬥爭上的應用，是採取兩個形態，其一是侵略的意識形態，其一是求解放的意識形態。大體上，當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對外處於劣勢的時候，求解放的經濟理論便被强調着。反之，當它處於優勢的時候，又必然要採取另一套理論，且以英、德兩國作爲例證來說罷。

英國根據許多理由，對內對外要求實施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它先進，它要求一切比它落後的國家，都爲它的製品，洞開門戶。因此自由主義經濟思想，便被理解爲英國民族生存鬥爭的有利而有力的武器。在英國的自由主義思想，配合其各種製品，向德國大量注入的十九世紀初期，德國經濟學者李士特（List），就大聲疾呼的叫德國注意英國的文化侵略——理論侵略經濟的陰謀。他說：「政治經濟學之著作或教授，無不醉心於世界主義學派，而視一切保護稅爲「學理上之疣」（Theoretical abomination）。彼輩有英國之利益以助之，有德國各埠及各城市之英貨販賣者的利益以助之，故無往而不勝利。尤可痛者，英國內閣善利用金錢勢力，箝制海外輿論，苟於其商業有濟，則揮金如土，從未有所吝惜。大隊通訊員，領袖著作家……漫遊各地，專從事於攻擊德國工業家要求實施保護稅之「無理願望」。……時流學說與德國學者之意見，既皆傾向於彼輩，以故爲英國利益辯護之工作，尤易易也」（見王開化譯李士特著國家經濟學）。這段話深刻的表明，英德兩國學者及政府，在怎樣把經濟

理論，作爲其經濟利益保護的武器。李士特及其後繼者的保護主義學說，在科學的評價上，儘管遠不如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之系統而深入，但在作爲戰鬥武器的實踐意義上，則顯然是自由主義經濟思想之致命的死對頭。

自然，英國自由思想在形成過程上，作爲對內爭取生存與利益的作用，或比較作爲對外爭取生存利益的作用爲大，這是英國經濟較先發展的情勢使然。但德國經濟發展的不利條件，即使它的經濟理論，一方面表露出求解放的自衞的意識，另一方面又配合其後進資本主義的打破現狀的冒險急進要求，而表露出極其濃厚的侵略意識。德國哲學家兼經濟思想家斐希特（Fichte）曾在其所著「封鎖的商業國」書中表示：凡是一個國家，自必有其出產的「自然境界」，沒有依賴外國來供給其國民生活上所必需的一切生產品之必要。國家必須具有生產上及消費上的獨立性；此種手段，可以依着和平的或戰鬥的手段而獲得之。政府在奪取自然的國境後，必須從快發出宣言，聲明此種戰鬥的目的，並非是什麼合併。這一段議論出自愛國主義哲學家之口，對於此後德國乃至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侵略理論，提供了一種非常有力的源泉。較近爲德國學者「專利發明」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的理論，不外是斐希特擴大「自然境界」的「再版」。而在帝國主義侵略過程中被宣揚着的「世界再分割論」，布洛克經濟論，在德、日等國，把它們資本社會特有的相對人口過剩，解釋爲絕對人口過剩的人口理論，世界工農業分工論，乃至敵人特製的東亞共存共榮論，中國社會經濟循環演變論等等，都是作爲侵略的經濟理論而產生出來。拆穿西洋景，許多新奇好聽的學說，均會顯出其猙獰的原形。然而，這些看起來，是完全爲了對外，推行經濟侵略政策的論理，一

且用到國境以內，又很可作爲維護特定社會集團之權益的法寶。

由上面所說，我們知道一切經濟理論，大體是通過社會的民族的兩種實踐要求，而逐漸形成，逐漸展開的。我們把這些經濟理論作爲研究對象，就不宜專對着這些理論本身作「格物致知」的工夫，而必得把現實社會經濟演變發展的次第，拿來證驗那些理論的正確性的程度；並須就我們自己社會我們自己民族所處的地位，及其實踐要求，來判定那些理論有益於我們社會經濟的改造，那些理論有害於我們社會經濟的改造。

因此，我之所謂經濟學的「應用」，便含有加以證驗、批判、選擇，最後並將其活用到我們經濟實踐中的意思。我個人之所以一面批判流行於中國經濟論壇的奧大利學派經濟學，一面又提倡「中國經濟學」，都無非是爲了實現經濟學之應用的目的。關於這所謂「應用」之詳細說明，請參照我有關那些方面的論文。

三　關於社會學、政治學、法律學、教育學的應用

經濟學以外的其他社會科學，原不止於社會學、政治學、法律學、教育學，但我們無法在這裏歷述到一切包含在社會科學中的科學，只好提出這幾門來代表。

如其我們有理由認定經濟在其他一切社會事象中，最有基本性和決定性，則以經濟爲研究對象的經濟學，就比之它以外的，以其他一切社會事象爲研究對象的各種社會科學，更能反映現實，更與實踐有密切的聯繫，或者就我們的題旨來說，更不能不重視它的應用。在這種理解上，我們似乎從反面默認了；其他各種社會科學與經濟學比較起來，都不是那樣能反

映現實，不是那樣與實踐有密切的聯繫，從而，也就不是那樣要重視它的應用。

但事實並非如此。

在一般社會意識中，原以宗教哲學思想爲最高級形態，政治法律等方面的思想次之，惟經濟思想最顯得直接具體，即這種思想的形成，對於作爲其研究對象的現實，始終保有極密切的聯繫。因此，這種思想或經濟學的形而上學化，還不是那樣容易，還有一個限度，而在其他社會意識，或法律、政治、教育等方面的思想，因爲它們所體現的對象，雖然最後是依存於經濟事象，但顯然沒有經濟事象那樣直接具體，因此，它們的形而上學化的可能性，就比較經濟學爲大。在這種範圍內，對於它們這種思想的研究，彷彿更須注重其應用。而實際上，表現在中國學術思想界的貧乏與昏迷狀態，一般經濟學研究者所應負的責任，也許不比其他各門社會科學研究者更大。

下面且分別就社會學、政治學、法律學、教育學諸方面的研究情形分別說明。

先就社會學來講

到今日爲止，在一切社會科學中，殆以社會學這一門科學，最難給人以明確的概念。美國社會學者華德（Ward）曾言：「社會學尙在無政府時代」，實可視爲資產者社會學界的坦率自白。

爲了在社會學研究的無政府或混亂的狀態中，刻劃出一個理解的輪廓，先須看看由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這一世紀間的社會學的研究，究竟經過了怎樣一些曲折。

被稱爲現代社會學之始祖的孔德，其有關社會學建立之理論，載在其由一八三〇—四二

年出版的「實證哲學」中；此後數十年，與孔德同被目爲舊社會學派巨擘的斯賓塞（Herbert Spencer），係於其一八七六——九七年刊行的綜合哲學體系中，專以「社會學原理」一書，研究這門學問。「社會學」這個名辭，是由孔德提出的，至斯賓塞始予以確定。孔德與斯賓塞的意見，當然互有出入，但他們同被包括在舊社會學派中的大體一致點：似乎不難發現有以次諸端：

（一）他們同把社會學當作社會哲學或實證哲學的一個部門，因而

（二）他們同是採取綜合的方法，把社會學看爲是以一般社會現象爲研究對象的學問，即所謂一般社會學的研究法。

（三）他們共有一個同點，就是彼此均係採用動的進步的觀點；孔德提出「動的社會學」這個名詞，就認定社會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的進化法則。斯賓塞是一位社會有機論者，同時又是一位社會進化論者。他以進化的理論，來說明社會一切有機現象的根本原理。

法英兩國這兩位古典社會學者的關係，使我們聯想起經濟學上法國重農學派與英國古典學派的關係。而法英古典經濟學說之遭受歷史學派與奧大利經濟學派的非難，更使我們聯想起十九世紀末葉德奧社會學派對於孔德與斯賓塞的攻擊。

所謂德奧社會學派，就是較近風行一時的形式社會學派，這派發端於唐尼斯（Tonnies）所著「共同社會與利益社會」一書（刊行於一八八九年），而發展於希麥爾（Geosrd Siemmel）所著社會學（一九〇八年刊行）中。前者以本質的與選擇的兩種不同意志，來說明共同社會

與利益社會不同的究竟，雖然是唯心的，主觀的，但還能運用批判的眼光，來考察由共同社會到利益社會的進化推移。即是，他的研究對象，盡管已由一般移到了特殊，却並未根本否定進化的原則。到希麥爾不同了，他以爲社會學研究的對象，是社會的本質；這種本質，非實體，而爲事像，爲諸實體相互作用之機能的實在。各種社會實體社會內容，分別爲其他各種社會科學之研究對象，惟此諸實體間的相互作用的形式，斯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故社會學爲相互作用形式的科學，是特殊的非一般的。又因形式與實體，原不可分，但我們得於理論上分之，脫離內容的形式，爲相互作用的純形式，是主觀的而非客觀的。

論到這裏，我們知道德奧的主觀的社會學，殆與奧國主觀經濟學（即奧大利學派經濟學），是採行相類似的步調，以期完成同一的資產者掩飾現實的歷史使命。但這個學派的理論的風行，並不能阻止他們同一陣營資產者內的反對論的出現。反對形式社會學的約有三個流派：

（一）外力學派——以法國的涂爾滏（Durkhein）爲首腦，形成一個涂爾滏學派。因爲他們反對形式主義者的主觀學說，以爲社會學研究的對象，是「社會實在」，此種「社會實在」，存在我們外部，對我們個人的行爲及思想，發生一種有强制性的拘束力，社會學就是研究存在於外部的「社會實在」所顯示的必然演變法則。

（二）巴登學派——與前述外力學派相反，而同時又在方法上與形式社會學表示區別的，是所謂巴登學派（The Baden School），即西南德意志學派；這一派的人物有文德爾班，有利克特（Rickert），還可把馬克士，韋伯（Ma X Waber）及桑巴

特（Sombart）包括在裏面。他們一致認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與自然科學的對象不同，社會過程本身，在客觀上並無何等規律可言；社會的過程的規律，是我們依據某種先驗「文化價值」來予以調整，予以編定的，所以他們又稱爲文化社會學派。

（三）全體主義學派——這個學派的創導者，是斯班（Othmar Spann），他反對以前一切學派，特別反對古典的孔德與斯賓塞。他認爲他們最大的錯誤，皆在把個人看做實在的原子，而由此假定出發，而不知道，個人其所以成爲個人，個人人格得以完成，乃因先有社會在。此社會是什麼！此社會如從其種種個別現象分離，此社會及其個別化現象（如經濟，法律等）如何演變，皆爲社會學所當研究的問題。與一切個別化現象相區別的社會概念，乃是社會科學中的總概念，最高中樞概念，而其他以個別現象爲對象而構成的各種社會科學，則皆被系統於這個總概念或全體概念之下。

除以上各派外，還有以動力學派見稱的美國學派，華德的「動的社會學」（一八八三年出版）及聲名大噪於美國社會學界之索羅金（Sorokin）的「社會與文化動力學」（一九二七——一九四一年），皆強調社會進步，不能徒任其作消極的被動的適應，而必須積極的能動的促成之。

凡此表現於社會學界的「無政府」情形，使與現實上的實踐連同觀察，殆可視爲必然的混亂。社會學原是諸種社會科學中之一特殊部門，它的特殊，乃因作爲其研究對象的社會，

係具有一定水準生產力與一定生產關係，及與此相適應而產生的政治法律諸制度及其意識態的社會。社會生產關係，如何隨生產力水準的提高而變動；一切關於上層的政治法律家族制度及其意識形態，又如何隨社會經濟結構變革而改變：這一切變動改變所顯示的規律和法則，乃是社會學的內容，故社會學成爲社會發展之方法論的科學。這種性質的科學，在資本主義初期及極盛期，資產學者尚不妨去接近它，研究它。但其中有一個限界，就是這種關係社會基本結構的學問，勢須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弄明白了之後；卽須在經濟學經過古典學派及批判學派予以完成之後，始能進行。也許就因此故，社會學的研究，比之經濟學的研究，差不多遲了一個世紀，經濟學在十八世紀中葉前後開始建基工作，社會學在十九世紀中葉前後才開始建基工作，而事實上十九世紀中葉的資本主義經濟情形，已不許資產學者作科學的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使它的社會生產關係感受到動搖的威脅。因此，他們在這時開始社會學的研究，除了在經濟情況較好的英法美等國，尚有進化論的、動力論的，外力論的一類不大明確的理論外，而在落後的觀念泥潭中的德奧諸國，就只好由主觀主義的形式主義的說教，大逞鋒芒。特別是所謂文化社會學及全體主義社會學，那在實際已是作爲第三帝國之社會文化的鼓吹手的傑作而表現着。桑巴特的「德意志社會主義」和斯班的「全體主義經濟學說」，已經說明了他們在法西經濟理論中表演了怎樣的角色。

然而，在中國的社會學界，却顯然只看到形式社會學派與文化社會學派的形形色色的理論，而比較客觀一點的研究，亦並不曾脫出進化社會學派的範圍。這趨勢，當然應與中國客觀現實對照來看，但其有害於中國社會的變革，是非常明顯的。我們對於社會學的研究，如

只是零碎的枝節的困擾在一些個別社會問題上，或者拘囚於形式主義主觀主義各派矯揉造作的社會類型的觀念框架中，我們所見到的中國社會，就被割裂成爲彼此孤立或隔離的家族、人口、婚姻、宗教、風俗、傳統、文化傳播一類具體社會表象，而無法把那些作用在這一切表象背後的共同社會根源發現出來。這至少是我們迄今尙對中國社會本身沒有理解的基本原因之一。

其次，爲了節省篇幅，我把密切關聯着的政治學與法律學連同考察。

在社會科學中，如其說，經濟學是最基本的，最能體現出社會各階層之利害關係的科學，社會學是作爲認識那種社會關係之演變，即認識社會發展法則之方法論的科學，則把上述兩種科學及其應用的情形弄明了，對於其他一切社會科學的應用，就比較容易理解。特別是政治學及法律學，由於以次諸種事實，彷彿更能給予我們以認識上的便利：

（一）自原始社會分解以後，人類歷史上最惹人注意的事象，彷彿就是政治的及作爲政治實施依據的法律的事象，因而政治的歷史，差不多成了歷史一般。

（二）政治上的頻繁變動，以及那種頻繁變動上或明或暗的顯出的因果關係，使人們很早就能素樸的不大明確的理解到政治法律制度與統治階層物質利害相結託的關係。所以，

（三）在社會科學中，政治學法律學比較出現最早，柏拉圖（Plato）的共和國，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學，就是一個明證——他們强調哲人政治，他們主張統治者應實行所謂貴族社會主義或土地公有，就是預知到了當時統治者如何因爲挑

有社會財富，致流於荒淫，而喪失其統治。

但在中世紀時代，一切社會意識，都受到了神權思想與王權思想的支配。即如前此由直觀由預感所構成的初期素樸的政治法律學說，亦橫被歪曲。十六世紀是神與人，是神權與人權，是貴族僧侶與商工市民開始激烈鬥爭的時代。拿神，拿上帝作爲政治權力屏障的英國傑姆斯第一（James 一）的著作（自由君主制的眞正法律一五九八年出版），雖還倡言：「國王可以正正當當叫做神，因爲他所行使的神權和上帝一樣，上帝有生殺予奪的權力，不對任何人負責；國王也是這樣，要怎樣做便怎樣做，除了對上帝負責而外，不對任何人民負責」。然而這不僅是神權政治說教的尾聲，並還是對於大陸方面反神權的法理政治思想盛行的一個最後的反擊。眞正能看做現代政治法律思想之最初系統著作，理應數到法國布丹（Bodin）的「國家論」（一五七六年出版）。在這部書中，他提出了有關政治法律的三個有古典性的論點：

（一）實踐的——他公開宣言，他是「想用這個著作來鞏固因爲內亂而動搖的法國王權的基礎，來實現關於國家的理想，並想發現適合事實的法則，決定普通政治學的法則」（見高一涵著歐洲政治思想史中卷第八五頁）。

（二）歷史的——他認定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不是什麼神或上帝的安排，而是由人類歷史演進的結果。

（三）唯物的——他認定每一個國家或每一個人民，都有一種特別的性質；一切制度，都要適應這種性質。造成國家或人民特別性質的勢力，便是物質的環境（同上一

〇三頁）。

布丹對於政治法律思想的這種歷史的唯物的觀點，無疑的沒有脫却初期的素樸的性質，但我們在此後作爲現代法律學經典的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大著「法意」中，隨處可以看到他的影響。但法國在現代經濟發展上，畢竟較之英國落後一些，因此，法國學者儘管可以在觸到政治法律的本質的時候，只是含糊的指述物質的環境的重要性，而在英國學者却不能不露骨的揭示出來。在陸克（John Locke）於一六九〇年出版的「政府論」中，他道出資產階層，在法律政治上的眞正期待：

「人類的自然的自由，是脫掉世界上一切優勝權力的支配。不屈服在別人的意志或立法權之下，管理他的唯一法律，就是自然法」。

「絕對專制的權力和無法律的統治，都不能與社會和政府的目的相合……最高的權力不得人類自己同意，不得徵收他的所有權。因爲保護所有權是政府的目的和人類所以加入社會的原因……」（同上二三五頁）。

這簡單幾句話，把現代政治及其整個法律的精神和盤托出了。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私有財產制度是資產階級一致向貴族僧侶封建制提起的反抗要求。因爲封建形態的政治和法律，是不適於資產者的經濟生活的。由此，我們不難聯想到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St. Simmon）所說的話：「規定所有權的法律，是一切事物中最重要的東西，是社會的建築物的基礎」。這理論更作科學的引伸，就是卡爾以次的幾點意見：

「政治的……及市民的……立法，都不過是把經濟關係之意欲，記錄出來，布告出

來」。

「每種生產形態，創制出其獨有的各種法律關係，各種政治形態……」。

「當市民社會發展時，司法權與行政權，會益益與土地所有權（在封建時代，司法權與行政權都不過是土地所有權的屬性）相分離」。

因此，作爲現代政治學法律學上反覆闡揚着的民主政治與平等法律的眞諦，在資產者階級以被壓迫者求解放者的資格，向貴族僧侶從事鬥爭時，雖還不失爲科學的說明；但一到市民的社會優勢已經樹立起來，卽是到了資產者階級已經變成爲保守的壓迫者的時候，對於逐漸在資本主義經濟關係中伸張起來的勞動者階級的要求，立卽就要顯出他們所强調的民主政治與平等法律的局限性來，也就是說，立卽要顯出，他們那種政治學法律學的歷史性來。

可是，我們研究政治學，研究法律學，儘管明確知道那是屬於資產者的東西，對於它們所提倡的「民主」，「平等」，儘管明確知道那是作爲有利於資產者取得政權，確保財產權的東西，但我們如其「極端公式的」把這種理解應用到實踐上，那就不免要在我們對現實的認識上，從而對實踐努力上，變成「新頑固者」。所以，我們關於這兩門科學的應用問題，必得提出以次的補充意見。

第一，現代政治學法律學上强調的民主精神與平等精神，儘管有其局限性或歷史性，但它對於落後的國民，却毋甯還存在有進步的意識與作用。

第二，在現代資產者市民爭取「自由」，「民主」，「平等」的過程中，一般差不多都取得了勞動者階層的助力，同時，像英、法、德諸國的勞動者社會政治勢力的增長，有不少。

竟是由他們與資產者從事這種「合作」的當中得來的。

第三，資產者階級的政治法律，雖然基本的是以他們自己的利益爲旨歸，但我在其他場合（見第四部「民主問題與經濟問題」）講過：「當某種法案，於全社會有利，而於他們無損，他們是樂得通過的；某種法案，於全社會有利，於他們更有利，他們亦是樂得通過的；某種法案，於他們目前似有小損，於將來卻沒大利，他們亦是可以放大眼光通過的：某種法案，即使於他們現在將來都不利，但如其他們預知不予通過，會馬上引起更不利的後果，他們亦是會勉強通過的」。

因此，一部現代的政治史，法律史，是大可以幫助我們怎樣去理解政治學及法律學的應用問題的。

最後，我得講到教育學方面。

與教育學接近的社會科學有倫理學，藝術學等，但把教育學的應用關係弄明白了，其餘是可以舉一反三的。

關於教育學的應用，我得改變一個說明方式，或把說明的程序變更一下。

對於現代型的教育，我們的教育界，或者擴大一點說，我們的學術界，似乎迄今還同時存在着兩種相反的見解：其一是期望在教育上多多努力，想藉此把中國社會一切不好的風氣，不好的現象，從根本改變過來；又其一是認爲新教育在中國已經施行了數十年，即使我們不忍說，當前社會上的諸種不好現象和風氣，是以這種教育爲媒介而引起的，至少，教育對于當種種，已表示毫無力量，甚至教育界自身，還待用外力來予以澄清。

這兩種樹立的意見的存在，是一方面太看重了教育的功能，同時，另一方面又太小視了教育的功能。歸根結底。可以說是由於根本來理解現代教育的本質。

也如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教育學之成功爲一種科學，幾乎通過了若干世紀的實踐歷程。我且把現代教育思想演進的跡象，區分爲三階段：

（一）神與人的教育思想階段——在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當時，由基督教義支配的歐洲死靜世界，已經在被交通貨幣一類經濟活動所衝激，使其無法維持平衡。以前被視爲造就神的侍者的教育，至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亦在其箴言中，認爲教育一方面固在造就宗教的人物，同時亦得顧及其生活上的需要。夸美紐斯（Comenius）於其一六三二年著述的「大教授法」中，首先揭櫫教育不僅爲信仰、爲道德、還爲知識。

（二）人的教育思想階段——隨着社會經濟的不斷演變，即隨着商工市民社會的發達，前此半神半人的教育，早已不合實際需要，於是在反神的教育要求上，强調「人」的教育了。由十七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我們見到許多有名的教育學家，教育哲學家，都以「人」爲其論著的中心話題。比如在十七世紀末，有陸克（John Locke）的「人類悟性論」；在十八世紀有柏克萊(Bakerley)的「人知論」，有休謨（Hume）的「人性論」，還有斐斯泰洛齊（Pestalozzi）的「人類精神發展之路」，盧梭（Rousseau）的教育名著「愛彌爾」，就是强調發展「人」由自然所稟賦的個性的。在十九世紀初，福祿柏（Froebel）的「人的教育」問世，

更把教育目的明確標舉出來。

（三）市民的教育思想階段——我已講過，前一階段的教育思想家其所以特別强調「人」，無非是期望把「人」由神完全解放出來，事實上，他們所理想的「人」，無非是一個好好的市民。這個市民的培養，注重三種教育：一是科學教育，一是職業教育，一是公民教育。前兩者是爲了達成市民社會的經濟任務，最後第三者是爲了達成市民社會的政治任務。而作爲教育理論集大成的美國杜威（John Dewey）的民主與教育，其所以注重生活，注重經驗，注重勞動，更注重自由與民主，無非是認定這一切，都是一個良善市民所當全備的品質。

顯然的，資產者社會的教育，愈到後來，愈加有意的把一切形式上的不平等規定都給取銷了，好像教育之門，眞是爲一切人民大衆而開放的，但在教育制度本身，是作爲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的上部派生物而產生的限內，教育上的不平等現象，並不存在於教育本身，而是繫於教育因以存立的社會，顯言之，教育上的不平等，是由經濟上的不平等所規制了的。

論到這裏，我們可以回頭來說明前面對於教育的兩種不健全的理解了：

在一方面，依據現代教育學說教育思想演進的歷程，我們知道：我們近數十年來所努力推行的現代型教育，顯然不會與我們社會化採取適應的或齊一的步驟。我們在仿行市民教育，而需要科學家職業技術人材的社會條件却尚不會造出，結局，教育不但無法配合社會的需要，且還由其造出的「多餘」或「過剩」人材，增大了社會的不調和現象，這一來，我們對於現代型教育，彷彿眞的不能有所期待了。最近我們朝野都有抑制文法科教育，强調理工科

教育的趨勢，大概是感覺到文法科人材有些「多餘」了，但社會事業底的展開，文法科人材的需要，定然會一同增大。如其我們社會經濟，還是停留在資本前期階段，則我們以資本式教育作育出的人材，感到多餘的，恐怕不限定是文法科方面的人材。事實上，假使我們有了可靠的人材就業統計，一定會知道：我們理工科人材在從事其「用非所學」的文法科的業作，確佔有頗不可忽視的比例。——總之，關於教育上的這一類問題，如其能從社會經濟上着眼去看，定然會明瞭其癥結所在，否則，今天直感到文法科人材過剩，因而忽視文法科教育，等到明天發覺理工科人材也有些過剩，豈不是對全部教育都要感到失望麼？

在另一方面，許多人又因爲同樣不明白教育的功能，以爲靠教育上的努力，就可把全般社會改革過來。一般書呆子氣的教育家如此想法，倒無妨看爲是他們特別重視自己事業的表示，但負用社會政治革新使命的人亦把問題看得如此單純，那就會引起坐待教育發展了之後，再來從事社會經濟變革的幻覺。中國有不少的教育哲學研究者，居然在傻頭傻腦的相信；現代德國的勃興，完全是得力於斐希特的那一部「告德意志國民書」。果其如此，那又似乎無須一般國民教育的發達，只要有一兩個有愛國熱情的教育家就行了。

對於教育的如此過分的重視或低估，只是由於我們平素研究教育或討論教育問題，都是在幾本習用的教育學原理的書上，看到一些極零碎極細微末節的教學方法教學技術的說明，而根本不理解教育的社會關係，其社會本質及其作用。每種社會形態，都有與其相配合相適應的教育體制。教育體制或教育思想，可能落在社會經濟變革的後面，而爲其障礙，如中國傳統的教育思想之多方障礙我們社會經濟變革是；那亦可能走在社會經濟變革的前面，而爲

其嚮導，如中國輸入現代各種社會意識之促進我們社會經濟變革是。可是教育在它本身終歸是作爲一定社會經濟體制的副產物而存在的，它對於社會經濟變革的妨礙或促進，都有一個限界。我們如其展開了社會經濟的基本變革，一切傳統的教育思想，都將變爲無力的掙扎；我們如其不允許社會經濟的基本變革，新來的嶄新的教育思想，亦只能表示一些不易在社會上生根的空想。這就是說：教育是要在它發生作用的社會條件或社會傾向，至少已在某種程度形成了的場合，它才能發揮極大的社會功能，明瞭了這種癥結，我們才不致高興起來把它看作「萬能」，掃興起來又覺得它並無何等效能。

第二部　社會科學的文化論

四　論文化與自然經濟

一　就文化與自然的關係說起

人類的文化，是根據自然的條件，在自然的基礎上創造起來的。把人類征服自然的過程，理解爲文化發展的過程，本是站在各種不同立場的學者，所大體一致首肯的。但他們對於自然乃至征服自然的解釋，却頗有出入。

顯然的，把一切與人類相對峙的外界自然現象，看作自然，那是誰都沒有異議的。一般所謂征服自然，也大體是指着這一自然範疇。

然而爲人類所征服的自然，如其單限定在這一方面，那就不但看作征服自然之成果的文化，不能有我們今日的成就，且也無法說明人類在征服改造自然過程中，同時在不絕爲自然

所改造的基本事實。人類在把他本身對象化爲一種特殊自然的限內，那會從人種與人性兩方面顯示出自然性能來。人性的善惡問題，和人種的優劣問題，會在歷史上引起過無限的論爭，並由是導來不知多少錯誤。人類在開始其人類生活的瞬間，還不過是一個純粹的自然體，與構成大自然的其他部分不能表現出何等物質形態以上的精神意義的區別。但當作歷史的、文化的產物的人類，又被觀念化爲宗教的、倫理的乃至政治的思想範疇，使他的自然屬性，無法「自然的」在各種不同的社會形式或社會規制下顯露出來。比如就所謂人類天性立論，大哲學家黑格爾（Hegel）就曾表示過這種意見：「人們相信，如說人性善就好像說了很偉大的事一樣，但他們忘記了，如說人性惡，是說了更偉大的事」。在黑格爾看來，惡是歷史的發展的推動力所顯現的形式，而且那有兩層意思，即一方面，每個新的進步，必然都是對於神聖的東西的罪過，對於正在死滅的因習俗而神聖化了的舊的狀態的叛逆；他方面，自階級對立關係出現以來，歷史發展的槓桿，正是所有欲及支配慾這樣的壞的情慾（參見彭譯Engels著「費爾巴哈論」第七六頁）。把維護這種所有慾支配慾，解作是維護自然，而爲滿足「人類生來就有的要求幸福的慾求（費爾巴哈語）」，對那所謂所有慾支配慾施行的反抗或破壞，似更可解作是維護自然。作爲道德評價之自然基礎的性善性惡認識，就這樣捺印上了社會的鈴記，使我們對於人類天性的自然實體，幾乎不易從它所由表現的社會關係中辨識出來。就人種的自然性能說亦是如此。由不同的自然條件乃至歷史條件所造成的某一特定民族對其他民族之社會的優越地位，很容易，而且往往被理解被强調爲該民族之自然種族或血統上的優越，而膚色、形像、體態上表現的差異，更給予這種錯誤理論以像是無可置疑的佐證。

事實上，對異民族強調種族優劣論的人，往往又必須強調同民族不同社會階層間的人性善惡論，有時，他們甚而把生而具有各種美德的領袖，和生而具有各種劣根性的被統治者間的差別，誇大到所謂優等民族對所謂劣等民族的差別以上，而絲毫不覺得矛盾。在另一方面，許多對外不肯以劣等民族自居的人，對內却又像行所無事的在治人者和治於人者之間，設立起不可踰越的自然的鴻溝。所有這些在人種人性上，依特定社會要求看出的自然，都會妨礙我們對於它的正確理解。所以對於前面所說的物界的自然的認識較易，而對於人類本身的自然的認識較難。

但在這裏，我們還得指出第三種自然來，那是從社會從歷史發展上表現出的自然。捨去人類對於自然所不斷施行的創化作用，則自然的發展，是由毫無意識的盲目的諸力素在交互作用中，表現出其支配的發展法則來。人類社會的發展，在本質上是與自然的發展不同的。社會上每一事象，殆莫不是人類意識的結果，是人類為了滿足某種要求或實現某種目的的結果。但同時却又是各別個人不克使其要求得到滿足，使其慾望得到實現的結果。由是，依無數各別個人之有意識的行為及其結果所形成的社會事象，特別是歷史的社會事象，就在其過程中，表現為與我們人類意志獨立的自然狀態，表現為非由人類力量所能控制的歷史的自然發展階段。在現實上，人類是要完全理解了這種形態的自然，他始能對於自身由人種偏見，由人性偏見所形成的拘束，所形成的不正確的認識，得到解脫，並進而增大其對於物界自然的控制力量。我曾在其他場合講過：「人類是要到了真能控制自然，並合理運用自然的時候，才真能理解自然，在所謂「自由的王國」裏面，自然是人類的奴隸；在客觀存在還從外部

强制着人類去遷就它的所謂「必然的王國」裏面、自然實際是做着人類的主人」（見拙著「經濟科學論叢」第三四頁）。

由上面的說明，我們知道，自然的範圍和涵義，既與一般所理解的不同，而當作文化形成過程的征服自然，也就有比一般所意識到的，所理解到的，有更深得多，更廣得多的意義。

我們且從人類征服自然的過程中所經歷到了的諸般反常現象，加以簡略說明罷。

首先，把文化發展的過程，看作人類征服自然的過程，那是就其征服自然獲得勝利獲有成果方面說的，但如其我們知道，人類在有關基本生存的衣食住行的進化史上所遺留下的任何一種成就或業績，都可看作是前此無數次嘗試失敗的最後成果，則我們就有理由相信，人類征服自然的過程，同時也就是不絕爲自然所征服的過程。而且人類文化愈向前發展，他們原初直接抗拒乃至征服外界自然壓力所表現的力量似乎在逐漸不斷的減弱。一個受過高度文化保育的人，一旦被流放到需要藉本身力量去控制自然的境地，他立即就會感到野蠻人對於他的優越。不僅此也，人類在征服自然過程中，同時又還表現了許多破壞或削弱他們自己對於控制自然的社會生產力的活動；不絕發生的相互殘殺的戰爭，阻礙社會進步的各種制度習俗的頑固的保留，都可理解爲使原有文化受到挫折和摧殘的反文化現象。

然而，從全般看去，不管我們在征服自然過程中，在怎樣爲自然所征服所阻礙，不管我們人類在怎樣隨着社會的進步，而使其本身對於自然直接適應和控制的力量逐漸退化，也不管我們怎樣在爲自己所設定的制度習俗，和所表現的像是愚蠢的自殺行爲，不絕摧殘着浪費

着自己已有的征服自然的成果，我們人類社會文化，畢竟在這一面創建一面破壞，一面前進一面後退的過程中建立起來了，並且還在向前發展着。這原因，是需要我們從文化本質中，從文化演進的內在關聯中，去得到解釋的。自然對人類的障害，或者人類在征服自然過程中所經驗的失敗，正是文化向前推進的反擊動力，由失敗的教訓中，由失敗所要求的進一步努力中，一切新的發明，新的有創造的設施，始能不斷的表現出來。至於人類在文化培育中所引起的直接對於自然的適應力和控制力的退化現象，那是就人類在個別使用其體力的觀點而言的，事實上，人類因為他個別的用天賦的體力去適應自然的能力的減退，就強制的迫使他進一步去講求團結的羣力，去講求利用工具的智力；換言之，那種退化現象正好是人類各種社會制度所由形成，各種科學研究所由發達的必要條件。最後，一切表現極大破壞性的戰爭，那須同具有極大惰性或執拗性的社會制度社會習俗連同考察。在大多數的場合，戰爭是由人類不能理解社會之自然發展階段，從而，不能把阻礙社會進步之社會制度，加以合理的清算，致由客觀必然造成的不得已的結果。惟其如此，戰爭除了它本身的緊迫需要，逼着促進科學的發明，促進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外，還往往因其成為顛覆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強有力手段，而變成推進文化的一個特殊動力。自然，我們並不攏統的認定一切戰爭，都是具有這種進步意義的，但由一種舊形態社會過渡到新形態社會，常是藉着戰爭來催生的。並且由新形態社會解放社會生產力所造成的文化成果，也往往比之依戰爭或革命方式否定舊形態社會所耗費的文化成果，是大得多的。

在以往，人類的文化是在這種不自覺的乃至半自覺的狀態下，一面像自動的征服自然，

事實上却是爲客觀自然不絕强制着從事那種活動的過程向前演進。

二　就經濟的視野來說明文化

由上面的說明，我們已不難理解，所謂文化，是人類在結成一定社會關係之下，從事精神勞動與物質勞動所逐漸累積的成果。晚近德國西南學派諸子，如文德爾班、利克特等，認爲以文化爲研究對象的學問，得稱爲文化科學（Kalturwissenschaft）。文化科學所研究的是社會現象，因而是歷史現象，故作爲社會學來理解的文化之學或文化科學，它同時是歷史之學或歷史科學。在這種表象說明的限內，還不能看出他們對於文化的理解，同我上面結論的文化定義，有何等根本不同的地方。把文化現象看作社會現象，看作歷史現象，寧是我們所極端贊成的。不過，德國西南學派諸子却對於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現象，有了奇特的解釋。照他們的意見，一切歷史的現象，是按照人們之自由意志而活動着，發展着的。人類的自由意志遷流不定，變動無常，因而歷史現象即社會現象，就不能像自然現象那樣，可以作千百無限次的有恆常性的重複；因而，以歷史現象爲研究對象的歷史科學，就不像自然科學那樣，從其有恆常性的不絕重複的研究對象中，得出一般的法則。惟其如此，文化科學或歷史科學，不是探究一般定律或法則，而只是記述每個有特殊性的事實。它所研究的對象或歷史過程本身，旣沒有可資根據的規律性，我們對它將如何說明呢，即我們將如何把那些各別具有特性的事實，構成一個整體概念呢？據他們說，那需要依據超歷史的先驗的準則，即所謂「文化價值」規範，把諸般歷史的文化的個別現象，分別放進它所設定的範疇或框架中。在這裏，我們

沒有詳細批評這種文化學說的餘裕。如須用一句話來概括他們的高見，就是：文化現象是主觀的東西，它本身沒有顯示何等發展規律，所以不能不就一種超經驗的文化價值來說明它。

當作德國西南學派之領導者利克特的這種高論，載在其一八九九年出版之「文化科學與自然科學」中。此後不到十年，即一九〇八年，同國有名社會學者米勒．里爾博士（Dr. Miller Lyner）發表其「文化變象論」（Phasen der Kultur——按即陶、沈等合譯之「社會進化史」），却提出了正相反對的意見。他在該書序言中說：「人類從渺茫的起源經過非常長久的時期，才進步到現在的地位。……今日世界上所有的人民，差不多都藉着貿易相結合成爲一個大的工作團體。他們一步一步的趨於組織更高的團體，前一代總是做後一代的先導。文化的成績，竟積成爲大產業。他們創造語言，爲文化最重要的媒介，發明工具、舉火，以後又發明耕種與畜牧，採取金屬。人類又發展了宗教、藝術、科學，造出各種巧妙的機械。到詩裏，人類文化的發展，始進到自覺的境界，發生了抽象的文化學，就是社會學。人覺得他正在進化的運動的中心。現在人的理性，初達到自我意識」。「今後文化進步的性質，一定要改變；本能的努力，一定要變爲意識的行動，人類向來以爲文化運動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勢力，用不可見的線索支配人類的命運。從此以後，他的進步的知識，希望益加能够支配這個文化運動」。「人要支配文化的運動，必須了解它。……文化的全範圍必須分爲最重要的各種成分，如人種的繁殖，社會組織，語言、科學、信仰、倫理、藝術。各種文化現象，在各別分類上所經行的途徑，自古迄今，可以排列爲多少變象或層級。我們比較這不同的變象，就可發現這些變象，都是遵循一定的路線。這些路線，我們稱爲「進化的趨向」。這

些路線，使我們清清楚楚的看出人類發展是一個進步的運動，不是偶然進行的，而是按着規則的定律，有一定的方向的」（參照前述「社會進化史」譯本）。

從這段話裏，我們可以辨認出幾個重要的意見：

第一，把人類過去文化的進步，認爲是本能的卽由客觀自然强制努力的成果，從現代起，本能的努力，才逐漸變爲意識的行動。

第二，要使本能努力變爲意識的行動，就須藉着日益進步的知識，把握着支配文化運動的線索。

第三，抽象的一般的文化學或社會學，可以作爲把握文化運動線索或進化趨向的科學手段。

第四，那種文化科學之所以能够成立，不是由於我們能藉着一些先驗的思想範疇，把各別文化現象分類編組起來的結果，而是由於文化運動本身顯出了有一定方向的規則的定律的結果。

除此以外，米勒．里爾還在他所提出的各種重要的文化因素中，特別强調經濟的基礎性質。他講文化的變象或發展過程，就從經濟的發展過程起。他明確指出：一般「文化發展的高度，常可用經濟發展的標準測量」（同書原序第四頁）。此外，他對所謂：「限定我們生活的勢力的，不是我們宗敎家哲學家的高尙思想，乃是日常物質的平庸事業」的見解，力言那是「眞實科學的表徵」，以爲「食物根源的擴張（如由農業），生產方法的進步（如因資本主義的制度），工藝上的發明（如鐵路，省勞動的機器等等），對於文化發達所發生的影響

遠勝於道德的教訓，宣講書籍，藝術品，哲學系統」（前書第二七八——九頁）。

到這裏爲止，這位作者的說明，是十分妥當的，就是他繼續對這理論加以限界的見解，亦不失爲允當。那是表示：「這個理論也不可極端的應用。以爲經濟爲文化唯一的原動力。因爲進步非自出一端，在文化任何一方面的新成就，均足以引起其他方面的進步」。一把他所舉例說明的倒轉過來，即把以次的命題「如宗教革命表面雖爲純粹精神的變故，但我們可以解釋它，說它是由農業國變爲商業國的過渡變化」這個命題倒轉過來，就是說，宗教革命了，那就大有助於由農業過渡到商業的變化，那亦是誰都不能否認的眞理。

不過，再往前推理，他的理論就露出破綻了。他說：「假使文化進步的極主要原動力是經濟生活的發達，那麼，那個驅策經濟往前發達的原因又是什麼呢？」（同書第二七九頁），他是這樣答覆的：「文化進步的根本條件，當然是在人的身體與精神的性質，他的社會本能，他的言語，他的知識，他的游戲本能等等，但是文化進步的主動力，既不在個人，也不在各團體，而在團體間的接觸與團體間的混合。用生存競爭的淘汰各團體，所以使進步可以傳播可以普遍。」（同書第三四三——四頁）

經濟發達的原因，是不妨進一步去探問的。我們用經濟狀態來解釋一般文化變象，自有理由要求根據什麼來解釋經濟現象，經濟發展。但這裏第一要設法不使問題的研究，流於「雞生蛋，蛋生雞」的詭辯。把人的身體與精神的性質等等，看作「文化進步的根本條件是可以的，但它們這些條件本身的表現，已經是里爾指明了的文化現象。其發展演變，正好是經濟發達的結果。而所謂「團體間的接觸與團體間的混合」，既都有「生存競爭」的作用作乎

其間，則把這種事象當作促進經濟發達的究極原因，似乎把因果顛倒過來了。事實上，經濟事象在其發展演變過程中，本就存在着自行强制自行敦促的作用。卽如一般看着促進經濟發展之人類滿足慾望的要求，那也是一步一步的依據已有經濟基礎與經濟條件而展開的。不但原始人或古代社會的人，乃至一世紀以前的人，不能有當代的經濟慾望，就是同一時期的較落後國度的人，也無法想像物質文明發達國家的人的經濟慾望。

然則經濟發達水準，爲什麼較能說明一般文化的進步或變象呢？其原因是需要釋明的。

經濟可以說是文化的出發點，亦可以說是文化的歸結點。

把文化的過程，理解爲克服自然的過程，人類首先就是在滿足經濟生活的要求上，去同自然奮鬥。人類最初與自然與其他人類發生關聯的歷史行爲，卽在這場合的文化行爲，無非是生產那些爲了維持其生存所必需的現實生活條件，其中包括有飲食、衣服、居住以及其他事項，在這些方面的進化史或進化歷程，事實上，就是文化水準所由測度的階梯。

不錯，人類文化的全內容，並不僅只包括經濟生活，文化的高度發達，往往會給人以精神意義重於物質意義的印象或外觀。在這裏，我們也用不着搬弄出「倉廩實而後知禮義，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或者「富而後教」的一類先哲格言，來予以否定的詮釋，先且講講與物質生活保有密切聯緊的社會組織或社會制度罷。如其說各種社會制度的發展，一方面是當作文化的具體表現，同時又是當作推進文化的動力，我們應探本溯源的想到，人類最初最迫切要求的社會組織是什麼；卽在文化最發達的今日，我們的一切社會文物制度，究竟是建立在怎

樣的社會組織的基礎上。現在暫就前一點來說明：我們在上面講過，人類最先與自然與人類發生聯繫的歷史的文化的行爲，就是爲了維持其生存及種族的生產行爲，當生產的時候，人類不但施工於自然上面，且係彼此通力合作。他們用一種特定的方法，共同勞動，且須互相交換他們的勞動，方才能够生產。他們爲着生產，加入於一定的社會關聯及關係裏、而且必須在這些社會的關聯及關係裏面，他們的勞力，才能施於自然之上，才能够生產。這就是說，人類最基本的社會組織，是生產組織，最基本的社會關係，是生產關係。生產組織因勞動工具的進步，而益形發達，而益加增大其社會生產力量，而適應着這種生產力量的生產關係本身，也逐漸繁複起來，而被我們當作文化現象來研究的風習制度典章文物等等，也相應複雜、充實、和多型多樣了。但當我們在進步的社會裏面，看到這諸般文化現象，特別是看到被人們强調爲精神文明的那些因素那些事象的時候，就彷彿被這所謂精神文明眩惑了眼，或著了魔似的，根本把它們是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之上，是通過一定物質利害關係而表現出來的事實，丢在一邊了。這一來，文化便被幻化成純精神的產物，是完全藉助於大思想家和大英雄們的「造化」。各種主觀主義的形式主義的文化學說，特別是强調中國文化是精神的，西歐文化是物質的這一類似是而非的謬見，殆莫不是發因於它們對文化與經濟的關係，太缺乏理解。

五　論東西文化與東西經濟

——評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觀

一　中國文化的化身在講話

最近從桂林大公報上讀到幾篇有關東西文化的論文。一篇是林語堂先生的「東西文化與心理建設」，一篇是梁漱溟先生的「中國以什麼貢獻給世界」。梁先生那篇大文的寫作，也許多少因為是對於林先生那篇大作抱有反感而引起。雖然他的中心論點，並不會對林作表示出何等根本的差別。

可是林、梁兩先生的主張，即使其同點多於異點，我個人却特別重視梁先生的議論，還與其說是由於梁先生是東西文化研究的專家，毋甯說是由於我認定：梁先生寫這篇文章，不是向着誰的面孔講話，而是向着他內心的實感和自信講話；不是為了動聽，為了叫人喝采講出來的，而是以「孤臣孽子」的心情，希望大家像他一樣具有民族好勝心自負心而講出來的

，惟其如此，我閱讀梁先生的大作，就有些感到是中國文化的化身在講話，是中國文化中一部份結晶爲優良的士大夫傳統精神在講話。

作者的光輝人格，是大有助於其言論之被人重視的，但其言論亦就因此更不容易滿足人們的期待。許多人讀過梁先生的大作，在體諒到他的苦衷與誠摯意境之餘，接着就覺得他實際只給了我們一些漠然的，不易確切的，空泛的概念。「人生向上倫理情誼」這八個字，也許比「仁愛忠孝信義和平」那八個字還要抽象，事實上，拿「人生向上倫理情誼」這八個字所包涵的哲理及其行爲表現，作爲向世界貢獻的一部份珍重禮物，那在理論邏輯上，至少會發生以次三個問題：

第一、我們向世界貢獻的，是否只能有這種倫理的文化精神？如其說，我們過去向世界貢獻的是它，目前或將來向世界貢獻的，是否還能是它，或者還只能是它？

第二、就東西文化相對待的意義上講，我們吸收西方的物質文明，而以這種精神文化貢獻出來，作爲一種「報償」，但西方是否願意吸收或接受我們這種精神文化，或者，是否會具有接受我們這種精神文化的條件或資格，却大是疑問。

第三、我們卽使以「野人獻曝」的愚忱，認爲這是我們可能向世界貢獻的固有或特有的「國寶」，而我們以外的世界，是否就毫無異議的承認我們有資格擅有這種倫理文化，從而，允許我們把這種倫理文化、當作「吾家特製品」貢獻出來？

把這三個問題的順序倒轉過來，就是(一)我們能否擅有倫理文化，卽使大體上，依着我們社會組織的特點，我們在這方面有獨特的高度的發揮；(二)人家是否有容受這種倫理文

化的社會條件，抑或我們這種倫理文化，任何社會都有吸收可能；如其這點極有把握，（三）我們是否承認我們始終或永遠只能以此爲向世界貢獻的唯一禮物。

就這三個問題來商討，都會使我們聯想到社會性質問題。梁先生的全理論邏輯，亦是設想到了此點的。不過，他對於社會問題的提起，是從橫的觀點出發，所以有中國文化、印度文化、西洋文化的不同解釋。而我之提論到這個問題，却是從縱的觀點出發，認定那些特定文化，是特定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的結果。特講到社會性質，不能不涉及形成各別社會性質的經濟條件。關於這點，我是贊同梁先生作爲其立論張本的以次見解的，他說：「在今天，……人類行爲不單出於經濟的動機，既成定論，而據我的淺學，不僅在今天，不僅在一般人，據近代一些淵博學者如亞丹斯密等的論證，中世歐洲因爲對外關係斷絕，各領邦間又相互封鎖，於是，領主貴族們的消費慾望，被限制在極窄狹範圍，他們也是在某種場合，對農奴表現溫情主義的慷慨與寬大，而農奴則因被束縛在領地上，對領主亦表現了極馴善的恭順，而建立在此基本社會關係之上的其他一切人與人的關係；亦多少相應保留有素樸的「人情美」，而成爲近代浪漫主義詩人哲人們所憧憬嘆美的素材」。這就是說，「人生向上倫理情誼」在歐洲中世社會，亦是表現過的。我們似不能在這方面獨擅其美！

但我們同時也得承認：我們的重精神而輕物質的「向上」表現，和倫理精神的發揮，確實遠較歐洲爲普遍而澈底。這原因，東西文化研究專家們，曾提出了種種的解釋：如謂歐洲封建文化延續時期比中國爲短促，因之，作爲封建文化之結晶部分的倫理精神，在歐洲就決不能像在中國的純化和高度化；又如謂歐洲中世的精神生活，主要是以宗教爲主導形態，因

之，人對神的關係，就在人對人的關係中，加進了一些隔膜；又如謂中國封建制所採取的向心形態，比之歐洲封建制所表現的離心形態，確較便於倫理觀念和倫理精神的發揮。所有這些以及其他關於中國人「倫理情誼」特別發達的說明，都不妨礙我們提出經濟方面的解釋。事實上，東西文化差別的關鍵，就東西封建經濟體制來釋明，或者更有依據。

自然，即使是强調唯物史觀的人，亦從不曾妄作「經濟是決定人類行爲之唯一社會因素」的硬化命題。不過，到了今天，人類社會行爲，大體或主要出於經濟動機，亦似已成定論，如其梁先生對此認識還有距離，至少總應該承認經濟是決定人類社會行爲的諸要因之一，我願意從經濟這一視野，來看看東西文化不同的癥結，藉以解答我前面關於梁先生立論會引起的三個疑問。

二　東西經濟體制的差別觀

首先，關於倫理的精神文化，被認爲中國「固有」的，似無問題，設自詡爲中國「特有」的，却就需要加一些解釋。梁先生似亦不否認以往的倫理文化，是宗法社會、封建社會的產物，但歐洲亦曾經歷過相當長期的封建社會階段，爲什麼它就沒有那種文化產生，而肯讓中國獨擅其美？事實上，遠在歐洲封建制形成的五世紀以前，希臘羅馬的哲學家們，實在講過和我們古聖賢一樣能表現「人生向上」的話。道德哲學的說教者如蘇格拉底師弟們，固不必說，就是以反斯鴿亞派之禁慾主義著稱的伊璧鳩魯，他甚且强調「我有水與麵包，我的幸福就不亞於神」。這論調，對我先哲「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就有道而正焉」的精神，似無遜

色，即使是到了「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義」，更失仁義而講禮法的羅馬時代，其代表的哲學者如西賽祿（Cicero）、色奈加（Seneca）等，更曾倡言「唯賢者斯爲富有」，倡言「物質上最富有者，精神上最貧困」。這應該說是「人生向上」的明顯告白。野蠻的日耳曼人，在羅馬建立封建帝國以後，歐洲人的整個精神生活，差不多都被浸透了基督教的禁慾思想。我們自然有理由理解這種禁慾思想的普及，是以當時歐洲經濟狀態，因戰亂及其他政治理由，陷於極度衰頹貧困的反映。

・中國的封建制，大體是以地主經濟形態爲它的基礎。周初雖封諸侯，大體雖係採取所謂「分土而食之」的領主經濟形態，但建基未久，即在春秋戰國之世予以破毀。秦商鞅將當時正在分解中的領主經濟形態，正式以法令廢止，使土地得自由轉移買賣，於是地主經濟形態開始。秦既統一中國，遂將此變革通行於宇內，結局，以土地爲要鍵的封建社會關係，乃確實由不完全的領主經濟形態，轉化爲地主經濟形態，在前一經濟基礎上，分封係分土而治，分土而食，其經濟權在地方，各受封領變成了經濟自給單位，故有離心傾向；在後一經濟基礎上，分封或設置疆吏，係由中央將各地方土地收入，以賦稅方式，輸歸中央，然後再由中央以俸給方式，支付地方，在此場合，其經濟權操在中央，各地方不易形成爲經濟自給單位，故有向心傾向。亦就因此之故，中國封建制與歐洲封建制比較起來，就不但更能顯得集中，並還確實顯得進步（比如土地得自由買賣，農民得自由轉動，以及伴隨土地勞動得自由移動而引起的較合理關係等等）。由於這種實質上的差別，中國的封建意識與封建文化，就比較可能排除宗教的成分，相應着，更需加强加深倫理的色調。作爲中國倫理化育規範的儒家思想

，無疑是大成於孔子，但却係發端於孔子以前的「古之聖賢」，而孔子及其一派的思想，在春秋戰國之世，還不過雜存於九流百家之間，秦代首先完成統一局面　迄未發現儒家思想，特別能配合其大一統政治要求，致演出一幕焚書坑儒悲劇。漢以秦爲殷鑑，決定罷黜百家，崇尙儒術，於是大一統之義，三綱五常之教，始在中國社會思想生活中，確立其絕對優勢地位。倫理是政治的目的，同時又是政治的手段，相互推演，對於中國封建體制的較長期延續，固曾盡過莫大的助成作用。同時，在此長期延續而逐漸發展的封建體制下，倫理思想不但因歷代儒家的研究發揮，而益進於淳化，益由半宗教性的天人之辨，演變爲哲學性的形而上學的理欲道器之爭，同時又因此種思想長期在實踐過程中作用着，故不期而採取了中國民族信念的外觀，更表現爲中國人像是生來就是非宗教的而爲倫理的特質。

依據以上的說明，被梁先生看作表識我民族特性的「人生向上倫理情誼」八字眞傳，就似乎可以當作我民族的「特有」美德，「特有」造詣，而把它向世界貢獻出來。但問題要看我們以外的世界，是否能或願接受它。

三　各種社會都有它自己的道德生活規準

講到這裏，我們需要對倫理文化本身，作一些認識前提的推論。

倫理更具象的表現，就是道德規範，而有關倫理之認識論上的說明，就是道德哲學。道德如不被理解爲「玄之又玄」的東西，而把它看作範圍特定社會人與人之日常生活關係的行爲準則，則任何一種社會關係的建立，就一定會產生適應那種社會關係，從而維繫那種社會

關係的道德生活的習慣和準則。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條件不同，那種道德生活規準的倫理的範疇，也相應而異其性質和內容。這就是說：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它自己的道德生活規準存在着。中世歐洲的封建文化，雖然全披上了宗教的外衣，我們依舊不難在它全般社會政治生活中，看出與我們相異的，也許大體不如我們那樣淳化，那樣有貫透性的道德準則和「倫理情誼」。即如在脫却了中世溫情主義「倫理情誼」，而被認爲急功好利，專以計較物質利害關係爲其他文化生活特徵的資本主義社會，似乎物質的進步，功利主義的發揮，在另一方面，並不曾妨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敬愛」以及一般社會同情心的增進，反而把那些原本在前一社會階段，用神秘的宗教的色調所翳障着的倫理關係，安置在更合理的社會基礎之上了。要之，以往的歐洲，無論在封建社會，抑在資本主義社會，都有適於它們自己要求的倫理情誼，而適於我們社會需要，爲我們社會所崇尚的「倫理情誼」，似斷然不易在它們社會移花接木的生起根來。這一點，梁先生似乎也不否認。因爲他明白表示，中國的倫理精神，是要在西方資本主義終結以後，才有發揚光大之可能的；即是如他所說，要在「政治上實現了民主主義，經濟上實現了社會主義」之後，才能大行其道的。

但根據我們前面的分析，倫理的道德規準，並不是超歷史的，超社會的。即使我們在主觀上，不妨把我們的倫理基準，作較高的較大的評價，但將來眞正民主主義實現，社會主義實現，是否會在實現過程中，造出容納或接受我們過去那種倫理精神的社會條件呢？任何形態的「倫理情誼」，都不是，而且不能是架空的抽象，而是要表現在一定的社會形式中，表現在一定社會關係中的，比如就梁先生具體提出的「父慈子孝」的「倫理情誼」而論，在將

來的社會，是否會覺得那有流於狹隘自私的弊病呢？又如梁先生所說，在將來的社會，人對物的關係，將被還元爲人對人的關係，於是，一切剝削關係不存在了，一切根源於剝削關係而造成有害無益的社會浪費不存在了，人得盡所能，取所需，在此場合，是否還須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的方式，以表示「人生向上」，而「吃得飽，長得胖」，就不能表示「人生向上」呢？

要之，我們如打算把我們的倫理精神，對將來社會去貢獻；我們如不能希望將來社會，大體具備我們過去的產生那種倫理哲學倫理規範的客觀條件，我們就得使我們傳統的倫理文化，改造到或變革到具有將來理想社會所要求所能接納的實質與內容。

於是，我們又須更向問題的深處發掘了。

四　我們對世界已有的貢獻和將有的貢獻

梁先生由民族好勝心，認定我們有所負於世界，而不得不對世界有所報稱，於是苦心搜索出我們這個倫理文化的强點，如其這個强點的用途竟被懷疑了，或者，我們的倫理敎義竟被視爲難有益助於將來社會了，那一定會損及他的自尊心，從而損及他的民族自負心。但這是過慮了。

我們的民族，對世界早有所貢獻了；在將來，可能有更大更多的貢獻。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一個相當大的部分——一切在中國本土表現的文物、思想、制度，不論其對於中國以外的世界有無影響，在它本身的發展與前進，均當理解爲貢獻世界的成果。我們無妨自詡

的藉外人對我們貢獻於世界的以文讚詞，來加強我們的自負與自信。

「三千年前，世界上有兩個民族，以理性之光，照耀於四週的蠻族。在西洋的是希臘，在東洋的便是中國。這兩個民族的合理主義，便是將來指導全世界的兩大文化支流。但是這種支流各有特色。希臘所產生的合理主義，是屬於知的方面，造成了近代西洋文明之哲學科學的基礎，反之，中國產生的合理主義，是屬於意的方面，發揚正義公正的觀念，使遠東橫溢着德化之光。前者是思辨的合理主義，後者是實踐的合理主義，前者以數學與理論爲中心，後者是以道德政治爲主眼，前者包含着近代精神文明的酵母，後者傳播了特殊的遠東文明的種子。」（見劉譯日人五來欣造著「儒教對於德國政治思想的影響」）。

不過，我們在欣然接受這讚詞之餘，應明瞭我們「德化之光」，是在過去光被於「四週的蠻族」，要使這光明繼續永遠照耀於世界，我們如其無法希望，或不應希望我們四週永遠爲蠻族，就得發揚自己的傳統的倫理文化，使它不固定化或硬化爲徒供人欣賞或憑吊的埃及金字塔似的文物。但這裏須得辨識一件基本事實，即我們的文化，過去其所以能在四週蠻族中發出德化之光，根本是由於我們的社會經濟體制，在歷史的發展階段上，跑到了那些蠻族前面，即那些蠻族當時是營着漁獵游牧，淺耕的民族社會生活，我們的祖先，已藉着自然的歷史的有利條件，建立起了高度化農業的封建國家。就是遠在我們四週以外的歐洲，它差不多是中國封建制已建立了一千多年，已達到了相當高度發展的晉代，才開始其封建的社會組織端緒；而在實質上，它的那種封建體制，已在前面證示其遠較中國封建體制爲不進步，不合理。反過來說，中國以往的較進步的，較合理的社會經濟組織，才容許並要求配合較合理

的較進步的人生哲學及其倫理的實踐形態。我們這種推理如不太遠於事實，則我們今後如其仍希望以「向上的倫理情誼」去光被四表，一定要我們社會本身，已造成了一種在進步性上，在合理性上，都較優於其他社會的社會經濟組織；那種社會經濟組織，可能是在某種限度依據了或發揚了中國文化中優良的傳統倫理精神的結果，但在那種經濟組織中所體現的「人生向上倫理情誼」，一定不是固着在我們過去的形態上。比如說，我們今日當作國策來要求實現的民生主義經濟體制，儘管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提出此種理想的時候，參證了或體驗到了中國傳統的「愛民」「親民」「惠民」的民本主義精神，但理想上有資本主義之利而無其弊的民生主義經濟體制如能建立起來，則表現在它這種體制中，並作為其秩序所由綱維的「倫理情誼」，一定是與過去不同種類的東西，它一定更有積極性，更有進步合理的內容。

論到這裏，我可就以次三點意見，對本文作一結束：

（一）「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我們民族能延續數千年以至今日，決非偶然倖致。其悠久歷史賴以維繫的「固有」或「特有」文化，應理解為其過去對世界貢獻的成果，且亦無妨認定為其將來對世界可能貢獻的因子，但在世界日漸變動與進步的情勢下，我們斷不能也不應以固定在一定形態上的倫理觀念及其表象，作為「推之百世而皆準」的將來人類社會行為之圭臬。

（二）倫理文化固然有一定倫理哲學作為其指導原則，但倫理哲學是最有實踐性的，或者是最少形而上學性的。一國想將他的倫理文化，或綜合體現着倫理哲學，在它以外的世界生根、開花、結果，一定要想到它以外的世界，甚至它自身，將來究會在何種限度具備有體

現其原有倫理哲學或倫理的精神文化的實踐條件。

（三）如其我們隨時體察世變，警惕着世界日新月異的進步，因而想發揮自己的特長，從闡揚倫理文化入手，則須明瞭，倫理文化的培養，並不能期之於「講道德說仁義」，談理欲論道器的空泛冗談，而要期之於一種可能使較高倫理文化因以體現着的較合理的社會關係，較合理的社會經濟體制，果其如此，則在消極意義上，我們不能在合理的社會經濟上努力，也就無法單獨的孤立的向世界貢獻什麽精神文化；在積極意義上，我們能認眞的創建出一種合理的社會經濟關係，則我們可能貢獻世界的。就不是固有的「人生向上倫理情誼」，不只是適於那種合理社會經濟關係的新型的倫理精神文化，同時必然伴有在那種合理社會經濟關係下，在新的道德敎化中可能創造出的一切精神的物質的文明。

六　再論東西文化與東西經濟

——評錢穆先生的東西文化觀

一　「愛之必以其道」

在去年，我曾就梁漱溟先生的「中國以什麼貢獻給世界」的大文，進而就梁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寫過一篇「論東西文化與東西經濟」，披露在「新建設」雜誌上。梁先生是主張中國人應拿「人生向上倫理情誼」這八個字所包涵的哲理及其行爲表現，作爲向世界貢獻的一份隆重禮物。我認爲，在這個「殺伐用張」的世界，梁先生的用心雖好，立論卻就大欠斟酌。我的結論大意是：

（一）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藉以維繫的傳統倫理文化，經過闡揚洗鍊，也許無妨認定爲其將來對世界可能作某種貢獻的因子，但在世界日漸進步與變動的情形下，我們斷不能也不應以固定在一定形態上的倫理觀念及表象，作爲「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將來人類社會之

結果。

（二）倫理文化固然有一定的倫理哲學作爲其指導原則，但倫理哲學特別要與實踐相聯繫。一國想將它的綜合體現着倫理文化的倫理哲學，在它以外的世界生根、開花、結實，一定要想到它以外的世界，甚至它自身，將來究竟在何種限度具備有體現其原有倫理哲學或倫理的精神文化的實踐條件。

（三）如其我們隨時體察世變，警惕着世界日新月異的進步，因而想發揮自己的特長，從闡揚倫理文化入手，則須明瞭：倫理文化的培養，並不能期之於講道德，說仁義，談理欲，論道器的空洞冗談，而要期之一種可能使較高倫理文化因以體現的較合理的社會關係，較合理的社會經濟體制。果其如此，則在消極的意義上，我們不能在合理的社會經濟上努力，也就無法單獨的孤立的向世界貢獻什麼精神文化；在積極意義上，我們能認真的創造出一種合理的社會經濟關係，則我們可能貢獻世界的，就不是固有的過去的定型的「人生向上倫理情誼」，也不只是適於那種合理社會經濟關係的新型的倫理精神文化，同時必然伴有在那種合理社會經濟關係下，在新的道德教化中，才能創造出的一切精神的物質的文明。

那篇文章發表以後，我就計劃：對於中國傳統的一切文化現象，都應就中國傳統的社會經濟形態，予以系統的科學的說明，但因研究環境變更，除了在國立中山大學研究院就此問題作過一次講演外，一直到現在還不曾着手。

最近在第十卷第二期「中國青年」月刊上，讀到錢穆先生的「中國文化傳統之演進」的大文。錢先生愛護中國文化的熱忱，當不下於梁漱溟先生，但他對於中國文化的認識，却不

像梁先生那樣拘囚於倫理的窄狹天地裏；他對於東西文化的異同的說明，也比較拓開了另一個境界。惟其如此，這就引起了我向原來研究計劃前進一步的興趣。

二　亦新亦舊的方法論

錢先生的那篇大作的內容，牽涉頗廣。爲了討論的便利，是須得抉發出他的立脚點或出發點的。錢先生自己不會把他的觀點明確指明出來，但就全篇字裏行間的暗示，似乎他的一切論點，至少是想接近或者環繞着以次兩個中心命題的：

（一）歷史的文化觀

（二）經濟的文化觀

錢先生是一位史學家，且是一位正統的歷史學家，他的文化理論採取歷史的觀點毋甯是當然的。而在實際，他這篇文字中顯示的一些特色，也就是存於他的歷史的觀察方面。至於他同時還採取經濟的文化觀察方法，在我們看來，彷彿有些意外，因爲這不是一個正統史學家所應有的研究法，甚至我們也很難期望正統史學家所能有的研究法。但說也奇怪，知道是時代太刺激了他們，抑是他們並不甘太落在時代的後面，另一個比錢先生還正統的大國史學家陳寅恪先生，當他去年四五月間在國立中山大學研究院講晉魏六朝學術思想的時候，他的許多講法，使我在當場聽着，聯想起胡漢民先生的「唯物史觀之倫理的研究」來，他居然從當時社會各階層間的物質利害關係，來釋明所謂竹林七賢一干人所以採取清談作風的「內情」。這是題外的話。我說錢先生從經濟的觀點來看文化，並不單是因爲他這篇文章後面

，有了「經濟和文化確實是相互爲命的」話，事實上，這句話原本就極其含渾，而且，他還是在講過農業文化與農業社會的關係之後，作了「這並不是唯物史觀」的鄭重聲明才說出來的。但雖如此，他全篇論及東西文化的異同，及中國文化的發達、衰落及將來展望的時候，總喜歡或者總想從社會經濟演變情形上去找到證據。可是，畢竟因爲他的正統思想習染太深、或者對於社會經濟史學方面的修養太嫌不够，他不但不能把文化史經濟史的內在關聯貫通起來，使他的說明，具有科學的系統性，反而依着他那不成熟的，未消化的，或太素樸的經濟觀的理解，把他從歷史觀研究上顯示出的一些特點，都弄得混淆不清了。

在下面，我想分別他的歷史文化觀和經濟文化觀，予以解述。

三　「可大可久」的新註釋

先講他的歷史的文化觀。

在他設想，「所謂文化，必定有一段時間上的意義在內，換言之，即文化有他的歷史意義在內」。「所以講到文化，應當用歷史的情況來講」。

「什麼叫做中國文化呢？要解答這個問題，不單要用哲學的眼光，而且要使用歷史的眼光」，「中國文化是一個傳統，是一線而下的，已經有了五千年的歷史」。中國由五千年歷史情況顯出的文化，孤立起來，是不能看出它的好處或特點的。必須拿它來同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種文化來比。同誰比呢？他以爲「最好同歐洲的文化比」。因爲在世界史上，「能够長期奮鬥前進的，只有兩個：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歐洲」。它們顯然是東西文化的代表者。可是

把它們相互作一比較，立刻就顯得有許多不同。照錢先生的提示：

第一，就時間上說：中國文化和歐洲文化不同之點，「好像兩種賽跑，中國文化乃是一個人作長時間長距離的跑，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這一路下來都是中國人，秦漢唐各代也是中國人，宋元明清還是中國人。西方歐洲文化則像接力跑，一面旗，從一個人一個人手裏依次傳遞接續去跑，由希臘人傳給羅馬人，由羅馬人傳給北方蠻族，現在傳到拉丁條頓民族手裏，拉丁條頓民族跑完以後，說不定將來會由斯拉夫民族接着來跑」。

第二，就空間上說，兩者也不相同：「中國文化是整個發生的。自始就滿佈大地」，「一擺就擺在一個大地方」，「而歐洲文化則係由一點傳一點的，像希臘文化中心到羅馬文化中心，再到東羅馬文化中心」；「到近代歐洲列強並立的時候，文化中心也就分在巴黎、倫敦、柏林，……等等地方，再由這幾個中心向四周發散」。「西方文化可以有幾個中心，中國的文化，則很難說有中心」。

總括的講，就是「西方文化可以分做幾段，中國文化卻不能分；西方的文化可分為地域性，中國文化則沒有地域性」。

錢先生自認為是「很粗淺的，很簡單的比較」，也許就因此故，就前一點講，他忽略了，他是拿中國文化與歐洲文化比，不是與歐洲某一國，或者意大利，或者法國，或者德國比，同時，也不是拿歐洲文化同包括中國文化的整個亞洲文化比，於是，就有獨跑長距離和接力跑的區別；就後一點講，他也沒有考慮到，中國文化並不是「一擺就擺在一個大地方」，或「自始就佈滿大地」，也不是「沒有地域性」，我們稍一留意中國文化，由黃河流域，而

長江流域、而珠江流域的展拓情形，就可對錢先生的講法，作相當程度的修正。即使退一步，相對的承認中國文化在時間延續上，在空間展拓上，都對歐洲文化顯示了上述的特點，但問題並不在提出事實，而在對它加以科學的合理的說明。錢先生對於這一點，彷彿從中國方面作了一些解說。

關於中國文化在時間空間兩方面表現的特點，錢先生從我們的古文獻中找到了依據，那就是易經上所說的：

「可大可久」。

究竟是先發現了這個文句，然後再確定中國文化的悠久性和光大性？抑是先發現中國文化「自始就滿佈大地」和「一直延續五千年」，然後再以這個文句來印證，我們用不着推敲，我們所注意的，甯是我們的「可大可久」的文化，究是如何一種情形。

錢先生把一部中國文化史，分作四個時期，秦以前是第一期，漢至唐爲第二期，宋以下至晚清爲第三期，現在則踏到第四期。對於前三期的文化內容，他是用這幾句話來包括：

「中國學術思想最燦爛的是在秦朝以前，政治社會最理想的莫過於漢唐，而文學藝術的發達，則在唐朝以後」。

每個時期都有它的特點。然則漢唐以後，爲什麽沒有把秦朝以前的學術思想繼續發揮呢？錢先生是這樣答復我們的：

「我們總覺得到現在爲止，學術思想方面還超不出先秦，政治社會方面還超不出漢唐。」

「……我們並不能說，漢唐的學術思想，超不出先秦的境界，便說漢唐沒有長進。因爲中國在先秦時候，孔子他們這一班聖賢，已經將那些人生理想講得很高深，以後實在很難超出」。

然則秦以前的學術思想，爲什麼有這樣難於超越的地方呢？錢先生在這裏把我們「可大可久」的文化特質道出了。

「……到秦朝爲止，一般學術思想，都是抱着一種天下的觀念。……修身齊家治國，最後就是平天下」。

「世界大同，天下太平，都是中國人理想中的一種人類社會，所謂「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就是中國文化的理想。中國文化是人類主義的，是世界主義的。他並不祇想求得一國的發展，也不妄想一步一步的向外擴張勢力，像羅馬，像現在一般壓迫主義，，侵略主義者的西方國家一樣」。

中國的這個平天下的理想，「到了秦始皇的時候，已經實現成一個天下了，所以中國文化開始就擺在大地上」。

這就是說，秦是中國文化第一期與第二期的分水嶺，秦以前，是天下一家的文化理想的產出時期，秦以後，則是那種文化理想的實現時期。所以說，「孔子他們的學術思想雖然很高，可是祇存空言，而秦以後漢唐諸代却是實幹，使孔子諸人的理想漸漸實現」。

結晶在中國文化思想上的世界主義，人類主義，在規模氣象上是「可大」，在理想展望上是「可久」。惟其「可大」，故「放之四海而皆準」；惟其「可久」，故「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錢先生從這裏來看中國文化對歐洲文化所顯示的特點，自是「獨具隻眼」。但也許是太浸沉於這種文化理想中的緣故，他在立論上就不覺留下了一些漏洞：

其一，錢先生認為先秦人其所以有如此高遠的理想乃因「當時的人認為整個版圖以內的一切地方，就是天下，就是世界」。這樣說來，這種「跨境內以為天下」的世界主義，實不過「中國主義」，因而他們那種「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的人類主義，實不過「中國人主義」，錢先生立意要證示我們的「大」，結果却適見其「小」了。

其二，如說中國人的「天下」，至秦始實現，中國文化至秦「始普遍的擺在一個大地上」，足見秦以前，還不會「擺在一個大地上」。這一來，他前面所謂「中國文化乃是整個發生的，自始就滿佈大地」云云，就彷彿第一期以學術思想為特徵的文化，擴到中國文化圈外了，這是一個大矛盾。

我們極同意錢先生的文化是有生命的話。中國文化第一期是文化理想產出時期，第二期是文化理想實現時期。漢唐這個時期，究竟對於第一期的理想，實現了一些什麼呢？

「秦以後，兩漢與隋唐，最有成就的事業，是政治與社會，一統的政治和平等的社會」。

「漢唐的政治，算得每一個人都安居樂業，過着幸福的生活」。

「這個時候，真是政治社會理想的境界。人人安居樂業，家庭境況優裕，國家富强，政治清明，社會公道」。

從這幾點說明上，足見「秦以後漢唐諸代是實幹，使孔子諸人的理想漸漸實現」。漢唐

領域之大，政治上統一了「天下」，是「中國的」世界主義之實現；社會的平等或平等的社會，是「中國的」人類主義的實現。但不幸得很，當他強調下一文化時期的文學藝術帶有平民精神的時候，却又不自覺矛盾的把他歌頌漢唐理想平等社會的論調，作了一個九十度的轉角：

「……唐朝以前，經濟不很活潑，到了宋代以後，就逐漸活潑了。但是唐朝以前，社會貧富懸殊，而宋代的社會經濟，倒反而平均了」。

由「平等的社會」，一變而爲社會「貧富懸殊」。在另一個地方，他並自問：「漢朝當時的政治社會既然還要合理，爲什麼後來弄得那麼糟」？他自答，「這個問題：我在下面倒要說明」。然而直到他那篇大作最後一句，仍不曾提出說明。因爲「一治」用實行聖賢的高尙理想來說明，「一亂」就似乎不能單依未實行聖賢的高尙理想來說明，所以只好不說了。

說到第三文化時期的文學藝術的發達，他並不忽視由宋到晚清在社會政治上的成就，即也是「統一」，也是「平等」的成就，不過，他認爲，「大概宋代以下的社會與政治，都逃不出漢唐的成規。因此，我們普通都說，宋代以下的政治好像沒有什麼長進」。姑且假定是如此，然則宋代以前，爲什麼文學藝術不發達，而到此以後才發達呢？他是從以次幾點來解釋：

其一、文學藝術上的成就，是要「天下太平」，大家把「精神用到生活的享受生活的體味上去」。然則錢先生不是講過：「漢唐的政治，算得每個人都安居樂業，過着幸福的生活」麼？照此邏輯，應當漢唐的文學藝術，特別發達起來。但我們可以代錢先生答復一句，單只這個天下太平的條件不够。

其二、「西漢的時代，大家都注重建設社會，對於文學和藝術沒有怎樣留意。到了東漢，中國人經過了這四百年的時間，便開始講文學藝術了，但是後來碰着魏晉南北朝之亂，局面未能安定，到唐朝天下太平，於是文學藝術復漸有發達」。這一來，唐朝又應該列到第三文化期了，但這是小疵，且有其條件限制，即

其三、文學藝術的發達，是大家的事，不是少數特殊者的事。據錢先生講，中國「宋代以後，已有平民教育」，也因是，全宋代以後，中國人「才用藝術文學代替宗教的作用」。即便總括說：「在宋朝以後，一般人都走上了生活享受的路子，在生活上求安慰，中國的文學藝術，在唐朝以前，是貴族的宗教的文學藝術，到唐以後，才流入大眾民間」。

到這裏，錢先生已開始引用社會經濟的關係，來說明文學藝術的發達原因了。

「唐朝以前，社會貧富懸殊，而宋代的社會經濟倒反平均了」。

「宋代以後，就根本沒有貴族了」。

「宋代以後的社會情形，許多達官顯貴，不過三四代，家境便即中落」。

「宋元明清各代，中國始終沒有貴族，沒有特殊階級」。

於是，以這種無貴族，無特殊階級的，「平等」「平均」社會爲背景，「到了唐朝以後，中國的文學和藝術，才逐漸由貴族的宗教的而解放爲平民的了」。

這算是有典有則的「經濟的」文化觀了。然而在全文中，這最合邏輯的片斷一旦被放在整個系列中，立刻就發生毛病了。

且在下面來補述。

四 「中國文化的最大缺點」云云

錢先生關於中國文化的敍述，愈到後面，愈加染上經濟的色調。所以，對於他的經濟的中國文化觀，我就依照他提述的第四文化期來說。

第一文化期以學術思想爲特徵，第二文化期以政治社會事業爲特徵，第三文化期以文學藝術爲特徵，均如上述。第四文化期，該以什麼爲特徵呢？錢先生沒有標明出來，也許是因爲我們正處在這一期，其特徵尚未形成，或者形成了，比較不容易發現。無論如何，他根本沒有觸及這個時期的特徵，却提出了我們在這個時期應當努力於文化的幾個方針：

其一、「要恢復固有的道德，這也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觀念」。

其二、「中國的社會沒有力量，如今既不能恢復封建制度，又不能進入資本主義，那麼究竟應該怎樣團結力量呢？我們必須使它們兩者相配，找出一條路來」。

其三、「中國文化最大的缺點，是農業文化，只有在農業社會裏才有辦法。……中國應當走進一步，那就是走上工業之路」。

關於中國今後文化努力方針的第一點，大家在讚：「着無庸議」。第二點須使封建制度與資本主義，兩者相配，大概是指着採取封建社會的精神，卽他後面所謂「盡人之性」的那一類觀念，同時又採取資本社會的物質，卽他後面所謂「盡物之性」的工業或科學。這就是物質與精神「兩者相配」，這樣代他解析，第二點也可「明白」了，同時第三點要走工業之

路，也連帶「明白」了。只是「中國文化的最大缺點，是農業文化，只有在農業社會裏才有辦法」這個命題，實在「太」經濟觀了一點，這一講，就使第一第二兩個文化努力方針發生動搖了，因爲

第一、文化是由物質到精神的總合。錢先生把學術思想，政治社會事業及文學藝術都包括在文化範疇裏面，當然贊同此一解釋。果其如此，錢先生認爲有「最大缺點」的中國「農業文化」，不也要把「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那一套「觀念」放進去麼？

第二、「農業文化只有在農業社會裏面才有辦法」，既決定「進一步走上工業之路」，變成工業社會，如何又能保持作爲農業文化之精神體現的諸般觀念與意識。

錢先生在這裏是意識到這種矛盾的，他依舊拿出了「經濟觀」的折衷論來。他說：「如何能在中國固有的理想之下，採用西方的科學，這個問題，頗難解決；中國的社會，科學來了就會改變的，但是要不變他的固有傳統，而變他的外形」。

「中國的社會，科學來了就會改變的」，這在錢先生，和他所說的「農業文化只有在農業社會才有辦法」，都算是特別健全的見解，可是把這見解展開應用，就不知所云了。

五　請再進一步

總括上面所述：

第一、如其我們不妨像在「論東西文化與東西經濟」中那樣，把梁漱溟先生看作中國倫理文化的化身，則在這裏，我們就更有理由，把錢先生看爲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文化

說教者。梁先生是一位哲學者，雖更觀念，也更質樸，更能捨去一切障礙其倫理觀念發展的社會事象，而更像能自圓其說；但錢先生是一位歷史學者，中外繁複的種種史實，雖對助他展開視線，向文化的一切方面去探索支持他的論點的例證，可是，如像鄭板橋所說：「讀書何必讀五車，充塞胸中亂如麻」。沒有一個正確的方法去貫串去系統那些史實，必然是治絲益棼，矛盾百出。比如，當他要說明漢唐的社會如何理想，如何平等，就力言：「秦朝以後，封建社會沒有了」；「中國自從漢朝以後，固然還有皇帝，但是並沒有封建貴族」。但當他要說明宋以後始有平民文學藝術，語調又變了：「宋元明清各代，中國始終沒有貴族，沒有特殊階級」，「唐朝以前，社會貧富懸殊」。——從這裏，我們顯然見到：他用以說明後一事實的例證，把他用以說明前一事實的證例取消了。在宋代以前，社會並不「平等」，可是一轉手間，他又回過頭來，說「中國社會，一般說來都是平等社會」，這或許還有「一般」二字緩衝，但他還說「中國維持農業經濟，社會平等」。如此這般的矛盾充滿全文。

第二，像錢先生這樣的大文，為什麼要費筆墨來講許多話呢？因為我是把錢先生看作「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說教的一個代表者，事實上，他的這篇大作，也當得起是這一類人的代表作。他們這類人有幾個根本的見解：

（一）他們只承認中國農業社會，有農業文化，而不肯相信歐洲那些工業國家，當它們還是農業社會的時候，亦有其農業文化，亦有體現其農業社會關係的倫理意識。

（二）他們不僅相信只有中國的農業社會，才有農業文化，才有高尚的倫理文化，並還認定工業社會，並沒有什麼維持那種社會秩序的倫理文化。

（三）他們還認定，中國只是物質方面不如人，精神方面則如錢先生所說，「中國文化走過了頭，和世界不能接符」，其結論，當然是如梁漱溟先生所說。我們將以「人生向上倫理情誼」向工業世界作重大的貢獻。

對於他們這些高見，我不願作任何批評，而且，

第三，我還得誠摯的原諒這些人的心情。人類的觀念的進步，一般是落在物質的進步之後的。況且如錢先生所說：「中國人的道德觀念向來很大，他要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要講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又要講禮義廉恥……這一條一條的道德的繩子，好像將每個中國人縛得緊緊」。受着這樣束縛的我們的士大夫學者，還不忘以「西學爲用」，還不忘主張進一步走上工業之路，而不像印度甘地先生那樣，認定反對英國這隻吃人的老虎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要反對它的吃人性格，反對它的機械、鐵路、醫院、律師制度等的物質文明，因爲這些東西不存在，英國就如魚失水，印度如跟着它學習這些文明就等於反對老虎，而不反對老虎的性格，結果只會爲虎附翼（參見甘地著譚云山譯「印度自治」）。——與這一套議論比較起來，我們的國粹主義者實是進步多了，但雖如此，

第四，爲了他們在學術思想界所處的地位的重要，和其立言可能給予一般社會的不良影響，我們不能不希望他們對於中西文化所抱的成見，有進一步的廓清。本文的篇幅，不允許我在這裏從長討論，但除了前面引述批評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觀的三個結論，可以幫助我們關於這種問題的理解外，更不妨就錢先生的基本論點，提供以次的評正意見：

（一）一切文化，都不是浮在空中，也並不是觀念的停滯在我們腦中，它必須在社會上

生根，它必須是特定社會由物質到精神的文物制度的具體表現。比如錢先生所說的中國文化是農業文化，是農業社會的文化云云，應該算是接觸到了問題的邊緣。

（二）一個社會的觀念形態或倫理哲學，不但是適應這個社會的物質條件和其社會關係而產出的，同時還是作爲綱維這個社會關係的秩序而作用着的。一旦物質條件改變，比如由農業社會移到工業社會，一旦適應那種物質條件的社會關係改變，比於主要由領主或地主對農民的關係，改換爲資本主對勞動者的關係，則以前在前一社會發生，並用以綱維前一社會關係秩序的諸種哲學思想倫理觀念，即使名辭還保留着，概念的內容却會大變的。比如「忠」字儘管保留，以前基本是對君主的，現在却擴大到對國家；又如「孝」字儘管保留，以前基本是對父母，現在却擴大到對民族。而且，這還是在中國社會尚未工業化說的。

（三）有了上述認識，我們就不難明白錢先生所提出的各文化時期的特徵表現，不過是中國農業社會或封建社會，或比較開明的封建社會，其各發展階段的社會關係的變遷上，顯示的諸特殊表象而已。周末或先秦是處在領主封建經濟過渡到地主封建經濟的轉形時期，思想比較解放，各家就爭鳴起來；迨地主經濟作了統一政權的物質基礎，這統一國家的專制君主，就開始抉擇他們所需要的，有利於其社會政治秩序綱維的孔家學說，孔子的大一統主義和宗法思想，正合他們這種需求。罷黜百家，崇尚儒術，並不是說儒家學說更好更精深，而實是因爲這種學說更有益於其社會政治秩序的保持，以後歷代都是一個政治社會形態，所以中國就「二千年無思想，以孔子之思想爲思想，二千年無是非，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明李卓吾語）。因此，這並非孔子及其一派倫理思想的「可大可久」，而是因爲中國在統一的

封建形態上，允許其在大地面上作用，成就其「大」，在朝代變來變去，政治一直保持原來形態，一直需要這種學說，才成就其「久」。孔子及其學說之幸，正是中國社會之不幸。而錢先生及他們這一流人物，却反過來，丟開中國社會，單單把孔子及其一派學術思想，當作中國文化的代表；不問中國社會的長期停滯，更以爲那種代表文化的「可大可久」。

當作一個中國學術思想的科學研究者和公平評價者，我對於錢先生這一類人的這一類文化考察方法，覺得有提出來糾正的義務。

七　三論東西文化與東西經濟

——評朱謙之先生的東西文化觀

一　由哲學家歷史學家到百科全書派

梁漱溟先生以哲學家的資格，談東西文化，錢穆先生以歷史學家的資格，談東西文化；我已分別把他們的不妥當的見解，分別評論過了，現在我想談到朱謙之先生的東西文化觀。朱先生是什麼家呢？他是哲學家、歷史學家、也是文學家、美術學家；談國學，他也來；談經濟學，他也來；他還有社會學的著述。最近更還在聚精會神的研究他「本店自造」的「軍火資本主義論」。因此，我們很可以稱他是一位百科全書家。百科全書家有幾個特點：

第一是，他的時代感非常强烈。而同時，因爲百科全書的學者，多半是產生在過渡時代，過渡時代各種惹人注意的社會事象，都會成爲他「探奇覽勝」的研究目標，因此，

第二是，他的涉獵非常廣泛，彷彿對於一切社會事象，一切社會的及有關歷史的問題，他

不但想從各別社會歷史科學方面，去求得解答，並且還想有他自己的一套解答。惟其如此，

第三是，他的態度非常開明。試想，一個研究興趣是多方面的，而自己又多所主張的人，他要向他人取得發表自己意見的自由，他就不能不讓他人也有表白其意見的自由。

這三點，應該是每個百科全書學者，在不同程度上所必備的特點。朱先生就爲我們如實的證示了這種情形。他對於時代的敏感，他蒐積之富，鑽研之勤，涉獵的廣泛，讀其書，知其生平者，均交口稱道不置。至若就研究的態度講，我們在幾年同事當中，每次見面必爭論，每次爭論必達到面赤耳熱的程度，結局，他總不吝給你滿意的說：「你所講的很對」；但當他這樣講的時候，言外決不忘記也給他自己滿意的表示：「我所講的也很對」。這就是說：絕對尊重他人的意見，同時也絕對堅持自己的意見。

可是，當作一個百科全書的學者，自然不可避免的有他的缺點。

其一、因爲注意的研究的範圍太廣，對象太多，他對於每科的造詣，就不一定能夠深入；「膚受淺嘗」的毛病，是難得避免的。

其二、因爲研究上難免「膚受淺嘗」，又因爲這種「膚受淺嘗」，主要是由於涉獵太廣。於是在運思立論當中，就往往會不知不覺的把許多類同的表象，或把許多不易調和的概念，貌爲比附的從觀念上關聯起來，使自己陷在自己強行設定的形式主義與觀念主義的迷團裏。

正如同朱先生爲我們證示了百科全書學者的特點一樣，他同時也在相當的程度上，爲我們證示了百科全書學者的缺點。

二　三基型與四基型

在第九卷第一期的「時代中國」雜誌上，朱先生發表了「經濟文化之三基型」的文章，據說，這是他在印刷中的「文化社會學」那部大著中的一篇，這篇文章劈頭表示了這樣「有創製性」的論旨：

「我們若從知識和文化類型的關係，更進而注意到經濟文化之地理的分布，我們便很容易發現東西經濟文化體系的不同。經濟文化體系由於財力組織的不同，實可分為三種經濟類型，而這三種經濟類型，實即分布於東西三個特殊的文化區域，形成三種特殊的經濟形態。這經濟三類型即是：

（1）宗教的經濟型——以印度為代表；

（2）哲學的經濟型——以中國為代表；

（3）科學的經濟型——以西洋為代表。

在這三個所謂「體系」的名目之下，朱先生為我們展示了「有條有理的」，「天造地設」一般的系統，即「以主要的生產形態言：印度為農業社會，中國為農工業社會，西洋為工業社會；以生產力的標準言之，印度為自然力（土地生產力），中國為人力（勞動生產力）西洋為物力（機械生產力）；以重要生產要素言之，印度為自然，中國為勞力，西洋為資本；以經濟體之大小言之，印度為農村經濟，中國為都市農村對立經濟，西洋為大都市經濟；以經濟之心理狀態言之，印度為絕慾論，中國為節慾論，西洋為唯慾論。」

經過了這一「總提」之後，接着是分別加以解釋，最後更殿以更「有創製性」的結論：

「由上述經濟之三種基本形態，印度代表宗教的經濟型，以飽食無事爲社會福利，爲消費社會型；中國代表哲學的社會型，以有無相通爲社會福利，爲交換社會型；西洋代表科學的經濟型，以增加生產爲社會福利，爲生產社會型。但這三種基型之外，更應綜合生產，交換，消費各社會型之藝術社會型，成爲經濟之四基本形態，此種藝術的經濟型，實爲印度、西洋、中國三方公共經濟之理想型。印度由宗教的經濟型到藝術的經濟型，中國由哲學的經濟型到藝術的經濟型，西洋由科學的經濟型到藝術的經濟型，但無論中國印度在其經濟發展的路途中，都必須經過現階段的科學的經濟型式的。所謂藝術的經濟型，是分配的經濟，世界大同的經濟，綜合形態的經濟，以生命與藝術生產力爲本位的經濟，這時候，合作代替了商人企業家，世界的生產者和消費者提高美感的標準，那時一切製品受美的評價的支配，自格外精良，格外美麗，機械運轉的音聲，一變而爲和平婉脆的音樂的節奏，並且這時科學應用最高的生產法，用化學可以從土壤空氣水諸原素中，造出綜合的食品，那麼還怕人們享受有窮盡的時候麼？這眞不是從前的經濟型所能夢想得到的」。

三　「你講的很對，我講的也很對」

朱先生的全部理論，總算「和盤托出」了。他的大文給予我們的第一印象，就是「整齊劃一」，三個不同的經濟文化型，由許多作爲它們各別不同類型之條件或內容的項目體現出

來，而這些項目，又是彼此分別都要縱橫關聯的，牽涉之廣，排對之工，彷彿不僅顯示思想之「造化」，同時還應歸功於中國文字的「造化」。但我讀過後，不能完全釋然的，有下列各點，且按照由表面的，逐漸引述到基本的層次，一一寫下來：

第一，以「印度爲農業社會，中國爲農工業社會，西洋爲工業社會」，這原是歷史學派發端者李斯特五階段論，最後三階段的簡括表現；李斯特所主張的最後三階段是農業階段，農工業階段，農工商業階段；朱先生將農工商階段改作工業階段，也許有他的用意。現在我不想多費筆墨來評論這個分法的妥不妥當，事實上朱先生已經在本文中「自我批評了」，他後面講：「中國代表哲學的經濟型，以有無相通爲社會福利，爲交換社會型；西洋代表科學的經濟型，以增加生產爲社會福利，爲生產社會型。中國這個農工業社會，一變爲交換社會了，而西洋以商品生產爲目標的交換經濟發達社會，反而把它的交換特徵捨去了。此外如中國爲節慾論，印度爲絕慾論，西洋爲唯慾論云云，無疑是梁漱溟先生的高見的「再版」，但

第二，卽使這種「削足適履」的分類法，至少總可勉强指出那三種經濟文化型的某一側面，可是這裏須有一個前提的認識，應當弄明白，卽印度、中國、西洋這三種經濟文化型，是這三個地域一直存在着的，還是分別有時間的限制。如其說，西洋的科學經濟文化型，是指着現代，中國印度的經濟文化型，一定要同是指着現代，才好相比，否則西洋過去何曾沒有宗教的玄學的文化階段，中世基督教的節慾禁慾，限制利息，限制商業，也許比印度還來得徹底！那將如何解答？爲了理論上的邏輯「便利」，朱先生想必對於他提出的經濟文化三基型同是指着現代，但可惜全文中引用來支持他的論點的「典據」，又多半是就印度及中國在現

代以前的社會經濟史論的，他引證的馬克士．韋伯的「社會經濟史」，和馬克斯（K. Marx）的「印度論」及「資本論」上的文句，都不能拿來作爲現代中國經濟和現代印度經濟的「比附」。

第三、把時間或歷史的觀念丟開，就假定通體看去：印度是宗教的，中國是哲學的，西洋是科學的，正如朱先生所肯定的「經濟文化之地理的分佈」。可是無奈他又是一個篤信孔德的社會進化論的人，這裏所謂經濟文化三基型，顯然是承襲孔德神學的，玄學的，科學的三階段論的經過剪裁的表現方式：而且他還更「進化些」，在科學的階段之後，復增加一項藝術的階段。並還斷言：宗教的、哲學的、科學的任一經濟文化型，還都得通過科學的經濟文化型，都得公同達到最後的藝術的階段。於是他一開頭就強調的世界三大經濟文化型之各別地理的分佈，即地理文化論，就在不知不覺之間，被他的進化文化論所否定了。

最後第四，上面這些矛盾形成的癥結，也許就在他努力想用社會意識的現象，去說明經濟文化，以爲這各別經濟文化基型的形成，係由於這各別社會存在着宗教的、哲學的、科學的不同形態的意識。我們原不忽視特定社會意識形成後，對於經濟發展演變上的反作用或影響，如中國傳統儒家學說對於中國經濟現代化所生的阻礙，但更基本的卻要看允許那種學說發生阻礙作用的社會經濟關係，允許那種學說或意識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以往的社會不談了，「死無對證」，我們如說是它們的社會經濟，形成它們各別的社會意識，朱先生會反過來說是由於宗教的、哲學的、科學的社會意識，造成它們各別的經濟類型。但「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且請朱先生加緊努力去用藝術的社會意識，來創造他理想的大同經濟類型

吧！事實上，朱先生引來支持他論點的「馬克斯扎記」中的那段話，已經明白表示：印度那種停滯和植物式的生活，那種生存的消極形式，在另一方面引起和它自己的野蠻相並的盲目的和放蕩不羈的破壞力量，造成印度宗教儀式的自殺」；不僅如此，朱先生關於哲學的中國經濟文化型，並不曾就「哲學的」涵義作何等正面的解釋，只說是：「中國農業也是以自然法為基礎，與印度村社以神意法為基礎者不同……中國交通經濟所標榜的是自然法觀念。有自然法，人們纔有更大的自由，享受更大的自然權利，這種在中國的「內在的」哲學的經濟概念……」；這段話可以說是全文中最「不知所云」的部分。自然法的概念，原是近代初期各國政治經濟法律學者所共同強調，用以反對神定秩序的東西，由重農學派到亞丹斯密，由布丹，霍布士（Hobbes）到孟德斯鳩，陸克等等，殆莫不把這當作反基督教義反封建社會組織的理論武器。但單純把這作為中國經濟文化之所以形成為「哲學的」類型的理由，不獨不倫不類，且根本把中國傳統倫理哲學對於經濟發展實在的影響，丟在一邊了。

由以上的說明，使我們對於朱先生這篇大文，或者對於他那以這篇文章為骨幹的文化社會學大著，不由得不發生以次的幾種評價：

首先，一切在表象上，在語文上講條理，講對仗的論著，往往會在內容上，在本質上發生無可救藥的矛盾。所提的項目愈多，那種矛盾也愈為錯雜。這無疑是任何形式主義者難得避免的通病，朱先生這篇大文卻為我們提供了極其像樣的標本。

其次，一切流於形式主義的理論，無論其所標舉的論題，如何具體；其所典據的文獻，如何權威；其用以說明問題的資料，如何確鑿，其支持論旨的徵引，如何博洽，但結局總無

法挽救他的玄學的或形而上學的歸宿。因爲離開內容的形式，根本就是觀念的產物。一切形式主義者，定然是某種程度的觀念主義者。其典據徵引的資料，一定可以想見是「望文生義」或「斷章取義」的結果。所以，朱先生這篇大文的字裏行間，都在若隱若顯的呈現着觀念主義的色調。

最後，我還得指明：在今日中國的文化論壇上，把東西文化的基本意義弄得極其朦糊，極其歪曲的，大體有三種說法，一是「純國粹主義」的，一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一是較近新康德主義流派的；第一種說法，已逐漸不大能引起人的注意，這是梁漱溟先生近年很少談這方面的理論的客觀原因之一；第二種說法，也許還有一個相當時期的掙扎，然而，如我在前文批評過的錢穆先生的高論，就是作者自己已經明白說到「農業文化，只有在農業社會才有辦法」；第三種說法就不同了，他們不是典據中國傳統的什麼經典立論，而是採合着較近流行於各國學術思想界的一些似是而非的哲學的社會的學說的結果。當作一個百科全書學者的朱先生，在經濟學上，是德國講壇社會主義的或即所謂浪漫主義經濟學說的「信士」，在社會學上，是德國西南學派或文化社會學派的流亞（儘管朱先生把文化社會學創建者文德爾班及利克特的方法論，作過一些不關痛癢的批評——見朱先生所著「歷史學派經濟學」），而更本質的在哲學上，他可以說是極有代表性的新康德主義者。新康德主義者的最大特徵，就在極力否認康德所提的「物自體」的客觀可認性，而强調一切客觀的存在，必須通過純主觀的認識方式與範疇，始有可能。客觀的存在，本來是一無條理秩序可言的，它們的條理秩序，是依據超經驗的那種認識方式與範疇，去序整出來的。朱先生是這樣理解出經濟

文化的三基型與四基型，他亦是這樣的作出那些組別的形式和項目。——然而，依這種「思維術」作出的東西，文化的思想「塵霧」，就比之前面兩位學者的研究或主張，還要使一般青年研究者，摸不着邊際。就因此故，我覺得我必須在寫過前面兩文後，繼續寫這篇文章。我相信朱先生定然是歡迎我的批評的，但却希望他不再說：

「你講的很對，但是我講的也很對」。

第三部　社會科學的戰爭論

八　政治經濟學對於現代戰爭的說明

一　歷史、法則、預言

中國的歷史家，曾說二十四史是一部相砍史。設把這段話擴而充之，說人類整個歷史，是一部相砍史，是一部各部落各民族相互殺來殺去的血腥歷史，也許沒有什麼說不通。但生存鬥爭論者的達爾文的世界觀，一定不能叫生存互助論者的克魯泡特金主義者感到心服。事實上，無論從中國史看去也好，從世界史看去也好，和平與戰爭是相間發生的。

不過，就是這和平與戰爭相間發生的同一事實，依舊有兩種絕對相反的看法；樂觀者可以說：和平了多少年，才有一次戰爭，戰爭是和平時代疏忽了戰備的結果，所謂「國家承平日久，武備不修」，致啓爭端，從這種觀點，和平是常，戰爭是變；但悲觀者可以說：戰爭

了多少年，才有一次和平，和平是對於前一次戰爭的休息，同時是對於次一度戰爭的準備，從這種觀點，戰爭是常，和平是變。和平與戰爭的這種演化關係，有如經濟上的繁榮與恐慌的交替關係一樣。遠的過去不講，在近代社會，許許多多的經濟學者會指示我們；每隔十年，或者每隔十年左右，就有一次經濟恐慌出現，恐慌過去，慢慢又恢復繁榮，就在繁榮的場面當中，又漸呈露出恐慌的暗影。於是樂觀者儘管把恐慌解作是經濟的變態，而悲觀者却「振振有詞的」說恐慌是「司空見慣」而且必然無可避免的常事。經濟上的這種繁榮與恐慌相間發生的現象，和政治上的和平與戰爭相間發生的現象，本來具有極密切的相互關聯，恐慌可以理解為戰爭的信號，但我想暫時不忙對此作深入的說明。在這裏應當解說明白的，就是和平與戰爭的循環現象，或者，每隔多少年就像照例要發生的戰爭現象，雖然一切歷史時代都存在着，但那並不是什麼自然現象，而是一種社會現象。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社會生活，有不同的社會對立與矛盾，從而，當作那種社會對立之爆發點，當作那種矛盾之解決方式的戰爭，也相應的具有不同的本質，不同的形態，不同的內容。

在這裏，我們沒有詳細比論各歷史時代之戰爭特質的餘裕，但我們可以從一部血腥的戰爭史中，看到戰爭演變的一般趨向，而由是達出以次三個結論性的認識：

第一、愈到近代，戰爭的經濟性，愈大於其政治性。——在過去，開疆拓土的政治願望，掩蔽了經濟動機，而現代爭取原料供給地與商品及資本市場的經濟貪慾，則涵蓋了政治動機。

第二、愈到近代，戰爭的必然性，愈大於其偶然性。——這是經濟的決定性愈來愈大的

結果，同時亦是戰爭條件限制的結果。

第三、愈到近代，戰爭的客觀強制因素，愈大於其主觀決定因素。——這又是戰爭之經濟性愈來愈大和其必然性愈來愈大的結果。

因為戰爭是經濟的，是必然的，是客觀強制的，戰爭就會依着它的這諸般特質，而顯出其因果關係的法則來。以一般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是延到現代才成立的；以社會現象之一的戰爭現象為研究對象的戰爭科學，亦是延到現代才成立的。

戰爭有了科學的研究，在戰爭的發生與發展上，找到了科學的因果法則，於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甫告結束的時候，儘管有些和平主義者，人道主義者，特別是戰勝國的國際政論家們，從四方八面呼出「戰爭永遠離開人類」的樂觀論調，但許多有遠見有社會科學修養的人，却已大體把次　度戰爭的必然性，其姿態，其規模，其延續期間，像很有把握似的預言出來。到今日，預言已似大體無誤的兌現了，已不幸而言中了。

慘酷的戰爭，已經劇烈的表現在我們眼前。我們不忍也暫不用作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預約。但我們如其不敢正視當前戰爭的本質，並設法在戰爭的過程改變它，恐怕第二次大戰的收場，就是第三次大戰準備的開始。

依照科學的預言而發生的戰爭，是須得依照科學的根據，予以解釋的。這裏且從現代戰爭的基礎說起。

二　在世界經濟基礎上進行的世界戰爭

戰爭是社會生活現象之一。戰爭的進行，當然受着社會物質的生活條件之拘束。世界規模的戰爭，首先必須世界規模的經濟已經完成。因爲世界各部分的經濟，如未結成有機的聯繫，各部分之間的社會經濟衝突，也就無從發生，同時，各不相聯屬的部分要進行戰爭，根本就非常困難了。世界的戰爭，是以世界經濟作爲它展開的基礎。這可從下面五點來扼要加以說明。

（一）交通　我們也承認：交通在許多場合，是用戰爭去開拓的，落後地域的戰爭，簡直被視爲一種交通形態。許多在平時不易突破的天然的障礙，往往是用戰爭去克復。但一般的講，特別在我們現代的社會，却更顯得是由商業，由經濟上的必要，才把世界各地域各孤立人羣聯繫起來。而那種聯繫，首先就須藉助於交通。德國一位經濟學者曾說：「橫渡大西洋的輪船，南北美洲及印度的諸鐵道，把特殊的諸地域，促進到能在歐洲穀類市場裏競爭的地位。在一方面，北美的大草原，阿根廷、南美的大草原，俄國的荒原，也加入競爭……在另一方面，俄國及印度諸共同體所有的土地，也加入競爭……」這段簡單的文句，對我們作了這樣的提示：各孤立地域由經濟結成的密切關係　是取決於交通工具發達的程度；交通工具愈發達，經濟關係乃愈形密切，而由經濟利害的矛盾衝突所引起的戰爭，才愈有可能。現代一切海陸空方面的新式交通工具，無疑受到了戰備或戰爭緊迫要求的促進，但主要的，基本的，還是爲了拓展經濟利益而發展起來。交通工具是經濟生活的條件，同時亦是戰鬥的條件，戰鬥條件與生活條件一致的事實，在交通上格外顯得明白。

（二）技術　現代備戰與實際從事戰鬥的緊迫要求，在軍事技術方面引起了莫大的改進

。但這種事實，並不能理解爲：軍事技術的發達，是由於軍事上的不絕的新發現，是一個自己獨立運動的過程。其實，軍事技術是複雜的社會技術的一個構成部分，或者可以說，是把社會的特別工業上的最有效的技術部分，被應用在軍事方面的結果。離開了現代社會的生產方法與生產關係，現代的武器與應用武器的一切技能，都將成爲不可想像。只有社會生產方法改進了，社會的一般生產技術改進了，軍事技術方有變革的可能。自然，我們在另一方面，也不能抹煞軍事技術督促社會生產改進的事實。我們甚且可以强調的說：各國相互之間的競相改良生產技術水準，雖然是企圖以更優良更低廉的製品，去競勝對方，但在許多場合，却也是爲了以更精良更優越的武器，去擊敗對方。現代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之相互對立的發展，以及當作其副產之武備的相互競爭的發展，乃使世界型的戰爭所需要的技術得以完成。

（三）財力　一種世界規模的戰爭，不論在備戰過程中，抑在戰鬥過程中，參加的國家，第一，必須其國富發達到相當程度；第二，必須其社會生產力發達到相當的程度，始夠資格。就前一點而論，現代戰爭動員的龐大，人數及其所應用所調度的繁雜而多費的武器，顯然要求一國國民經濟能提供出與其相適應的物質的資源，和其國民能擔當起如此浩大的戰費。前次世界大戰的總耗費，單就交戰各國的直接損失說，已達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其中平均每日用在戰爭上的費用，前三年爲一二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一九一八年爲二四四、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這樣龐大的損耗數字，在二十世紀以前的各國國富程度，決計無法擔當。換言之，各交戰國在前次大戰中的耗費的物資，都是他們的國富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迅速積蓄增加的結果，而且，由於現代戰爭的全面化與機動化，單靠了

過去的蓄積，單靠着死的堆積着的資源，是依舊無濟於事的，大量耗費的補充，適應機動戰鬥環境或隨時在變更着的戰爭形態，而要求的武器，運輸工具的擴增與革新，皆直接依存於社會生產力的變革與發展。而此變革的發展的社會生產力，又得依存於全般的國民經濟發展的狀態。

（四）人力　關於現代戰爭上的人力問題，不論從量上講，抑從質上講，都須在經濟上確立其基礎。從量的方面來論，軍隊的動員，會由兩個方面受到經濟發展程度的限制，首先，一般國民之變成軍隊，是把一定的軍需品，一定的裝備，作爲它的前提。而且，愈到現代，一個兵士所需要的物質裝備，遠較過去爲費，遠較過去爲多。這多而且費的裝備，已經够使動員的人數受到莫大的限制了。同時，維持大規模的戰鬥，又非有一部份人繼續從事生產勞動不行。大約一國社會勞動力愈低，它維持前線作戰所需從事生產勞動的人愈多，換言之，即可能動員到前線的人愈少。不過，這裏有一個相互乘除的事實存在，即生產不發達的國家的軍隊，其裝備是比較簡單的，從而，維持其比較簡單裝備的生產勞動，也是比較不多的。但軍隊的裝備與社會勞動生產力，一般說來，終不免有限制動員人數的兩大妨礙。所以，在以前小農經濟體制下，一國能動員其全國民的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已算難能可貴了。到了產業資本主義時代，直接參加戰鬥的人數，還不過佔全國民的百分之十。帝國主義時代的情形不同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各交戰國動員到戰爭過程的人數，竟達到了全國民的百分之十五乃至百分之二十。

以上是就量的方面說。以質言，從事現代戰爭的人，都須是從現代性的經濟機構裏面抽

集出來的人。沒有現代產業上的技術訓練，根本就無法運用或把握現代的武器和運輸工具。「在從前，佔軍隊中大多數的，最好的要素，雖是荒昧無知的，文盲的，對於作爲槍砲之餌食的自己的任務，沒有單獨思考能力的農村居民，但是在現代，客觀上最有價值的要素，已是都市居民——特別是產業的普羅列塔利亞，因爲只他們保有運用機械的必要的知識，能以工廠勞動的規律性和組織性，移植於軍隊之中。因之，他們有於短期中習得軍事技術，和更完善的適應於現代戰爭之複雜環境的能力」。

（五）統制力　現代的政治，在戰爭過程中，乃至在備戰過程中，待別顯得是現代經濟的集中的表現。作爲戰爭之最重要措施的國家總動員，是把經濟機構之高度有機化與高度集中化，作爲他的前提。事實上，全民族性的戰爭，就是意味着被經濟紐帶結成一體的一個民族與同性質的另一個民族的搏鬥。分散的落後的農業經濟體制，決不易表現強有力的統制力。而一國在戰鬥過程中運用統制力的最高統帥部或司令部，其所屬全體幹部的量與質，均與其產業發達的程度，保有極密切的聯繫。不能把產業上的規律與組織移植到軍隊方面，對於現代化的軍隊的統率，已經是極不容易。若進而把一國乃至多個國家的人力、財力、交通、技術，統合的加以編配、調整、運用，那更加困難了。愈到現代，「軍隊的靈活的指揮，早成爲極端重要的要求。在這個要求之中，應放在第一位的重大事體之一，就是關於握在國家指揮者之手的物質資源的基本知識」。對於軍事技術方面的進步不加以精密的剖解，根本就不能得到有關現代戰爭之必需品的明確觀念；同時，對於有關現代戰爭之必需品沒有充分的理解，也就根本無法得到現代戰爭上的必需人材的明確觀念。技術的，物的，人的基本觀念

的缺乏，要成立一個能發揮統制力的最高司令部，一定不能有所成就。

總之，我們無論從上面列舉的五項因素中的那一項來說，現代戰爭的進行，都得以現代的經濟技術與組織，作爲他的基礎。而且，上述五項戰爭的因素，彼此都在經濟的地盤上，密切的依存着，聯繫着。然而，我們在這裏所急於要知道的，也許不是世界戰爭如何在世界經濟基礎上進行，而寧是世界戰爭如何在世界經濟機構中產出。

三　在世界經濟機構裏釀成的世界戰爭

這裏所指稱的現代經濟，大體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支配的經濟，要理解這經濟的內容，先得直截了當的去理解資本主義的內容。對於資本主義，一百個經濟學者也許能定出一百個不同的概念。我們在這裏沒有替資本主義下定義的必要。最有效的辦法，當然是指出它的具體內容。當作一種綜合的社會體制來看的資本主義，它包括有三個制度：

（一）私有財產制——這是資本蓄積，資本增殖的必要前提。有了它，作爲資本主義社會之支配者的資本家，乃能獨佔生產手段。但單是生產手段，是不能給予資本家一些什麼的，換言之，生產手段並不能從容的叫資本蓄積增殖起來。包括着原料，輔助材料及勞動工具的生產手段，要有了勞動，才能發生增殖價值，增殖資本的機能，所以，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一定要鑲配起一種可以買賣勞動力的工資勞動制度。

（二）工資勞動制——湊巧得很，近代私有財產制成立的瞬間，也就是工資勞動制成立的瞬間。因爲生產手段被一部分人獨佔了，以前的獨立手工業者，自耕農民，就相率被迫與

生產手段分離，而不能不變爲被傭者，由是使工資勞動制必然相伴而產生出來。但有了工資勞動來推動生產手段，還不够且不能使資本變爲更多的資本，使價值變爲更大的價值。於是，在私有財產制及工資勞動制成立的過程中，又相伴產生了一種成就一切「好事」的商品生產制度。

（三）商品生產制——資本家利用其獨佔的生產手段，傭備勞動者從事生產，其目的在依照營利主義，把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販賣出去，獲取利潤，而被傭者生活所資，全從購買得來，這又不啻爲資本家的商品，提供了市場。同時，勞動者獲取生活資料，全靠出賣其勞動力，勞動力也成了商品。由是，資本家用以從事生產的，都是當作商品購買進來：資本家所生產出來的，都得當作商品販賣出去。商品生產制是這樣完成的：

商品生產制的完成，也就是整個資本主義體制的完成。由是，私有財產制，工資勞動制，商品生產制，便成了資本主義的「三位一體」，「金甌無缺」的具體內容。所謂現代經濟，是以此三者爲核心，爲實體，爲本質。但爲要接近我們這裏所要討論的問題，單提出它的這種內容還是不够的，我們須得進一步去理解它那適應或配合這種內容所結成的社會經濟關係。那究是一些什麼關係呢？我們在這裏也可從三個方面來說明：

（一）資本家與勞動者所結成的生產關係——這像是很容易明白的，因爲上述的工資勞動制，就已經把這種關係體現出來了。但我們這裏所着意的，並不是它的形式，而是它的實質；不是資本家與勞動者是否結成關係，而是看他們結成了怎樣的關係。從表面看，他們相互間是平等自由的，是互相依存的，是休戚相關的。因爲勞動者是以勞動力的所有者的資格

，與資本所有者的資本家立於對等的地位。他照着自己的意志，把勞動力賣給資本家：同時，資本家則照着他自己的打算，把他利用勞動力所生產的商品，賣給勞動者；一旦，資本家不買勞動者的商品，勞動者也就不買資本家的商品，他們顯然是「有無相通」，「各得所需」，平等自由而且他助互助了。但這是過於表面的看法，資本家賣給勞動者的，是勞動者替他生產的商品，而勞動者賣給資本家的，却是他自己的血肉精力所構成的勞動力，這已經是先天的不能等量齊觀的買賣。而且，資本家買進商品又賣出商品，一轉手之間所得到的剩餘或利潤，據科學的分析，那種剩餘或利潤，並不是由變把戲，要花槍得來，而是由於勞動者作了他所得報酬以上的工作。但有人會問，他是自由的，他爲什麼要忍受資本家的剝削呢？那很簡單，因爲他離開了生產手段，如再離開資本家，他就祇有餓死。因此，他們的自由，便被形容爲餓死的自由。農奴是被封建法制束縛在土地上，現代的工資勞動者却是被一種美名爲自由的法制所拘束着。然而我們在這裏用不着對此加以深入的說明。我們所應注意的，却毋甯是勞動者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具備有兩重的「服務」資格。他是商品的生產者，他亦是商品的消費者，他以生產者的資格多被剝削一分，他就會以消費者的資格，少被榨取一分。而現資本主義的大量化與機械化的生產法則，必然要引起生產愈來愈多，消費愈來愈趕不上的危險。資本家或者他的代言者，早經意識到他們與勞動者所結成的這種關係，是不能保證其商品生產活動的圓滑進行的。他們把貪慾的眼光，移向海外落後的地帶了。

（二）整個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次殖民地帶結成的關係——事實上，近代國家一開始搽上資本主義的印記，就已經同落後的地域發生了密切的關係。殖民政策是催生資本主義的

一個有力的因素。不過，資本主義每向前發展一步，它對殖民地或準殖民地的要求，就不可避免的要加緊一步。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的特質，第一，要求它製作那些能適應能接近一切預想的或可能的市場的商品，由是，它對於製造那些商品的各色各樣的原料，就感到迫切的需要了。原料原是落後的農業地域供給的。資本主義生產愈向前發展，它由國內取得原料的可能性，就愈加相應的減少。換言之，對於國外落後地域的要求，就愈加相應的增大了；第二，商品生產的特質，既不是為了直接生產者乃至資本家自己消費，而是為了把它生產的商品，賣出去，以取得利潤，於是，擴大市場、和確保市場，就成了商品生產的非常重要課題，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相並存立，且相互競奪市場更相爭着相互競求原料供給地的情形下，單靠買賣關係來維持或確保商品市場與原料供給地，是頗無把握的。由是，通過政治關係來使落後地域獨占化或殖民地化，就成了商品生產必然要採取的步驟。到了資本輸出的時代，這步驟益發加大它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了。

（三）資本主義各國相互結成的關係——以商品生產為前提的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相並存在，在它們之間，自然也保有相互補充，相互調節的餘地。各國因為自然條件與社會條件的限制，其所生產的商品，並不一律，其所需要的原料，也不一致，它們相互「通有於無」的可能限度，確不算小。如其政治的風波，不驚動它們的經濟往來，那種可能，也許更大得多。但現實是比我們的預想，參差複雜許多的。正因為各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然條件與歷史條件不同，它們就不是以同一步調踏上資本主義旅程，其各別所具的資本主義的先天秉賦，往往會決定其資本主義的後天特點，它們的發展的參差與不平衡，就使他們無法保持合理的正當

關係。

這三種社會經濟關係，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外殼。它們三者不但相互密切的關聯着，並且在上述資本主義「三位一體」的財產私有制，工資勞動制，商品生產制的發展演變過程中，即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各階段中，演着極其錯綜的作用。此外，不論就各國相互間講，抑是就某一特定國家講，資本主義的生產發展，是無法平衡的。「企業，托拉斯，工業部門，以及個別國家的發展的不平衡的進行，並不是依照已經規定好了的秩序，也不是一個托拉斯，一個工業部門或一個國家，時常在前面，而別個托拉斯或國家，經常依次的跟在後面，而是跳躍的，在一個國家中的發展，帶着間歇，在另一個國家的發展則跳躍的前進」。所謂「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的絕對法則」。現代的戰爭，就是在這個絕對法則的作用下，表演出來的。這關鍵，我們把產業資本主義時代和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經濟內在發展的趨勢，加以比較的考察，就瞭如指掌了。

首先，產業資本主義時代，一般是指着由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這一百多年間。在這當中，世界主要諸現代國家，雖都先後成就了產業革命的任務，但正因為它們成就產業革命的任務，是先後發生的，而且，這個時期，大體尚是屬於產業革命的第一期，而以輕工業對重工業保持了相當優勢地位為其特徵，各國社會資本的有機構成，一般的尚不甚高，這就說明了當時經濟的形態，限制了戰爭的規模和範圍，使戰爭不能不局限於一定的區域，同時並使大家在經濟活動上，還覺得「行有餘力」，還覺得不妨「和平相處」，「雖然其間某些國家，為了完成現代化過程，也發生了相當規模的戰爭，如中國鴉

片戰役，普法戰爭，中日戰爭等等」，以維持自由競爭的場面。這事實，仍可由上述三種社會經濟關係的現實，來予以詮釋：

第一、就勞動者與資本家的對立關係來說，因爲當時尚是輕工業佔有優勢，因爲社會資本的有機構成尚不甚高，因爲以機械化代替或驅逐勞動的要求尚不十分急迫，尚未大規模的進行，由勞動者大批失業，商業預備軍大量存在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尚未達到怎樣嚴重的程度，所以各國爲要「安內」而以「攘外」形態出之的要求，也就比較不很急迫了。

第二、就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關係說，因爲當時尚是在分割落後地域的過程中；各國一拿到了或分得了某個地域，爲了好好利用或消化，馬上就採用開發和開化的方策，用自己的形態，去冶造殖民地；殖民地完全是處在被動的或不自覺的地位，這樣，各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的關係，就比較單純，比較不是怎樣尖銳了。

第三、就各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的關係講，因爲它們各別國內的勞資糾紛尚未嚴重化，因爲它們對落後地域的佔有，尚未達到完全絕望的田地；同時又因爲有些開始踏上資本主義旅程的國家，還需要鞏固自己的根基，它們在獲取原料供給地和商品市場上，一方面雖感到先進國既成勢力的壓迫，另一方面也感覺有依賴先進國，或與先進國妥協之必要，這樣，它們就是在爭取殖民地的鬥爭下，也還能採行「相忍」「相協作」的形式，而相安於一時了。

到了次一階段的帝國主義時代，情勢不變了。

後進國家在對先進國競存的場面下，以一切可能的方式，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結局，許多國家都以最高速度，擴張其生產規模，以致商品市場和原料供給地的要求，突然緊迫

起來。

而且，由商品生產增加，由資本蓄積增加，所造出的大量可轉化爲機能資本的資金，在國內找不出有利出路，遂相率向落後地帶輸出。但資本輸出，較之商品，更需要保障或保護，需要獨占，需要把落後地帶殖民地化。

不幸，在十九世紀末期前後，世界一切落後地域差不多都分割淨盡了。在這場合，先進的，已獲有充分殖民地的國家，就相對的佔着優勢，使那些新興的後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只有採用兩個帶有危險性的競爭方式；那第一，是力求生產的改進，企圖以較低較精美的商品，去競爭市場，但結局，招致了國內勞動失業人口的增加，招致了國內消費市場的縮小，是加重了經濟的危機，由於這個競爭方式立即會引起恐慌；另一個方式，就被認爲是必要而且是無可避免了，那方式，就是以戰爭來打破現狀，來求落後的殖民的地帶的再分割。

然而這樣一種說法，一定會結論出，戰爭責任全由後進的國家來担當的危險。事實上，像英國那樣的先進國家，它對於戰爭，並不全是被動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要是在英德兩大帝國主義强國導演下形成的。德國作戰的原因，誠如上述，而英國作戰的原因，則是因爲德國工業實力的水準，趕上了它；德國憑藉着優勢技術的，組織的和商業的力量，擊潰了它，打破了它在世界上的統治，由是它感到，除了依靠武器來維護它的世界霸權外，再沒有其他的路可走了。

所謂帝國主義的戰爭，就是在這鐵一般的必然的傾向下產生的。

四　第一次大戰與世界經濟問題

第一次世界大戰，依着經濟的必然，依着資本主義法則而產生之後，對於世界經濟問題，對於帝國主義的基本矛盾，究有怎樣的影響呢？這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說明：

（一）戰爭解決了的問題——

1.殖民地或保護國勢力圈的爭奪，被表現爲戰爭所由發動的中心問題，德國戰敗了，它的全部殖民地，乃至它在歐洲領土的八分之一，都被交由戰勝的協約諸國處置，爲了要求再分割殖民地及落後地域而戰爭，戰爭確然達成了再分割的任務。而且，

2.殖民地問題所以被尖銳化，所以成爲戰爭的主要課題，無非是爲了日益擴大的日益改進的生產機構，經常需要與它適應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給地；又加日益蓄積的龐大的資本，經常需要能作爲其出口的落後的地帶；但各交戰國「你死我活」的拚鬥下來，不僅把它們的生產機構破壞了，同時還把它們多年蓄積的大量資本銷毀了，這就是說，一度戰爭的結果，幾乎連戰爭存在的根由也予以剷除。然而這還只是就戰爭之物的因素方面去論。

3.促使交戰國不得不挺而走險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是由於各資本主義國家的龐大的產業預備軍的存在；由產業預備軍存在所引起嚴重社會問題，使各交戰國當局，半自覺地或者有計劃的用對外的刺激，來緩和國內的鬥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可驚的傷亡數字，對於帶有威脅性的龐大產業預備軍的剷除，一定有了莫大的幫助。

在這個方面，戰爭係是解決了不少的問題。

（二）戰爭遺留下來的問題——

1. 戰爭無疑地把戰勝國與戰敗國之間的矛盾解決了，但這種解決方式、即一方强力壓迫另一方勉强就範的方式，根本就留下了問題更加惡化的禍根。而同時戰勝諸國間由分贓的不勻，由過去佔有殖民地在質上量上的差異，以及由發展不平衡所引起的矛盾與糾葛，却就不但使他們彼此之間，無法和平相處，且還會由它們一夥的鉤心鬥角，更使戰敗國有捲土重來的恢復機會。

2. 戰爭誠然破壞了促使戰爭爆發的物的因素（如龐大的生產機構和資本蓄積），和人的因素（如廣大的產業預備軍），但資本主義制度本身還存在着，那些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一定會「再生產」出來；一定會利用戰時的經驗，而很快的「再生產」出來。

總之，當前的表面化的問題是解決了，而根本的問題，却還存留着。

（三）戰爭造出來的問題——

1. 在世界規模的戰爭中，因了種種關係，並不是各個參戰國家，都同等的平等的分受戰爭的負担，有些國家，如像美國同日本，或因參戰時間較晚，或因距離主要戰場較遠，它們不但不曾損傷元氣，不但不曾摧毀其上面所述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且反而利用戰爭的機會，利用其他交戰國由世界落後地帶暫時退出的機會，猛烈的、迅速的、過度的、擴大其生產的和交換的機構，這就不但在它們彼此之間，在它們與其他戰勝的協約諸國之間，也造出了新的不平衡和新的矛盾。戰後在各資本主義國家間鬧得不可終日的賠款、戰債、軍縮等問題，不過是作爲那種不平衡與矛盾的露骨表現罷了。

2.當列强正在歐洲戰場上拚命厮殺的時候，它們對於世界殖民地的束縛，已經大見鬆懈了。不但如此，它們在兵員方面，在軍需品方面，還對殖民地有所要求，在這種有利的條件下，各殖民地，各落後地帶，不僅在經濟上加速的前進了，工業化了，並且在政治上，也多少獲得了一些自由，這就是說，它們和宗主國以外的國家，也可能有某種限度的經濟的與政治的往還了，殖民地的這種離心傾向，把戰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相互關係，弄得更加錯綜複雜了。

3.蘇聯在那次世界大戰過程中的出現，那對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是一個非同小可的損害。六分之一的地球上的廣大面積的「淪陷」，已經够嚴重了，但由於這個反資本主義的「王國」的存立，發展，對於資本主義列强國內的勞資對立問題，乃至對於列强間的對立問題都增加了莫大的複雜性；從那些問題的解決意義上講，簡直是增加了無法計量的破壞性了。

在戰爭所造出的諸般問題中，這很可以說是最麻煩的一個。

五　從德日兩國社會經濟組織中發出的戰爭信號

戰爭與經濟的一般關係，我們已經明瞭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並不是某個國家或某些少數國家，單方需要戰，就戰起來，這事實，我們亦經指明了。我們在這裏把德日兩國特別提出來，除了使我們把握的命題，即經濟觀的戰爭的命題，更具體的得到說明外，同時還想就大家必然感到，而且確曾感到的以次疑問加以補充的解釋：即無論就上次的戰爭說，抑就此次的戰爭說，在一切交戰國中，雖然大家彼此都準備打，但畢竟有些國家更需要打，而事實

上，更需要打的國家，確實由它或它們最先動手來證實了。第一次大戰是德國或德奧做了先發動者的丑角，第二次大戰，德國更無忌憚，更露骨的做了主兇，不過，日本這個小丑，却在德國大動干戈以前，就已經偷偷摸摸的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了，假使他日有機會審判這次戰爭的責任問題，德國也許更有理由向它夥伴身上推諉的。

我將就以次幾個論點，來展開說明。

（一）德日兩國社會經濟組織的特點——任誰把德日兩國社會經濟組織加以比較的考察，一定會發現下面這幾個類似點或同點。

1.相同的落後性——以統一的現代姿態的國家而出現，在日本是始於一八六八年的「大政奉還」或「明治維新」的開端；而在德國，則是始於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在普法戰爭後，德意志南部諸邦，始脫離法國的羈絆，而統合於以普魯士爲盟主爲中心的德意志國家了。把它們以現代國家資格出現的時期，與英國的「光榮革命」（一六五〇年）時期相較，自然是落後得可觀了，就是同法國的「大革命」（一七八九年）美國「獨立戰爭」（一七七六）的時期相較，亦將近遲滯了半個世紀以上，如其說現代經濟，在其發軔之始，受到了統一的現代國家的不少的保育，日本和德國產業的落後性，是非常明顯的。一切落後的國家，或者那種國家的產業，在其發展的或現代化的過程上，必然會表現出兩種作爲落後標幟的傾向，即其變革，其維新，其現代化的努力，第一、外鑠的影響，似大於內發；第二、由上而下的强制，似大於由下而上的推動。這兩種傾向，都說明變革的無法徹底，把領主改裝爲地主；把藩國的騎士武士，新飾爲常備官兵；把中世的基爾特，編組爲產業組合。一部使舊勢力

合理化合法化的憲法，把大大小小的貴族們、將軍們、都在舊的基礎上，取得了新的存在。一言以蔽之，封建成份的大量的保留，形成了德日兩國社會經濟組織的第一特點。

2.相同的脆弱性——它們的經濟上或產業上的脆弱性，有一半是從它們的落後性導來的。落後了，不能很快的走上資本主義的旅程，它們就不但對於殖民地的要求，不能表示鈍感。同時，它們自身，且還要被當作落後的殖民地來為人所盤算，美國的「黑船」向日本探掠的時候（一八五二年），日本是同非洲澳洲等量齊觀的。而在這以前不遠的期間（一八四八年），德國國家主義經濟政論家李士特（F. List），已把德國描述為英國蘭開夏、滿切斯特商工業者的殖民地了。等到日本同德國立意要由殖民地登上現代國家的舞台，世界落後的地帶，大體已被宰割淨盡了。日本無疑從中國強奪去了朝鮮、台灣、琉球，德國也還在非洲，在太平洋，找到了一些立脚的基地，但比起其他先進國來，它們的資本主義的這一方面的脆弱性，就已經表現得非常顯然了。但還不止此。日本在美國黑船到達以前，原本是一個封鎖的，與外國無何等交往的國家，惟其如此，它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出現的「資本」，就完全只靠國內的，由封建王侯將軍們胡亂消費剩下的一點點原始蓄積。德國原和日本不同，在新大陸和遠東尙未同歐洲直接發生商業聯繫以前，德國曾由所謂「漢撒同盟」，壟斷過歐洲北部的商業，但海洋大道對於英、法、西、荷諸國的大大成就，同時却把德國變成了一個同外界截斷了商業關係，而只是它在歐洲，讓宗教的、政治的、經濟的、乃至國內農民的戰爭，來消耗它的國力的，破碎支離的國度了。它是由法國得到一大宗賠款和能彌補其先天貧弱症的煤鐵產地亞爾薩斯，洛林，才起家的。但雖然如此，它的脆弱性，它的先天不足，並

不下於日本。

3.相同的侵略性——社會的經濟的組織，何以在落後性與脆弱性之外，又表現着侵略性呢？這有一大部份正是由它的落後和脆弱性所招來的，日本和德國的產業，自始就帶有幾分「殺氣」，帶有幾分橫衝直闖的戰鬥性的因素。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說明：產業軍事化，是德日社會組織下最值得注意之點。我們已講過，落後國家要對先進國家迎頭趕上，首先就需要備有相當程度的武裝，軍國民主義在這裏是最好活動的溫床；而由外而內，由上而下的社會改裝，更方便把產業的基礎，安置在軍需工業上。就日本說，對華戰爭，對俄戰爭的勝利，對於那個軍事化的產業，不啻一次一次的給予了鼓勵，給予了加强擴大的機會，而日本軍人在憲法上取得的特權，更無異給予了那種產業以有效的保障。日本在這許多方面，無疑是把德國作爲它的「自我冶造」的標本。日本的憲法是從德國抄去的，日本的軍閥主義是由德國輸入的，日本的產業是按照德國樣本來裝備的。德國的軍事化產業，也無疑受了普丹、普奧、普法戰爭的勝利的鼓舞。但尤其是得到了具有濃厚封建性的軍事勢力系統的支持。德國的皇帝不但是國防軍的統帥，同時還是全國產業組合上的最後支配者。除了這種軍事化的特點外，它們全盤的產業，還有一種以和平競爭方式去奪取市場的戰鬥性能。一個先天薄弱而又落後的國家，要使它的製品，在人家已經把握並部署好了的市場上去獲得銷路，它就不能不在生產過程上，下一番「剪裁」的工夫。德日兩國從不同的作法上，得到了同一的結果，就是德國多方使產業技術化組織化，用優良的技術和組織去戰勝敵人，日本在這裏是採取不同的戰略，它利用本國低廉的勞動力，利用一般顧客好奇取巧的心理去擴增銷路，但它們的

作戰儘管不同，他們由此形成的產業的戰鬥性或侵略性却是一致的。

（二）德日社會經濟組織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我們肯定這種說明的時候，一定會引出這樣的反駁，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爲什麽德國做了戰爭的元兇，而日本反而很安活，很逍遙自在的，站在一傍，來享受快哉的「神風」，而成爲最多收穫的「戰時利得者」呢？自然，我們很有理由從主要戰鬥局限在歐洲來解釋，從英德是戰爭的兩大主角，日本當時不過是做着幫忙的配角來解釋。但，戰爭爲什麽局限在歐洲，日本爲什麽不同德國一樣演着主角的任務呢？歸根結底，還祇有從它們各自的社會經濟條件，去得到說明。

先就日本說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當時，日本的經濟發展，雖然已經感到了市場狹窄的痛苦，但因了以次幾個理由，終把它在產業上「天稟」的那種兇焰，那種「殺氣」，那種侵略性格收斂起來了！那些理由之一，是日本社會特殊的「稟賦」，還允許它用各種新的方式，在農村中從事原始蓄積；它的勞動大衆，尚沒有現代的組織的戰鬥的經驗，允許它的資本主義，施行前資本主義的搾取，事實上，日本對外推銷的製品，就已經是在利用或「享受」它這個優點，它像從這裏發揮了它「伸縮自如」的彈性。然而單靠這個條件是不行的。它的自然環境靠近所謂地大物博的中國，靠近這個列強眈眈虎視，而不會全部宰割，不會明確的劃定勢力範圍，不會爽切地變成誰的保護國的中國，自然會增添它不少的幻想，所謂「大陸政策」，就是它那種幻想的具體表現，它因爲在處心積慮的圖謀這塊肥肉，所以，只要列强不積極侵蝕到這裏，侵蝕到它的「臥榻之傍」，它是樂得故示鎮定，樂得看人家厮殺的，此外，我們還得指明一點，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可以理解爲英德的爭霸戰。日本在

日俄戰爭以後，它的國際地位，它的實力，確實增加不少，但同當時的德國比較起來，它還不够成爲英國對世界統治的威脅。就因此故，英國雖然已把德國當作老虎來打，對於日本，它却不妨把它當作警犬，與它結成盟盟，使它担任防守其遠東利益的任務了。這就是說，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方面固然是持有「袖手傍觀」的自然的和社會的條件，同時也由於它不曾在實力方面，具備一個作爲大戰主角而行動的資格。

德國是不同的。在接近德國本土的周圍，都由英國或在英國主導下，佈置了產業的乃至軍事政治的天羅地網，德國每從產業，從政治方面一有所擴展，馬上就碰到英國給予它的障礙，而不幸，我們前面已經講過，德國產業的發展，又是以超速度而前進着，這又不僅刺激英國的戒備，且還使德國抱着非突破英國封鎖無以圖存的決心。在這一現實前面，並還顯示出了另一個加深它們之間的政治危機的事實。那就是，德國產業上對於發展受到的妨阻，不但不能像日本那樣，向本國勞動大衆方面得到補償，且還必然要由此加大勞資對立的關係。即德國產業工人一開始，就具備了幾個較之日本產業工人難於駕馭得多的條件；第一，德國產業的發展是相當集中化的。集中化的產業，要比不集中化的產業，更便於產業工人的組織化；第二，德國產業工人在他們形成組織之始，就具備有戰鬥的經驗，這經驗，是其近鄰法國特別是英國產業勞動者，經過去多年，許多次鬥爭獲得的，所傳揚給它們的；第三，作爲勞動者爭取階級利益的指導的學說，在德國甫一踏上資本主義的旅程，就已經在當作各國產業勞動大衆的共同的福音而傳佈着，這些學說，又主要是以德意志文字寫下的。拉塞爾（Lassale）洛貝爾淌（Ropertus）馬克思（K. Marx）恩格斯（F. Engles）的理論，當然能給予德

國勞動大衆更多的影響。就因爲這些理由，在十九世紀最後三數十年間，德國勞動者階級的活動，已經變爲德國資本主義的一個痛苦的重壓了。德國資本家爲了突破這難關，都依照資本主義法則所指示的有利途徑，加緊使他們各別的産業機械化，用機械這種「吃人」，去對付「桀驁不馴」的勞動者。結局，機械驅逐勞動了，結局，個別資本家像是在這一方面得到了避免勞動者的麻煩的便利；但就全資本家階級講，就他們都需要商品消費者講，馬上就發生了一個大漏洞，由被機械所代替了，所驅逐了的産業預備軍的增大，把社會的危機，社會的威脅加大了。爲要克服這種危機與困難，德國資産階級感到他們唯有對外打破包圍，把國內産業勞動大衆的注意，集注到對外關係上，始能得救。

就這樣，德國作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元兇。那次戰爭的發難責任由德國來負担，那總該可以說是一種「不自然的必然」罷。

（三）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的日德經濟概況——第二次大戰的發動，有兩個說法，一是起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在中國蘆溝橋的侵略，一是起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國向英法的宣戰。事實上，日本向中國的進攻，已經不是始於一九三七年，而是始於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的事變，而在德國，它對法宣戰以前，早經對奧、對捷、對波以及對歐洲其他弱小國家，甚至法國，有過一長列的侵略行動。德國爲什麼做了第一次大戰的元兇，又要做第二次大戰的元兇呢？這不能從「尚武」「好戰」一類「考語」中，得到何種解釋；至若狡猾的日本，它這次爲什麼不等待「神風」吹來，坐享其成呢？德日發動侵略戰前後的經濟現實，可給我們合理的說明。

1. 日本在此次戰爭前夜的經濟現實——由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經濟復興期。這個復興期，在首當戰爭之衝的各國，如德、如英、如法等國家，雖由此把生產機構恢復過來，但它們對生產機構的恢復，就意味着，它們對過去殖民地市場的要求，又熾烈起來。它們對殖民地市場要求的熾烈，也就意味着，另一些在戰爭過程中，呼吸了「神風」，同前述那些國家的殖民地，發生過密切的經濟往來關係的國家，如美國同日本，就立刻感到它們前此的生產機構，擴張得過大了；一九二九年由美國首先爆發的大金融恐慌，同年即在美國恐慌浪潮下，也從日本經濟神經中樞的全國銀行業上表現破產停業情形。這裏，我們且丟開美國不說，日本在這以後，就完全被「不景氣」的危機所侵襲着。

不幸，與這經濟相伴的，還有一些根源於這危機，卻又反過來加大了這危機的社會政治的危險關係的存在。

首先：隨着生產機構在戰爭過程中的不絕擴大，日本產業勞動者有了迅速的增加，但他們不僅在量上有了增加，在質上也變得非常厲害了。世界勞動大衆的覺醒運動，使日本勞動階級也漸感覺到了，他們不再「鋼筱」在「困着讓人踢」的全無反抗的地步了。在一九二九年間，日本組織的，當作鬥爭團體而出現的都市勞動者羣，已達到了九十萬人之多，勞資爭議變得頻繁了，在都市產業勞動者運動的影響之下，農村勞動者也不肯落後了，與城市罷工運動相併表演的，有各地農民的有組織的，半有組織的拒納地租的運動。這在日本資產階級看爲是突兀的帶有威嚇性的「不穩」行爲，由於蘇聯以工農爲主體的國家的出現，更加在日本都市乃至農村的勞工運動上，發生了「火上添油」的影響，——這事實，表現在第一次世

界大戰前，日本對內可以任意搾取的那種資本主義的特質或特別有利條件，到此次戰爭的前夜，雖未完全失去，却已大體改觀了。

自然，對內搾取受到妨阻，大可利用它對外的有利條件去得到補償的。這所謂對外的有利條件，就是接近中國這個尙待開發，尙可施展侵略的廣大市場。但事不湊巧，當日本利用第一次戰爭更加發育繁昌起來的時候，中國的民族資本或現代性的國民經濟，也多少受到了這次戰爭的「潤澤」；民族資本的擡頭，必然伴着昂揚的民族意識，由是，反帝運動，特別是排日抗日運動，在整個中國迅速的展開來。就連日本一向視同「囊中物」的東北三省，亦鬱勃着，蔓延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或隱或顯的各種方式的計劃或行動。——這事實，又表明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尙持有莫大野望與確實把握的中國這個可以「生殺予奪」的大市場和大的原料供給地，也發生了不易「任意」利用的困難了。

不僅此也，日本的肘腋下的殖民地，台灣和朝鮮，也發生了所謂「不軌和徒然」的獨立運動，使它需要在邊僻地帶，駐紮皇軍，幫同警察維持治安了，特別是「不逞」的朝鮮人台灣人，勾結「內地」的不穩份子，相互影響，把「昭和聖代」的「非常」性，格外顯示得嚴重了。

此外，戰後日本的國際關係，尤其陷入了重重難關。從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直到一九三〇年的倫敦海軍條約的簽訂，日本隨在都感到英美，特別是美國，在用一切可能的壓力，使日本國力的發展受到限制。而在所謂「空前屈辱」的海軍條約簽訂以前不久，日本還因恐慌——赤字的威脅，把常備陸軍也削減了四個師團之多。這舉動，在政治上的意義，雖是

想藉此綏和國際的不利關係，同時却在國內引起了重大的政治危機，「以重大決意」「突破英美包圍」的右翼運動乘機抬頭了。負縮軍及簽訂倫敦海軍條約之責的濱口雄幸首相被刺殞命了。

「山雨欲來風滿樓」，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就是在日本這種經濟的——政治的危機前，而表演出來的。

但日本這種對中國侵略的軍事冒險，在英美，特別是在英國的「綏靖政策」下，不但不會受到「膺懲」，反而受到鼓勵了。資本主義的貪慾，配合着軍國主義的「發揚國威」的要求，一直在向着抵抗力最弱的側面前進。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變，無疑是一列有聯貫性的侵略行動中的一個環節，但在七七事變前夜的日本，顯然增加了一些敦促它，鼓勵它的經濟——政治的因素：世界大恐慌一直沒有眞正緩和的徵兆，資本主義列强拚命擴展軍備，中國抗日排日的全面化與組織化，英美對日關係的惡化及資本主義列强與蘇聯關係的錯綜矛盾，德意與日本的勾結。所有這些因素，都有助於「七七事變」發自日本方面的理解。但探本窮源，則不能不認定所有這些因素，都是通過日本的社會經濟組織，或以日本社會經濟組織爲基礎，而作用着的。

2.德國在此次戰爭前夜的經濟現實——戰敗後的德國，無疑是由戰爭以及戰爭結束條件受到了破毀與支解的打擊。但我們在肯定它的這種打擊之餘，却不能忽視它在另一方面也得到了一些便於它的經濟恢復和改造的便利：首先，由戰爭的失敗，威廉第二奔逃所引起的霍亨索倫王朝的瓦解，使德國前此未完成的資產階級的革命，有了一個較澈底的清算。依韋瑪

憲法所產生出來的較開明的，較前進的政治組織，對於團結國內一切力量，以克服內外一切困難，實有決定的影響；其次，德國以被爭取者的資格，退出了國際政治鬥爭的舞台，它不但可以暫時埋頭對內的恢復工作，而且還有幫助它的恢復工作進行的條約關係的存在，那就是，被解除了武裝，且不許繼續武裝的德國，它因爲沒有或僅只極小額的軍備費用的支出，它的全部經濟力量，就可以集中使用到經濟恢復工作上來；再者，戰後資本主義列强或戰勝國間的矛盾，以及它們與蘇聯間的矛盾，都可以利用來作爲取得國際援助的「把柄」，事實上，它確曾由此得到美國英國的援助了；還有，被殘酷課加於德國的大量賠款，在辯證意義的理解上，也盡了增進德國恢復工作的功能。因爲要德國按期支付出大量的賠款，就沒有理由不設法使它的經濟得到相當的安定。「道斯計劃」以及「揚格計劃」，在另一方面，是不妨把它們解作有助於德國戰後經濟之復興的；最後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德國的殖民地市場沒有了，它對外的貿易，且還受着許多條約限制，結果它要在不但無保護，且還有障礙的諸般國際的關係下，發展其對外貿易，它唯一可能的努力，就是使它的產業組織，更合理化、更機械化、更集中化、更具有優越技術的性能。

然而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德國生產機構的合理化，其本身就預伏着機械驅逐勞動的更深刻的危機。這危機在世界大恐慌尚未發生以前，還可由其優越技術所保證的對外貿易，得到相當程度的和緩，但自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性恐慌由美國揭幕後，德國就受到幾重的打擊，美國爲了收不回對外的借款，並爲了調劑國內的金融，對國外信用採取緊縮政策，這在缺乏資金週轉的德國，無異是當頭一棒；此外，恐慌侵襲到的各國，都開始對本國，對殖民地，

採取了極富於侵略，防守性的關稅政策，這益使德國產業走頭無路，失業、破產、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政治的危機，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的當時，已經有迫使德國採用「日本路線」的必要，然而，它那時的軍備，是不能作這種冒險的。

德國在社會危機中所昂揚起來的國際主義運動，蘇聯第一次五年計劃成功，第二次五年計劃開始，所給予資本主義世界之物質的精神的打擊和刺激，法蘇互助公約的簽訂，使英國立即感到有維護德國右翼的反國際主義的反法蘭西的勢力抬起頭來，並在它希望的限度下，武裝起來之必要。希特拉在一九三三年登台了，希特拉通過所謂「精神抄襲」的四年計劃，挽救德國社會經濟危機的最有效辦法，就是重整國防，擴大軍備。把國內的怨忿，有計劃的，很技巧的轉向外國。「以大砲代替牛油」的口號，出盡了國內搾取之能事了。而由萊茵駐軍，薩爾收回，奧國吞併，捷克征服所給予德國法西主義勢力的一列鼓勵，當然大有助於德國法西主義的統治和軍閥主義的猖獗！然而所有這些成就，卻並不能阻止德國更大規模的軍事冒險。德國已利用它的軍事的產業基礎，集中的經濟機械，和超越一切國家的技術優勢，把全國變成了一座兵工廠或兵營。但就因此故，它在金融政策，勞動政策乃至一切其他社會經濟政策上面，所玩弄的戲法，已經達到了智窮技極的境地；同時，不生產的消費的無限擴增，看看已是難乎為繼了，人民消費了的限界，也無法作進一步的壓縮。此外，英國顯然在運用忍無可忍的綏靖政策，作為其加速增大軍備和部署新包圍陣勢的拖延手段。希特拉是最知道德國的經濟現實及其國際環境的。他鑒於第一次大戰的經驗，認定不能再事遲疑了。

總之，日德兩國是此次世界大戰的發動者。它們對於世界規模的戰爭的演出，都是把它

們各別的社會經濟組織作爲依據。客觀的經濟的强制要求，使它們把戰爭禍首的責任，當作建設或實現他們所理想的「世界新秩序」的大使命來履行。從它們或它們的代表者法西斯黨徒或軍國主義者的意識上，是看不出戰爭的規律性和法則的：而由那種意識所反映出的它們的社會經濟組織本身，却在顯示着戰爭的必然。

九　論戰爭與社會進步

一、從兩方面來看

把「戰爭與社會進步」作爲討論的題目，它似乎會表現出兩方面的意思：如就社會進步方面說，社會愈進步，是戰爭會愈加多，抑是會愈減少？如就戰爭方面說，戰爭會促成社會的進步，抑會妨礙社會的進步？這兩方面的問題，都値得我們研究，但我覺得，處在當前戰爭狀況下，把後一方面的問題拿來研究，似比較更有現實的意義。可是，爲了說明上的便利，在討論戰爭究會促成社會進步抑會阻礙社會進步之前，需要把「社會愈進步，是愈會加多戰爭抑減少戰爭」的命題，作一簡單的交代。

中國歷史學者稱我們的二十四史是一部相砍史，其實一部世界史亦可作如是觀。在最先是部落與部落戰，往後是種族與種族戰，同一種族中的某政治地區與其他政治地區戰，而到近代，則是一羣國家與其他一羣國家戰。社會由部落，而種族，而國家，一直在向前進步，

戰爭的內容變了，方式進步了，但戰爭的規模越來越大，戰爭的可怕程度却越來越兇，彷彿戰爭要與人類社會相始終似的。據歷史家統計，現代最先進的英國，它在過去八百年中，就打了四百一十九年的仗。而在歐洲大陸，處在戰爭漩渦中的法德諸國，當然在同一時期，有超過英國以上的戰爭頻繁的記錄。可是，我們如把統計的時期，縮短到現代這一百年，情形就很不相同了。英國由十九世紀中葉到現在，只從事過屈指可數的十數次戰爭；法德亦大略相同。而且他們由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就幾乎完全是過的太平日子。最重要的是它們這些國家（日本、意大利、帝俄亦在內），自經採取現代的形態以後，就一直不會發生過內戰。從上面這種簡單的分析，我們知道：就世界全般講，愈到近代，戰爭的次數是愈少了；就各別國家講，一個國家愈採取較合理的進步的社會經濟形態，戰爭也愈要減少的。一國可能由進步的社會經濟形態的採取，化除內部各種族間各政治地區間的戰爭，則全世界亦可能由進步的社會經濟形態的採取，化除各民族間各國家間的戰爭。因此，我有理由斷定：社會愈進步，戰爭愈會減少。在最進步的大同社會裏面，戰爭是可能消滅的。

由上面的說明，我們會認知：

第一，各時代，各歷史時期，儘管戰爭一直連續不斷的發生，而社會依然在不絕向前進步着，可見戰爭並不足以妨礙社會進步。

第二，在比較進步的社會，可以相應減少戰爭，在最進步的社會，可以使戰爭發生的根源不存在，從而，可以使戰爭根本消滅，可見社會的進步，並無須戰爭來促進。

可是這兩個認識，雖然可作爲戰爭是阻礙社會進步，抑是促成社會進步這個命題的引論

，但卻不能遽視爲這個命題的結論。因爲，戰爭不足以妨礙社會進步爲一事，戰爭是否妨礙社會進步爲又一事；社會進步需不需要戰爭來促進爲一事，戰爭是否促成社會進步爲又一事。因此，把「戰爭是妨礙社會進步，抑是促成社會進步」，作爲問題來研究，它並不能由「社會進步究竟會增多戰爭抑會減少戰爭」的上述結論，得到說明。我們需要就戰爭妨礙社會進步，和戰爭促成社會進步兩方面的理論與事實，分別指明出來，然後再看在何種情形或何種社會條件下，戰爭始能眞算是有礙於社會進步或有助於社會進步。

二　說戰爭阻礙社會進步的一面

首先，我們且來解述戰爭有礙於社會進步的見解與史實。

一個社會的進步程度，總括的講，雖是由它的社會生產力加以測量，但也大體可就社會生產力，一般文化水準及人口質量性能三個方面加以測驗。戰爭對於這三方面的損害是非常明由的。每次戰爭的結果，照例會依戰爭規模的大小，使大量社會健壯的優秀的人員遭受殺害；使社會構成員中，老弱傷病殘廢者的比重，突然增大起來；此外，由於戰爭過程中，一方面文化事業歸於停滯，同時，殺伐尙武的精神，又多方受到鼓勵，那對於人類的品質和性能，多少要發生一些有害的影響。若就文化方面講，已有的文化成果的保持和一般文化事業的推進，似乎都有賴於和平。戰爭會無情的損害過去文物，並使科學技術的研究，暫時中止或停滯起來。至關於物質進步的最基本的社會生產力，它原本就包括有勞動的熟練程度，和科學技術的應用範圍在裏面，上述兩方面蒙受戰爭損害的情形，當然直接會損害到社會生

產力，但可作爲生產手段的社會物資或社會蓄積的大量損耗，使原有的社會生產規模，不能繼續擴大，乃至不能維持，那就更會給予社會生產力以決定的影響的。

上面這些意見，原已由事實證示得非常明白，我們很可以訴之於常識而得到理解，但爲了認識上的「鞭辟近裏」起見，最好看看許多社會的實際情形。中國社會，一向被認爲是停滯得久的。它那種停滯、至少在某種範圍內，受到了戰亂的極大影響。每個歷史朝代的末期，殆莫不伴隨有大規模的戰亂。周末演成的春秋戰國局面，漢末以黃巾開端的大動亂，晉代開國未久，即有由八王之亂所導出的五胡十六國的紛亂情形，他如隋、唐、宋、元、明諸朝，殆莫不以遍及全國的農民戰爭，而交代其歷史命運。這些有自發性或必然性的歷史戰亂，幾乎都一度一度的把社會的物質蓄積，文化遺產，給予了毀滅性的破壞；而由「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及「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所描狀出的戰爭對於社會人口質量上的損害影響，無異說，叫每一個新的歷史朝代的開始，都得在社會進步的諸因素方面，重新自建基礎，自行設法培養社會的生機和元氣。然而這種情形，並不限於中國。歐洲在它的中世紀封建社會階段，它的離心的封建形態，比起中國向心的封建形態來，自然更多戰禍，以時間來形容的所謂「七年戰爭」，「三十年戰爭」，「百年戰爭」等等，不管其戰爭發動的因由，是爲了王位繼承，爲了宗教權益，還是爲了其他的什麼，但戰爭結果之破壞社會生產力，阻害文化發展，而由是妨阻社會進步，却是千眞萬確的。即如在晚近發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成果，有名的國際問題專家，曾爲我們統計出了這樣血淚的動人的數字，即「在世界大戰中，死亡者至少有一千萬人，傷者多於二千萬人，人民之死於貧困、瘋

疫和砲火者，也不下數千萬人」。財富的「直接損耗」，大約超過了一千八百六十億金元，間接損耗，大約有一千五百一十億金元，兩共三千三百七十億金元」；財富及人口的大量損耗，以致戰後許多國家的人民陷入飢餓困境，許多國家的財政，都有極鉅大的赤字。此外，「戰爭並鬆懈了道德的束縛。當人們學會了自相殘殺，互相懷恨的時候，回家以後，有些人還是毫不猶豫的作殘暴行爲」。至各國在戰時採行的宣傳方法，在戰時施行的言論壓迫，戰爭一旦結束，就「比較容易設立專制政府，爲眞正和平的阻礙」（參見葉會合譯 R.L.Buell 所著「國際關係論」下卷第二十五頁）。

戰爭阻礙社會進步的情形，我們已有一個輪廓的理解了，但主張戰爭促成社會進步的人，却也有他們的根據。

三　說戰爭促成社會進步的一面

持主張戰爭妨礙社會進步，好像只憑常識就夠了，若主張戰爭促成社會進步，彷彿單憑常識是不行的。所以强調戰爭的軍國主義者們，就比之反對戰爭的人道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們，更需要一套理論。

他們最講得起勁的，是說：戰爭在社會進步所需的人的因素，物的因素，以及文化的因素上，都有極大推進功能。以人的因素而論，戰爭是去弱存强，去劣存優的社會淘汰手段。戰爭能使一國國民的鬆懈，弛緩，和散漫精神振奮起來；使他們不統一的意志，不團結的力量，集中起來；使柔者能剛，弱者能强；使那些爲一己利害打算者，能發揮出「公爾忘私」

，「國爾忘家」的道德意識。而備戰及實際從事戰鬥的緊迫需要，一定會促成各種科學技術上的發現和發明，而且是增進勞動效力，使社會一般勞動生產力，得到極大的擴充和改進。自然，在戰爭緊迫要求下，所引起的社會勞動生產力的增進，無疑是局限在有關軍需工業的生產部門，但他們可以很明確的告訴你，一切在戰時軍用品製造上擴增的社會生產力，以及在這上面進步了的科學技術，戰爭甫一結束，是馬上會被利用到一切產業部門上去的。

所有他們這些像是能自圓其說的戰爭理論，還都稱可以任意指出史實來作爲證明。現代以軍國主義教育和戰爭萬能論之產源地著稱的德國和日本，它們的國力的增進，它們社會一般情形的向上，一般人民的富於愛國心和勤奮努力，確實得了戰爭不少的庇蔭，落後的德國和日本，在世界殖民地差不多全被瓜分的時候，才開始踏上現代競爭的舞台，它們的商品經濟的每一步進展，都會感覺到英法等先進國家對它們發展前途所設定的障礙。因此，它們要突破那種障礙，只有兩個可能的方式：一是和平的盡量設法改進生產組織，加強勞動效力，壓低在勞動方面的生產成本費用，以期在世界市場上競勝他國商品；又其一則是訴之於戰爭；但要訴之於戰爭，就須把和平的努力方式，作爲備戰的條件，就要把平時當作戰時看，就要藉助於軍國民教育，把全國國民的愛國，勤奮，團結精神發揮出來。在這種意義上，如其說，這些精神有助於社會進步，似乎都不是戰爭本身的結果，而是備戰的結果。又如，德國在普丹、普奧、普法諸戰役勝利以後，日本在中日，日俄諸戰役勝利以後，社會各方面無疑都受到了昂奮與向上的刺激。但嚴格講來，這又似乎不是戰爭本身的結果，而是戰爭結果的結果。我們如果不把論點分析得過於嚴密，含混的承認德日兩國的現代發展，或其社會進

步，在相當限度內，是受了戰爭之賜，那是沒有什麼說不通的。而且，它們在戰爭收到了美滿成果之後，必然會使它們的產業，益益帶有軍事的性質，益益走向進一步備戰的道路，而爲了使全國人心或民意能配合上這種「國情」，這種侵略動向，愛國主義和優等民族的宣傳，就成爲必要的襯托了。在這層層因果關係之下，它們的社會各方面，確實達成了可驚的進步。它們軍需產業上的勞動效率和生產技術的改進，確實被應用到一切產業部門，並又反過來使一般產業上最有效率最新式進步的科學技術成果，率先利用到特殊工業生產部門了。由是戰爭除了由它的成果——擴地，獲得大宗賠款和掠奪敵國物資外，還會由這種生產力反復促進的程序，使一個社會富裕，並使一個社會智慧。在這種認識下，戰爭被謳歌爲社會進步之原動力了。

四　在兩種對立意見之間的科學評判

這兩方面互相對立的意見，都像是根據事實，叫我們「兼聽則明」的人，不知究應作如何的斷定。我們說戰爭也阻礙社會進步，也促成社會進步吧，大家一定覺得這是一個太沒有意義的結論。到這裏，我們需要脫開現象論的圈套，從戰爭與社會進步之本質的關係上，來確定戰爭對於社會進步之究極的影響。

我們且由問題的現象方面，慢慢追蹤到它的本質上去。

首先，大家定然同意以次這一個斷案，即戰爭是否有助於社會進步，就看戰爭是勝是敗，勝利了就可促進社會進步，失敗了就會阻礙社會進步。上述德日諸國以勝利「起家」，以

勝利「暴發」的情形，正符合此種邏輯。但這樣一個斷案本身，是經不起科學分析的。因爲第一、照此說明，戰爭是有助於社會進步，抑有礙於社會進步的問題，就變成了戰爭結果對於社會之影響的問題。我們即使退一步不明顯區分戰爭與戰爭結果是兩件事，但第二、一個國家戰勝了，使它的社會得到進步的固然不少，但它即使戰勝了。它的社會各方面，因勝利而招致腐敗退步的，也所在多有：而且，有些國家的失敗，竟還變成了它的社會起衰振敝的一大關鍵。如其說，上述德日諸國社會進步，是戰爭起家，或戰爭勝利起家的結果，但如像以前的羅馬帝國，拿破崙帝國，儘管戰爭一帆風順，領土在不絕擴張，但羅馬的社會，法國的社會，却並不曾在它們勝利的過程中，有了何等進步的成果，反之，勝利却在不絕提供它們以促其腐敗，頹廢，和縱慾浪費的材料；反之在大革命以後，中經拿破崙第一世和第三世摧殘，弄得政治上擾攘不甯的法國，它却是在對意戰爭，對普戰爭失敗以後，才開始安定下來。俄國的情形，更値得供我們參考，頑固的束縛着俄國社會進步的農奴制度，是在一八六一年克里米亞戰爭失敗，才開始作出溫和的改革程序，在一九〇五年對日戰爭失敗，才又進一步提出較根本的改革程序，在由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參加世界大戰的失利，才導出根本推翻的新場面。綜合上面這種種實例，至少可給予一個總概念，即戰爭的結果是勝是敗，並不足以說明戰爭是促成社會進步，抑是阻礙社會進步。

其次，我們顯然需要把問題引到戰爭的性質上了。戰爭的性質，需要就對外對內兩方面來予以確定：就對外方面講，要看戰爭是侵略的，抑是求解放的；就對內方面講，要看戰爭是維護既成的腐敗社會組織的，抑是催生新社會秩序的。但歸結起來，要由這當中看戰爭是

有助於社會進步，抑是有碍於社會進步，則戰爭的對內性質，較之其對外性質，有更大的決定性。比如，一個國家在對外求解放的戰爭中，卽使勝利了，卽使對外得到解放了，如其它原來被侵略被壓制的社會生產力，仍不能由舊的社會經濟軀殼中解脫出來，則那種解放，並不就意味着社會的進步，反之，設在國內障碍着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腐朽社會生產關係，反而由對外戰爭的成果，得到了加强鞏固的實效，則那種戰爭，倒甯可說是會給予社會進步以不良影響的。所以，把戰爭對於社會進步的利與不利的關係作爲課題，一定要把它的社會的性質指明出來。假如戰爭有解放一個社會的生產力的效果，不拘是勝，如解放美國社會生產力的南北美戰爭；抑是敗，如解放俄國社會生產力的第一次大戰，卽使它們各別在戰爭過程中，在物質、人口、文化上蒙到了多大的損害，而這損害，比起它們社會生產力解放所能作出的成果和進步來，是頗不足道的，在這種理解上，戰爭是大可促成社會進步的。反之，如一國的社會生產關係，早已不允許其社會生產力有何等發展，甚且早已成了它的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束縛，在從事戰爭以後（不管戰爭對它是勝利，如像第一次大戰中的英國，抑是失敗，如像德國），它的社會生產關係，依然還是繼續阻害着社會生產力，則在戰爭過程中的人口物資及文化成果的大量耗費，就已經是社會的純損失，而社會生產力與社會生產關係的尖銳矛盾，反由社會生產力的破壞，得到弛緩，並由是便利了原有的社會關係，在這種理解上，戰爭就是大大妨碍社會進步的。

因此，我可用下面這幾點意見來結束我的討論：

第一、戰爭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一定社會制度下的社會矛盾的暴露。

第二、這本身就被理解爲社會矛盾暴露的戰爭，當其暴露出來，它可以作用爲那種社會矛盾的解消手段，它還可以作用爲一種新社會誕生的催生手段。

第三、戰爭對於一個社會，是演着促成進步的作用，抑是演着阻碍進步的作用，不是由戰爭寶來的損害程度決定，不是由戰爭的勝負決定，甚至也不是由它對外是侵略性質抑是求解放性質決定，而最基本的是由它究竟作出了解放社會生產力的結果，抑是作出了束縛社會解產力的結果來決定。

十　再論戰爭與社會進步

一　結論與導論

在前論「戰爭與社會進步」一文中，我曾就戰爭對於社會進步的關係，得出以次這種結論，即：

「第一、戰爭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一定社會制度下的社會矛盾的暴露。

第二、這本身被理解爲社會矛盾暴露的戰爭，當其暴露出來，它可以作用爲那種社會矛盾的解消手段，它還可以作用爲一個新社會誕生的催生手段。

第三、戰爭對於一個社會，是演着促成進步的作用，抑是演着阻礙進步的作用，不是由戰爭將來的損害程度決定，不是由戰爭的勝負決定，甚至也不是對外是侵略性質抑是求解放性質決定，而最基本的是由它究竟作出了解放社會生產力的結果，抑是作出了束縛社會生產力的結果來決定」。

我把這個結論重寫出來，一方面因爲在戰爭過程中，這是値得我們反覆吟味，多方警省的大命題，同時也因爲在導出這個結論的說明當中，或者就在結論列述的三論點本身，還有需要補充，需要進一步予以詮釋的地方。

比如就第一點而論，戰爭本身是一種社會現象，自極顯然，但如說戰爭是一定社會制度下的社會矛盾的暴露，似乎就容易引起這樣一個疑難；戰爭是發生於若干政治主體之間的，一國發生戰爭，它可能是由於它現行社會制度發生破綻，或在運行上表現出某種困難和障礙，可是，它的對手國或被侵略國之應戰，就不一定是由於其現行社會制度的矛盾；反之，一被侵略，即使是由於它的社會制度，已經顯出了某些被侵略者視爲有隙可乘的破綻，而在侵略國家，也許是由於其社會制度正在發揮優點，顯示國力伸張，需要藉戰爭來耀武揚威。就這兩方面的任何一方面來說，戰爭似乎不一定是，或者不完全是社會矛盾的暴露。

又如就第二第三兩點說，戰爭「可以作爲社會矛盾的解消手段」，那麼，它即使不「作用爲社會誕生的催生手段」，仍舊不難發生「解放社會生產力的結果」，換言之，仍舊可能促成社會的進步。例如，德日諸國之發動此次戰爭，無論是由於它們自身經濟體制發生矛盾，抑是同時窺知其對手諸國社會內矛盾的尖銳化，如其戰爭的結果，它們勝利了，或者它們的交手國戰敗了，它們的社會生產力，可能由原來促使其訴諸戰爭的社會制度或社會諸生產關係的改變，或其束縛性的鬆懈，而尚有發展的餘地；顯言之，德日諸國一旦勝利，它們各別社會的生產關係，儘管不用改變，其社會生產力，却可因其囊括有更大市場，更多原料供應地，和更廣闊的科學技術應用範圍，而有所擴張。這一來，豈不是戰爭即不「作用爲一種

新社會誕生的催生手段」，也能促進社會生產力，因而促成社會進步麼？

對於上面這兩個疑問，我們需要作一綜合的解釋，戰爭對於社會進步之關係的問題，原可從兩個立場來考察：一是站在交戰國各別國家的立場上，一是站在統合一切國家的社會或世界立場上。在交通不發達，經濟交往不密切的過去社會，一個國家或一個部落，不發生何等經濟上的直接利害衝突，單爲了好大喜功，爲了耀武揚威，四征弗庭，或者爲了行使刼掠，而發生戰爭。那種戰爭，也可能只顯示出交戰國或交戰部落某一方面社會的矛盾；那種戰爭的結果，也可能因爲它們彼此原來沒有何等密切的經濟交往關係，無從顯示出一個足以範圍彼此發展途徑的共同前程。到了近代，情形不變了，戰爭的發生，不僅是交戰國任何一方面社會經濟制度上矛盾的暴露，同時，還是它們之間的，即它們各別共同所屬的整個社會經濟制度上的矛盾，或者它們各別社會矛盾之綜合錯雜的暴露。在這種情勢下，戰爭對於社會進步的關係，儘管在一方面，可以就某一個交戰國社會的個別立場來判定它，但在同時，却尤當就一切交戰國社會的共同立場來判定它。因爲這一個時代的戰爭，如其我們不能否認它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產物，資本社會矛盾的總暴露，則至少在資本主義諸交戰國之間，不管是誰爲侵略者，誰爲被侵略者，也不管是誰勝誰敗，這戰爭如其不能大有助於新社會體制的產生，而只是作用爲舊社會方面的暫時解消，其結果，就不但侵略者勝利了，無法擴展其社會生產力，就是被侵略的方面勝利了，也無法根本解消那種社會矛盾。根本解放社會生產力，在這種限界的意義下，或者，只有在這種限界的意義下，我才敢斷言：戰爭對於一個社會是演着促成進步的作用，抑是演着阻礙進步的作用，不是由戰爭的勝負決定，也不是由戰爭

的性質決定，而是由戰爭在結局是否作出了解放社會生產力的條件決定。自然，在我們提出這個命題的時候，並不會絲毫減低我們對於戰爭勝利希望，我們至少還相信，在任何情形下，被侵略者方面的勝利，總比之侵略者方面的勝利，有更大和更接近解放社會生產力的可能。

爲了明確具體解述上面的論點起見，我願就當前參加戰鬥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如英、美、德、日諸國的勝負關係，來說明此次戰爭對於社會進步，或對於社會生產力解放的可能前途。

二、就德日兩國來說明其中的關鍵

首先，我們就德日兩國的情形來說，德日兩國無疑是此次大戰的發端者，它們其所以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而甘於做戎首的原因，當然是由於它們各別社會經濟的基礎，比較脆弱，以致其社會生產力發展受到的局限，比較緊張。它們發動戰爭，乃企圖藉戰爭的成果，使其陷在緊張狀態中的生產力的束縛，得到解除，在戰爭的初期，德日兩國曾經利用其「美滿的」戰爭成果，分別着手建立歐洲新經濟秩序和東亞新經濟秩序，在這種新秩序建設過程中，它們得盡量利用其佔領地區的人力、物力、財力、智力，使它們原來局促在國內及國際社會經濟關係下的生產力，突然得到解脫的機會。假使它們那種勝利的局面，能繼續維持，並且達到最後的成功，則依這種方式獲得解脫的它們的社會生產力，似可比照它們勝利的成果，比照其佔領地域的廣闊程度，比照其可資利用的人力物力的增多程度，而更加發展起來。果其如此，我們如依照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程度，來衡量戰爭對於社會進步的影響，那末，德

日勝利了、新社會誕生的可能性儘管更少了，社會的進步不仍舊受到了促進麼？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就兩方面提出否定的答案：

先就社會全般來講，此次戰爭對於社會的影響，顯然不能單從德日兩國的社會生產力的變動，得到說明。在戰爭過程中，依暴力摧毀其交戰國之社會生產機構，奴役其征服地域的人力物力，所增進的社會生產力，不僅是暫時的，並且在社會全體的觀點上，把這所增進的生產力，與所破壞，摧殘，妨阻的社會生產力比較起來，一定是得不償失的。不錯，如其勝利的德日的社會生產力能盡量的發展，則將來由此所益助的社會進步，說不定可以補償它們今日在各征服國家所造成的破壞與混亂而有餘。我們毋甯贊同這種計算式的推測的，但其前提要看德日兩國即使勝利到底，其社會生產力究能有何種限度的增加。

次就德日兩國個別社會來講罷。我們有不少的理由，假定德日兩國即使最後勝利了，它們各別社會的生產力，也決不能有何等擴展的前途：

第一、平分世界春色的「歐洲新經濟秩序」與「東亞新經濟秩序」的幻想，假使眞的實現了，它們分贓不得其平的火併，是立即會發生的。它們火併的結果不論如何，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的大破壞，是不難想見的。而況

第二、所謂社會生產力，包括有勞動者之平均熟練程度，科學及技術學科實用性的發展階段，生產過程之社會組織，生產手段之範圍，作用，能力，以及種種自然的關係等項目。一二國家要奴役世界，壓制其他民族國家，使其他國家的經濟，陷在荒廢退步狀態下，它們的社會生產力，決不能得到滋養。

第三、武力征服的直接後果，往往使征服國家的國民，陷於驕奢墮落的氛圍氣中，他們可以不事生產，可以坐享被征服國民的勞動成果。過去羅馬帝國，拿破崙帝國，都曾給予我們這種教訓。德日征服者所宣佈的「新秩序」，已經顯明告訴我們，那種秩序的最大目標，就在如何使它們「優越種族」，從一切被征服者得到豐厚的貢奉。

第四、德日以社會矛盾或社會危機的威脅而發動戰爭，戰爭如暫時解消了它們的社會矛盾和危機，決不能使它們再夢想到社會的變革，而且，對世界自私的國家，在國內必然會更頑固的維持階級的分野，從而，必然使他們已經達到了發展極限的資本體制，更加退化墮落。

所以，世界許多有識人士早經預言過：世界如其不幸竟陷溺在德國或日本的統治中，將使人類社會倒退或還元到極悲慘的野蠻狀態，這一類的預言，當然不會忽略到我們這裏所提述到的幾點意見。

三、英美在這次大戰中獲得勝利的進步意義

然而，我們上面假設的論到德日兩國即使勝利，對於全世界，對於它們自己本國，都不會發展生產力，從而都不會促成社會進步；其主要目的，在說明戰爭不能作用為新社會誕生的催生手段，即無法促成社會進步的一個面，即當前戰爭的陰暗面。幸而這種假定，在目前已經成了一個不合時宜的假定，我們已經面對戰爭的光明面了，在資本主義野視來說，英美快獲得最後勝利了，我們此刻最關心的是，英美的勝利，會不會使這次戰爭「作用為解放社會生產力的手段」，即「作用為新社會誕生的催生手段」。以當前英美的一般政治經濟動態

而論，似乎這次戰爭的作用，大體還不免停滯在作爲「社會矛盾之解消手段」的階段。因爲我們可以毋庸諱飾的指出：

第一、戰爭的勝利，顯然是大有助於原有社會生產關係的保持的，戰爭既然暫時由大規模的耗損與破壞，把原有社會的矛盾解消了，人們的惰性，特別經勝利鼓舞了的惰性，是定然會減弱「改弦更張」的念頭的。

第二、伴隨勝利而來的世界商品資本市場的再調整，再分割，或者由於以往强力競爭者一部分的被打倒，使它們都像有理由相信；戰後世界還大有促使其社會生產力盡量發展的餘地。

然而第一次大戰的血的經驗告訴我們：在戰爭過程中，由軍需品緊急需要而特別受到鼓勵的科學技術的發明與改進，和產業機構的特別擴張，一到戰爭結束，一到軍需品的生產，被轉化作一般商品的生產，就很可能使它們重又感到市場窄狹的苦痛。而那種苦痛的被感到，由於此次復員準備工作的提前進行，由於戰爭破壞的更形普遍，也許比第一次大戰後各勝利國家所感到者，在時間上還要迫促，在程度上還要厲害，儘管歷史是不會重複的，但同一社會生產關係阻制其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事實，都必然會再現出來。在這種限度內，這次戰爭究竟有助於社會進步，抑是有礙於社會進步，就彷彿頗費我們揣度。但同是資本主義國家，英美的勝利，其所以和德日的勝利，會表示出極其不同的社會意義或進步意義的，那與其說是由於公理正義的立場，毋甯說是由於以次這種事實：

首先，英美雖然同是資本主義國家，但因爲它們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比較雄厚，比較

沒有德日諸國那樣在國內表現出尖銳的矛盾和社會危機，它們的對外政策，就比較能採取和平的民主的立場，比較能顧及弱小國家的利益。所以，在戰爭過程中，英美已經在外交活動上，表現了一些相當進步的綱領和步驟。所謂「大西洋憲章」的宣佈，正可顯示此種精神。

其次，惟其它們能以比較和平的和民主的立場，來從事戰爭，那就不但大有助於戰後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的改善，還可能藉助於和平民主精神，多方設法調整國內及國際經濟之防患未然的合理措施。在目前，它們不已在復員準備工作當中，企圖使國內私有經濟在某種限度社會化麼？不已在各種有關戰後經濟復興的會議中，企圖使國際私有經濟在某種限度計劃化麼？它們努力的成果，自然還有待於將來事實的證明，但它們確實已表現了向這些方向努力的傾向，而且，在實際，更還有加强它們這種傾向的若干事實在。那就是，

又其次，我們要說及的它們在同又一種社會經濟體制的國家，即蘇聯，在作為比肩作戰的盟友。蘇聯在這次戰爭中，是發生了重要的領導作用的。它的參戰，一開始就使這次戰爭，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或帝國主義戰爭具有大不相同的性質。老憊無能的帝俄一經改變社會體制，就在人力物力上發揮出舉世震驚的戰鬥成果，還對於英美的國民或社會，不期然而然的要給予莫大的刺激和值得反省的影響，上述英美在戰爭過程中所採行的種種開明而寓有變革意義的政治經濟步驟，我們是無法忽略蘇聯在其中發生的促進與示範的作用的。而且

最後，由於中國自始至終在這次大戰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對於這種戰爭的性質，對於這次戰爭結束的可能方式，也會直接間接改變英美人士傳統的態度和觀念，中國原是一個被壓迫，被國際資本束縛得近似麻木的脆弱國家，它在這次戰爭中站立起來，它因此由英美諸國

在戰爭過程中，卽已取得了的國際地位平等的待遇，那不但在戰後會根本改變它們對中國的關係，還必然會聯帶影響到它們對其他世界弱小國家，乃至殖民地帶的關係，在目前，我們已有理由預知東歐諸後進國家，英、荷、法、美殖民地帶以及一向受德日奴役壓迫的諸民族，不久都可能改善它們的不平等的地位。

上述這四種事實，如其能配合起來，盡量發揮其促成推進的作用，這次的戰爭，也許可能不只成爲舊社會矛盾解消的手段，且進一步成爲新社會誕生促成的手段。然而，直到目前爲止，我們還只能看到這種可能，要使其實現，却還有待於我們的努力。如其說這種努力，在當前世界上負有領導使命的國家，和已往處在被壓迫地位的民族，同樣負有重責，則我們中國就彷彿負有雙重的責任。如其說，促使這次戰爭變成進步戰爭的關鍵，在於參加戰爭的一切盟國，力圖自己社會的進步，則我們原本落後的中國，就彷彿更須加倍的努力。我們是需要檢點一下：我們在戰爭過程中，究竟進步了一些什麼，並進步到了何種限界的。

十一　三論戰爭與社會進步

——就中國來說明戰爭是促進社會進步抑是妨阻社會進步

一　我們是立在左右世界戰爭性質的地位

我已在「再論戰爭與社會進步」一文中，預約定：「我們需要檢點一下：在此次戰爭過程中，我們自己的社會，究竟進步了一些什麼？究竟進步到了何種限界」？如其不妨補充一點的話，究竟根本迫切需要進步的在什麼地方？

在求人類社會共同福利的大前提下，我們有理由期待我們的盟國，在某些問題上，比如，期望英國在印度、希臘的問題上，採行一種更開明更合時代潮流的方策。同時，我們也許更有理由，期望我們的盟國，印度和希臘，在同一問題上，由自己能站立起來，團結起來，健全起來，而由是使自己的要求和願望顯得更其有力與合理。反過來，在我們的盟國，英國、希臘、印度，乃至美國、蘇聯，它們該會怎樣鼓勵我們，期望我們呢？不論我們是以四强

之一的資格，準備領導世界，向進步的路上走；抑是以被壓迫國家之一的資格，準備領導諸落後民族，向平等的路上走，我們在戰爭過程中，確實是立於左右戰爭性質，乃至左右戰爭成果的地位，問題是看我們自身够不够力量，或者够不够進步以發揮那種力量。

我們現在來分途解答上面提述到的幾個問題吧！

二　從外國觀察者看出的中國社會在戰時的進步

首先，我們得檢點一下，我們在戰爭過程中，究竟進步了一些什麼？

正如同我們的缺點，無論我們採取怎樣的駝鳥主義，也無法掩飾一樣，只要我們實際表現了一點進步，即使再謙虛，也無法制止外人不爲我們傳揚。在抗戰已越三年的一九四〇年十月，美國名記者斯諾（Edgar Snow）在亞細亞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名爲「中國的進步狂潮」的文章（譯文見時與潮），其中他指出了這次抗戰所給予中國社會的進步影響，有以次諸大端：

第一，他認爲，這次抗戰動搖了中國根深蒂固的家族制度，「成千成萬的兒童，都因此和父母分離開，有些是被軍隊徵去的，有些是狼狽逃出死亡深淵的，然而更有許多是自動脫離家庭爲國家服務的。中國人在抗戰中發現了國家。中國青年不再把「對家庭」的責任，放在第一位了。孝順已不再如過去之爲人視作光榮。孩子們不願意在淪陷區侍奉父母，而相率冒危險到大後方的，所在皆是，他並指出：第二號漢奸王克敏就因爲他背叛了國家，以致被唾棄於其兒女。

第二，他認為，抗戰打破了中國人的迷信觀念。在中國，宗教或至少說是迷信，已在無希望的衰頹期中。凝固的社會秩序一經為抗戰的浪潮所震撼，神靈是只在當作譏嘲的對象時，才為人所提到。許多廟宇變成了醫院或兵營；有的神像，且被利用來支撑紡織機」，工人們漫不經心的在神像上點火。以前鄉村很繁昌的香紙店，也逐漸式微了。

第三，是地域界限的破除，「從東部各省的人民，像潮水似的流向西部各省。甚至每個小村落裏，都有外來人」。「各省人民與各地方言，正在進行着大混合過程」。窮鄉僻壤的村民，一向不會看過世面，現在每天都可觀感到一些新的地方和新的事物。

第四，是社會財富的新分配。「許多中產階級的家庭，幾乎都把他們的全部財產喪失掉。更有許多人現在都完全無產階級化了。許多地方，由於貧乏的物質狀況，致使學者、士兵、公務人員、商人、工人，都完全歸入一個生活環境裏，更列入同一的入款人羣中。中產階級的人民，都在開始學習窮人的處身涉世哲學。保守觀念與階級劃分的經濟基礎，都在若干點上毀滅了」。

第五，是人民教育的開展。「由於戰爭的原故，在掃除文盲上確實邁進了一大步。軍隊裏發現識字的人能作更好的戰士，沒受過教育的人不容易訓練他使用現代武器……成年人補習教育在許多鄉村中進行着。游擊隊都在使用新方法教育民衆」。與這相關聯的是：對於文化的舊日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在人民大衆中間，現代醫學與科學已得到廣大的信任」。

此外，他還認為中國的確已發生了一種自助與自信的精神，「這種精神的由來，是鑒於中國業已抵抗住日本這架有力的戰爭機器達三年之久」。「在政治實施中，雖沒有多大的民

主成分，但在熱烈討論中，却有驚人程度的民主」。

中國在換取這些進步因素的戰鬥過程中，人力物力無疑受到了難於計量的損害。但即使是這些損害，他亦認爲可以從另一方面看出它進步的後果。比如說：「假使日本不把重慶最醜惡的區域毀壞掉，而强迫擴街道的加寬和衞生設備的改良，則多少年以後的重慶，恐怕仍然不會變成現代都市。至若進步地方的人民移居到落後的西部來，以及使落後的西部成爲抗戰的根據地，因此種種所發生的社會影響，實在太大，太複雜……這許許多多的進步，時時成爲新行動的焦點，這些新行動實在是對全部地域的生活加一番革命」。

所有這位外國觀察者指出來的諸種事實，都是千眞萬確的，中國是在大破壞中進步了，並且在以後連續抗戰的幾年中，這許多方面的進步，雖然顯得迂緩曲折些，但仍是會進步的。

三　進步的實質與限界

現在，我們需要把討論折回到我們原來的出發點，即需要考驗到：所有上面舉述的諸般進步事實，是否可以允許我們遽作這樣的斷語，說這次戰爭，無論引起了多大的破壞，仍舊促成了中國社會的進步。要解說這個斷語是否健全，首先要看上面這些進步的事實，够不够使中國社會的生產力，得到解放。如其我們社會的生產力，能由此解放出來，則今後生產建設的大擴張，自然很容易把戰時大量耗損的人力物力，很快的補償過來，我們才很容易明白這次戰爭，確有助於我們社會的進步。反之，如其上述的諸般進步事實，有的是關於觀念方面的，有的是關於比較非基本的制度方面的，且又全都是關於戰爭緊迫期中十分勉强促成的

，那末，一臨到戰爭結束，甚至一臨到戰爭鬆懈，那些進步事實，就難免不再後退回來。即使說，進步的影響是存在的，但進步的基礎未固，利用進步作用的社會條件不會創建出來，那些未生根的表面進步現象，恐終不够補償戰爭的實在損害。

事實不已明白告訴我們了麼？儘管在戰爭過程中，上述諸方面進步現象是一直存在着，並且有的還一直在增大其影響，但我們社會的生產力，不論就農業領域方面講，抑就工業領域方面講，却不但無所增益，有的且還大大縮減了。如其照我們前面所說，一個社會的眞正進步或退步，是以它的社會生產力的增減來衡量的，則這次戰爭對於我們的社會，似乎連「作用爲舊社會矛盾的解消手段」還不够，更自談不到「作用爲新社會誕生的催生手段」了。

自然，我們絕不忽視戰時敵人直接加諸我們社會生產力上的破壞影響，我們並還不低估那些利用戰時機會對社會生產力作着無情損害的非法經濟活動，但即使如此，我們仍是不能指望戰爭一旦成爲過去，那些破壞影響與非法經濟活動一旦失其存在依據，我們的社會生產力就可突然發展起來。在目前，存着這些幻想的中外人士一定是很多的，從他們的眼光看來，中國原本是由傳統社會制度禮俗錮蔽得非常厲害的國家。這些，他們亦承認是中國現代化的障礙，是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障礙，但他們認爲，經過這次抗戰，經過上所舉述的諸般進步事實，那種障礙是除去了。

然而，這都是過於皮相的看法。一切屬於觀念上的，屬於上層機構上的進步現象，無疑大有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那對於解放社會生產力的基本社會經濟結構的改進，實在還有極太極大的距離，而且，後者即基本社會經濟結構改造的程度，往往必然要成爲前述諸進

步現象的進步的限界。

四　進步之路

由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揭幕的此次世界大戰，就其發生的經濟背景講，在日寇方面當然是由於它在前次戰後的世界復興期內，利用前次戰爭機會儘量擴展起來的社會生產力，已經感到國際市場過於狹窄，國內社會生產關係過於使它沒有展拓餘地，以致接二連三的不景氣與大恐慌所體現出的社會政治危機，使它依據壓力向弱處發展的原則，找着中國來做它的犧牲。而恰好在中國方面，又長期在爲舊社會制度的矛盾所困擾着。伴隨着國際資本的捉弄，傳統的封建社會組織，始終不讓它的力圖解脫的社會生產力，得到一點輕快的發展機會。這一點，在日寇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它認爲，中國的社會生產力能一直爲現存的傳統社會生產關係所束縛，則它自己的社會矛盾，它自己的社會生產力的束縛，就可相當的得到緩和，戰前它高唱「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經濟提攜，是從這點出發；戰時他在中國淪陷區，肆行摧毀中國的新式產業基礎，竭力扶植或保育中國的封建傳統社會關係，亦是從這點出發。

可是日寇儘管這樣盤算我們，而我們自己，彷彿一直還不大理解這種癥結。在抗戰前期，抗戰建國綱領的提出，多少是意識到了這種根本問題的表現；以爲我們其所以不能抵禦日寇的侵略，根本是由我們國家不會現代化，不會把現代的產業建立起來。如此的認識，大體是正確的，但其缺點，就在於大家的認識，一直都停頓在這裏，以爲現代產業不會建立起來，只要努力設法去建立就行，而終未認清，現代的產業，需要有配合它的社會條件和社會基礎

，它被當作一種生產組織，表現出一定的生產力，並不是，也不能在任何社會生產關係下，都行得通的。儘管我們往往倡言，或者不諱飾我們的社會是落後的，是帶有濃厚封建性質的，但臨到實踐，臨到採行現代化程序，就多半不會設想到；那種性質的社會或社會生產關係，究竟容不容許現代產業的成長呢？更不會設想到：我們的產業現代化遭遇挫折，是不是由於我們的社會生產關係，或作爲那種社會生產關係之關鍵的土地所有關係，在從中作梗呢？以土地爲重心的經濟制度，和以資本爲重心的經濟制度，該有如何大的距離啊！由前一種制度過渡到後一種制度，該須經過多少社會的變革囉！

然而我們將近一百年來的產業上的努力，彷彿總是「鑿孔栽鬚」似的硬要在前一種經濟制度上，建立起後一種制度來。我們遭遇了反科學的失敗！

在抗戰過程中一切原本是潛存着的現代阻力，都由戰時緊迫的需求和無情的攪擾，給充分暴露出來了。商業破壞產業，高利貸歪曲銀行業，以及其他官業商業化等現象，儘管最後是把最基本的傳統土地所有關係，作爲其演出的基地，但我們的注意，却依舊完全被吸到商業，物價，貨幣等表象上面，以爲這都是戰時的現象，並以爲一到戰爭結束，這些現象中止，就大可順利從事生產業建設。彷彿戰爭已把我們原來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落後社會生產關係都清除了似的，更彷彿落後的社會生產關係，在此次戰爭以前，就不會存在似的。我們原有理由强調的說；我們過去產業其所以不發達，乃由於國際資本或不平等條約的阻礙，但不能認清帝國主義所加於我們產業的壓力，是我們在國民革命以前的錯誤，過於强調那種壓力，是我們在抗戰前後所犯的錯誤。

我們還在戰爭過程中，我們有許多緊迫的應急工作要做。但即使是如此，却並不能因此就疏忽或竟拒絕承認我們傳統社會關係及其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所有形態，對於戰後建設，乃至對於戰時生產的致命的妨礙；也並不能因此就說我們完全無法利用戰時的諸般有利條件（如政府權力加强，社會輿論支持及反動勢力不敢公然反對等等），使那些落後的社會生產關係，逐漸予以廢除，我們必須採取這種革新步驟，這次戰爭，才對我們能作用爲解放社會生產力的手段，能作用爲新社會誕生的催生手段。亦只有我們在採行這種革新步驟中，我們對於所參加的這次世界戰爭，才能發生左右其性質，從而左右其最後結果的作用。

第四部　社會科學的建設論

十二　建設上的兩種科學

一　常識與科學

人們很常識的知道，建設是不能缺少科學的，但他們也同樣很常識的知道，建設上所不能缺少的科學，是與剖解室、化驗室、機械室等等相關聯，或通過這種種研究機構而得到證驗的科學知識；不但如此，他們並還進一步很常識的知道，建設其所以需要科學，乃因被建設的對象，不論是工業、農業、礦業、水利、交通，或其他方面，都非分別利用那種種科學知識和技術不能有所成就，他們有關建設與科學的關聯的全部認識，也許到此為止了。對於增進社會的財富，不相信點金術，而相信科學的建設，無疑是一大進步；但以為有了上面所說的那些科學知識，或以為利用了那些科學知識，建設事業即可樹立起來，那却又未免把科

學看成點金術了。

在事實上，建設事業是隨在要在社會上生根的，是隨在要看一般社會條件，對它在何種程度發生適應和助成作用的。一般社會條件對於建設事業，不能發生積極的助成作用，有時甚或發生妨礙作用，那就等於或類似於某種土壤，氣候，及其他自然條件，不適於特定的農產物；我們需要通過有關自然條件研究的科學，以判定那種農產物的栽培是否適宜，至少也同樣需要通過有關社會條件的科學，以判定那種建設事業，究竟能否得遂其發展。

然而人們在建設的問題上，彷彿仍只知道自然科學的重要，却不知道社會科學同樣或更加重要；只知道建設要利用自然科學，而不知道建設要收到利用自然科學的效果，首先必須依據社會科學。

二　社會科學在建設實踐上的功能

爲了了解社會科學在建設上，不但和自然科學同樣重要，甚或更加重要的實情，且不妨就科學其所以被重視的根本道理予以說明。

一般所謂科學，都被理解爲自然科學。而一般對於科學在實用或應用上的功能，很容易指數出的，是它的確實性，它的節約性，它的效率性。

就建設上來講它的確實性的功能，是說無論那種建設事業，在着手建設時，就須憑科學的精密計算，對於建設上預期達到的目標或限度，有最大可能的把握。而此科學的精密計算的前提依據，又是建立在建設過程中一切縱橫相關程序之科學的安排和部署上。自然，在各

種不同的建設事業之間，那種科學的正確性的表現程度，並不能完全一樣。比如，更依靠自然的農業和礦業，比之較不受自然拘束的工業和交通業，其預期達到的努力成果，就似乎不能不照應其所受自然的影響，而有所增減。可是這種事實，我們與其據以懷疑科學的正確性，甯不如說是我們對於影響農礦業之自然條件，如土壤，氣候，以及地質構成等等的研究，還不會達到理想的程度。

再就建設上來講科學的節約性的功能罷，那顯然與它的前一性能保有密切的聯繫。任何建設的程序，都要求適度的準確，能準確斯能避免許多不必要的物力人力與時間的浪費。如從事生產，其總生產過程中之生產程序與流通程序，如發生不啣接的毛病，立即就會影響再生產的進程；如從事交通及水利建設活動，其中任何一個步驟或環節，安排部署得不確實，立即就會引起全部運轉的混亂，或者使全部工程不能按照一定的時期建成，而在工程本身，或工程迫切要求如限完成的事實上，造出莫大的損害。但科學的節約性，表現在時間的空間的經濟利用上，表現在以前認爲無用物或廢物之有用利用上，是更爲顯明的。

最後更就建設上來講科學的效率性的功能罷，科學的節約，儘管是非常重要的，但畢竟只表現出它的消極的功能，而幾與科學成爲同義語的效率，則爲其積極的功能。在建設上，應用現代的科學的技術，以同多的勞力和資本，比之以前應用舊式的技術，是會產生出更大得多的報酬的。而且，科學的建設活動，推行得愈廣，或其所進行的規模愈大，它那種以較少勞費而獲有較大報酬的效率性，也表現得愈加顯著。

我上面關於科學在這三方面顯示其性能的敘述，是極其概括的，因爲我的目的，只是要

藉此說明一點，即所有這些為人們所特別重視的科學的功能，都是偏就自然科學說的，但在建設上，要把自然科學的諸般功能，變為實際效用，勢非在着手建設的時候，根據社會科學指述的有利途徑不可。

比如就第一點說，建設各方面的部署，無論達到了如何理想的準確程度，即生產無論能如何確實的在一定期內，一定勞費內完成；交通無論能如何維持預定的速率和周轉的程序，以及其他水利工程一類工作，無論能如何安排部署得合乎理想，但如其這種生產事業，交通事業或水利事業所由建立的社會配適條件，沒有具備產生，則它們本身藉科學作出的準確性，就顯然沒有社會的意義。生產也好，交通也好，水利也好，都是為了滿足社會需求的，如其一個社會沒有造出利用那些生產品，交通工具或水利事業的條件，那些建設事業本身，就顯然沒有依照着社會的準確原則。

而且也許就因此故，就因建設沒有依照社會科學所要求的原則而進行的原故，我們無論在建設過程上，在工廠裏，在農場裏，在交通機構裏、怎樣依據科學，講求節約，講求時間經濟，講求廢物利用；並進一步，如何講求利用最新發明，以大量或大規模進行那些建設，以期減低成本，增進效率，但結局，如其利用大規模水利工程，所轉運的工廠，所排水或灌溉的農田，所產出的大量工農業品，並非社會所需，或非需者所能購買，以致像在各資本主義國家慣常做的，把那些相對過剩的產品，堆着聽其霉爛，或竟予以燬壞，又或為等待經濟情形好轉，暫時把原已成為多餘的事業，不惜賠本將其支持，在那種場合，那就不但科學的節約性效率性無法顯示出來，而節約與效率，反而會由其造出了更多餘的產品，使再生產感

到更大的負累。在此次大戰以前，像英國一類國家，其所以不肯輕易利用更新或更科學的設備，其所以最新式的科學發明常被人收買來秘藏或毀壞去，就爲我們明白解說了此種事實。

由是我們知道，在建設上利用自然科學，如其是爲了想收得前述科學的確實性，節約性，效率性上顯示的效果，則在自然科學被利用以前，首先應當問清楚，或者應當研究明白，那種建設是否「確實」爲社會所必需，或者已經存在着的社會條件，是否允許那種建設對科學作節約的有效率的利用。這就是說，正如同自然科學一樣，作爲科學範疇來看的社會科學，它在社會建設的應用上，亦有其確實性，節約性，效率性。能按照社會性質從事建設，那種建設，就會恰好適其所需，就會地盡其利，人盡其力，貨暢其流。在這種理解下，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在建設上講求科學，就不應當只講自然科學，不講社會科學；如其我們不能否認建設是爲了社會的效果，我們更有理由相信，社會科學的重要，實在是超過了自然科學。

三　建設當利用自然科學，更當依據社會科學

自然，在科學的研究上，我們是用不着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表示孰輕孰重的軒輊的。這在建設上，特別是在人們對於建設，已知道自然科學的重要，並特別重視自然科學，以爲社會科學無關輕重的場合，提出社會科學更重要的命題來，那不是矯枉過正，那寧是憂慮着：片面的强調自然科學，一定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上面我已泛泛的就這兩種科學對於建設的關係作了一個比較抽象的說明。但爲了「鞭辟近裏」起見，爲了從理論移到實踐起見，這裏且把論點拆轉到我們的建設大業上來。

如從這一個視角出發，將近一百年的中國現代化歷史，差不多是講求如何從事現代建設的歷史，亦差不多是現代建設的慘敗史。直到今日，我們的建設宣傳，還差不多是在重複半世紀以前李鴻章，張之洞一流人物的建設八股。派遣學習自然科學的留學生，輸入外國機械，輸入外國資本，輸入外國技術人才，都無疑是從事建設所不可缺少的「古典的」節目，無可置辯，但半世紀以上，儘管在這些節目上作了極大的努力，而建設的大業，彷彿仍要由我們來從頭做起，仍要由我們來重複背誦這些節目，其中的癥結所在，就是由於我們很少反省到這歷史性的失敗的教訓。只知道建設要利用自然科學，而不知道建設更需要依據社會科學。

我在其他場合（見拙著「中國經濟論叢」第九篇中國工業建設論）曾講過：建設在中國並不單是經濟上的積極創造的問題，同時還是消極破壞的問題；不單是造出我們所期望的經濟體制的問題，同時還是我們所期待的經濟體制如何始能使其實現，如何始能造出的問題。換言之，我們的經濟建設，實際包括有變革整個社會體制的產業革命的涵義。新的產業，不能在舊的社會基礎上建立起來，那是稍有經濟科學知識的人所能喻知的。新的產業的重心，是放在體現着一定貨幣資本價值量的生產工具上，而舊的產業的重心，則是放在體現着一定特權關係的土地上。如其一個社會的權勢，尙是把握在土地所有者或與土地所有者有密切關係的那一干人，如高利貸者和商人手中，而希望他們自覺自動的担負起新產業建設的任務，那是反乎科學常識的，並也是反乎歷史經驗的。不錯，在現代世界各國產業革命史上，我們是非常容易列舉出許多國家的貴族領主，高利貸業商業者，都像不約而同的，有一部分在各別社會變革中，變成了產業資本家。但當我們承認這種事實的時候，同時得承認，那一部分

舊社會的權勢者，其所以肯變爲或能變爲新社會的催生人，並不是出於他們主觀的自覺自動，而是由於客觀的，原來支持他們社會權勢的有利社會條件，已經被變革了，或尚在積極變革中，致令他們痛感到，非改弦更張，非另尋出路，就只有跟着舊社會一同死滅。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現代社會科學就是把這一類鐵一般的事實作爲它研究的對象，而探究出它的本質及其內在必然關聯，而建立起來。當現代社會尚未出現，尚未脫却初期的形成階段的時候，社會科學自然相應逗留在極素樸的狀態下，所以一個最先進國家還時要從事產業革命，就不能不摸一些瞎路，不能不轉彎抹角的在嘗試錯誤的當中，把變革的時期特別拉長。一個次先進的國家，就比較可以參照他國的經驗；愈到後來，這種產業變革可資依據的經驗更多了，社會科學的指導作用也更大了。一個從事經濟建設或產業改造，能依照社會科學所明確指示的途徑，它在建設技術條件的諸般努力，就不致於有所浪費。自己訓練的乃至由外國招僱的技術人材，由外國借入的資金，由外國輸入的機械，乃不致中途喪失其效用。試想想，我們開始這幾項建設因素的招致與造成的努力，該有多長的歲月？而我們實際上收得的建設成果，是否能同那種努力相適應？顯然的，由李鴻章，張之洞以來的建設失敗教訓，就是我們只是很常識的知道，建設要資金，要技術，要機械，而不知道要使這些建設所需的要素，聯同發生作用，還要對於促使它們聯同作用的社會基礎，或一般社會條件，先來一個從根本的變革。事物是非常執拗的，一種社會生產方式（或者我們在這裏不妨別稱作生產建設方式），只能在爲它所要求配適的一定社會生產關係之下，方可樹立起來。要在非現代的社會生產關係之下，樹立起現代的生產方式，那顯然是枘鑿不入的。這種明如觀火的事實

，我們愈到晚近，似乎更像不能反省到的原因，也許有以此幾點：

（一）一個長期受外力阻制壓迫的社會，特別是外力爲了達成其壓制目的，不惜在某些場合，盡力扶植其惡勢力的社會，無疑很容易使它把以往現代化或建設事業失敗的責任，完全放在外力方面，以爲我們培植技術人才，輸入機械，獎勵自然科學，其所以未收到效果，全是帝國主義政策的作祟。我們絲毫也不看輕帝國主義政策加重於我們產業革命前途的阻礙。但過於强調這一點，就很易引起我們忽視對內改革的努力。

（二）儘管我們已理解到現代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產業革命，同時曾伴有，或先行有一個社會革命，但當我們還在爲前述事實，混淆我們的這種革命認識的時候，那種產業革命方式，已經成了一種過時的舊式的變革方式了。蘇聯的經濟體制，或者蘇聯的建設計劃，是在另一種社會革命之後進行的。我們已不安於走舊式的產業革命的路，覺得太迂迴了；我們又似不自信能走新式產業革命的路，覺得那太躁急了。我們彷彿有了時代的徘徊與躊躇，但這躊躇，與其是說爲了抉擇產業革命的方式，寧不如說是爲了抉擇產業革命或生產建設所要求的社會革命的方式。「一次革命論」在這種躊躇狀態下產生了，那顯然會進一步增加我們在建設意識上與實踐上的困惑，而且，

（三）我曾一再指述過，中國傳統封建經濟的進步性，即由土地得相對自由買賣，勞動力得相對自由移轉所顯示的進步性，把封建經濟的本質掩蔽了，即把它還從封建體制裏，或依封建特質所規定的「自由」，與現代資本制所要求的自由，混爲一談了。這錯覺，由前述兩種事實，及我們對於社會變革的惰性和顧慮加强了。

由是，我們知道：直到現在爲止，我們對於建設大業的推行，首先仍得把上述幾點矇糊認識的事實，予以辨析淸楚：對外求解放，是建設所必需的，但對內求改革，更爲建設所必需：舊式的產業革命，固要求有一種先行的社會革命，作爲其生產建設展開的前提條件，而目前嶄新的產業革命，儘管要求另一種先行的社會革命，但如其革封建制的社會革命，未經達成，則革資本制的社會革命，事實上就根本無從談到，歷史發展的必然階段可以縮短，却不能超越；同一封建制，它在不同的國度可以顯出不同的特質，正如同一資本制，可以在不同的國度，顯出不同的特質一樣；我們有理由說中國封建制最有進步性，正如同說英國資本制最有進步性一樣，但如說最進步的中國封建制，便可理解爲資本制，那就無異說最進步的英國資本制，便可理解爲社會主義制，那顯然是非常可笑的。

凡關這些有關社會認識的問題，都需要我們根據社會科學的結論和提示，予以詳細的辨解。把這些關鍵弄明白了，從實踐上將各種傳統的社會障礙解消了，我們在建設上多利用一分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就可多收得一分實效。否則我們在自然科學上的任何努力，就難免成爲徒勞。

中國數十年來的建設經驗，是可以充分利用來支持我這個論點的。我絲毫沒有看輕自然科學的重要性。我不過表明：自然科學所由顯示其重要性的社會功能，是必須在我們爲它作出了發揮其作用的社會條件下，始有可能的，眞正重視自然科學，對於社會科學的研究，尤其不可忽略。如其我們以常識，以成見來代替社會科學，那同時就表示我們對於自然科學的社會功能，仍缺欠理解。

這是今日從事建設，關心建設的朝野人士，應當深切反省的。

十三 混合經濟制度論批判

一 論題的提出

「混合經濟制度」在今日尙不是一個很習見的名辭。它是在此次大戰將趨結束時，由中外若干皮相經濟論者所津津樂道的。（經濟彙報第二卷第九期夏炎德君在其「戰後世界經濟之歸趨」一文中，指述混合經濟制度係由美人Staley和S.Chase所强調，其在中國，在形式上，也許夏君是首先表示贊同者）。如一切其他初見的名辭一樣，它的涵義，並未十分定著，而正有待於一切對它發生興趣的研究者觀察者去貌爲比附。但目前像上述那些人士之提論到它，顯然是基於以次的，却並不曾經由科學證驗的事實。即他們認定在此次世界大戰歷程中，世界兩個對立的經濟體系，即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與社會主義經濟體系，都在發生變化，並且將都在戰後發生更大的變化，那變化的顯明傾向，就是作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看的蘇聯社會經濟，在戰時已有不少向右轉的資本主義化的徵候，而作爲那種徵候之徵候來看的事實

，就是蘇聯採取了允許宗教信仰自由、提倡愛國主義、解散第三國際組織，以及以較多報酬誘致較大勞動生產效率的許多步驟；同時在資本主義的英美諸國，則又因戰爭的迫切需要，依統制干涉的程序强制的採行了一些在經濟方面的社會化與國有化的步驟。像這樣，一方面向右資本主義化，一方面向左社會主義化的正相對照的措施，就給予了留心世界經濟演變的人士以一種頗不平凡的印像，使他們像很有根據和理由的，斷定今後世界經濟將走向折衷的混合的路，依我們傳統的表現方式，卽是走向所謂「中庸」的路。慣於傳播這類皮相見解的國內權威的大公報，就曾在一九四四年上期的桂林版上，强調這種趨勢。而根據近一年來的報導，英國似更具體的在計劃與提議擴大鑛業交通業諸方面的國有化的程序，美國亦不絕有類似的措施，如最近由政府宣佈若干鑛產資源地的國有等，卽可見一斑。此外爲法國將淪陷區經敵人轉變過所有權的各種大企業，分別由政府予以管制和沒收，亦不外此種趨勢之具體反映。單從這諸般事實來講，我們原不妨有條件的承認資本主義經濟左傾社會化的傾向的存在；但在另方面，關於蘇聯戰時國內社會經濟的眞正動態，我們如僅憑上述的一些需要充分鑑別的措施，而斷定蘇聯在戰後不但不會進一步社會主義化，且會改變其根本作風，而趨於資本主義化，那想法，就誠如一位美國記者所說，是一種不可救藥的「愚蠢」。因此，從這一個視野來預斷戰後世界經濟會走向混合制度的可能，就顯然是「不可必而據之」的奇想了。

可是，混合制度論者們並不會因此氣餒。他們有的甚且更進一步，以爲整個世界經濟，卽使不全是分途傾向於折衷的混合，但它們各別國內在分別進行中的不純粹的資本主義制或未完全否定資本作用的社會主義制度，那已表明混合經濟制度，並不只當作一個傾向而存在

，且還當作一個事實而存在，對於客觀的事實或客觀的可能傾向，人們是有依照他們自己的希望或想像，去編造一種爲他們所樂意的字彙的自由。但混合經濟論者，却至少需要在理論上克服以次這幾種可能引起的混亂：

（一）承認混合經濟制度或其可能，首先必定已承認了作爲混合因素的諸種體制，如資本主義體制社會主義體制等等的嚴格性；而承認了這種混合制度或其可能，又無異在否認那諸種體制的嚴格性。

（二）社會的發展，貫徹有作用於其中的一定歷史法則。各種經濟制度，都有它自己的法則；每種經濟制度在向着其次一經濟制度推移的歷程中，又都分別表現有不同的法則。混合經濟制度是不是亦有它的法則，或者亦有其混同各種經濟制度法則所形成的混成法則，如其是的，那就不但是對於各別歷史的經濟制度的法則的否定，亦是對於它們之間的連續推移的法則的否定。

（三）混合經濟制度不僅如上面所述，會否定社會經濟法則，同時還必然會由其推論而否定歷史，或至少不能不在其理論邏輯上，承認歷史到此終止了。

如其混合經濟制度論者無法解除這諸般理論上的混亂，他們就必然不可避免的會在實踐上引起一些舉棋不定的昏迷與周章。因爲一切經濟的措施，都必須是依據客觀現實所顯示的變動傾向或法則，有目的的予以因勢利導或合理規制的結果。如其我們惑於一個社會同時並存着的諸種經濟體制的因素，而不理解何者是它的基本經濟體制的構成分，不理解那種體制已演變至何階段，並將爲何種其他較進步的基本社會經濟體制所代替，則所謂「有目的的利

導」與「合理的規制」均將失所依據。因此混合經濟制度這個名稱的提出，如其不是號召者爲現實的表象所迷惑，就是他們想用這種號召，去迷惑人們。在世界整個經濟的大轉形中，特別在中國經濟的改建過程中，我們需要對這一似是而非的謬見，予以明確的辨正。

二 當作「混合經濟」之先行體制看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形態與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形態

一提論到混合經濟體制，人們很容易聯想到爲大家所熟悉的、但卻曾被應用得非常混淆的兩個語辭，其一是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制，其一則是所謂國家社會主義制。這兩個語辭，儘管在今日已明確的在分別表現着兩個性質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而一般人對它們的理解，卻仍是非常混同。我們當前的混合經濟制度論者，也許還有興趣把它們用來支持其論點。因爲在這任何一種體制之下，都同時存在着資本主義經濟因素與社會主義經濟因素。

蘇聯在推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列甯曾在社會鬥爭的戰路上提出「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稱（見拙譯Knight等著歐洲經濟史第七七二頁），按其用意，無非是在當時生產極度破壞與極度萎縮的情形下，想藉着對私人資本作種種讓步的措施，使一般國民產業有一昭蘇的機會。但當上述目的在開始第一次五年計劃期內，得到某種限度的實現時，本來由國家給私人資本以發展機會的政策，就變質爲發展國家資本的政策。於是「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稱，便隨着政策的改變，被代換以「國家社會主義」的稱呼（同前揭書）。此後「國家社會主義經濟」云云，遂專門用以表識蘇聯迄今所施行的經濟形態。在這種經濟形態裏面，仍含有不少

的私經濟成份。所以蘇聯社會經濟的右傾推測是由此出發；如從蘇聯方面看出混合經濟的何等展望，亦似只能由此出發。

在另一方面，當蘇聯依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五年計劃建設所謂「一國社會主義」的期間，我們又還發現另一個倡言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即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希特勒德國的「精神抄襲」，當然不止於「國家社會主義」這個名詞，它也還有作了「五分之一折扣」的第一次第二次四年計劃。但在計劃剛開始實行以前不久，在所謂二十五條黨綱中，凡可以比附於「國家社會主義」的諸條目都被「領袖」一筆勾銷在「不許亂談主義」，「不許作理論試驗」的脚註中。結局，由酒館革命起義到柏林地下室消亡去的希特勒德國，就一直是爲大資本所支持，因而一直是在支持着大資本。在備戰及從事戰爭的過程中，領袖希特勒及其黨徒，無疑也推行了不少「難謠如資本家意」的經濟措施，不少有關軍需的大企業，按照戰爭及維護統治的便利與要求，分別予以合併或重新編配了。即國家對於大資本的所有權雖然「暫忠」保障，並且被宣揚爲「國家化身」的領袖希特勒，雖然在扮演着「資本十字軍」領導者的大角色，但一切資本的使用權，却無疑被侵奪了。也許就因此之故，希特勒德國的經濟的劇烈社會化措施，亦遂被設想爲或被認定具有可觀的社會主義因素。而這種「僭稱」爲國家社會主義，實是依大資本對國家行使壟斷統治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形態，就可能被視爲所謂混合經濟之又一前身。

顯然的，德國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從典型的資本主義觀點去看，那是頗不純粹的，正如同蘇聯式的國家社會主義，從理想的社會主義觀點去看，亦是相當不純粹的一樣。但「不純

粹」云云，並不能不加辨別的理解爲「混合」。對於蘇聯型經濟，我們只能說它尚殘留有資本主義的因素；對於第三帝國型經濟，我們亦只說它表現了若干社會化傾向，它們分別以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爲其立國精神和基本社會經濟指導原則的事實，却並不會因爲它有那種殘餘或有那若干傾向，而在認識上引起混同的錯覺。

然而，混合經濟制度論者，是可能由這類錯覺出發的。因此，我們對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及國家社會主義經濟，不能不有進一步的說明。我曾這樣理解過（我曾有一篇「論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形態與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形態」的長文，送交中山文化季刊，但桂林淪陷，使它發出成了問題）：國家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轉形形態，而國家社會主義，則是社會主義的初期的或未成熟的形態。它們不備在發展歷程上是「鄰居」，並且前者可視爲是對於後者的技術準備階段。雖然每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可因其社會的或歷史的條件的差異，對於由其轉形形態過渡到未成熟的社會主義形態的必然順序，在規模上，在延續期間上，在表現姿態上不一定相同，但以次兩點是非常明白的，即，

（一）已發展到轉形階段的資本主義，決不會再回復到它典型的形態；同時，已發展到未成熟階段的社會主義，更決不會逆行或倒退到任何資本主義形態。因爲其中存在着這樣的事實：

（二）資本主義即使是在轉形階段，當作這個階段的社會經濟的指導原則或指導精神，仍不能不是資本主義的；同時，社會主義即使是在未成熟的階段，當作這個階段的社會經濟的指導原則或精神，也仍不能不是社會主義的。

我們能把握這個關鍵，就有理由根本否定所謂混合經濟制度的「說教」。但其癥結，還須作進一步的深入的說明。

三　對於社會經濟制度多重存在的差別理解及其在實踐上的一元指導

如其說，作爲歷史發展階段看的若干社會經濟體制，同時並存於某一特定社會，便被理解爲混合經濟制度，那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像這樣一種制度，即使是今人所「發明」，但却並非始自今日。大約自原始共同社會崩潰以後，在一切歷史時代或社會階段，差不多都多少存在着其前一發展階段的經濟制度的遺留。我們甚且可以說，純粹的單一的社會經濟制度，即不混合着其前一發展階段的殘餘和後一發展階段的萌芽的經濟制度，客觀上是根本不曾存在過的。舉一個較極端的例吧，列甯在施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曾倡言當時蘇聯經濟裏面，包含有由原始村落共同體到社會主義這一序列的五種不同的經濟因素。這應該說是集混合制度之大成了。然而我們在認識蘇維埃經濟的時候，却並不把它看作混合經濟制度，而竟不顧它的那種「無所不包性」，僅認定它是與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對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形態。不論是贊成它的人，抑且是反對它的人，都一致當作明白的事實這樣承認它，正如同我們今日，還可毫不遲疑的承認英美型經濟爲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一樣。我們其所以對於相並存在着的各種社會經濟因素的某一社會，只確認其中之一的某種經濟形態作爲其代表經濟形態，那首先最直接的無疑是要看那各種社會制度的經濟因素，究竟是由何者在客觀現實上佔着最大的或較大的數量或比重。然而，這儘管是最普通的看法，却並不是最能避免錯誤的看法。要澈底了

解一個社會的代表經濟形態，除了注意其規模或數量外，同時還得就以次三方面去確定其性質，其中之一方面，是要看該社會所由構成的諸基本經濟條件，在體現着怎樣的社會本質；另一方面，是要看該社會的諸基本生產關係，形成了如何的社會階級構成；最後第三方面，是要看該社會的一般經濟活動，在被怎樣的指導原則所左右。

這裏且先就不十分可靠的數量觀察說起。

這所謂數量觀察，是看在某一特定社會中，某種性質的經濟因素，對其他經濟因素佔有如何的較大的比重。但這種觀察方法，很容易把我們導向下面這種疑團：比方說，蘇聯的實施新經濟政策當時的經濟，資本主義性的經濟成份，特別是在農村方面的富農經濟成份，無疑對社會主義性經濟成份，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比重」「在一九二三年終，中央統計局估計，私人貿易佔國內貿易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同年，國家獨占大工業的政策，亦弛緩下來，私人租借財產，私人特許及混合公司的經營，是三種一般的例外」「僱工人數在二十以下的私人工業被允許了，農民在其保有地上」，「可僱全年長工，並以金付工資」——參見前揭拙譯歐洲經濟史第七六八頁以下）。也許因爲是單看到這一點，當時資本主義各國的大資產者階級，正確信這個一度「着了社會主義之魔」的國家，快要清醒過來，重復回到它們的懷抱。就在同情蘇聯的國際人士，亦有不少在擔心蘇聯對國內資本主義勢力讓步太過，縱容太過，是不是會釀成資本主義「復辟」的危懼。

然而，在蘇聯自身，它卻自信有一些極可靠的保證，就是，依着正確的社會科學理論，它知道決定一個社會的性質的經濟因素，是它的基本的生產工具。在土地是國有，一切其他

工鑛交通諸方面的生產手段，通通把握在國家手中的情形下，爲了刺激生產，活潑國內市場，讓一般農民及工商業者，在一定限度下展開自己的謀利活動，那不致發生怎樣了不起的反社會主義危機。

無疑的，商工業者農業者，積得了相當財富，變成了中小資產者，變成了富農，勢將不免比照其財富力量，在社會生產關係上，在社會階級構成上，引起一些變動，事實上，在新經濟政策將要結束的當時，這種變動確已成爲蘇聯當局的注意焦點，但正因爲前述社會基本生產手段把握在國家手中，從而，國家的政權把握在無產者大衆手中，以往資產階級所依以存立的一切社會特權、社會便利、社會基礎，通通不存在了。所以，富農及中小資產者一時雖像來勢洶洶，但因爲他們擴大其社會權力的基本條件，早被把握在與他們站在對立地位的階級手中了，等到反富農，反資本主義活動的新措施一開始，他們馬上就在幾次五年計劃中，完全被清算了。

因此，在最後，我們知道，要測驗一個社會是由那種制度的經濟成份佔着表識它或代表它的地位，與其從靜態上去計較它已成就的數量或規模，甯不如從動態上，從實踐活動上，去觀知它的指導原理。因爲，在我們的研究立場上看來，對於一個社會制度的性質的決定，與其說是在它已有的經濟的成就，不如說是在它正在發展中的動態。而引導或指點那種動態的實踐方針，不但反映着那種社會的生產關係或階級關係，還反映着那種社會的基本生產手段，是把握在誰的手中。

但是，上面的說明，如應用到蘇聯以外的任一國家，却又需要我們對基本社會科學理論

，作更靈活更有差別的運用。比如就典型資本主義國家英國來說罷。它在今日，沒有一個人懷疑它不是資本主義國家，但它的資本主義，却顯然已脫離典型階段，而移到了轉形階段。惟其它在這一階段，它的政治經濟動態，就表現了一些令人感到迷糊的外觀。今日最有力指導或左右英國社會經濟活動的兩大政黨，一個是保守黨，它的政綱極鮮明的在擁護既成的資本主義勢力；另一個是工黨，它的政綱，雖不像前者那樣鮮明，但最後卻要求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照我們上面關於蘇聯政權性質及其經濟指導精神的理解，英國政權掌握在保守黨手中，其經濟指導方針，無疑是在向着維繫既成資本勢力方面努力，我們由此很容易看出英國的資本主義性格。但如像目前這樣，英國是由保守黨的反對黨工黨執政了，工黨如「社」實行其社會主義化的綱領，我們是否可以據此推斷英國爲社會主義國家呢？我們如對此沒有一個明確的解答，勢將影響我們上面的整個立論點，而爲所謂「混合經濟制度」開一方便之門。

但我們知道，英國社會的一切基本生產手段，通通是由大大小小的資本家所把持，照應着這種事實，英國的統治階級，還是資產者階級。在社會的基本經濟結構毫沒有動彈的情形下，工黨所提出的社會經濟綱領，至多只能是改良主義的綱領，它只企圖把社會主義作爲未來的展望，而不想立即以激烈的手段求其實現。惟其如此，工黨就可能在資產者統治的政治經濟基礎上，掌握政權，亦正惟其如此，我們就無法由當前掌握英國政權的工黨的可能作風，而把英國社會理解爲社會主義社會。

不但如此，我們在另一方面還有理由相信，在客觀現實的要求下，在「以退爲進」的政

略運用下，在「廉價」革新步驟可能更有利於「實貴」社會權力保留的權衡划算下，保守黨在某些場合，不但會贊同工黨的「廉價」革新，甚且還樂於提出它的「社會主義」。前此保守黨內閣的建設大臣伍爾頓勳爵，就曾提出一個「向貧困宣戰」的計劃，這計劃是會被譽稱爲「我們的時代的社會主義」。眞正的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上建立的，亦可能是由資本主義被迫逐漸讓步，逐漸採取革新步驟，而逐漸接近於實現之旅程的。但基本的社會經濟組織沒有受到威脅，「突變的生育陣痛」不會經歷，那依舊還是資本家的天下。

把蘇聯同英國的社會經濟本質，從一切亂人視聽的表象上，明確體認出來了，我們就知道所謂混合經濟制度，只不過是在那些辨認不清各種社會經濟本質的人們的頭腦中存在，或者只是在那些希望複雜的社會經濟事象，變得適合於其簡單想法的人們的頭腦中存在。因此，我預想這種在現實上根本不會存在的混合經濟制度，將在中國論壇上，當作一個「時髦」而流布傳揚着，形成爲轉形過程中的現實革新認識上的一大障礙。

四　中國經濟改建上的「三重混合」問題與「二重混合」問題

被當作世界的一個重要構成份來看的中國，無論我們願不願意，它已經是處在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推移的世界大轉形的過渡階段了。但在中國自身，又無論我們承不承認，它確還未從前一個轉形階段，即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推移的轉形過渡階段，蛹蛻出來。

照應着並正視着這種歷史現實，孫中山先生在將近三十年前，就提出了顧及世界潮流及中國自身社會條件的民生主義經濟改建原理。雖然快經歷一個世代了，那種原理的正確性，

還不曾絲毫受到懷疑。所可惜的，是我們迄今還不曾將它付諸實行。這一次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應是我們認眞實施民生主義的時候了。時賢對於如何實施，以及在實施當中需要注意到的問題，論列頗多。但從字裏行間，使我體認到他們大多數的見解，有意無意的混雜有這里所論及的「混合經濟制度」的意識，比如，顯而易見的：

（一）在論及中國工業化的時候，大家不約而同在把論點集中到工業化的諸技術條件方面，彷彿落後的封建諸生產關係以及依存或「銜合」於那些生產關係的變態的商業金融形態，對於工業化都無妨礙；又彷彿工業化中的民營國營的措施、不妨與那些關係及那些經濟形態相並存在而「各遂其生」一樣。

（二）在把民營事業理解爲資本主義型經濟，國營事業理解爲社會主義型經濟的場合，大家又不約而同的以爲這兩者同時推行起來，會水乳交融的達到調和而折衷的圓滿結果。「道並行而不相悖」的包容哲學，更大有助於這種意識的發展。

對於前者，我稱之爲「三重混合經濟制度論」，即有意無意的認爲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可以混爲一體，中國土地幅員之大，國內經濟發展之不平衡，頗足爲他們「持之有故」的論據。不錯，他們中間較高明一點的，有時雖也認定有剷除封建勢力的必要，但當他們高興起來，却又以爲工業化的過程，同時就是各種封建傳統解體的過程，但他們不知道這僅是問題的一面，其最關重要的另一面，却是各種封建傳統正在阻止工業化，歪曲工業化。

對於後者，我們稱之爲「二重混合經濟制度論者」，他們已經認定要工業化，必須從土地改革的程序上，從根掘去各種封建力量生根的地盤。可是他們沒有注意到，土地即使改革

了，社會型與資本型的經濟，在某種場合，儘管像是可以相互補充，相互促進，但它們彼此間相尅相消的作用，却大過封建制與資本制間的矛盾。所以我們如其天眞無邪地認定它們在客觀現實的演變上，也可以像在我們高論者頭腦中那樣糊裏糊塗的不分界域，那我們一開始各種企業私營國營的程序時，立卽就會碰上許多步驟凌亂與互相牽制的弊害。

總之，「混合經濟制度」在理論上是不存在的，任何社會在任何一個階段，只允許有一個支配的指導的力量。而且只有在單一的指導原則下，才可能使社會經濟的發展，較順利地達到預期的目的。以當前中國客觀現實的情形看來，非特殊的頑固者，決不會再堅持要保留封建力量，並以爲保持封建力量，可能不妨害工業化。他們至多只不過小視了傳統封建諸勢力，並且對那種勢力所依存的社會根基還有些隔膜。這就是說，從所謂「三重混合經濟制度」錯覺解放，還比較容易；但以同一的當前客觀現實看來，要大家從所謂「二重混合經濟制度」錯覺解放，就比較困難了。因爲我們已經有了幾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封建毒害的經驗，而對於資本制度如何妨礙社會化的教訓，則只是漠然得自其他國家。因此我們如其不願意爽爽快快的走資本主義的路，或者渴切希望避免資本制在各國所造成的弊害，則我們在並行國營與私營的建設程序當中，就要明瞭我們的建設指導原則，必須偏重在那一方面，它不能是混同的、不能是二重的。二重的經濟指導，在經濟實踐上所發生的破壞影響，恐怕比二重的軍事指揮，在軍事行動上所造成的混亂，還要嚴重得多。然而，建立軍事的統一指揮，是較之建立經濟的最高指導原則，要容易得多的。因爲經濟上的單一的指導原理或指導精神，必須是一定社會生產關係的產物。這，我們試回顧本文前面第三節所說卽可明白。其中有許多實踐上

的道理，需要詳加分釋，這裏，只不過乘着尙論一般混合經濟制度的機會，順便述及罷了。

十四 論中國戰後農村工業化

——評顧翊羣先生及其他工業化形式主義論者

一 談工業化的四組論點

關於戰後工業化問題的討論，目前似乎達到了空前熱鬧的程度。大家樂於討論這個問題，也許不僅是因爲它過於迫切，急需各人貢獻所見，以便得出一個工業建設可資依據的實施張本；同時還因爲它本身具有極大的闊度，具有不能單從表象上得到理解的深度，頗需要我們從各別的視野，各種深淺不同的角度，去加以探索和論究。事實上，許多專家學者正好是如此這般的在論究着。設把有關這一方面的議論，彙集起來，在互有出入的意見中，也許不難發現以次幾個類同點：

第一、各方討論工業化的內容，都或多或少的在把民生的還是國防的，放任的還是統制的，重工業的還是輕工業的，民營的還是公營的；這幾個論點，作爲其各別議論構成的經緯

，換言之，他們一般都注意到了這些基本的工業化原則，只不過彼此對於這些原則的認識與着重程度，互有參差罷了

第二、大家在上列四組論點上表示的參差意見，同時却全無例外的，在原則中之原則的民生主義上面得到統一了。無論是主張工業化應以民主爲前提，還是應以國防爲前提；是主張採行放任政策，還是採行統制政策；是主張運用國營方式，還是運用民營方式；是主張從重工業入手，還是從輕工業入手；又或者是在這諸方面採取折衷的辦法，或採取畸重而不偏廢的辦法，都像「條條道路可以通北京」似的，在把民生主義作爲其理論展開的最高原則。而民生主義本身的包容性，更給予了大家討論上許多便利。

第三、上述兩個類同點的說明，是作爲這裏所特別注意的第三個類同點的引論，即是：國內專家學者根據民生主義原則所提起的右述諸工業化的主張，彷彿一致的忽略了民生主義之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性，和民生主義整體性；作爲民生主義具體內容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及國營事業，是最高政策，同時也是最高原則；惟其如此，根據此原則而施行的任何經濟建設，都必須顧到此諸原則在應用上的內在關聯或不可分性。因爲此諸原則所由產生之客觀的社會經濟條件，在如此要求着。邇來國內論壇，在論及土地問題的場合，往往只拿出平均地權的原則，以爲節制資本和國營事業，與土地問題無大關聯；而在論及工業建設的場合，更像非常自然的，只引據節制資本和國營事業的原則，以爲平均地權，與工業化沒有直接的聯繫——這一點，大體可以看爲時下尙論工業化的共同作風。我當心這在朝在野，會引起「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的後果，早想打破一向不願談戰後經濟問題的沉默，對此有所論

雜。

在一九四一年暑假前，我從桂林大公報上讀到顧翊羣先生發表的「中國戰後農村工業化問題」。這篇文章別致的地方，就在他把問題的研究內容，引出了上述四組論點之外；工業化應當仍舊慣的集中在都市，抑當分散在農村，又成爲一新組論點了。可是這種別致地方，並不會影響到上述第二第三兩個類同點；即一方面依據民生主義，一方面又不會依據整體觀的民生主義。

在讀過那篇文章之後，我當即決定藉此表述有關於這方面的意見，因爲（一）顧先生不僅是實行家，且對經濟理論頗有素養，對於問題的討論，有許多方便；（二）農村工業化的主張，發自一位對全國農業金融行政負專責的人，那不只是「坐而言」，還極有可能「起而行」，理應特別值得重視；（三）那篇文章關於戰後農村工業化，除了解述其意義，重要性，明確內容外，且把實施的步驟，辦法，乃至推行那種工業化工作的機構，也指明出來，那對一般單述及原則的論文，有更大的切實性；（四）除以上各點外，因爲它提論到的問題，有關工業與農業之間的聯繫，那對於我所要提出來商榷的工業化與土地問題之間的關聯，較爲接近，較便於理論的展開。

但因爲課務及其他寫作計劃的牽累，已經有近半年的延宕了，我滿以爲在此延宕過程中，可能有使我這種意見成爲不必要的議論出現。無如近半年來論壇上接二連三發表的有關工業建設的專號特輯，其一般內容，仍似不會脫却前面指述到的三大類同點。所以，直至此刻，我依舊覺得需要藉着顧先生那篇大作，來表述我關於這方面的意見。在這種意義上，我下

面準備展開的說明，就不限定是以顧先生的見解爲對象，一切在其他論點上與顧先生相異或相反，而在這一論點上與顧先生表現了相同傾向的議論；或者，一切在其他論點上與作者較能採取相同立場，但在這一論點上和作者表現了差異認識的論調，都將在作者論難到顧先生的見解的場合被接觸到，被批論到，這是須得在這裏分釋清楚的。

二　對顧先生的評判

顧先生那篇論文，共分四節，當作緒論的第一節，首先說明工業化的重要，認定「今日所謂現代國家，非賴工業之發展，無以圖存而當强；」其次說明發展工業，採取歐美諸國集中於大都市的方式，甚多流弊，如「（一）影響農村衰落，（二）都市地價高昂，不合經濟原則，（三）發生貧民窟，引起社會問題」；又其次說明農村工業化之意義：（一）「在促進農民自己從事副業生產，以恢復農村手工業，並謀充實農家收益，以改善其生活」，（二）「在使都市工業分散建立於農村，使農民勞作不僅恃用手藝，且有機會學習使用工具，由使用工具而得高度技藝，以節省勞力，增加生產，而充實其生活」；此外還把農村工業化的重要性，從減少農村人口過剩壓迫，利用農村剩餘勞動力，減輕工業上勞動不足困難，就近取給原料，附帶促進農業生產發展及附帶收得節制資本效果諸方面表達出來。

第二節把反對農村工業化諸理論，一一加以駁斥，並由是論證各國工業逐漸由都市轉入農村，以求平衡發展之趨勢。

第三節再從正面解說農村工業化應如何實施，在這裏詳細分述到了維持農村工業恆久繁

榮所應達成的諸目標，卽改進鄉村工業現狀啓發廣大農村生產者之自覺，使其認識工業技術進步之重要；訓練並獎勵管理與經營人才。又詳細分述到了農村工業之類別，卽糧食類，園藝農產類，茶、糖、油、絲、棉、麻、紙、染料等特種農產類，畜產品類及工具類。推進的機關，也指出由中央工業實驗所，中國工業合作社，經濟部工礦調整處，振濟委員會，各省建設廳，合作事業管理處與中國農民銀行等機關協助辦理了。

最後第四節，再結論到「農村工業化，爲改善我國農民生活，促進國民資本平衡積聚之要圖，且可避免工業急激集中，對國家社會之不良影響。」因此，顧先生自認「理論正確，倘能適時適地推行，不難成功」。

上面是顧先生那篇大作的大概內容。

爲了避免零碎枝節的不必要的較量和討論，首先且爲顧先生在那篇大作中表現得不够明確，但却已够給我們以暗示的中心經濟意識，理出一個顧先生自己看了，也會十分首肯的頭緒來：

（一）反對大資本——顧先生在這一點上的表現，儘管會給我們以這樣的印象：彷彿大資本所有的罪過，都是由於其集中在都市方面，才產生出來；但不管集中經營是怎樣本質的附着在資本主義制上的一個特點，而在晚近，資本家階層利用農村破產現象，所造出的低廉勞動，以及爲了便於競獲市場，爲了分散勞動者集體勢力，而在可能範圍內，在不妨礙技術應用的條件下，使廣大的農村，分別變爲其廠外部分，這原是現代型家內工業不同於過去家

內工業的重大分野。顧先生所謂美日諸國工業向農村分散的事實，一定可以從這裏找到論據，同時，它們那種形式或那種要求上的分散，不但不會阻止資本集中，阻止工業向都市集中，且常可看爲是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的其他方面或其他部門，加强資本集中，加强工業向都市集中的一個變相手法。這就是說，現代各資本主義國家所表現的諸種社會病態，是一定會隨伴資本主義制度而存在的，即使把它的經營方式作某種程度的改變，也不過把那些病態改裝一下表現出來。關於這些，顧先生定然是知道淸楚的。所以，他爲了强調農村工業化，雖然像把資本主義集中都市的弊害，掩蔽了資本主義弊害一般，他骨子裏不但是反對大資本，並且至少在展望上，是反對中國工業化，走向資本主義老路的。這可由下面的主張得到證實。

（二）强調小商品生產——顧先生在這一點的表現上，也無疑會給我們以這樣的印象：彷彿是因爲小商品生產形態的工業，不但便於分散在農村，且還必須分散在農村。他對「農村工業化的意義」，明白表示在「促進農民自己從事於副業生產，以恢復農村手工業，並謀充實農家收益，改善其生活。」就他列舉的農產品加工裝成之種類，及主要農產工業區域劃分的說明，農民從事那些副業生產，似不可能自製，自享，而是在分工分業要求下，提供於市場，成爲小商品生產。但在經濟發展之歷史的必然程序上，小生產，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前奏。小商品生產得到了保育，得到了顧先生在「獎勵與保護」項下，提到的「原料供應之優待，捐稅之減免，運輸之便利，保護關稅，及非常時期或不利時期之津貼補助」，更加以技術管理諸方面的助成，顯然很快就會踏上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覆轍，就會因其內在的必然

要求，使工業集中到都市方面，或者使那些原來爲了遷就水利原料或其他社會條件，設立在農村的工業，逐漸把農村化爲都市。這種後果，顧先生也定然是很淸楚的，否則他不會提出以次這種理論前提來。

（三）主張以合作方式，或通過合作方式，以補弱小商品生產在技術及其他方面的弱點，同時並由是限制資本集中，限制工業集中到都市方面，或限制工業由集中而使其所在地的農村，形成新的都市。關於這一點的表現，比較其關於上述兩點的表現，似較明白。他以爲「建立今後鄉村工業，不限於技術的改良，且須變革組織，以促進農民自營，自有，自享爲原則，故私營方式應逐漸取締，而以合作組織方式爲中心」。在文字表現上，這種見解，雖然同顧先生强調小商品生產的主張，有某種限度的抵觸，但過細體會其中心意識，似仍不難發現其把合作，把小商品生產，當作是與資本主義正相對立的經濟形態而理解。

在右述這幾個理論前提下，顧先生在他這篇大作中的說明，至少會引起我們以次這幾種疑團：

第一、主張「恢復農村手工業」，「使都市工業分散建立於農村」，以此作爲農村工業化的命題，似在表示今後工業應全部分散於農村方面，但就其後面所區分的農村工業的分類與分區而言，又似其所着意者，僅在可以對農產品加工裝成的那一部分工業，僅在可以改良「充實農民生活」的那一部分工業，其餘特別需要採行大規模集中經營的重工業、礦業、或國營企業，却像被拋棄去，作爲不在討論之列。果其如此，如其經濟愈向前發展，那些被集中在都市，甚至分別集中在農村的工業，即使是採取國營形態，亦似不免要發生顧先生所顧

慮到的「弊害」。如其把那些在其內部組織及本質要求上，需要集中的大工業，不管是國營抑是私營，竟爲了避免那些集中所引起的弊害，設法將它們分散開，那是否合乎技術要求，是否合乎經濟原則，似頗有斟酌餘地。事實上，我們的大工業如能國營，我們散在農村的工業，如能「逐漸取締其私營」，恐怕顧先生所當心的集中的弊害，大體上會得到緩和或糾正也未可知。

第二、農村工業化如不限定在「恢復農村手工業」（這在全文中是表現得最有毛病的語辭），而最主要是要在「改進鄉村工業現狀」的要求下，「促進其組織，使由各個的經營成爲集體的廣大的單位，以便實施技術上之改進」，「統一分散式的供銷業務」，「在使農民勞作不僅恃用手藝，且有機會學習使用工具，由使用工具而得到高度技藝，以節省勞力，增加生產」。則由工具或機具結合起來的集體的廣大的生產單位，及與其相配合的「統一分散的供銷業務」，很快就會使這種工業所在地的鄉村，變成大大小小的新都市。事實上，我們今日的許多大都市，在不到一百年前，還不過是一些荒野，沼澤或小市集。據此，我們似乎不應在固定的概念上，來理解農村與都市的相對關係。在前述農村變爲都市的過程中，同時，也還有不少都市慢慢的演變爲破落的市集或村野。

第三、以合作方式，作爲農村工業化的基本形式，這一點；顧先生也許是根據近年工合及農貸上的體驗，以爲「在目前，農民合作組織一時不易普遍發展，不妨暫時採用公營制度，作爲合作組織之橋樑」。似此，在「農村工業化應如何實施」的項目下，認定不妨「暫時採用」的「公營制度」，就是一個比較重要的節目，但顧先生對於這個節目，完全沒有解釋

。如其他在該論文中其他項目下表示的「今後改進之途，應由中央政府指定或設立强有力的專門機構，負責計劃與推行」，「於適當地區，設立各種農村工業示範工廠」，不能算作是負起農村工業化過渡期全責的「公營制度」的註脚，則從討論項目上看去，像是異常具體切實的主張，就留下了一個極需彌縫的漏洞。而且，公營制度究應實行到若何程度，爲何要實行到若何程度，始可達到免除它作爲走向「合作組織之橋樑」的任務，亦不曾明白指示出來。設把問題引進一步，把顧先生理想爲農村工業化之基本形式的合作經濟組織加以論究，那將使我們明瞭：農村工業化的障礙，究竟在什麽地方。現在的合作組織，是在反對大資本獨占壟斷的要求下產生出來。我們在大資本沒有發生之前，就來進行這種組織，以免重蹈各資本主義國家的覆轍，原是非常機智，非常理想的。但問題並不能這樣簡單。我們防患於未然的合作組織，固然不會受大資本的壓制與阻礙，但也無法享有大資本爲我們掃除諸般社會障礙的便利。顧先生似乎也觸覺到了這個問題的隱處，所以他很機敏的暫時用公營制度來代替合作組織，同時又不把公營制度的內容揭露出來。

上面的幾個疑團，大體是就顧先生那篇論文的邏輯意義上引出的。在作者個人對於今後工業建設，在不妨礙技術發展限度內，在顧及其他有利條件下向內地或農村分散；對於以公營代替私營，以合作代替獨占；甚至連對於維護小生產者利益，甯都表示極大的同情，認定還都是有心人的「有深意存焉」的設想。但當作一種號召，一種坐言起行的實際主張，却須明瞭它的可能實行的限界。

在現代資本主義大踏步發展的前一世紀初期，反對大資本，主張保護小生產者利益的所

謂新經濟學說，就由有名的浪漫主義經濟學者西斯孟底（Sismondi）正式公表出來（其大著「新經濟學原理」，於一八一九年出版），此後蒲魯東（Proudhon）雖曾在不同的立場上強調過同一主張，但直至合作主義確實表現其效果以前，反對大資本，主張小商品生產的理論，始終不曾找到一個實現其理論的有效方式。到了二十世紀，合作主義形態在對抗大資本的情形下，逐漸普遍發展起來，於是新的浪漫主義經濟學者，便把合作與大資本在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內部的對立，理解爲可用合作組織來代替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對立。把資本主義制度的副產物，看作資本主義制度的代替者。

由於合作組織，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先進國家被誇大了社會功能的結果，同一組織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度，遂很自然的被視爲有代替資本主義或抵制大資本發生的社會功能。我們即使站在反大資本，甚或反資本主義的立場上，亦當不能忽略：合作是在大資本及其所關聯的一列社會條件下產生，那一列社會條件如其還不存在，合作如非在眞實或抽象中輕快的存在着，它就必然要受到另一列社會條件的拘束。那另一列社會條件究是一些什麼呢？中國社會的現實，將在這方面給我們以明確的答覆。

三　對其他一切工業化論者的總評判

論到這裏，我們很可把論點折回到出發的地方，即折回到國內學者專家們關於中國工業化議論類同的地方。在這以下，作者的討論對象，將不復是專對顧先生那篇論文發言，而是對一切表示了前述那些類同點的意見發言。雖然仍打算把顧先生的見解，作爲立論起點。

顧先生那篇論文中，有關前述第一個類同點，即不關那四組論點上的表示，他顯然是比較傾重民生的，傾重統制的，傾重公營的，最後，至少在他立論範圍內，他又是傾重於輕工業的。他表現得特異一點的地方，就是因爲他主張農村工業化，他就沒有其他學者專家，認定工業化仍是在都市進行，可以不要理會農村狀況那樣自由方便而輕脫。這就是說，他不能不提及農村一般的經濟狀況，特別是與土地關聯的社會經濟狀況。然而意外得很，他關於這方面的意見，只是從側面像是不着邊際的講了這幾句話：「當前中國最大問題，如人口，土地與文化三者的失調，因而發生了種種社會經濟問題。其調整之道，根據一般學者專家的意見，不外一、應發展文化，由農業生產閉關經濟轉向農工業平衡發展與國際貿易；二、改良土地利用，提高農業生產的量與度；三、厲行優生政策，改良人口品質，維持適度人口，以求三者發達之平衡」。這之後，他就不再以這個問題與農村工業化有關了。他只加强表示：「我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農民，我們的問題，主要是解決農村問題，使每個農村，皆能豐衣足食，則中國其他問題，皆可迎刃而解。故農村生計問題，急需解決」。然則如何解決農民生計問題呢？不用說，是農村工業化。

如其他這篇論文，不是詳細把理論實行到理論的步驟與辦法，都論到了，也許這樣輕便的處理問題，不算是怎樣簡略。我這裏不想深入的論到當前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如學者專家所說，是人口、土地、文化三者配合失調的問題；只想對顧先生認定解決農民生計問題的農村工業化，究竟能否在今日中國農村現狀下行得通。

首先，作爲工業化基地的農村，是如顧先生所說，係爲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

民所定居的地方。這些農民，如其不在看爲是抽象概念，看爲是可以適度一切新制度的所謂「盆圓則水圓，盆方則水方。」的水樣的東西，而在爲一些歷史的社會的例解條件所規制着；而這規制着他們的社會經濟條件，又是使他們不得「豐衣足食」的社會經濟條件，則我們企圖用一種新制度，新辦法，使他們能「豐衣足食」，則伴隨這新制度，新辦法而形成的社會經濟條件，就顯然不能與已有者相同，也不能與已有者並立，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

我們且把問題展開來看。

工業化無論是在都市開始，抑是農村開始，那只是關係分佈技術的問題，不會改變它的本質。我們在今日談工業化，和洋務運動時代談工業化，當然，在內容上在涵義上都有許多不同。但如其認定我們今日還談工業化，是由於近一百年來工業不曾成功的結果，或竟是完全失敗的結果，則我們工業與工業建設的口號，就顯然還沒有失去「產業革命」的意義。又，我們近百年來的「產業革命」的流產或失敗如其不能一味向外看，說那是帝國主義不平等條件束縛的結果，同時還得向裏看，認定那是我們不曾把傳統的封建的社會生產關係改革過來的結果（事實上，許多人只看到帝國主義政策加强了我們落後社會關係的保留的一面，而不曾或不肯承認我們自己允許落後關係的保留，以致加强帝國主義政策活動的另一面），則我們今日爲朝野上下强調的工業化或工業建設，就更加具有濃厚的「產業革命」的意義，也就是說，產業革命展開所要求廓清的傳統社會經濟關係，即主要廓清或變革規制着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的社會經濟條件，依舊是，或更應是我們今日的工業化運動，所第一要担當起的任務，我們的工業化運動，無論傾重那個方向或强調那個重點，最根本的最必須

的都要自成就這個任務的途徑做起。我們根據近代各國的一部農業革命史，應當體認此點，我們就根據中國現代化的慘痛教訓，亦應體認此點。

爲了說明較爲鞭闢近裏起見，就假定工業建設在農村進行罷。我們農村社會的廣大農民層，究將以如何的條件，地位，或身分，來參加那種建設呢？要問到這一點，一定要看他們大家相互間，已經是處在爲怎樣的社會經濟條件所規定的地位，和各別具有如何不同的身分。他們是大地主，中小地主，富農，小自耕農，佃農，僱農。如照顧先生所說，叫他們各別拋棄其農村社會地位的畛域，「平等的」以合作方式，形成集體的廣大的工業生產單位，我躭心的並不是地主富農不肯幹，貧農僱農還更不肯幹。目前的事實，正像反乎我們的常識在這樣存在着。因爲照目前的狀況，無論在如何民主的平等的方式下，不但他們參加合作的經濟條件，會影響他們的地位，從而影響到他們的利益；假使他們是兼營合作工業，他們在農業生產領域內的已有的社會地位，還必然會影響他們在工業生產領域將要形成的社會地位。在這種認識下，佔絕大多數的貧農佃農僱農爲了迴避他們在農業領域內已有的不明確的「農奴」身分之外，又附上「工奴」的身分，他們是不能怎麼熱心的。也許合作太理想了。就採行資本制的商品生產罷！但在這種方式下，仍不免要碰到反乎我們常識的事象發生，即在這場合不能熱心參加的，倒反而不是貧農僱農或佃農，他們在隨時預備並期待工業發展起來，貢獻他們的勞動力；可是，有資格，有資力變爲工業經營者的地主，以及兼地主的商業家高利貸業者，他們却就怕要因了廣大的貧農，僱農，佃農的存在，覺得如其他們感到生疏，感到對勞力提供者沒有羈絆把握的工業領場，來利用勞動者的勞力，就甯不如在他們習慣了的

環境下，認定土地是最有效束縛勞動者的手段的農業領域，來利用勞動者的勞力了。如其他們這種成見，受到了高率地租，及與高率地租有密切關聯的高率商業利潤和高利息率的牽涉和鼓舞，那種不易對工業感到興趣的傾向，就會更加表現得明白的。事實上，農村的這種抗拒工業化或產生革命的社會生產關係，並還不僅只從農村社會勢力者不肯或不願參加工業建設的這一單純事實上表現出來。依託在那種社會關係上的一切落後的政治的倫理的乃至其他社會意識上的因素，都將從四方八面來限制工業化運動的展開。

這種明如觀火的事實，這種隨時隨地可以得到印證的事實，為什麼專家學者們竟是如此的加以忽視呢？

在這個問題的解答上，如其說我們的專家學者，沒有注意到現代各國產業革命的史實，那也許是冤枉了，但至少他們沒有明確把握住那種史實的機鍵。

每個現代化了的國家的產業革命的進行，都曾伴以破除其原社會封建關係的土地革命。中國在鴉片戰爭結束後開其端緒的產業革命，或工業建設，也許因為當時外鑠的原因，大過內發的原因，始終就不曾觸到產業革命所要求的農村社會經濟關係的變革。這瞎路，一直摸了近半世紀，到了中山先生把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同時提出來，大家始漸恍然悟到我們現代化工業化不易達到目的的癥結。

現在，洋務運動被進步化為工業建設運動了，大家儘管都倡言依據民生主義原則，而對於構成民生主義之基本部分的土地改革要求，總以為無關重要，或者以為可藉工業化所造成的進步現象，逐漸設法改進。土地改革運動，至少已在大家觀念上，安置在工業化運動後面

了，這種顚倒因果程序的想法，一方面固然由於我們社會在近數十年來一直在內憂外患的動亂中，只要可能避免引起社會風波，大家就以爲無妨迂迴一點，在可能不破壞舊有的社會關係之下，去建設起新的社會關係來；但同時，還得從我們舊有社會經濟的特殊性上得到說明。西歐各國土地改革的主要內容，是解放農奴，確定土地的自由買賣關係，確定合理的土地租佃關係。大體上建立在地主經濟基礎上的中國封建制，較之大體建立在領主經濟基礎上的西歐封建制，對於土地買賣上，對於農奴排制上，一向就表現了較大的自由與寬容。這可以傲然的說是我們封建制下的土地關係的進步性，但正因了這種進步性，把它資本主義經濟的正面衝突冲淡了，緩和了；也因了這種進步性，把它對農民的剝削關係文飾了，從而也把農民改革要求鈍減了。正因了這些事實，使我們專家學者把它給予工業化運動的阻礙小視了。然而，它的進步，並未曾超越出封建社會關係的範疇，也自然不會達到產業革命或工業化所要求的變革程度。中國工業上的坎坷狀況的形成，不僅因爲我們在吃不進步的虧，我們同時還在吃進步的虧；也不僅只爲我們在吃西歐各國資本主義進步的虧，我們同時又還在吃中國封建經濟進步的虧。那種進步性，在農民及土地移動上表現的自由，便掩蔽了由土地所有關係和土地使用關係，農業僱傭關係以及與其密切關聯的借貸關係買賣關係等等所構成的整個不自由不進步不合理的農村社會生產關係的實質。這種種，曾經阻撓着我們的產業革命，現仍在阻撓我們的工業化。

因此，我認爲，依據民生主義來實施任何方式，任何內容的工業化，首先不能不實行民生主義所具體指示的土地改革方案。這才是工業化的眞正起點。

十五　中國工業建設論

一　工業建設的意義

「工業建設」這個術語的含義，看來好像十分明確，用不着加以解釋，但在實際上，許多毋庸解釋的術語，就最容易被濫用，也就最需要加以說明。

從科學的範疇來說，工業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是人類社會勞動的一種作業，一般把它與農業和礦業區別開來。它是以原料（通過勞動濾化的低級生產物）爲勞動對象的一種加工作業。由於加工過程中所使用的勞動工具和方法的不同，通常又區分爲手工業和機械工業兩大類，前者是用手和簡單的勞動工具，生產率較小，故又稱爲小工業；後者是用物理性較複雜的機械爲主要勞動工具，生產率較大，故又稱爲大工業。這兩種形態的工業，雖都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但前者在現代以前老早就有了的，祇有後者是現代社會才出現的。換言之，機械工業是現代社會的產物。所謂「現代社會」也就是以這種機械作業在社會生產結構中佔着最

大比重爲特徵。我們今日所需要建設的工業，就是後面這一種機械工業，因爲前一種手工業在我們的社會，還佔着絕對的優勢，就表識着我們社會還是一個落後的社會，還不够現代化，不够機械化。我們今日所要求的工業建設，就是要求從手工業變爲機械工業。

這種從手工業到機械工業的變革，在外形上由於它所表現於物理性的巨大變化，從而很容易使人把這種變革，意識爲純技術的範疇，這自然是一種錯覺，祇有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上來看，我們才能明白這種變革，是社會發展歷程上必經過的階段。技術物理性所表現的變形，祇是這變革體現在外表上的一面。

此種社會體制發展上的變革過程，在社會科學上名之曰「工業革命」。所謂現代化了的國家，意卽工業革命業已完成。我們國家不够現代化，就是我們還沒有完成這一變革的過程，還正在這變革的過程中。我們今日所要求的「工業建設」，就是要求從主觀的努力來加速完成這一過程，而一般所謂「工業革命」的別稱，就是「產業革命」，從而我們也可以更本質的說：中國工業建設，就是要實現產業革命。不過「建設」這個概念，沒有把「革命」這意思很顯明的表達出來罷了。但進一步來理解，我們仍可看出「革命」是「建設」的另一面，因爲「建設」是產生在破壞的對極，破壞舊的就是「革命」，把舊的破壞以後才有新的建設；換言之：新的建設是要在革命破壞後的廢墟上來進行的，它是以舊的破壞爲出發點，而以自身完成爲終結，有怎樣的破壞，才要求怎樣的建設，後者是前者的產物，前者又是後者的淸道工夫，一般所謂「沒有革命的破壞，就不會有革命的建設」，這話是眞實的。在一間破舊房子存着的同一原基而上，決不能同時又樹立起新的大廈來，必須把原來舊的拆掉才不

致妨礙新工程的進行，由此我們不難明白「革命」與「建設」是互爲條件的，是對立，同時又是統一的，沒有建設的革命，固然是消極的革命，而沒有革命的建設，亦是不眞實的建設，我們數十年來的革命實踐，其所以未能早日實現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設，帝國主義的侵略束縛摧殘固爲其主要原因之一；而我們的革命破壞不够澈底，舊社會殘存的因素太多，從而妨害了新社會建設所需諸般條件的成長，與阻礙了新的建設工作的推行，未嘗不是一個最基本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們的工業建設，還包含着打破落後的傳統的舊社會因素的意思在內，這是應當認清的。

年來國內不少學者專家以及立法者，都忙於戰後工業建設計劃和方案的草擬，這種「未雨綢繆」的打算精神，是値得我們敬仰的。不過，把一個社會體制變革性的建設事業，僅理解爲技術的範疇，而忽視現實社會存在着各種舊因素的妨害作用而不予以全盤革除，那末，我們有理由預斷那種計劃方案，卽使草擬得極其周密堂皇，結果仍難免不成爲一紙具文，數十年來，我們許多有關工業建設上的計劃和方案之不易見諸實施，那都是値得我們今日從工業建設者之檢討和反省的。

二　工業建設的諸前提條件

前面我們說明了工業建設的意義，這裏我們應進而認清工業建設需要些什麼前提條件。

（一）大家容易明白的前提條件：

（1）物的條件——資源或原生產物，機械工具以及工廠設備等。

（2）人的條件——技術人員、技工、以及一般自由勞動者等。

（3）政治的條件——健全的幣制與自主（對外）合理（對內）的稅制等。

（4）社會的條件——如市場、交通、社會信用等。

上面這些前提條件，（1）（2）兩項普通一般人都會明白，無用多加解釋，它們可說是工業建設的本格前提條件。（3）（4）兩項，在具有一般文化水準的人，也都易明白，它們也可以說是保育扶植或促進工業建設發展的重要前提條件，沒有健全的幣制，是不會有健全的財政系統和金融組織的，從而通過政治機構來護植工業發展所採取的各種政策之措施，就不易生效，而自主（對外）合理（對內）的稅制，對於一國工業尤其是幼年期的民族工業的發育，實具有極重要的扶植作用，不少先進的工業國家都曾利用過稅制作為護育工業發展的重要手段，中國近百年來對外關稅自主權的喪失，便利了國際商品的傾銷與資源的掠奪，給我民族工業嚴重打擊的事實，這是衆所周知的。所以對外關稅權的自主，是工業建設不可缺少的前提條件。就對內來說，稅制良好，它可成為調整工業各部門發展的利器。反之，它就會變為束縛工業發展的沉重桎梏，因為稅制不良，關卡林立，無異堵塞物資流通，造成市場供求失調，助長商業資本獨立活動，而繁重的稅額，實為絞殺產業合理利潤的兇器，亦即阻遏社會資本趨流於工業生產領域的障礙，當前產業界對於「虛盈實稅」的一致咀咒指責，甚至藉此關閉廠門，拍賣機器，就是鮮明的實例。

至於社會的條件，如市場、交通、貨幣、信用、資本……等，對於工業建設上的重要性，為更明顯。現代性的工業，它生產出來的生產品的出售和用以生產的諸要素的獲得，無一

不是通過市場來實現的。所以一國商品市場的廣狹，也就規定了它的工業生產規模的大小和發展程度，因爲商品性的生產，是需要通過市場完成其生產行程的，所以居於商品流通過程支配地位的市場條件，便成爲現代生產機構再生產過程能否繼續運行的決定關鍵。而通過市場的交換行爲是要藉貨幣的中介作用來實現的，所以現代性的產業，不僅需要廣大統一的市場，而且需要統一安定的貨幣條件，因爲幣值不統一，在市場領域必體現其狹隘性，而貨幣本身價值不能穩定，勢必惹起物價的劇烈波動，由此生產界就會受到極大的震撼。近年來我們貨幣價值的劇烈變動所給予產業界的嚴重打擊是十分顯著的，因爲幣值的迅速下跌，產業資金經生產行程一度周轉之後，它所售出的產品，雖能獲得貨幣上的名目盈餘；但因人工原料及其他諸生產要素價格的猛漲，生產經營者，已不能由出售得的貨幣額買進與前一次同等規模的生產條件，從而再生產規模必由此而縮小，所以貨幣的統一與其價值的穩定，實爲工業建設的重要前提條件。

其次交通與信用亦爲工業建設上的重要條件，經濟科學告訴了我們：生產事業的擴大和發展，是以它有機構成的資本增進的增殖來實現的，此項增殖的實體「利源」，固非產生於流通過程，但它却是藉流通過程來實現的。生產資本周轉的速度愈快，一定額的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配合消化速度也愈快，從而增殖的「利源」也就相對的愈多，交通與信用就是縮短這流通過程加速生產資本周轉運行的重要因素。如果在一個社會，交通與信用不發達，生產物資的流通與資金的周轉就非常遲緩，從而輒引起生產諸要素供求上的脫節，而常使生產行程停頓，生產規模自難擴大和發展，所以交通與信用在工業建設上的重要，也是十分明顯而

較易理解得到的。

最後，關於資本這一前提條件，對於工業建設上的重要性，那更是一般人最易明白的，大家都認定沒有資本，根本就談不到工業建設，但目前一般人甚至不少專家和經濟學者，都把這個社會的基本前提條件歸屬於技術範疇，以爲從技術上予以措施即可辦到，用不着去改革社會關係，這種看法與想法，要是符合事實的話，那我們社會今日湧集於流通界而獨立活動的商業資本和猖獗於農村的土地資本與高利貸資本，老早已趨流到生產界去了，目前大後方許多工廠紛紛關門的現象，也就不會發生了，這種擺在我們眼前的事實，總不是開玩笑吧？

上面所舉出的前提條件，都是當前論壇界所熱烈討論到了的，這裏也無須用過多的篇幅詳加論究，在我們認爲除了上述這些前提條件之外，還有一個更基本的前提條件，是值得我們進而說明的，把這一個更基本的條件說明了，一般關於工業資金籌措問題，或資本等問題方面所生的誤解，也許多少得到糾正。

（二）大家不易明白的前提條件——合理的土地關係。

「合理的土地關係」這一個工業建設上的基本前提條件，直到現在，還不爲大家所明白而被忽視着，這一方面是由於沒有把工業建設這有關社會體制改革的事業從歷史的視野去考察，一方面也是由於我們社會傳統的土地關係存在着諸種特質，冲淡了人們對它要求變革的意識，但我們如果作較深入的觀察，那就會明白上面所說到的那些前提條件，無一不與這一基本前提條件密切的關聯着。這基本條件未具備的話，我們的工業建設，儘管從技術上去努力，也是很難希望有較大成就的。我們這種預斷，並不是憑空幻想的，而是把經濟科學上已

確立的法則應用來分析現實經濟的結果。

這裏所指「合理的土地關係」，是指着工業化所需要的諸般前提條件，不但不受其妨碍與窒息，且能順應此諸前提條件的要求，使得順利的成長發育的那種土地關係，那也就是現代化的土地關係。現代化的土地關係，它具有以下幾個特徵：（A）租佃關係法律化，（B）地租率不高出一般產業利潤率，（C）在耕作經營上有較大的較自由的使用性。下面我們要就這三個特徵來解說它們與工業建設所需上述諸前提條件，有着怎樣的關聯。

（1）就租佃關係法律化來看，在較狹隘的意義上，法律化了的租佃關係，就是指着土地出租者，不能任意提高地租率和任意撤回租佃權，由是承租者的佃農們，才無所顧慮而樂於改良租耕的土地，而他們改良租耕的土地，才不致成為提高租率的一種獎勵。同時，地主不能在租約規定之一定期間內，任意撤回租佃權，佃農才願意把生活上節省下來的或可能累積起來的資本用於改良土地，因為用於改良土地的資本，是不能在生產一次兩次即可全部收回，那是需要經過較長時期才能收回的。如果租佃關係未法律化，地主可以隨時撤回租佃權，那麼土地經營者投資改良了的土地，一旦被地主撤回租佃權（地主可將這改良了的土地以較高的租率另租於別人），則投在土地改良上尚未收回而凝化在土地上的那一部分資本，就歸地主所有了。在這種場合，土地耕作經營者，誰也不願投資改良土地。

然而這裏還有更深一層的理解，改良土地，增加農產品，增加工業所需原料及生活資料，並由是增加社會財富蓄積，增加工業資金來源，固然是租佃關係法律化的實效，但同時我們應知道：農村的一切社會關係，是以租佃關係為最基本的最有決定性的關係，這種關係能

由法律予以明確化，則因緣此種關係而表現在我們農村的其他不合理的，如買賣的，借貸的諸關係，即高利貸資本與商業資本賴以活動的從種種方面阻礙工業建設的諸關係，都將得到糾正。

（2）就地租率不高於產業利潤率來看，我們知道，在現社會裏的各種資本，都有一種向利潤率較高的場所或部門趨流的法則在作用着。我們社會經濟發展的遲滯和落後，雖然還不够使那種法則很明確的表現出來，但在大體上，如果地租率顯然高於產業利潤率，則社會擁有大量資金的人，也就顯然不會把資金投入產業界，而會用以購買土地。如其所購土地，能增大其社會地位和勢力，同時土地上的其他關係，又允許其利用那種勢力和地位，多方增進其土地收入，那就更會加重資金的這種運動趨勢。而且地租愈高，從事現代式農業經營者固不會出現，而靠租入土地耕種為生者的農民的生活條件必無法改善，農民生活愈惡劣，它們就愈不能有多餘的生產品拋售到市場去，從而也就愈無力向市場買進工業生產出的生活品及農具，而力求自給自足。中國經過近一百年的破壞，而尚頑執的保留到了相當程度的工農結合體，就是在這種事實上得到存在依據的。在這種情形下，商品經濟自不易發展起來，市場貨幣信用交通諸關係，亦相應受到妨阻，地租現代化與工業建設所需諸前提條件的關係，由此可以深知其梗概。

（3）就耕作經營上有較大的較自由的使用性來看，這裏所謂較大的使用，是指着耕作地面積，能在技術上應用科學化的生產工具，能大規模的經營。所謂較自由的使用，是指從事土地生產的勞動者不受其傳統的土地關係所束縛，這一點，關係到了土地的所有問題。我

們目前的土地所有關係上，並存着大土地所有與小土地所有兩種形態，這兩種形態在相互補充着，都以零碎經營或土地碎分爲其相通的特質。因爲土地在使用上被零碎的分割着，它就不但不能應用改良的技術，以節約下過於無效率的勞動力，使勞動者的自由移動，自由適應價値市場受到限制。這種事實，許多學者因爲太看重中國土地自由買賣，農民可能自由離開土地的片面現象而疏忽了，其實社會經濟條件的拘束，比之封建法令（就束縛農奴說）的拘東，是有着同樣的或更大的强制力的。

從上面簡要的分析，可知合理的或現代化的土地關係，實爲工業建設的基本前提條件，具備了這種基本前提條件，其他人的物的因素，才能成爲工業建設條件，而其他政治的社會的諸因素，才能成爲促成那些條件實現的手段。這不是我們空談理論，而是每一現代化了的國家所經驗過來的事實。科學的理論就是從這種歷史發展的事實上抽象出來的一般法則的體系，我們可以進而檢討各國產業革命過程中的土地變革關係。

三　先進各國工業發展與其落後土地關係的改革

現在工業高度發展了的國家，無一不是以土地關係現代化爲其出發點，這裏我們就英、法、德、俄、美、日幾個國家來加以考察：

（1）英國——大家都知道英國是產業革命最早實現的國家，也是工業發展進行得最順利的國家，其所以致此的原因，落後土地關係迅速的變革，實有決定的作用。原來英國的封建制度，是由諾曼的征服者威廉於十一世紀建立起來的。作爲其基礎的莊園組織，在一三四

八年發端的黑死病災變以後，便因勞動力的突然急速減退，而引起勞動荒，一三八七年的有名的農民暴動，可以說是黑死病鬆弛莊園組織的結果。那次暴動雖被鎮壓下去了，土地所有者爲了顧全自己的利益，都需要對隸農採取妥協的態度，於是自由租佃者與自由工資勞動者逐漸增加了。這對於英國此後產業的發展，在資本蓄積上，在商品市場的拓展上，乃至在勞動力的提供上，算是出盡了準備的作用。而英國產業革命正式開始前六十年間（一七〇〇——一七六〇年）展開的所謂圈地運動，即主要把耕地變爲牧場的圈地運動，雖然用血與淚寫下了「羊吃人」的故事，但英國向世界進出的毛織品工業，卻是通過這種故事所由編成的事實中成長起來的。不過，毛織品的原料，毛織品工業上的勞動者，雖由此得到了供給，卻並不會阻止一般農業的衰落，爲了挽救這種缺陷，英國就在它已經確立其「世界工廠」的優勢當中，迄未忽視其對於農業上的諸般努力。十九世紀下半期爲了便利改良土地，爲了扶植自耕農所通過的許多有關土地的法案，都說明一個能靠殖民地生存的工業國家 亦不能忽略它在國內農村方面的合理化。英國的殖民帝國的膨大，很容易使我們錯認它的工業優先發展，不是由於農村落後社會關係的前提改進，但事實上，它的產業現代化過程，一直是把它的農村關係的不絕改造作爲基礎。

（2）法國——法國產業革命是僅落後於英國而早於其他諸資本主義國家的。在十七世紀後期路易十四朝重用高爾貝積極從事工業建設，一方面竭力增補技術人材，一方面爲着原料及工人食糧的充裕，對於農業的獎勵，亦不遺餘力，所以後人均視高氏爲法國大工業建設的首創人，然而高氏的努力，雖不能說對於法國後來產業革命全無推動貢獻，但因高氏的經

濟努力重點，是放在商業上，是在商業的要求上，注意到農業，所以關於農業上的設施，都只在表象上用獎勵的方式，圖廉價原料品與食品的增加，迄未觸到農村社會的生產關係，由他輔政直到大革命前夕的一百二十餘年間，法國的工業非特未能蓬勃的發展；而且愈向前建設，愈顯得矛盾百出，不易走通，終不免發生「巴士底獄」壯烈的一幕偉大史劇。原來法國農民對於領主的從屬關係，就在十八世紀初，依然頑執的存在着。農村的特權階級，爲貴族，僧侶及布爾喬亞層，他們在當時佔有的土地，雖僅及全土地面積的二分之一，其他二分之一，則屬於農民，但農民是沒有完全的所有權的，是要負担領主稅的。每一個農民所保有的土地，都窄狹到不够維持一家的生存，因此不能不兼作佃農或分租佃農，而這種分租佃農的境況，比之普通佃農還要悲慘。像這樣的小農貧農經濟，在重商主義政策所受到的水利及其他技術方面的獎勵，決不能補償他們由此獎勵在種植品種，使用農具，栽培方法及買賣價格等等方面所受到的不便。同時，由獎勵農業及工商業上所增大的國庫支出，又須取償於農民。而爲了對無力負担的加強加深搾取的包徵稅制，更促使可能殘留在農村的直接生產者的生產條件，日趨惡劣，終至演成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悲劇。但自大革命澈底掃除了舊社會的封建關係之後，其間雖有相當期間經[illegible]過拿破崙的政治紛擾，一旦由維也納會議進於安定局面，法國就得藉着一八二五年英國機械輸出的解禁，而迅速走上產業革命的坦途，由此可見封建土地關係的改革與舊社會因素的掃除，對於工業建設的發展，該是如何的密切關聯着。

（3）德國——德國現代經濟體制的建立，亦即工業革命的完成，比西歐其他國家都來得遲緩，此中原因，主要的是由於德國社會封建關係的廢止，較爲遲緩，當英國已完成第

一期的產業革命時，德國才開始走上工業化途徑，讀過德國歷史的人都會知道：一八〇七年普魯士首相斯太因發佈的農奴解放令，雖然撤廢了選擇職業的限制和打破了世襲農的關係，但這祇是順應歷史發展的一種極消極的措施，而一八一一年哈登堡的立法且被封建領主們的反對而流產，一八一六年的解放「宣言」，仍未把大多數的農奴解放出來，「宣言」所給予保護的農民，僅限於保有足够養活自己的土地的一小部分，大多數的農民仍被遺落在大土地所有者的權力下。但一八二一年七月所頒佈的法律（共有地分割法和義務解除法），對於德國產業發展前提條件的孕育，是發生了極大的影響的。

（4）俄國——俄國遠在彼德大帝時代就積極開始工業建設，可是在當時俄羅斯農奴的經濟基礎上，他那「移花接木」的作法，終於失敗了。一七二一年發佈的有名的「彼得飭令」，儘管用強制手段把大批農奴驅進工場，實施強役勞動，但結果不獨未能使工業發達起來，反而導來此後一連串的農民暴動，而克里米亞之戰，更無情的暴露了農奴制度的俄羅斯之脆弱和無力，終有一八六一年「農奴解放」飭令的頒佈。但這種由上發動的農奴解放措施，並未把俄羅斯封建的土地關係全盤的變更過來，祇是「從一方的窗中追了出去，從他方的窗中走轉進來」而已。自然哪，這一改革是助長了俄羅斯資本主義體制的形成和發達，導來了較大規模的工業相繼設立，但它是以殘存的農奴制度爲勞役土壤，使自己聳立在它上面，這就構成它那半封建的資本主義體制，此後俄羅斯的社會生活便變成「中世紀的野蠻加上近代的苛刻」的生活，一般生產者的大衆肩上，不但負着舊來之封建的農奴的搾取，且要擔着資本主義剝削的重担。這個內在矛盾的發達，一方面把她推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道途；同時也

就導來了國內革命怒潮的激盪。被稱爲「絞首台」的斯托利平的鎮壓和改革的措施，終未能迴抑這革命洪流的氾濫。反加速了「十月革命」這幕劃時代的史劇的提早演出。而近二十餘年來蘇聯建設的驚人成就，也祇有從它社會經濟結構全盤澈底的改革上去考察，我們才得到科學的理解。

（5）美國——美國產業發達的速度和達到的高度，在今日資本主義各國中，是首屈一指的，它之所以能那樣迅速的發展起來，主要原因，就是由於它沒有受到傳統的封建因素所束縛，在自由的土地關係上很自然的蓬勃發達起來的。在產業化初期，廣大的農民或農業經營者，他們並未負担過對主人——土地所有者——的義務及供應的負担。獨立戰爭結束後，美國便開始了自己嶄新的社會經濟體制的建立。一八〇六年輸出禁止令的實施，也就決定了美國工業上殖民地時代的終結，打開了國民的組織的工業發展的端緒。但在南北戰爭之前，美國的南部與北部的經濟發展，却呈現出極大的區別，南部資本的發達是遠落在北部之後的：北部現代化經濟的所以較南部發展得快，主要原因，就是北部沒有大部奴隸勞動存在，在自由土地的耕作經營上所蓄積起來的資本，很快的移用到工業和交通建設部門，由是工商業得順利的發展。至南部墾植家們從事墾植所使用的勞動者，都是從非洲販賣運來的黑奴，在勞動組織上還是一種落後的奴隸制度，從而限制了資本的活動與發展，南部這種落後社會因素的存在，對於北部經濟的發展，也自然起着很大的牽制影響，所以在南北戰爭以前，美國的主要工業，還是以消費產業部門爲主，至於純製造工業還是南北戰爭奴隸勞動制度廢除後，才有大規模的發展。從這裏我們已不難看出落後的社會因素，是如何的會妨礙着工業的現

代化了。

（6）日本——日本在幕末開港之前已開始提倡工業建設，但由於傳統的落後的諸社會因素的存在，始終未能發展起來。直到明治六年（一八七四年）實施「地租改正」後，日本才真正走上產業革命的道路。雖然這革命，並未把日本社會舊的封建體制全般改變過來，但租稅體系却法律化了。地主從土地上蓄積起來的資本，其他企業部門易於吸收，故結成了日本半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特質。同時這一改革，雖然並未減輕農民的負担，然而對日本初期政府經營的軍需工業的發展，却起了很大的協助作用。因為它充裕了政府財政的收入，從而政府能支出較大額的軍需工業建設費用。這種軍需工業的發展，也就加速了日本走上帝國主義的侵略途徑。因為「地租改正」並未將日本生產大衆的生活條件改善，從而無法提高一般農民的生產力；工業建設上所需原料食糧，在國內自然無法充分自給，工業的生產品，也就無法在國內獲得市場，從而對外掠奪原料與爭佔市場，就成為日本半封建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唯一出路。中日、日俄兩次戰爭，就是日本這種社會體制內在矛盾的發展所促成。這兩次戰爭的勝利，不獨使她獲得了大宗賠款，補充她資本蓄積的貧血病症；而且奪得了國外廣大市場與原料供給地。日本之所以能在保存着極濃厚的封建因素下繼續其工業發展，就是依存於這國外市場原料的佔有掠奪和國內人民尤其是生產大衆的低度物質生活水準所提供的低廉勞動力這一基礎上。明白了這點，我們才不為「日本保留了極大的封建因素而能使工業發展」這一事實所迷惑。

四　中國工業建設所受傳統的土地關係之妨害與挫折

由上述各國產業革命過程中之經驗，使我們曉然於中國近一世紀來在工業上之努力，該在那些方面。看到了傳統的土地關係的妨阻。在目前「工業建設」聲中，提論到這點，那也許比翻看人家的歷史，還要親切有味得多。但爲了篇幅的限制，僅能概略的就以次諸方面來說明我們傳統土地關係直接間接加在工業建設上的不利影響。

第一、我們傳統的封建土地關係，大有助於傳統的商業資本的買辦化：中國的商業資本，在春秋戰國時代就發展起來了，可是它隨着地主經濟的形成，就脫出了它正常發展的軌道，而導演着促成王朝盛衰循環更迭的要角。中國歷史上每一個王朝的興起，商業資本便在統一局面下蓬勃的發展起來，由於商業資本的活躍，輒招致抑商政策的實行。結局，商業資本乃被迫轉入土地買賣的漩渦，而加速造成土地兼併與集中，造成農民大批的離村和社會秩序的擾亂，王朝以是覆亡了，「牛死虱死」的商業資本，亦相應歸於沒落。降及清代，由太平天國所標識的革命運動，已顯示了商業資本在較長期安定局面下所滋長起來的力量，又在加速促成農村土地集中和農民大離散。這次革命運動，雖然滿清政府借用外力壓平下去了，但却並未把傳統的土地關係予以改革。結局，剛在太平天國大亂結束後就開始進行的洋務運動，工業建設運動，就在各方面受到阻擾。而其間對那種運動具有決定打擊作用的，大體要數到傳統商業資本之逐漸變質爲買辦商業資本。本來，中國傳統的商業資本，是以它對於地權的聯繫爲特徵的，而買辦的商業資本，則是以它對國外貿易的聯繫爲特徵的。從表面上看，

對地權的聯繫和對國外貿易的聯繫，是正相背離的。但一透視到內部的關係，就知道落後的封建性的土地關係的存在，不僅是傳統商業的基礎；且是買辦商業的基礎。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傳統商業始能變形爲買辦商業。不過，在買辦商業資本作用中，不但舊的生產組織被分解，就是舊的生產機能亦被斲喪。

第二、傳統的土地關係助長了國際資本對中國金融業與貨幣可能發揮扶植民族工業之機能的窒息：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中國社會秩序已經常陷於紊亂動盪的不安狀態中，這種不安狀態，必然會促使社會上依高率地租高利貸及商業上蓄積起來的資金，或依其他經濟外的原始蓄積方式搜括的橫財，在尋覓安全保障的要求下，大量流入外人勢力所在地的大都市中，流入外人的金融機關中。這一來，不絕需要資金周轉潤澤的工業建設，就不但不容易從國內的原始蓄積受到挹注，反而因此造成了農村資金的枯竭，造成了高利貸，以及與高利貸結合的商業資本的猖獗的活動。結局，中國的舊式金融業不必說，就是新式的銀行資本，即在若干場合，也受到了前述農村不安狀態之「惠澤」而發育起來的新式銀行資本，也因一般農村狀況，有利於獨立的商業資本活動，不利於工業生產，而把它的性質，完全歪曲爲商業性財政性的東西，在這種情形下，儘管貨幣金融是工業發展的必要前提，是使社會資金能順利的有效的轉化爲工業資本的機鍵，却反而通過農村的落後關係，以及用那種落後關係所形成的諸般弊象，竟變成了脫殺工業的可怕勢力了。設我們由此進一步推論到外人利用我原始蓄積，以發展外商企業，使我民族企業多方遭受競爭壓力，其有害影響，就更加彰明較著了。

第三、傳統的土地關係妨礙了中國工業所需技術上的採用，這一點也是非常顯著的。

中國社會勞動力變態過剩的存在，主要是由於中國傳統的土地關係所造成，這是無庸再說的。這種變態的過剩勞動力，正是中國勞動者低廉工資的主因，也就是阻礙着中國社會小商品生產的手工製造業轉化爲機械工業的重要原因之一。上述社會資金的濫用與浪費，是中國工業資金缺乏的明顯事實。在資金不易獲得同時又不易獲得勞動力的諸般限制下，企業者定然樂意利用隨在可以找到，又可任意榨取的活的生產工具的勞動力，而不願去購置機器。購置機器，不僅一次需要籌集一定額的較大量的資金；而且這較大量的資金額一度轉化爲固定資本，就要體現出運用上的硬化性，不易隨時隨意的轉作其他用途。一旦生產行程上所需諸生產因素發生脫節現象，或者在外資外貨交相煎逼情形下，經常遭遇到周轉不靈現象，這些機器就可能被閒置下來，而失去其資本的機能。如果他將購機器的資本改用於僱用低廉的勞動力，那是有較大較便的運用伸縮性的。勞動者是可以隨時任意僱傭的，勞動力是可以零碎購買的。正由於此種原因，所以在正常產業化的社會，一般是機器驅逐勞動，而在我們社會，卻體現出勞動驅逐機器的反常現象。從這裏，我們又可看出中國手工業製造業之所以不易轉進爲機械工業，傳統土地關係所造成的變態的過剩的勞動力的存在，確在起着莫大的作用了。

第四、傳統的土地關係妨害了中國社會資本的蓄積和其向工業資本的轉化：在中國地主經濟制下，作爲一切原始蓄積的最後來源的社會直接生活者的剩餘勞動，無疑是有着較大的榨取深度與容度的，但這並不一定有利於中國社會資本的蓄積，這是地主經濟結構中的諸特質規定了的。這裏我們沒有較多的篇幅來從長說明此點，祇能扼要的指出其中癥結所在：（A）資本的累積是以社會再生產不斷的擴大來實現，再生產的擴大是以生產諸條件不斷的改

進爲前提，這在層層剝削下的中國農村的直接生產者是無法辦到的。（B）地主高利貸業者及商人，在社會總剩餘價值的分割上，雖然他們個別獲得了較大的分額，但他們由此取得的「利源」，往往是由取得的舊道路再分散轉去。換言之，地主、商人、高利貸者的所得，總是再使用於土地購買，高利貸放款和商業活動上去，很少改用於生產部門上去，這種資本的運用，雖然在社會關係上再體現出租佃或債權與債務的關係；但就整個社會立場上來看，並不能增殖社會資本，而且（C）一個社會的資本，被用於非生產界愈多，則生產界可能吸收到的資本也就相對的愈少。中國社會一般出賣土地或借債者，多半並非用來改良自己的生產條件，而是用來維持最低度的物質生活，所以社會總再生產行程是無法擴大起來的，從而巨量的社會資本蓄積也就不易實現，高率地租，高率商業利潤，高利貸一方面在阻止着社會資本向產業上運用，同時也因爲它們在連同戕殺生產事業，因而也就不能造出大量可供產業運用的資金。這問題，同上述諸點關聯起來，將更加顯示其嚴重性。目前許多人都爲這問題絞腦汁，這裏是毋庸辭費了。

上述諸點，係就傳統土地關係直接間接妨阻工業建設的最基本事實，簡單予以指證，在實際，它們的作用和影響，不但是相互關聯着，並且在現實上是表現得更豐富或者更形嚴重的。

五　當前工業建設的幾個主要論點

關於中國工業建設的討論，早已成爲論壇上的主要課題，寶貴的意見，是層見叠出的，

但大家似乎都是在不同的程度上，把問題的考察，集注在它的技術面，而忽視了它更基本的社會面了。現在且就時下關於工業建設討論得最熱烈的幾個代表意見，略予分釋：

（一）重工業與輕工業的重心問題——即工業建設部門的重心問題。這有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是認爲當前工業建設的重心，應置於重工業部門，理由是我們急待建立現代性的國防。現代性的國防，是建基在重工業上的，沒有重工業，就根本談不到國防，沒有國防，我們民族工業的建設，也就失去了保障，勢必遭受外力的打擊。故欲工業化成功，就不能不以重工業爲主。另一種相反的意見是認爲今後工業建設不應再蹈過去的覆轍，應循工業本身發展的一定程序。產業革命是首先發生於輕工業部門，輕工業發達了，對外貿易才能擴張起來，英國工業革命之所以能順利發展，就是按合這個程序進行的。中國過去工業建設之失敗，就是由於一開始就從軍用工業着手，顛倒了工業本身發展的程序所致。

這種討論，在我們看來，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因爲先進工業化了的國家，有的確是由輕工業部門開始的，英國是典型的代表。但亦有從重工業開始建設而實現工業化了的。社會主義的蘇聯第一次五年計劃是以重工業爲重心而開始的，第二次五年計劃才把輕工業提升到與重工業並重的地位。而日本在開始工業建設當時，差不多與中國採取相同的辦法，也是從軍需工業開始。由此可知部門上的秩序，並不是决定工業建設成敗的要鍵。英國是工業化最早的國家，在她工業開始時，並無其他國家已有大量機械和技術人材給她利用，她之所以由輕工業開始，是她的時代環境社會條件促成的，是很自然的發展起來的。但蘇聯日本從重工業建設開始亦獲成果，就是由於它們的社會，具備了可以利用別人現成的技術條件，故能實現

。若果自己社會沒有具備利用別人現成技術條件的社會諸前提條件，任你從輕工業部門或重工業部門開始，都會無法收效，數十年來我們在重工業輕工業上都曾努力嘗試過，但結果是一無所成，這不是最好的證驗麼？

（二）國營工業與民營工業的重心問題——這個問題年來是被人討論得最熱烈，歸納起來，也有相對立的兩種意見；一種意見是認定要使中國不走上資本主義的途徑，在工業建設上，就應遵照 國父中山先生的遺訓，節制私人資本，利用大規模的國營事業來發達國家資本，以免重蹈資本主義的罪惡覆轍。另一種意見是主張當前工業建設，應以民營爲重心。理由是今日中國並不是私人資本已高度發展了的國家，不獨用不着馬上節制私人資本；而且正宜利用私人企業心較强的特點來獎勵私人資本的蓄積，藉以奠定工業基礎。因爲私人經營的企業，在自利心刺激下，是較國營企業容易發展起來的，而我們當前的政治條件，也不適宜於國營事業的創辦，所以今日中國工業建設，不僅要利用已有的私人企業基礎使之擴張；而且應多方獎勵私人企業的經營，俾存留在私人手裏的資金轉化爲產業資本，藉以減殺當前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以及土地資本的猖獗。

這兩種主張，在我們看來，並不是當前我們工業建設上的最基本問題，或者說，這只是民生主義已經確定了的用不着我們斷斷置辯的原則問題。事實上，一國工業的發展，是受它的社會諸條件規定了的，若果一個國家工業建設所需諸前提條件沒有具備，公營私營都是沒有希望的，數十年來我們公私經營的企業所受到的挫折，已够證驗了，同時，一個國家社會體制的性質，也不是某些工業部門由國家經營就能決定的。如果一個社會的物質基礎結構和

政治性質，未脫出資本主義的範疇，即使工業上某些部門爲國家直接經營，它累積起來的資本，還是會轉爲私人資本而無法妨止的。當前我們有些國營企業，在外形上似乎是國家資本，但骨子裏它何嘗具有國家資本的屬性？充其量也不過是私人資本的變相經營形態罷了。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一種企業的經營，在私人資本支配下可以發展，在國家資本支配下，也可以發展。而在落後的社會，阻礙私人資本蓄積的諸社會因素未予剷除，同樣可阻礙國家資本的蓄積。所以僅從企業本身經營上某些部門去控制私人資本，不獨不易生效，而且在目前似乎也不太關重要。

（三）都市工業建設與農村工業化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是當前被人討論得最熱鬧的，大家的論點都集注在都市工業建設同時不能忽略農村工業化，因爲農村不工業化，農業生產力就無法提高，從而都市工業建設上所需糧食和原料，就會得不到充分的供給，勢必影響都市工業建設的進行。因此，今後工業建設，必須配合農村工業化才有前途。

這論點，在原則上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但問題並不在農村需不需要工業化，而是在如何才能使農村實現工業化的關鍵上。要使中國農村工業化實現，那就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了，如果現存的土地關係不予改革，在現存的零碎土地小經營上，機械技術固無法使用；即使有勉強可使用機械耕作的土地存在，也是不會有人去採用的。前面我們已再三說了，在現存的農村社會關係下，一般直接担任生產者的農民的生產條件是無法改進的，這些貧困的農民誰有資力購買新式耕具？而一般地主富農，在高額地租的引誘下，購買土地坐收地租，較之從事大農業經營，不獨利得豐厚，而且清閒安逸得多，從而地主富農誰又願購備機器自己出馬

去大規模經營？就農業企業家來說，地租高，農業上的利潤就相對的低，與其把資本投入低額利潤的農業經營，就不如去購買地皮，坐收高額地租，利得既厚，又可避免經營上的麻煩和市場天災等的損害。由此我們也不難明白在現存的土地關係下，單從純技術一面去努力，要把中國農村工業化起來，也未免理想得太過分了。

經濟科學已告訴了我們，在一個工業正常發展的社會，都市工業發展與農村工業化，是很自然會配合起來的，封建土地關係解除，農工結合體分解，從土地上游離出來的農民，很自由的湧進都市工廠，這一方面提供了工業上所需要的勞動力，一方面又是工業生產品的市場購買者。而在農村中土地關係現代化的條件下，從事農業經營者，利潤既有保障，自然很易擴大經營，採用新式技術，提高農業生產力，使工業上所需原料與食糧，得到供給。

總之，上述這些論點，即使是工業建設當中需要注意的問題，但比起我們開始工業化所須嚴肅正視到的最基本問題來，對於它們的斷斷辯論，就似乎顯得有些枝節煩瑣，有些把問題片面化，技術化了。

六　總括的說明

上面我們已把工業建設的意義，它所需的諸前提條件和先進各國工業化經歷過來的史實，中國工業建設所受挫折的原因與當前討論這問題的幾個主要論點，作了簡略的探究分析與說明，這裏再總括為以次的結論：

（一）一個落後國家的工業建設過程，也就是產業革命的過程，它是歷史發展必通過的

階段，它是在舊社會破壞的廢墟上來進行的。舊的社會因素不予革除，新的建設工程就會隨在遭受阻撓而無法順利展開。

（二）現代化的工業建設，不是一個純技術的範疇，而是一個社會體制改造的問題。技術性的條件，祇有在一定的社會性的諸條件具備下，才能有效的利用起來。缺乏一定的社會諸前提條件卽使獲得某些技術條件，亦不易收到工業建設上的成效，祇有社會性的諸條件與技術性的條件配合起來，工業建設才能順暢的發展下去。

（三）技術性的諸條件，不論是屬於物的，抑是屬於人的，都不難由別的先進國家移植來。社會性的條件，却須在自己社會關係的改革中，才能實現。

（四）爭取民族獨立自由澈底解放，收回一切主權領土，才有我們工業建設發達上的重要保證條件，而傳統的落後的舊社會諸因素的革除，尤其是合理的土地關係的建立，實爲我們工業建設首應實施的重要清道工作，我們應把這種工作作爲我們工業建設的出發點。一般人動輙強調民生主義，但當他們談論到工業建設時，却像極其自然把民生主義中的土地國策漠然置之了。這簡可說是非常意外的。

（五）一個關係整個社會改革的問題的解決，在作爲解決問題手段的政策之確立上，固須有科學的理論作爲指標，而負責推行的人，對於其所進行的艱鉅任務，尤須具有社會科學的認識。否則，在實踐的過程上一遇到困難，就難免不因此發生疑慮，由疑慮而表示退縮，而改變念頭。因此，我們認爲提高國人對於這一建設偉業之科學性的理解，確係當前比實踐還値得重視的急務，這是我們今日從事中國經濟解放的理論的研究者，所當勇敢的積極的負

荷起來的責任。

十六　論技術在生產建設上的地位

一　技術與生產建設的意義

要從事生產，技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國內論壇上，不，就在生產建設的實踐上，多年以來，甚至可以說數十年以來，無形中存在着兩個對立的意見：其一是認定從事生產建設，只須從國外輸進新的技術就行；又其一是認定從事生產建設，一定要排除生產建設的社會的障礙，社會的障礙不予掃除，新的技術也無法施展。前一個意見，可以說是技術改革派的意見，他們認為，在生產建設之始，用不着或可以不必攪動原有的社會秩序，等到建設從各方面擴展開來，原有的社會秩序，自然而然會為一種新技術造成的新社會秩序所代替，由李鴻章到張之洞這一輩子的變法圖强論者，始終都抱定這種主見，他們留給我們的建設「陳蹟」差不多都是在這種主見下進行的。也許說，主張「西學為用，中學為體」的張之洞一流人物，他們只漠然感知到富强國家的輪廓，根本未意識到什麼新的社

會秩序。但晚近大大小小的許多新的張之洞，對此恐亦沒有高明多少的理解。至前述後一個意見，可以說是社會改革派的意見。他們認爲要使生產建設很順利的進行，至少是不能不預先造出新技術應用所要求的社會條件的。 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在骨子裏就包涵有這種基本的概念：他無疑是接受了中國半世紀以上的變法圖强失敗的教訓，同時也明確認知了世界各先進國家現代化成功的必由途徑。然而，就在大家認定民生主義已越過宣揚階段，而達到當作國策來施行的實踐階段的今日，所謂技術派的意見，不僅支配着經濟學界，還更有力的支配着經濟界，這實可說是非常意外的。

如其說惰性可以助長愚昧，對事理的認識不清，又會無端加强惰性，則技術在生產建設上，究竟佔有怎樣的重要地位，它能否在任何社會條件下發揮它的作用，那是需要從長研究的。

一般的講，技術有廣狹不同的兩種意義：廣義的技術，通常被解作處理事物所用的方法。而狹義的技術，則是指着經濟活動時，在生產過程或勞動過程上，由勞動力方面表現的技能，和由生產手段，特別是勞動工具方面表現的技巧之綜合。在勞動必須藉着勞動工具始能發揮，同時，勞動工具方面的技巧，又必須藉勞動力始能體現的限內，這種狹義的經濟意義上的技術，就很可說是人類在生產過程上或勞動過程上，使用生產手段，特別是使用勞動的方法。如其說，經濟科學嚴格意義的所謂生產方法，是指着勞動工具的結合方式，而在其中包含有人對人與人對物的兩重關係，那麼，技術就可說是指着那種結合方式上的人對物的這一方面的關係。

生產建設是經濟範圍內的事，生產建設的進行，誠然有需要藉助於廣義技術的地方，但

一般人模糊意識中的技術，尤其是前述技術派或技術改革派意想中的技術，却顯然是指着狹義的經濟意義上的技術。

技術的概念明白了。技術在生產建設上的地位，就似乎由它的本質和功能完全確定了，表現爲一自明的事理。但問題其所以這樣被提出，就因爲我們這裏所謂生產建設，具有遠較其字面表現爲深刻的特殊涵義。

中國經濟論壇上當作宣揚目標來使用的「生產建設」一語，有時被擴大其稱謂爲「國民經濟建設」，有時又被縮小其稱謂爲「工業建設」，但三者所指，只有範圍廣狹之不同，其究極涵義則一。我曾在其他場合（參看中國工業建設論）就「工業建設」這個有號召性的語辭，加以明確的分析。那曾指明，從科學的範疇來說，工業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是人類社會勞動的一種作業。它是以原料（通過勞動濾化的低級生產物）爲勞動對象的一種加工作業。由於加工過程中所使用的勞動工具和方法不同，通常又區分爲手工業和機械工業兩大類，前者是用手和簡單的勞動工具，生產率較小，故又稱爲小工業；後者是用物理性較複雜的機械爲主要勞動工具，生產率大，故又稱爲大工業。這兩種形態的工業，雖都是歷史發達的產物，但前者是在現代以前老早就有了的，祇有後者是現代社會才出現的。換言之，機械工業是現代社會的產物。所謂現代社會，也就是以這種機械作業在社會生產機構中佔着最大比重爲特徵。我們今日所需要建設的工業，就是後面這一種機械工業。因爲前一種工業在我們的社會，還佔絕對的優勢，就表面看，我們的社會，還是一個落後的社會，還不够現代化，不够

機械化，我們今日所要求的工業建設，就是要從手工業變爲機械工業。這種由手工業到機械工業的變革過程，即一般所謂「工業革命」或「產業革命」。所以，我們這裏當作問題提論到的「生產建設」，實即以工業爲中心，但却包括了農業及其他生產作業之全盤改造的產業革命。

二 技術變革的重要性問題

論到這裏，我們已可明確認知問題的重心所在了。討論技術在生產建設上的地位，不是懷疑或低估技術在生產上的重要性，而是要究明：對於我們這種有產業革命涵義的生產建設，是否單靠技術上的努力可以成就？是否一切社會傳統原封不動，新的技術仍可展開，約言之，即在我們的生產建設上，究是技術變革重要，抑是技術變革所需要的前提條件——社會變革重要？

這樣來理解問題，也許還有一個障礙。就是有的人唐吉訶德式的不肯承認中國的生產建設，還具有產業革命的性質；爲了在觀念上使自己現代化，或使自己不過於落後，簡直頑强認定中國的產業革命階段已經過去了。但如何想得使自己冠冕堂皇一點，儘管是誰都有的自由，若避開名詞來講事實，任何人都不能也許都不會否認中國的生產建設，原意就在使大工業代替手工業，使大農經營代替小農經營，概言之，即使用機械工作的產業，代替用手工作的產業。

可是，就在這種「避名務實」的精神上，又從反面引起一個錯覺；由於他們過於「形下

的」把握着由用手工生產轉移到用機械生產，在外形上表現的物理性的巨大變革，遂不期然的把這種變革，直觀的意識爲純技術的範疇，而將技術因以取得存在，因以發生作用，表現功能的社會條件置諸腦後了。

我們將從這裏進一步展開問題研究的序幕。

首先，我們承認，在簡單勞動工具受勞動者支配的過去社會，勞動是技術的基礎；而在勞動者受支配於複雜勞動工具的現代社會，機械才是技術的基礎。如其說，現代社會是以產業革命爲始點，則產業革命就是以機械的採用爲始點。在這種認識下，我們似乎應當而且必須把我們生產建設的努力重點，放在技術上，從而，放在機械的採用上。

其次，我們又得承認，現代的機械，像是能自行擴大其作用範圍，或自圖發展的怪物。一種產業部門採用機械，特別是與它相關聯的產業，就不能不迫而被强制的採用機械。比如，機械紡織業，一定使機械織布業，成爲必要。而這兩者合起來，又使漂白業，印花業，染色業．有發生機械化學革命的必要。同樣，棉花紡織業機械上的革命，又喚起彈棉機的發明和採用。各種輕工業相互連滯的機械化，製造機械的重工業遂不能不相應產生。農業上的生產方法，在工業生產方法變革的過程中，已經由機械的應用而開始了。而原先以小農業及家內工業，乃至都市手工業爲樞紐的社會，其交通運輸工具，絕不够供應這種新生產作業場面的諸般要求，於是河川海洋的輪船、鐵路、乃至電報等新機械交通工具，就被喚起來與工農生產領域的機械化生產規模相配合。

機械就這樣像是離開人類意志而獨自開闢出它的新天地來。一切現代國家彷彿通是這樣

完成它們現代化的大業似的。

然而中國自李鴻章開始採用機械，建立現代機械工業以來，距今快滿一個世紀了，機械生產作業規模，仍舊是留在極不足齒數的可憐狀態。所以致此的原因或責任，我們一向都自然的歸罪於東西較先進國家從多方面加於我們的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但如進一步問：許多先進國家在其現代化大業開始時，亦曾受到其他更先進國家的妨礙與束縛，則我們對於自己機械化前途的黯淡，似須坦白承認，我們在自己產業革命事業的開端，就未免犯了表象主義的「唯物的」毛病，那就是太看重機械的自發作用，和過於相信技術決定一切。

事實上，機械的採用，雖是現代產業革命的起點，但機械之所以採用，所以能採用，還更有它的起點，即有它的社會的前提條件。我們只是膚淺的觀察到各先進國家機械化生產事業擴展的過程，而不會透視到伴隨那個過程，或者更確切的說，先行於那個過程的，還有整個社會變革的過程在。

我曾在前面明白指出，技術是人類在生產過程中，由勞動力使用勞動工具所表現的方法。這樣一個簡單命題，就已夠暗示我們：無論是技術，抑是作爲技術基礎的機械，都是一種社會的存在，都是在一定社會關係下取得其存在的。

在勞動過程上，勞動工具的使用者即直接勞動者，雖然顯得他們是機械的侍僕，他們的工作程序，工作進度，甚至工作效率，隨在皆受着機械性能的拘束和限制，但一走出工作場所，回到社會視野來，機械畢竟是由人們所造成，所使用的。一切歷史時代的生產作業，誠然都是由勞動力所有者或勞動者，以一定的勞動工具，加工於勞動對象之上，而由是顯示出

一定水準的生產技術來；但勞動工具每經一度變革，不僅勞動者對於其使用勞動工具的技術關係改變，同時還連帶着使勞動者使用勞動工具的社會關係改變。在以前的社會，小農或獨立手工業者應用簡單勞動工具所表現的技術，差不多主要是由他們的勞動性質或勞動技能所決定，而現代自由勞動者應用機械所表現的技術，則差不多主要是由機械的性能或技巧所決定。這中間穿插着一個微妙的社會關係。就是前者的勞動工具，是屬於勞動者自己所有，勞動生產或勞動報酬，可因其技術的效率增進而增加；後者的勞動工具，是屬於直接生產者以外的資本家所有，勞動生產物便是屬於資本家，從而，資本家要想增大其所得或報酬，就比較不易期之於「利不關己」的勞動者的技能，只好期之於自己可以任意改良的勞動工具或機械的技巧方面了。

在這裏，我的意思不是要解析增進技術的機能，永遠是操持在利於技術改進者手中的「社會造化」，而是要說明，使用勞動工具的方法有所改變，即人對物的技術有所改變，在這同時，或在這以前，對於勞動工具，勞動生產物的所有分配關係，即人對人的社會關係，亦卽在生產領域看出的社會生產關係，亦必然改變。

如其一個國家或者我們在生產建設上或產業革命上的努力，只着重在機械上或技術條件上，而忽視了與它配合適應的社會生產關係的變革，那將從許多方面證示那種努力之沒有效果。

不顧社會生產關係，單在技術上用工夫的最大可能阻礙，可以從物與人兩方面分別予以說明。

先就物的方面講：

作爲技術之基礎來看的機械，它是從何而來呢？常識可以很輕易的回答我們：一國如其不能在國內生產出來，它將由國外購運進來。最先進國的英國，它的機械是在相當長期內，自己發明製造出來，而次於英國的其他先進諸國，開始多半是藉助於輸入。法國在這方面提供了極明顯的例證。法國產業革命眞正的開始期，是一八二五年，因爲這一年，是大不列顛聯合王國機械輸出解禁的一年。也許正因此故，機械對產業革命，或對我們所謂生產建設，就被强調到它應得的重要地位以上了。然而，我們稍一注意歷史的聯繫，就知道法國當時輸入機械，展開生產建設的可能，是由一七八九年以來的大革命，爲它作了社會方面的預備工作。這裏且不忙對此作詳細的說明，還是折回到我們原來的論點。

要輸入機械，會要歸着到我們當前議論紛紜的建設資金問題上來。我們知道，建設資金只有兩個可能的來源：一是依存於國內已有的社會的蓄積，或社會剩餘；一是向國外借貸。至若我們一向並且今後還會當作一個大的搖錢樹來看的所謂華僑匯款，其可靠性，固須依特許多社會政治條件，其可能數量，比起眞正大規模建設所需資金來，亦是至爲有限的，所以姑且存而不論。

一個國家向外借款，也如同個人借款一樣。個人借款的可能數額和其借貸條件，大體是由他所保有的財產，及其財產經營狀態來決定。國家亦然。一個國家的國力，不但能決定它

借款的利與不利的條件，且可決定可能借得的數量。中國近數十年來的外債史，實在說明了比這裏所指出者還要多，還要沉痛的經驗。原來打算借來從事建設，輸入機械的借款，中途被轉化作其他消費的用途，固然是司空見慣的事（這種事，亦係由建設的社會條件不備所促成，因須較多篇幅來說明，祇略提示如此），同時，即使是決定用以輸入建設材料，那些材料的品質，甚至它的種類，甚至我們建設的用途，也被借款條件所限制了。在帝國主義政策並未能隨這次戰爭死滅的認識下，慢說過去，就在今後相當長期內，我們亦不能太稚氣，太樂觀的，把我們的生產建設大業的殷望，寄託在借入外資來輸入機械上。

建設資金不向外求，就向內求罷。這是最可能而且必要的路。一國能向內求得建設資金，它對外借貸的信用是會隨着提高的。特向國內張羅建設資金，有兩大限制；其一要看社會已有蓄積程度如何，其二要看已有的蓄積，轉化為建設資金的可能性如何。我們社會已有的蓄積，或者開始現代建設程序的原始蓄積，一直就在被胡亂的耗費着，此外，還被大量的轉入國際資本主義的吸血指爪了。這就是說，我們的社會蓄積即可以轉化到建設上的剩餘是極其有限了。由是，我們這裏特別應注意的問題，就是我們社會的這種有限的蓄積，應如何使其有效的，經濟的，利用到建設事業上。

但所謂社會蓄積，究是指着一些什麼呢？它們如何能被利用到生產建設上來呢？把對外的關係拋開不說，每年以賦稅方式被徵集到官府方面的資金，每年以地租方式，除了賦稅，確實被集中到土地所有者手中的物資，此外，在各種產業者各種生利事業者，保留在手中，用以獲取收入利得的資產，大抵可以指示出社會蓄積或剩餘的粗略內容。用各種賦稅方式徵

集到官府的社會財富，官府在其支出上，如其能儘可能節省不生產的浪費性的部分，而把它拿來從事生產建設，那是再簡便不過了，也許就因此故，有些學者就設計出高其稅收，以便籌集建設資金的「賦稅建設的」理想畫圖，但他們忘記了一件事，賦稅可以建設，賦稅亦更便於浪費；其抉擇往往不是取決於官府的主觀意向，而更大可能是取決於官府因以依存的社會經濟基礎，這就關聯到下面幾項算作社會蓄積的性質。

在我們這種社會，「土地是財富之母，而勞動則爲財富之父」的名言，仍是非常適用的。土地是最大的財源。地租這種所得形態（且不論其中包括進了利潤乃至工資部份），表徵着可能轉化作建設資金的社會蓄積。但經濟學上，資金的累積方式，往往決定其分散方式的積散律，在這裏發揮極頑强的作用。可藉以取得社會政治勢力的土地，可藉以安坐而食，而又可依憑社會的傳統慣例，再加上政治勢力而增高其所得的土地，一直都使地租的蓄積，不易使用到或分散到土地購買用途以外，至多，只是使購到有利於土地取得商業活動或高利貸活動爲止。事實上，商業活動及高利貸活動，直到今日，還被視作取得更大更多更優良土地之前哨的業作，因此，希望土地上的地租蓄積轉用到生產建設上，似乎要我們分一點尊貴的注意到這種原有的或現存的社會生產關係上面來。

至若分散在社會各產業者手中，用以取得收入或利得的資財，在「有土地有財」的社會，在主要藉着自然力（土地）及勞動力謀利謀生，而非藉着資本力的社會，那些作爲生產手段，作爲勞動工具及原料而存在於直接生產者手中的資財，那是極其零碎散漫的；把零碎散漫的資財，集合起來，使成大規模的產業基金，看來好像是非常容易的事。因爲在表面上，

那只是把小規模生產部門的資財，移轉到大規模生產部門去，把購買各種各色簡單勞動工具的資金，移轉去購買機械，但稍加分析，就知道問題是比我們憑常識理解的，要複雜困難得多。獨立生產者，不論是小農，抑是手工業者，他們的生產手段，是屬於他們自己的，如其把他們購買生產手段的資金，拿去購買現代性的機具及適於機具所加工的原料品，要就是他們有足够的，或積得或借得有足够的能應付這種新場面的資金，能如此，他們的社會地位，就不是直接參加生產的獨立勞動者，不是小農，也不是小手工業者，而是不直接從事勞動的資本家了；要不然，就是離開他們的原有的生產手段，或被剝奪去原有的生產手段，讓他們以前取得那些生產手段的資金，被集中到他人手中，或就他人的資本生產，而使自己失去原有獨立生產者的社會地位，變爲「自由得一無所有」的勞動者。在這種社會的轉變過程中，每個人的社會地位，每個人由一定的社會制度所規定的社會地位，都不能也不是照着他自己的意志變更的。要是照着各人自己的意志作去，我想社會一定全是資本家，而沒有勞動者了。單講到這裏，已够使我們想到，使原有生產資金，變爲現代性的，可以備置新式機具，應用新式技術的生產資金，該是多麼不簡單的事啊！

此外，我們還得闡明一點，把社會的障礙暫行捨棄，要使社會零散的諸種蓄積，集中爲整體的，够備置新式機具的大量資金，那顯然不能像派捐募債一樣，向各人手中去取得，那除了用賦稅，用公債，間接藉助於地租一類原始蓄積方法以外，商業同高利貸業，也是最有效的兩個轉移並集中社會資財的方式。但如前面所說，商業者，高利貸業者，在我們社會制度之下，如經常都是做着地主的夢，而不是做着資本家的夢，他們蓄積所得，就顯然沒有變

成機械或引出機械的希望。

四　單純發展技術的阻礙——人的方面

次就人的問題方面來講。

不論是簡單的勞動工具，抑是現代的機械，通是由人來使用它，但使用簡單勞動工具的人的地位，和使用複雜機械的人的社會地位，是絕不相同的：不僅如此，使用簡單勞動工具，人與物的關係，也比較簡單；使用複雜的勞動工具或機械，人與物的關係，就比較複雜多了。木匠的斧頭、鋸、鑽之類工具，就是屬於木匠所有，由木匠使用；但一序列製造木器的機械，它儘管是由木業勞動者使用却不是屬於他所有，儘管是為木廠資本家所有，却不為他所使用。這種由勞動工具改變所引起的人使用勞動工具的關係的變化，就一個人說，或就少數人說，像是沒有大得了不起的關係，但若就社會全般來說，其變化就非同小可了。——這事實，上面已就物的問題方面連帶提論到，這裏打算進一步予以分析。

在生產技術變革的過程上，一個木器廠的廠主或資本家，可能是以前自備斧鋸的木匠，同時，這個木器廠的勞動者，他或他們也可能是以前自備斧鋸的木匠。有的木匠躍升為木業資本家，有的木匠降落為被傭勞動者，這變化，就個人講，我們儘管可以隨意講出一些偶然的或命運的因素，但就社會的立場講，這些個人，擴而充之，整個工業上乃至農業上的人，相率向這兩極分化，就不是偶然或命運可以解釋的了。較有社會科學修養的人，也許有理由把這種分化，解作是應用機械，應用新的生產技術的結果。但仔細研究起來，我們似乎只可

以說，新的技術，新式機械被廣泛採用以後，確乎把那種分化加强了，但在起首時，新的機械技術，並不能製造出這種分化，反之，却是社會的這種分化局面，或者分化傾向，已藉着某種社會的政治的變革方式形成了，它才允許新的機械技術逐漸擴展其應用範圍。不過，這種分散局面，可因各別社會之歷史條件及其他無數經驗上的事實，引起無限的變化姿態。要測定它是否眞正爲機械或技術擴大應用範圍所需要或必具的現代轉形性的分化，就要看它的兩對極——卽一方面是無產的產業勞動者，一方面是產業資本家——是否在同時形成，否則如像中國傳統存在的那種分化局面，一方面儘管有大量的無產者或由土地游離出來的失去土地者的的存在，而作爲他們的對極的上却不是產業資本家，而是封建的大小土地所有者。像這樣一種前資本主義的社會，要完成怎樣不同於近代各國在產業革命當時所成就的社會的政治的革命，那不是在這裏要討論的，我只須指明，如其我們把前資本主義的社會分化，解作是現代性的社會分化，而以爲卽此就可把新技術同機械廣泛的應用起來，發展起來，那麼，新的勞動工具儘管像大水淌來一樣的，毫不費力的從外面運輸進來，那就使用它們的勞動力方面講，它們不但不會像先進國家一樣，加强排斥勞動力，恐怕還會受到勞動力的排斥；就使用他們的資本方面講，它們不但不會像先進國家一樣，特別爲社會有財力而又想加速增進財力的人所歡迎，且反而會受到他們的冷遇或歧視。這是近數十年來我們社會的生產建設的據實說明，我將就此分別予以較詳細的解釋。

先從我們勞動力所有者對於新的機械技術的妨礙情形說起。

一般的講，轉形期間使用機械的自由勞動者不待說，他們主要是由原來小農及獨立手工

業者蛹化過來的。不論他們之中的保守性的程度如何，不甘願離開自己的崗位，變成他們所不習慣的僱傭勞動者，那是大家一致的。他們直觀的認定，使他們向着這個方面淪落的，是由於機械的採用，而機械採用造成的失業驚恐，更加强了他們這種信念，於是，他們對機械採取直接的破壞行動了。每個現代國家都曾經驗過這一類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我們坎坷萬千的現代化過程上，這種「遷怒於物」的故事，也是間嘗聞到，但却頗不足齒數。這原因，並非因爲我們採用機械，應用新技術，很順利的不會受到勞動者的妨礙，而是因爲我們採用機械，應用新技術的範圍過狹，還不够在這方面引起勞動者特別重視。由我們社會歷史條件的特殊，還由於我們採行現代化的步驟不免有些顚倒，我們採用機械所受到勞動者方面的壓迫，就呈現了一種異常特殊的姿態。

作爲中國封建制基礎的地主經濟形態，它與西歐或一般封建制基礎的領主經濟形態是不同的，那對於由封建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的各方面的轉形過程，也自然要發生一些變化。在地主經濟形態之下，土地是可以自由買賣的，土地不曾由封建身分固着起來，耕作土地的勞動者，便也得到了移轉上的相對自由。土地自由買賣與勞動力自由移轉，儘管那自由是受到了許多限制，且與現代土地和勞動力自由的概念，大有出入，但畢竟是中國封建制的一種値得稱許的進步性。這進步性，本來可利用來作爲較易轉向現代社會的一個階梯，但可惜我們把它錯誤的理解了，那反而變成了妨阻我們走向現代社會的一個障礙。我們——由李鴻章、張之洞到今日一班大大小小的李鴻章、張之洞們——自來就淡然的把握這種進步性，這種自由，以爲中國過渡到現代社會的變革，早經成功了。我們封建的本質，特殊封建剝削的關係

，就被掩單在這種進步性和自由的後面，眞所謂「自由自由，一切罪過都假汝之名以行」了。因爲這是中國技術派意識形態中最「炫灼」的部份，所以不憚煩便在這裏提示一下，而我的論點，還是要由此引述到中國轉形期中自由勞動者的造出問題上來。

前面講過，現代各國採用機械所要求的自由無產勞動者，一般都是經過一種社會變革程序來造出的，都是把土地上的特權，城市基爾特的特權，從根打破，再從農工業上游離出來的勞動隊伍當中，來吸收住他們的。但中國自來就在土地自由集中的過程裏面，不絕造出了土地被集中去了的大批的農業勞動者，他們這類人——這類待土而耕的人的歷史的存在（事實上，中國舊式的手工業者，無非都是一些得不到土地並殷切希望找機會得到土地的人），直接造成了高率地租的一大前提：高率地租不但牽引着高率商業利潤和高率利息，並還局限着社會蓄積，始終除了浪費外，不肯走出這三位——土地、商業、高利貸——結成的連環圈套。由是歷朝後半期照例由土地游離出來並且愈積愈多（多到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挺而走險，結束這一個朝代的乾坤爲止）的大批過剩勞動者，到了我們這個時代，就彷彿他們不是爲了等待土地，而是爲等待機械來服侍似的。本來，即使是等待土地的人，他們是可能，而且逐漸會是願意服侍機械的（雖然他們使用舊式農具乃至舊式手工器具的手，並不怎樣慣適於使用機械），但無奈他們方面，或者勞動力方面，儘管在客觀上期待新時代的展開，我們社會的傳統生產關係，却仍允許並保證着地租上，高利貸業上，乃至商業上的特殊利益，且還把大批的失土失業的勞動者的經常存在，作爲其特殊利益所由取得的一個有力的助成條件。這傳統關係既多方限制着機械或新技術應用範圍的展開，結局那種過剩勞動者羣

的人數愈多，就不但不能按照資本技術構成上的比例，促成機械的採用，却反而依照着勞動者報酬與其求業人數所形成的反比例，壓迫機械的採用。這就是說，容受過剩勞動者的範圍愈狹，勞動力的報酬將愈低，勞動力的報酬愈低，生產事業的經營者，愈會覺得採用國外輸入的昂貴的機械就常不如僱傭「就地取材」的低廉勞動力；而在中國國情下，國際資本的競爭，防衞力量的薄弱，以及各種不利於新式產業發展的社會政治的作用，乃至由貨幣制度不健全和社會信用不發達所引起的資金的必然缺乏，都促使他們有理由覺得採用固定性太大的機械，不如多使用可以隨時因應市場關係的變動而解僱而集合的奇特場面，就這樣被演成了。我們迄今還存在着這種場面，它的根本原因，從表面上孤立去看，是無法理解的。

我們的勞動者在客觀上是這樣的排斥着機械和新技術，再看理應特殊親近機械與新技術的我們社會的有錢人或資本家們的態度吧

近代各國的產業資本家，有許多當然是產業界出身的，在轉形期當然特別如此。但過去的商人，高利貸業者，坐收地租的貴族，乃至其他社會各色人等，也有不少變成了產業界的巨頭。在以前等級社會的空氣下，誰靠近產業，誰就要依他靠近的程度，失去其尊貴的身分。到了市民社會，經營產業變成極時髦的事業了。這種氛圍氣所由養成的本質原因，主要還是由於經營產業所得的利益，比之坐收地租，比之過高利貸生活及作欺騙的買賣，要較有利益。同着這方面趨利的形勢已經造成，機械和新技術，便同過去社會的土地一樣，特別被人們所愛顧和講求了。

把這種事實拿來比照我們的社會，我們只依據上面的說明，就知道，我們還把土地當作

最重要的殖利生產手段，機械就不易被當作最重要的殖利生產手段了。結局，坐食地租者固不必說，與「吃地租」保有極密切關係的商業者及高利貸業者，他們為了適應時代的變化，其最大展望，也只是做買辦商業家和買辦金融家，或者變形為都市的公債、地皮、標金經營者，除了在特殊有利場合下（如在第一次大戰過程中的某一時期），他們是沒有理由，也沒有興緻去親近機械與新的技術。

就是到了國際資本大體引退，民族產業在多方被獎掖的條件下的今日，「產業家」仍舊不會變成一個很吉祥的名稱。然而許多不肯正視事實的學者乃至政治經濟家們，也許要把這種特殊產業不景氣的原因，歸之於機械不容易進口罷！

現代各國在轉形期最愁難得的，是對機械抱着反感的產業勞動者，而我們却愁着找不到對機械表示親切的產業資本家。

五　結論

上面的說明，使我們有在這裏概括並引申為以次諸點的必要：

第一、在生產建設上，技術無疑是一個極關重要的項目，但一切技術，必須附着於一定社會條件，在這限度內，任何一種技術上的變革，都不能不要求它的變革性質所需要的社會條件或社會關係；在另一方面，任何一種社會關係，對於作用在它那種關係或社會經濟結構中的技術的改進，因此也都設定了一個限界。

第二、一國的生產建設，如不是指着產業革命過程中的轉形大業，而是指着通常意義的

生產或建設，指着產業革命大體完成以後的生產事業，因爲它是在新的社會關係允許的情形下進行，着重技術，專心致力於機械的改進，如像先進各國在前世紀末本世紀初所努力的一樣，那麼，它們强調技術的重要性，是不無理由的。到晚近，它們的技術發展程度，似已超過其社會生產關係所允許的範圍，它們不能應用其在前一個轉形期的經驗，而仍想藉技術的改進，來解決其在社會經濟上所遭遇到的嚴重問題，所以，它們的這種努力，就只能爲自己造出更大的困難。——我們不但需要接受近代先進諸國在前一個轉形期的教訓，我們還得接受它們在當前面臨着的這一個轉形期的教訓。

第三、先行於技術變革的社會變革，儘管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但其表現形態，從而，其變革步驟與方式，各國不盡一樣，事實上也不能而且不必一樣。中國前資本社會的形態，對世界各國都顯出極大的特殊，這特殊，是以我們社會的地主經濟基礎，對其他社會的領主經濟基礎，表現了較多的自由的進步性，但這種進步性，並不會達到其對現代社會表示不落後的程度；其特殊，也不會達到否定歷史發展之一般定則的程度。我們有理由利用過去社會的進步因素，以減少社會變革過程中的痛苦，却萬分不應該誤用那種進步性，來代替新技術變革所要求的社會變革。

痛苦經驗已經够多了，表演在我們眼前的產業界的傷心史實，還不够警惕我們技術萬能論者的愚昧與迷頑麼？

十七　經濟建設在工業化、政治建設在民主化

——民主問題與經濟問題

一　民主化與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兩個面

民主或民主制度，原是政治或政治學上的用語。但不論講這種制度的發生抑是講它的演變，它卻始終同經濟或經濟制度密切關聯着。我們甚且可以說，現代的民主制度，是從現代的經濟制度取得其存在基礎的。在民主政治上發生的一切問題，都可直接間接的在現代經濟領域內發生的諸般經濟發展的障礙上或變動上得到解釋。我們如其不否認現代社會是資本主義支配的社會，則在這個社會的政治範圍內產生的民主問題，就顯然可以正本淸源的說是它的經濟問題在政治上的感應。把民主問題與經濟問題關聯起來研究，那是種種問題本身性質要求我們這樣做的。離開了經濟問題來談民主問題，儘管它在今日世界論壇上，乃至在中國論壇上，大家像是不約而同的採取的一致作風，但撇開了最基本的，或者種種不同性質的民主

問題所由發生的經濟問題，民主問題將會像懸空斷線的風箏，最後是不知演到伊於胡底的。
讀者如其懷疑我的意見有些不易摸着頭腦，我是會用事實給他解說明白的。

二　歷史是如此告訴我們的

首先，我們試想想，民主問題究竟是怎樣發生，怎樣會變爲社會問題的呢？這個問題，需要分別來答復，分別來說明。因爲我們如先把中國目前的現象撇開不講，只一般的談到現代世界。則民主問題之成爲問題，大約在現代初期的階段，和在當前的階段，具有極其不同的性質和內容，該問題採取的姿態，及其發生的經過，儘管大不相同，其由經濟問題上產生或演化出來，而成爲經濟上的政治問題，則大率一致。

且先略述民主問題在現代初期發生的經過。

這裏所謂現代初期，無疑是把歐洲作爲它地域上的限界。歐洲在這一個時期，工商業者市民，對於封建領主貴族的權勢，在作着強烈的鬥爭。當時封建體制的經濟基礎，雖因十字軍興以來的商業資本活動，新大陸的發現，貴金屬大量的輸入，而使它那種利於靜止的，定型的規制，受到劇烈變動的不利影響，而逐漸趨於頹潰，但這種頹勢，並不能阻止貴族領主對於新興商工業者勢力的防壓；他們利用其經歷了多少世紀的社會上政治上的支配地位，使當時處在有利發展情形下的商工業者的經濟權益，多方受到損害和束縛。像這樣一方面在經濟上力圖發展，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力圖限制的政治與經濟脫節背離的不和諧現象，延續到了十八世紀中葉前後，就因爲處在被支配地位的商工業者的社會經濟力量的日益增進，而由是

感到政治解放要求日益迫切，於是在較先進的英法兩國，乃伴隨着以自由主義爲中心的經濟思想運動，而展開了以民主主義爲中心的政治思想運動。從社會意義或其發動的影響上講，這兩大思想潮流，以及由其激盪而生的實踐上的運動，無疑互有作用，但從其歸結的要求上講，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却根本是爲了要達成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其中的原委，我們最好以最先進的英國社會鬥爭的內情，作爲具體的例解。

我們知道，英國的封建勢力，是不像法國那樣，由大革命一次澈底清除的，而是依溫和的方法，逐漸去變質，去解消的。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不久，英國商人和製造家，無論多聰明，多富足，總不及大土地所有者那樣高貴，那樣有社會地位。若其被人知道是一個商人或一個工匠，或者這種人的嫡系子孫，都是其個人在社會地位上的玷辱。直到十九世紀初，富足的工廠鐵礦主人，猶不能在政治上佔有勢力。延至一八三二年國會改革條例施行之後，下議院議員五分之四，仍屬於大半由過去領主貴族化裝的地主階級。這些領主們既在社會上特別是在政治上佔有這樣大的勢力，所以在新興商工業者與他們利害相關的立法上，他們就不免大佔便宜，而使前者的利益蒙到損害了。單就穀物條例這一個法案來說，大地主或領主們，自然樂意穀物的漲價，反之，市民階級却樂意穀物的跌價。穀物跌價，勞動者的消費品低廉，工資降低，生產成本減少，市場銷路擴大，在這利害恰好相反的場合，在政治上佔有議會絕對優勢的領主階級，遂利用其政治地位，爲了抬高穀價或維持高的穀價，通過了限制或禁止國外穀物輸入的法令。商工業者的新興資產階級受到了這種委曲或壓制，遂強烈要求在政治上爭取自由和民主。爲了向在政治上壓制他們的勢力作廣泛的鬥爭，他們利用勞動者因

穀價騰貴所受到的不利，誘使勞動者階級加入他們的陣營。一八三一年，英國勞動階級在奧文及其信奉者領導下，組織「全國勞動者階級同盟」，而宣言「爲全國國民計，務必促成英國下院有效的改革，議會每年須開會一次，一切成年男子皆得有選舉權，祕密投票方法必須撤廢，議員財產上的資格限制必須取消」。他們抱着這種目標，參加資產者階級的選舉法改革的政治運動。在翌年即一八三二年，選擧法的改革，照着商工業資產者的志望實現了，領主貴族化裝的地主們，不再在選擧上佔有特權，議員被選的權利，開始擴張到了工商業都市。但工商業都市雖在此後獲得了議員的被選擧權，他們在下院的議席，並不能馬上增加到壓倒貴族領主們的多數的程度。所以，貴族領主階級利用以壓制資產者，而增加自己不勞而獲的收入的穀物條例，還經過了有名的反穀物條例同盟在民間在社會各方面普遍的運動，到了一八四六年，始根本取消。貴族地主階級爲了報復資產階級，乃於翌年通過所謂「十時法案」，使資產者的超榨取所得的豐富利潤，亦受到相當打擊。

由此一例，我們就知道，所謂民主政治，離開了經濟，便無法取得存在基礎。民主政治之逐漸伸展，逐漸在各方面造成制度的根基，都是在經濟要求中，或者，都是通過經濟利害關係而演變出來的。事實上，現代的民主政治，一般是被具體的理解爲議會政治。議會政治之經濟涵義，就是一切有關工商利益的經濟法案，通是由議會通過。如其議會的議席，絕大多數爲工商業者市民階級或資產階級所佔據，不利於他們的經濟利害關係的法案，或不利於他們的經濟政策，是無法通過的。

不過，論到這裏，我需要爲大家解除四點疑難，否則我的論點就不易受到一般的支持。

其一是：現代社會的民主，並不單是在經濟上表現出來。各種社會生活方面，都不難找到它的蹤跡，比如在教育上，在宗教上，在家族關係上等等。在民主政治形成爲一種社會制度的界限內，它在社會各方面發生影響，那毋甯是必然的事。如其我們不否認經濟生活是最有決定性的社會生活，則由經濟要求造成的民主政治制度，即使變成了現代一切生活形態的一個特徵，那並無礙於我們所提出的主張。

其二是：民主政治的淺近解釋，是說，在同一政治領域，隸屬於同一政治組織下的人民，都有權過問政治，參與政治。如其這點是確實的，議會政治就不會是由某一特定社會階層所把持，如其竟是由某一特定社會階層所把持，那就根本不成其爲民主。關於這點，需要觸及現代民主政治在其經濟性的本質以外的另一本質，那就是由經濟性派生的階層利害的局限性。但關於這一點，下面還有說及的機會，這裏從略了。

其三是：如其說由工商業者市民階層所支配的政治，就完完全全是以他們這一階層的利益爲前提，事實上恐怕會遇到不少的反乎這種論據的現象。但是當我提出這種論據時，如其同時附加上以次的補充說明，那就不會使大家疑慮了。那是說，商工業者政權儘管以他們自己利益爲前提，但當某種法案，於全社會有利而於他們無損，他們是樂得通過的；某種法案，於全社會有利，於他們更有利，他們亦是樂得通過的；某種法案，於他們目前似有小損，於將來却有大利，他們亦是可以放大眼光通過的；某種法案，即使於他們現在將來都不利，但如其他們預知不予通過，會馬上引起更不利的後果，他們亦是會勉強通過的。這樣在鐵算盤計量上表現出民主，把它的局限性完全暴露無遺了。

共四是：現代爲工商業者市民階級所期待所爭取的民主政治，爲什麼竟還是由同一階級支配的許多國家，如像在德、意等國，又把維護他們利益的這個制度，給它摧毀了呢？關於這一點，需要從長說明的，那正好是現代資本制臨到末期重又發生民主問題的關鍵。

三　現代民主政治是怎樣形成又是怎樣沒落的

工商業者市民階級即資產者階級在初期所以爭取民主政治，我們已在上面解述過，是從維護他們的經濟利益出發的。這種政治制度在實際上，確也達成了滿足他們期待的任務。資產者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共所以有此成就，當然受了那種政治制度的保育。我們甚且可以說，現代型的國家或政治制度，儘管是在經濟要求上，經濟基礎上逐漸形成的，但如其沒有這種形態的所謂民主政治，現代型的經濟制度，也許根本就無法建立起來。照形式邏輯推論起來，民主政治既是爲資本主義經濟盡了莫大的保育責任，在資本主義經濟還能維持其社會優勢的限內，這種政治制度是應當繼續被尊重的。

然而事實總在執拗的反對形式邏輯。資本制在它成育發展過程中，一直在以幾乎相同或更大的速度，使它胎內孕育着的反對力量，即資本制生產所必須依存的勞動者階級的力量，向前發展。我們曾講過，資本家階級在它對貴族地主階級爭取政治民主化時，曾利用過勞動者階層的力量，他們不能一味欺騙，因而不能不在其得到勝利時，給勞動者階層以某些利益。但這種種，還只算是勞動者階級力量伸張的一些較副次的原因。現代的各種企業形態，不斷在續製造出了大量的勞動者羣，還爲他們造出了共同生活的共同意識，造出了便於集中和

團結的機會。像這樣一些因素，在資本制順適發展歷程中，即它藉着勞動力機械力所製造出的商品，能順利找到銷路，那也不會變爲怎樣不利於資本家利益的誘因；然而資本制本身就「先天的」存在着不能一直「順適」活動下去的病根，由無政府的生產狀態（就社會而言，非指着個人——每個生產者是都有他自己的計劃的）所必然要造成的商品過剩，所必然要爲了減低成本而以機械驅逐勞動，因而造成大量產業預備軍的事實，要把上面指出的那些因素，一一變成了勞動者階級聲勢逐漸浩大起來的媒介。他們在英國，因爲商工業者市民層，要利用他們向貴族地主爭取政治民主，而幫助他們於一八二四年獲得的集會結社的自由，就使他們以在英國乃至在其他國家，以組織政黨的姿態，向資產者階級的民主政治，爭取「民主」了。在先進諸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中，逐漸有他們的議席了。要求增加資本稅，要求增加失業救濟金，要求增加社會教育費，以及一切其他利於勞動者、但不利於資本家的提案，公然在資本神聖的議會殿堂中，近似「褻瀆的」提出了。而且，他們還不僅在議會中呼籲，並還在社會每個角落發出吼聲；他們不僅有實際的直接的行動，並還有激動和指導那種行動的理論及學說體系。像這種對資本主義制本身生存，採行了威脅壓力的社會運動，在那擁有廣大殖民領地，可資以轉嫁禍害，緩和危機的英國；在那擁有廣大國內市場，以新[illegible]主關係，迅速蓄積鉅量財富，可資以減輕壓力，緩和危機的美國；甚至在那有着廣大金利生活者的社會層和相當的殖民地，同時又有傳統的小農經濟制，可資以增大資本伸縮彈性，緩和危機的法國，雖然還不會嚴重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即是，雖然還允許這些國家表幟着民主政治的議會制度，相當的維持一個「過得去」的場面，但在發展落後，海外市場無法展開，而社會

財富蓄積又處處遭受先天後天限制的德日意諸國的情形就兩樣了。這裏且單就德國來說明此中的內情罷：

當德國資本主義開始大踏步發展的十九世紀後期，世界的殖民地市場，已近於分割殆盡了。她雖在普法戰爭的勝利當中，陸續獲得了現代資本制不可缺少的煤鐵產地，並還獲得了大宗賠款，以補充其原始蓄積虛弱的缺點。但她不幸的是，在開始就獲得了先進英法諸國經營企業過程中，走彎路嘗試錯誤的教訓，以致她的各種經營，自始就能發揮出最大的效率，從而，自始就因其知道如何培育對外貿易的產業部門，而很快的遭到商品生產過剩的危機。然而更不幸的是，她的勞動者階級，也如同她的商工業者資產階級一樣，一開始踏進資本家的廠門，就已把它們從英國勞動者階級那裏學習得到的鬥爭經驗，正式應用起來了。此外，他們還有「本店自製」的理論武器，還有極有名望的像拉塞爾一班的領導者，因此，德國資本主義在它成育的過程中，差不多一直就有社會主義伴行着。鐵血宰相的社會主義鎮壓法的宣佈，却並不曾阻止住勞動者階級在德國國會中議席的迅速增加。自然，勞動保險制的創出，無疑在勞資對立關係中，發生了莫大的緩和作用。威廉第二很知道從正面來阻止勞工運動的威脅，就甯不如設法叫勞動者階級知道，使他們痛苦的，並不是國內資本家，而是阻礙德國發展的大英帝國，這樣把勞動者階級的對敵情緒，由國內轉到國外的高妙手法，一方面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所由產生的一個契機，同時，也是德國原本就不十分健全的議會政治得以布延到那次戰後的一個有力原因。以英國爲首的協約諸國，是以德國軍國主義，控制議會，發動戰爭，而互相責咎德國之不民主，迨德國戰敗，她們就很「正義感」似的支持德國的民主

政權。然而所謂民主政權，並不是浮在水面上好看的油珠！它的存在，一定要有相當堅實的基礎。戰後德國的經濟環境，自然比戰前還要艱辛。大宗賠款雖由道斯楊格計劃分別予以緩和，但它在復興期所有的成就，終敵不住世界恐慌爆發後的經濟災難。由失業洪水所造成的社會危機，致使勞動者階級的政治力量，迅速膨脹到全世界資產階級羣相駭怪的程度。在一九三一年的最後一次選舉運動中，社會民主黨的選民，雖仍佔在第一位，但共產黨的選民，竟一躍而升在第三位。這現象，是火燒國會陰謀的由來，是希特勒所以受到國內國外支持而上台的由來，亦是民主政治在德國壽終正寢的由來。

就在希特勒登台以後不久，燎原在法國的社會勞動運動，已經引出了火十字團的「衛道」英雄；而英國失業洪水造出的社會危機，亦由莫斯萊勳爵導演的黑衫黨出面來高呼「希特拉萬歲」（作者曾於一九三四年在英國海德公園親聆這種怪叫）。火十字團不曾在法國做出打倒議會政治的成績來，莫斯萊勳爵還不免在此次戰爭開始時一度作階下囚，那並不是他們的反動運動不力，而是英法社會對於經濟危機，及由是導來的政治危機，還沒有達到無法或無力應付的餘地。從另一個視野來看，日本直到現在還保持着議會政治，可是它早已沒有政黨存在了，這自然是希特拉的的一黨國會的「複製品」。事實上，日本在發動九一八事變前後，社會勞動諸黨派的議席，已由九十萬有組織的勞動黨團支持，而遞有擴增。這個資本主義患有先天脆弱病的小國家，根本就經不起這種政治重壓。日本當時亦有主張對外發動戰爭，以緩和國內危機，使抱有現代民主意識的國務大臣，及朝野著有社會威望的人士，不再橫遭暗殺，由是使她那半身不遂的議會政治，得苟延殘喘的。但是對外戰爭一經發動，一向在

憲法上取得有特權的軍閥，就更跋扈猖獗起來，結局，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經過多少鬥爭，從舊來封建勢力，爭取到的一點民主場面，就被軍人狄克推多破壞得比德國還要澈底了。

四　經濟上改革的努力是政治民主化的保證和測驗

由上面的說明，我想應當能够對現代民主問題之經濟的涵義，有了一個明確的概念。在初期，商工業市民階級其所以要爭取民主政治，因爲沒有這種形態的政治，他們的經濟利益，就不能得到保育；在末期，即在較近這個階段，他們其所以暗地裏以大量金錢支持那些推翻民主政治制度的獨裁專制魔王，就因爲要保留在這種形態的政治場面，在這種政治場面下潛滋暗長的反對方面的勢力，就將使他們的經濟利益，無法繼續保持。從這裏，我們就知道，現代所謂民主就不是全民性的民主，而是市民性的民主，是商工業資產者階級以他們的經濟利益爲轉移的，有利則拚命爭取它，不利則無情破壞它的民主。利益是可以在某些場合使人智慧的。資產者們對於所謂民主政治的想法，是比一般民主政治的理論家們，特別是比中國擁護乃至抗拒民主制度的政論家們，聰明得多的。現在，像英美這類國家的資產者，他們對於這一形態的民主政治，似還在很熱烈的支持着，他們及他們的政論家們，且還把這次大戰的發動，理解爲維護世界民主制度的十字軍的奮起。但這一種事實，絲毫不會妨阻我們上述的推理。我們在前面已把英美社會經濟的較爲有利的條件指出了，即它們暫時還不妨這樣目前維護民主制度的道理了。在此次戰爭結束以後，我們如略以「杞人憂天」的情緒，把戰爭過程中，社會勞動生產力拚命擴增，社會購買力一般壓迫的事實，加以比較；並把這比較

的結果，看爲是戰後世界最惱人的課題，則這種形態的民主政治，會不會遲早也在勝利國家發生問題，那就是我們難以預想的事了。

論到這裏，我們似乎需要概括上面的說明，而將以次的諸結論，用作我們今日中國喧論着「民主問題」的借鏡：

第一、把民主問題與經濟問題關聯起來立論，那比文字上所顯示的相互關係，要有更深遠得多的涵義。我自始就認定：現代的民主問題，是經濟問題在政治方面的表現。

第二、民主問題在它發生之始，就是把社會經濟的根本變動作爲它的實質的條件。工商業者如尚在封建制的基爾特市集中工作，他們根本不能想到過問政治有何意義。而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天賦人權……這一類在本質上就是意味着民主政治的思想，是商工業者已部分的從封建制得到了解放，並其社會經濟力量，已可能向封建領主貴族提出此類要求的客觀情勢下，才被接續提出來號召的。

第三、現代民主政治雖是在社會經濟允許的情形下形成的。但並不能說，現代資本制經濟已經完成了，才開始實現民主政治。資本制的經濟制度同資本制的政治制度，都是一步一步的向前開展；每逢經濟上有一大成就，那在一方面固可視爲是它進一步向政治要求的動力。同時也可說是從政治上得到了某一方面的解放的結果。因此：

第四、對於民主政治的爭取，自然要在政治上努力，但最基本的還得注意到經濟上的演變趨勢，還得注意政治上的任何成就，雖有助於經濟的展開，但經濟上的措施如其沒有利用到那種成就，那種成就將因其失去存在基礎，而逐漸趨於落空的。

以上這四種結論性的命題，大體應可作爲我們今日討論民主問題的參考，但我在這裏想指出我們向民主政治上努力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其一、中國今日需要實現的民主政治，從我們社會經濟的基礎上看來，理應是初期性的，即是說，傳統的封建的勢力，還在從經濟上，從而，從政治上，成爲現代民主制度的梗阻。雖然我們經濟上乃至政治上的諸般措施，應利用人家經歷過來的經驗，不要亦步亦趨的重複他們的路，但由歷史嚮導的便利，並不能超越歷史設定的界限。

其二、民主政治在今日中國，雖已很別緻的成爲朝野上下共同努力的目標。但其成就的有效測驗，與其說是在政治上的形式集會，却毋庸說是在經濟上的努力，是否向着根本改造的，向着允許並要求那種政治形態存立的鵠的作去。自然，在這種關鍵上，我們是相信，多有一些人參加改造建設的意見，也許是會使改造建設較合乎實際要求的。

其三、在我們的這種政治努力上，還有一個頗得注意的事實須得指明，就是我們的商工業者近年雖也漸續發出修明政治，解救經濟危機的呼聲，但在實際上，我們較大的商業者乃至一部份工業者，他們本身就都在各別找尋政治因緣，使其商工業特殊化，特權化，而成爲修明政治的障礙，成爲經濟正常發展的障礙。他們這種不明朗的意圖和性格，是要從長由中國社會經濟的特殊性去說明的。等待有機會再來分釋罷！

跋——附答沈立人先生

最近看到上海文匯報「圖書」欄沈立人先生有關「社會科學論綱」這部書的評介，對於他所說的：這個書名與書的內容有些不相符合，我亦有同感。顧名思義，似乎題稱爲「社會科學新論」，要比較妥切些。

沈先生關於全書各部份，都有一詳細介紹和說明；他認定貫澈全書有三個重點，即「實踐的」、批判的、中國的」，這確是我企圖實現的目標。關於社會科學的書，國人翻譯過來的，或依據外國教本專著編述的，不能不說已有相當的數量，但從各種論壇上反映出的國人消化那些讀物中的原理法則的成績，似乎並不很好。這使我間嘗想到：要刻板記住社會科學中的各種原理法則，要刻板講述或編述那些原理法則，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只要一個人勤奮一點，有了一點普通的社會科學知識，孜孜的編著下去，他就很有希望做一個大家禮讚的社會科學著述家。在知識落後的中國，就是這樣的編述工作，我覺得還是值得鼓勵的。然而，老是這樣作下去，對於提高知識水準，特別是對於理論與現實的聯繫，就有問題。本書所

以在內容上採取這種佈局的方式，確實是希望舊的，特別是新的社會科學研究者，理解到社會科學的論述，是不必要那樣死板，那樣「按圖索驥」的。

至於論社會科學，單單拘泥於文化，戰爭，建設三個方面。而文化又只及於東西文化之異同，戰爭又只及於戰爭與社會進步，建設又只及於農村工業化問題云云，我的解答是這樣的：一方面，因爲這許多語文，原是分別參差發表後，再彙集起來的。同時又因爲這三個方面，是特別突出，特別爲大家注意集中的社會事象。而且對於文化部門，雖然是就東西文化立論，但在該部門第一篇「文化與經濟」中，已算一般的指明了文化諸特質。在戰爭部門的第一篇，亦對於戰爭全般作了一個本質的說明。最後建設部門所論及者，並非只及於農村工業化，就是批評顧翊羣先生的那篇文字，其後半部，還是一般批評今日論壇上的工業化理論。不過雖然如此，我是深深覺得當作一本涵蓋社會科學領域的書，它仍是不免掛一漏萬的。

在這一個新版中，對於最後建設部門，已把它的論點推廣了一些；我希望今後每重一版，分別把書中各部門，擴增其研究範圍。使這部書，隨着中國社會現實與社會科學研究的向前開展而不絕增益變革其內容。

我還希望沈先生及其他社會科學研究者，不斷給我以指示與鞭撻。

王亞南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讀「社會科學論綱」

沈立人

一

本書的書名，很易引起誤會，以爲是與什麼「社會科學概論」或「社會科學大綱」等相類似的社會科學的入門書，給中學生或大學一年級生讀的，其實不對。在本書作者寫的序裏一再地說明了所以著作本書的原因，並不是供給啓蒙之用：「大家只知道注意某門社會科學入門知識或基礎知識，而不肯注意學得那些知識的人，對於現實有關的問題，究作如何的理解的」；「近年以來，以注入的刻板的方式，叫學者去死死閱讀什麼ＡＢＣ的傾向是有所改變了，於是通俗的，實用的社會科學讀本又風靡一時。但這種補救的方式，也許不免會矯枉過正的發生科學流俗化，常識化的毛病」；所以「爲了使理論不避開實踐，同時還要不使社會科學的研究，一直逗留在入門的階段，我（作者自稱）以「社會科學論綱」這本書向我們科學家貢獻出來。

的確，這一本書並不是掇拾一些他人的意見而湊在一起的教科書，而是有作者自己的思想體系溶貫在內的。每一段，每一章，我們都可找出作者的新的觀念，不因循舊說，而能獨立地在社會科學的領域開一新天地，發揮好多新的意見。從這個不很適宜的書名看來，也許作者有一意圖，想建立一新的社會科學；至少，這本書是提出了好多新的「學說」，有的爲其他人所未談，有的爲其他人談過而作者認爲不滿，處處，我們都找到了獨特的議論。

本書的內容和編製也是很新穎，與其他的社會科學的教本大大不同。一共包括四部，每部約三篇到四篇的論文；拆開而言，是每一篇都獨立的，併在一起，便結構成一完備的科學新思想。第一部是「社會科學的認識論」，都是關於社會科學本身的解釋，而最注意的是一句話：「一切社會科學，均是在應用過程中產生」。所以在以下的三部，便分論及「當前最顯著的，且爲一般論壇談得最熱鬧的文化，戰爭，及建設三種社會事象，分別應用社會科學的基本理論加以研究」。於是第二部就是「社會科學的文化論」，第三四部就是「社會科學的戰爭論」和「社會科學的建設論」了。他的所以在每一部之前加上「社會科學的」五個字，並不是畫蛇添足，而是因爲要不憑着成見，玄學，或直觀的及經驗的常識，跟其他的人一樣地去討論這些問題；故而添了如此的標題，目的只在說明他是「科學的」，並且是「社會科學的」去討論着，「寓有批判的意圖」。

別人講過的他都沒有講起，而他所講出的又都是別人所未曾講到，以下，便就本書的特見和創見加以介紹。

二

社會科學是什麼？這樣一個太淺薄的課題，在任何一本初級的教本上都可以覓到幾十種各國自古以來的名學者的解釋，然而也因爲這答案太紛紜了，所以結果，使聽到的人除了有一似乎整個的概念外，實在可說對於社會科學沒有明確的認識；也因此，在他的日後研究工作中碰到無數困難。本書的作者並不寫出什麼很巧妙精當的術語句子來作定義，只是說明幾點關於社會科學性質上的基本認識。

起先，作者指出社會科學是一種「科學」，所以它也擁有其他「科學」所有的屬性。本來的所謂「科學」是指自然科學而言，一直到社會科學在近代完成了他的科學體系以後，於是原本的「科學」領土內才分化出來。既然算是科學，它就該有一切科學的性能，依作者的意見，「科學」是指有「規律性」「系統性」「實在性」的，社會科學亦合乎這三項法則，雖然它的對象不同，但終於形成了「科學」。這一段內，作者講得非常透徹，不再贅引。

然而社會科學與其他科學終有些兩樣，其差別所在，作者便提出「一切社會科學皆是歷史科學」的意見。換一句話說，就是指示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易變而且在變的，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是必須要配以動的觀點的，再則社會科學是研究到人類的意識和行爲以及各時代社會關係的。以社會科學的方法可以治史，但以治史的方法亦能够研究社會科學；不然，那社會科學也容易變爲空虛和無基礎，於是缺乏了實在性而不成爲科學。

更其次，作者說出處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人來研究社會科學的難易。他所指出的難處，大

致是說這一個時代的黑暗面，影響到意識思想方面，如果不是被歪曲，被抑制，便是得到種種無理的摧殘，這是在生產力落後的國家所有的不良現象；而自然科學的不能配合步伐，亦使社會科學受到資本制在末期所發生之反動所影響，一直陷入跛行的坎坷狀態中；第三、則因爲對象的不同，特定空間的限制，社會科學的運動軌跡便不能享充分的自由，不能絕對地表現出眞理。至於容易方便之處則有：一、中國的社會科學是從十九世紀中葉起才開始孕育完成的，落後民族每能捨去傳統的束縛，它的經濟狀態雖不容許從自身找到例證，然也因此，他可以站在純客觀的地位而發生信心和興趣；二、二十世紀的社會科學是發展而成社會史學的了，一切狹義的科學思想都得到解放，向外，一個學者很易從文化的交流上得到覺醒，不致一昧地蒙在觀念的氛霧中；最後是因爲我們還有一特別便於研究的優點，就是「眞理往往留在被壓迫者一邊」這句話所昭示的理由。

進一步，作者討論到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連繫性，這話似乎有人說過，但那些說過這話的莫不從方法上着眼，指出有什麼什麼的不可分性而已，從未把握內在實質上的至義。本書的意旨有二點，一方面說明必須在進步的社會，斯能尊重自然科學，學術昌明有待於政治的穩定，而停滯在時代尾閭的國家是不能，不肯，甚至於不敢提倡眞正的科學，僅有在新興的社會，當它向上發展的階段時，它才要求着眞理的認識；反之，如果理性與自由（社會進步的原動力）一旦被抹殺了，那麼不論是屬於社會或自然範疇的科學都失了立脚的根據而衰落下去。同時也戳破了那批表面上在提倡獎勵自然科學而骨子裏是恐懼着社會進步的僞君子們戴在鼻子上的假面具。

這一部的第三篇論文最爲精彩，是講社會科學的實用問題，提出「實踐的」「歷史的」「唯物的」三個論點而加以推廣，頂重要處是敘述主觀的立場與客觀的環境的適應性，而分門別類地一一將舊有的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法律學，尤其是經濟學賜予新的估計，給以實用的改造。好在這些意見在以後的幾部中都將重覆出現。

三

從第二部以下才進入此書的本論，也就是作者思想結晶的再表現，而首先論到的便是「社會科學的文化論」。

什麼是文化？作者並不從此處入題，而一開頭，就是「論文化與經濟」的關係，這素樸的辯證唯物觀念的發洩是必然的，亦祇有如此，才把握到文化的本質。「人類的文化，是根據自然的條件，在自然的基礎上創造起來」。「把人類征服自然的過程，理解爲文化的過程」。但是所謂自然（文化的對象和根源）究竟是什麼？作者指出除了純自然外，更應包括人性實體的自然和從社會歷史發展上表現出的自然，這樣地講文化，較之其他學人的立說，眞確得多，深得多，廣得多，而文化現象的諸般形態，亦包涵得最無遺留。

接着就「從經濟的視野來說文明化」，這一前提下所刻劃的文化，不再是獨立孤單而是有了相當的後幕來作襯托了。「所謂文化，是人類在結成一定社會關係之下，從事精神勞動與物質勞動所逐漸累積的成果」．於是文化現象亦被看作社會現象之一，不過並不是「探考一般定律或法律，而只是記述每個有特殊性的事實」。惟其如此，「我們將如何把那些各別

具有特性的事實，構成一整體概念呢」？「那需要依據超歷史的先驗的準則，卽所謂文化價値的規範，把諸般歷史的文化的個別現象，分別放進它所設定的範疇或框架中」等的德國西南學派的「高見」就被淸算掉。文化變像是該用經濟狀態來解釋，文化的發展演變，正好是經濟發達的結果。「經濟可以說是文化的出發點，亦可以說是文化的歸結點」。人類爲了要滿足經濟生活的要求，才去同自然奮鬥，才與自然及其他人類發生「歷史行爲」。

當然，這樣講來，會使得好多人，尤其是東方學者（那批提倡精神文化的超優性者），很容易不滿意的，以爲本書的作者只在着重文化的物質意義，或甚至於搬出「倉廩實而明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及「富而後敎」的一類格言來予以否定的詮釋，於是作者便連續一論二論三論地批評掉這種過分强調東方文明的幾位衛道者的謬見，唯一的利害武器，就在說明這種對於文化與經濟太缺欠理解的論調，是犯了不可恕的「色盲症」，他們將文化幻作純精神的產物，以爲完全藉助於大思想家和大英雄們的「造化」，不知道文化是生根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之上，是通過物質的利害關係而表現出來的事實。

第一篇論文是批評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觀。梁先生是研究中西文化的專家，他也有民族的好勝心，以爲中國能貢獻於世界的一份隆重禮物是「人生向上倫理情誼」，而向世界的文化作一橫的比較，說有什麼中國文化，印度文化，西洋文化等的不同解釋。但作者却從縱的觀點出發，說出這三種文化的特殊性，只是社會發展階級不同的結果，因了各別社會的經濟條件有異，所以才影響到社會性質的差次。這決不是價値的問題，而是進步與否的問題。所謂中國文化，是因爲中國歷史上的封建時期最爲長久，所以作爲封建文化之結晶部分的倫

理精神，就比了歐洲所有過的來得純化和高度化。這是很精當的意見，故而除非歐洲的各民族會退化，那麼中國的所謂「精神文明」才能征服世界，但歷史不打回頭路。然而也不就是說中國將對於世界的文化一無貢獻，中國在過去已經分輸到外國以無數文化的成果，而此後亦必有對世界可能貢獻的因子，僅須要她能趕上潮流的先哨。

較下的一篇是批評錢穆先生的東西文化觀。錢先生的意思，大致是根據於歷史與經濟立論的；一方面總括地講中西文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不相同，「西方文化可以分做幾段，中國文化却不可分；西方文化可分爲地域性，中國文化則沒有地域性」；另一方面則引用社會經濟的關係，將中國的文化史分作四時期，而認爲以這種無貴族無階級的近代社會爲背景，中國的文學與藝術「解放而爲平民的了」。作者所攻擊前一點的理由，是說出錢先生只提供事實而缺乏解釋，除了字面的漂亮外，毫無客觀的依據；後者，因爲錢先生只承認有什麼中國的農業文化而不懂得歐洲的那些工業文化，於是才以爲中國的社會是「無階級的」，中國的文化是「走過了頭」的，是僅在物質方面「不如人的」，於是才浮空地認爲中國的精神文化可以移殖到外國去，而不知中國的文化是落後的文化。錢先生力言：「秦朝以後，封建社會沒有了」，而作者指出現在這時代尙是半封建性的，因而就否定了錢先生所舉出中國的倫理精神，什麼「修身……平天下」及「忠孝仁愛」等等的時代價值。

梁先生是哲學家，錢先生是史學家。在本部的第三篇，就批評到另一「百科全書派」的學者——朱謙之先生的東西文化觀。朱先生的意見亦是將文化與經濟分作印度中國和西洋三類型而加以「宗教的」「哲學的」「科學的」三頂帽子，於是再分別地將這三基型比較地

觀察，非常整齊地比較，其所得的「有創製性」的結論便應有大同的世界該綜合三者而後担成一第四的「藝術的社會型」而產生。朱先生是形式主義者，如果不是被他的劃一美觀的詞藻所驚服，什麼人一眼就可看出他所持的折衷論的無稽，但是他却亦說到一點較對的話，就是在比較三個不同社會的經濟性時，朱先生說：「以主要的生產形態而言，印度爲農業社會（其實只能指若干年代前的印度），中國爲農工業社會（其實應指出中國農工業的特性），西洋爲工業社會（其實該說是農工商社會）。」但是少了一種時間上的觀念和進步的層次，所以才將歷史學派發端者李斯特五階段論的後三階段並立起來而橫視了，當然也被作者用同一武器所擊潰。

四

戰爭是文化的產物，是文化所胎孕出的不孝子，尤其從近一世紀以來，任何人都省識過戰爭的殘酷的眞面目，這當然是一嚴重的社會問題，可是從來的社會科學家都未加以注意，本書的作者於是提出他的「社會科學的戰爭論」，對這歷史上的大問題加以檢討。

所謂戰爭，經過了科學的研究，就找到了它的因果法則。在第一次歐戰結束後，好多社會科學家已在預料着下一次的必然，對其姿態，規模，延續期間，描聲繪影地講述出來，故而可說戰爭的研究亦是一種合乎科學根據的，並不是社會科學以外的社會現象。

戰爭的發生聯繫着社會經濟的衝突，受人類生活條件的束縛。戰爭範圍的擴大，是以「世界經濟作爲它展開的基礎」，到現代戰爭的進行，亦可從現代的經濟組織，技術，生產大

上得到解釋，這是說明了戰爭的表象和形式。但戰爭如何發生呢？作者探源到世界經濟機構的不平衡，於是才會釀出人類的不幸事件。現代之所以還不能避免戰爭，全應歸咎到資本主義（進一步爲帝國主義）生產方法所支配着的經濟機構的內涵矛盾；私有財產制，工資勞動制，商品生產制，再加一殖民地剝削制和市場的競爭制，都是使得人類不能安定的理由。近世紀來龐大生產力，更使得這種矛盾不能耐忍而一再破裂。以下便是舉例，說出自產業革命以來因生產關係之不能應合生產力而發現的種種苦悶，及這種苦悶的所以迫使在苦悶着的國家挺而走險的原因，這是社會經濟組織本身上的缺陷，作者徵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作爲他立論的根據，認爲有客觀的强制要求。

以上規劃出戰爭的性質大概，以下的二篇論文都是講戰爭與社會進步的相互關係。第一：說到社會的進步能够使戰爭逐步一直到消滅，而戰爭的發生亦並不妨礙社會的進步，這命題的結論是：「戰爭不足妨礙社會進步」。第二：然則戰爭是否促成社會的進步？從常識上判斷，從一短時間而看，戰爭自然是礙止社會的進步，不論是人口或物資的因戰爭而大量損失，若由另一角度看去，都能還原爲這時代生產力的遭到耗摧；但既然這些情形並不妨礙整個歷史過程的進展，當然也有其所以必然發生而担任的職務，那只能簡單地觀察，因爲每一次戰爭必然也是一次對社會的大刺激，使本來存有的癥結得到解除，而再趨奮向上。由於以上對立着的意見，歸納而合在一起，那麽可以將戰爭看作一種必然的社會制度下的社會矛盾的暴露，這種暴露，「可以作用爲那種社會矛盾的解消手段，它還可以作用爲一種新社會誕生的催生手段」。可是它對於社會所發生的作用，究竟是演着進步的作用呢，抑是阻礙着進

步，「不是由戰爭齎來的損害程度決定，不是由戰爭的勝負決定，甚至也不是由它對外是侵略性質抑是求解放性質決定，而最基本的是由它究竟作出了解放社會生產力的結果，抑是作出了束縛社會生產力的結果來決定」。

一切的大小戰爭都是他立論時的上等佳喻。

五

講完了文化與戰爭，作者才拉出另一問題，建設，來作爲討論的中心。普通人在這問題上是以爲只有自然科學才發生重要，以爲只須要技術或常識就可以得到他預期的成效，但作者在篇首便說出：「在事實上，建設事實是隨處要在社會上生根的，是隨處要看一般社會條件，對它在何種程度發生適應和助成作用的」。於是畫的龍有了睛。

在說完了一些社會科學在實踐上對於建設的功能後，作者便得出一概略的結語，說出建設之必須依據社會科學而出發，而任何侈談建設者如果忽略了當代的經濟背景，僅以爲能有了技術條件的努力，便能夠運用其他先進國的經驗來充實自己，那種沒有社會科學的根據的計劃，一定會招致不可饒恕的錯誤，人力物力的大浪費。所謂社會科學的根據，就是說若不在一定的社會關係之下，而想樹立起另一種的社會生產方式（生產建設方式），顯然是柄鑿不入。中國的封建性是進步的，這種傳統的經濟本質常會被掩眩過去，因爲中國的農民並不全束縛於他的田畝，而土地亦得相對地自由買賣，但在持自然科學爲建設的唯一因素者看來，便在意識上或多或少地增加他實踐的困惑。對外求解放，對內求改革，在這以前，不但不

能夢想會有先行的社會革命能移殖到中國，並且連一古典的大規模產業革命都無從說起，建設之所以難免成爲徒然，卽是對此提示的關鍵少有明瞭。

中國數十年來的建設經驗；證明這些話並不是臆度，而近來朝野人士亦深切地反省到要從事建設，還得從農村的經濟制度改革或改良着手，接着，作者便評論到「顧翊羣先生及其他工業化形式主義論者」的論究中國戰後農村工業化的這一個建設實踐上的大課題。

這是一空前熱鬧的討論，該從各別的視野，各種深淺不同的角度，來加以探索。普遍的意見，都是「把民生的還原變國防的」，「放任的還原變統制的，及重工業的到輕工業，民營到公營的，再加一「平均地權」的民生主義原則；而顧翊羣先生的意見，更添一新的課題，就是工業化應集中在舊慣的都市，抑在分散着的農村？結論便是贊成農村工業化，不過「在促進農民自己從事副業生產，以恢復農村手工業，並謀充實農家收益，以改善其生活。」及「在使都市工業分散建立於農村……」。從這些以及其他相類似的意見看來，顧先生是反對大資本，强調小商品生產，和主張以合作方法彌補技術上的缺點的；在這些話看來，或能贏得一般初從大學畢業的學生們鼓掌；但是顧先生終忘記了一更重要的地方，是太失偏於全盤的組織的改變了。「平均地權」固是民生主義的一面，然而必須配合到另一面的「節制資本」才可算是完備，否則，農民們卽使能從「農奴」的身份脫出，但在這「工業化」後的農村，他更將陷入「工奴」的地獄而不能自拔。合作制度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末期副產品，決無神通以挽救那垂滅的制度。革命不易，但在時勢所趨便不可免；改良不易，但卽是改良了，也不過將一必須被揚棄掉的社會苟延殘喘。既沒有深深地瞭解這社會的時空特性，又沒有

針對着他的弊病的發藥，僅不過擬定些懸空的步驟與方案，在一旦考核到他實踐上的準確性時，便失去了價值。作者從這同一的情形出發，連串地又批判去一些其他的農村工業化的方案，因爲其他的也犯了同一缺點，未曾體察到中國土地問題的特質。

本書的第十四篇論文，也就是本部的第三篇，是批評中國農民經濟研究會所提出的「有建設性」的「穩定戰時經濟方案」，理由與前開彷彿，而這方案又是被時間否定了的，自可不詳引述。

「破」的到此告一段落，接着作者敍出他自己「立」的意見。關於建設，在作者的本意裏，是不祇是經濟的問題，而尤其是應與政治相配合才有成績的。「歷史是如此告訴我們的，民主化與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兩個面。」要趕上時代的峯巔去，必須要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同時建設起。民主政治固然要以經濟的合理制度作爲基礎而經濟的進展——落後的半殖民半封建的農業爲主的社會進展到以工業爲主的社會——尤須在民主政治上得到保證和協力。現代民主的形成，是工業（生產力）進展後的成果；而現在的社會經濟，亦必須先有了政治的民主化才能存在。再進一步，「現代的民主問題，是經濟問題在政治方面的表現。」「民主問題在發生之始，就是把社會經濟的根本變動作爲它實質的條件。」「對於民主政治的爭取，自然要在政治上努力，但最基本的還得注意到經濟上的演變趨勢。」好了。從這些話，我們才看到現代的建設的火車的兩隻輪子，單是空嚷嚷「工業化」或「民主化」的獨輪車是行不通任何一條路的。

以上是作者在本書第四部「社會科學的建設論」中所講的大概。

六

總結本書尙不滿二十萬言，然而因爲內中所論述的題材是較爲新穎而切合實際，所以筆者雖摘敍了好多段，但還漏去精萃不少。

論到本書的優點，那麼可說是一册較新且深的社會科學書籍，從形式到內容，最少祇有三項特色爲他書所未有，未曾有；即是：「批判的」「中國的」和「實踐的」。尋常的社會科學書都僅是記述些以往的名流的語錄，排列些術語，以雜爲貴，以材料衆多爲尙，絲毫沒有選擇和推薦的作用，以致使初學者捫摸不着頭腦，即久學者時時感到惰性的催眠；可是這書却全是用批判的筆觸來行文，從評騭他人的學說裏，作者漸漸地剝露出自己的意見，使讀者亦隨時隨地可以討論他們的眞正是非，不一定跟着作者主觀的邏輯而迷信着，故而只有此一類的「立」才能眞正立得定。本書的討論問題都是中國的，用「問題」來敷衍文字，是使讀者易生親切之感。最後，本書所討論的中國問題又是實踐的，並不是詭辯，亦不是以奇異爲淵博，更不尋出些抽象的現態來反覆玩弄，却無一不關聯到現時代和現社會，這自然較之專談理論的社會科學書籍來得醉人。而另一長處，即是在每一頁都能找到西洋歷史的旁例，使任何時都對着鏡子討論，是非得失，自易明白。

相反說來，這三項優點也就是本書的缺點，如果仍執持這原有的書名，那麼顯然覺得內容與題目有很多參差，尤其是部門的不够齊全。社會科學應有些什麼綱領作爲他內涵的實質，這還是近代學者所爭訟之一端，本書作者提出他的「文化」「戰爭」「建設」的三分論，

祇不過是絜起些最重要的近代社會現象，決不可說是整個社會科學的領域是如此的樸素和簡陋，這是有待於後來學者或本書作者須補充之一。其次，即使是單獨地討論這三個個別的問題，也應該更全面地加以詳述，使這個問題能徹頭徹尾地被說明；但本書的作者顯然是有他的主觀的偏頗，如文化中着重於中西文化的差異，戰爭論中着重戰爭與社會進步，建設論中着重於農村工業化等等，致使這一被討論的問題不能全顧到，這是有待於須補充之二。批判的，於是顧不及介紹和比較，以及詳細的敍述；中國的，於是顧不及舊有學者的種種意見，而成爲一東方的社會科學，斷乏世界的普遍性；實踐的，於是只能偏於具體的說明，不及顧到純理的究辨；這三者或可說是並非本書的缺點，而只是本書的特殊處。

我的讀此書，是並不當他一冊教科書或參考書而閱讀者的，我只當他是作者的一種新學說的嘗試。在內容方面，也許可視作四部獨立的專著，在形式方面，大概是作者有一想建立新的社會科學的體系的意圖。爲了當作一本學術的私家別論，所以我才嘮叨地徵引下來，算是一公開的讀書筆記。